

海角浪子

平 德 著

封面題字：張詩劍

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HONG KONG LITERARY NEWSPAPER PUBLICATION CO

目錄

Contents

序

楔子	10
出國前后.....	12
民運搞手.....	19
逐出正統.....	34
時來運轉.....	45
居權風潮.....	56
劇烈抗爭.....	72
絕食請願.....	86
小報總編.....	95
被迫辭職.....	111
福人鷄店.....	130
重振小報.....	150
舌戰閣揆.....	167
悲歡離合.....	180
塵埃落定.....	192
各奔前程.....	198

序

臧世清

我與平德君素昧平生，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的一位朋友給我看了一部書稿，書名曰：《海角浪子》，是平德君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筆耕之作。十幾萬言的小說，讀來如水就下，一瀉無礙，或許是它所敘述的是留澳學生的生活，同時還觸及海外民運和居留權等敏感熱辣的主題，相當吸引眼球，吊人胃口，因而為好奇心所驅使，一口氣就把書稿讀完了。

這是一部傳記體的小說，敘述一位來自廣州名叫阿新的青年，在澳洲留學、掙扎求存的心路歷程。阿新在國內時曾經當過法警，槍斃過死囚。到澳洲後，浪迹天涯，窮困潦倒，後來因緣際會他成為民運搞手、中國留澳學生領袖，為爭取居留權參與和策劃了靜坐絕食、集會談判等一系列活動，成為叱咤風雲、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中間他還經歷了幾起幾落，洗過大餅，做過雞販，當過小報記者，筆觸廣涉民運內幕、兩岸諜影，以及留澳中國學生的生存狀態和情欲孽戀，內容十分龐雜，文筆舒展生動，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朋友囑我為平德君這部小說寫一篇序，高情難却，略綴數言，序稱不上，聊申讀後之感。小說還是留給讀者去品味吧。這裏，我想借題發揮，談談我對海外新移民文學之管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應該說是新移民文學的醞釀積澱期，大量學子負笈海外，生活的巨變、情感的考驗、文化的衝突、人生的何去何從，正越來越強烈地激發新移民靈魂深處創作的衝動。雖說早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

紐約》以及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失之于表現新移民生活的淺陋，但却不能不承認這些作品乃“新移民文學”的發端開山之作，它們的問世，不僅強烈地刺激了海外新移民的創作，同時也調動了海內外讀者對“新移民文學”的熱切關注。

九十年代應該說是海外新移民文學向縱深發展的繁榮期，這不僅表現在新移民作者生活積累的廣度和深度，而且還表現在文學精神的覺醒與升華上。這個時期，表現海外新移民精神歷程的長篇巨著層出不窮，其中有張翎的《上海小姐》、嚴歌苓的《海那邊》、張慈的《浪迹美國》、雷辛的《美國夢裏》、李肪肪的《我倆——一九九三》等一大批長篇小說的問世，塑造的人物已相當豐滿，主題亦走向博大深厚，為我們留下這個時代生動的面影。

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由于海外留學生的普遍思考，一代人共同的內心焦慮和情感失落以及社會文化的根本衝突逐漸浮現出來，人們的目光已不再是個人短暫的傳奇經歷，而是思考這一代人在海外所面臨的普遍境遇和命運。

所以我們說，新移民文學發軔于八十年代後期，濫觴于九十年代，經歷了由浮躁、粗糙到沉潛、過濾的初級階段，從單純描寫個人沉淪、奮鬥、發迹的傳奇故事，已逐漸走向對一代人命運的反思，對中西文化夾縫裏的新移民文化心態的表現，進而對生命本身價值的探討。年輕一代如何在海外創立華人的新形象，如何在經濟、政治地位上尋求突破，又如何營造自己民族的文化環境，就成為新移民文學聲勢浩大的主旋律。

走過近二十年的風雨探索，無論是從社會人生的積累，還是從文學意識的醞釀和崛起，新移民文學已逐步走向“成熟”，它們已不是曇花一現的流星，也不是一時炒作的喧囂，一批具有穩健精神特質的里程碑式作家的誕生，猶如延綿的峰巒，支撐着新移民文學的骨骼。

平德君的這部小說，所敘人與事都富有傳奇色彩，它所表現的新移民尤其是留學生這個群體其人心人性在生存環境中的悲劇性扭曲，揭示了海外民運的搞作、傾軋、內訌等內幕，以及與澳洲高官移民局長乃至內閣總理交鋒過招，都予人耳目一新之感。筆觸如此深涉海外民運，堪稱這部小說一大特色。

《海角浪子》中，塑造了幾個留學生的典型，有民運搞手、鑽營善變的馬

紅軍、關東北之流，有頹唐傷感的女作家夢露，有荒淫貪婪、沉迷欲海的肖伊文，也有懷抱理想、狹縫求存的小報老板尤大力，而主人翁阿新，則是一個具有正義感、同情心、能說會道、聰明機警，但又玩世不恭、放蕩不羈、狡黠多計的浪子，顯然這個人物有着作者隱約的影子。我們從他們的經歷、浮沉、拼搏，深刻地感受到大洋彼岸的風雲，海外謀生求學之路的荊棘滿途和艱辛，同時也感受到海外學子拼搏奮鬥的精神和頑強的生存能力。

據朋友言，平德君自幼酷愛文學，青少年時已在寫作上嶄露頭角，曾在《羊城晚報》等國內報刊發表習作，及後的歲月，無論人生命途如何多舛坎坷，他都始終沒有放棄和冷卻追求文學的熱望。在這部作品中，我們讀到了平德君對生活的堅忍，對人生的感悟以及對文學的執着！因此翻閱《海角浪子》，是一次新奇難忘的閱讀感受！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楔 子

自從兩百年前庫克船長發現了澳大利亞這塊神奇的大陸，之後這裏成為英國人傾瀉罪犯的垃圾場。十分有趣的是所有罪犯刑滿之後都不願回到自己的故鄉，他們愛上了這塊人類遲遲沒有開發的新大陸。這些人，包括那些僅僅因為偷一小塊面包而被流放的罪犯，成為了這塊新大陸的第一批移民。在英國白人開始大批涌進這個新大陸的時候，中國南方沿海的農民就駕駛木船歷經艱難，踏上了這片當時還相當荒涼的新大陸，開始了淘金者艱苦卓絕的生活。長達百餘年的華人移民史是一部充滿血與火悲壯的奮鬥史。維多利亞州的新金山留下了早期淘金華工的累累白骨，也留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族魂。中國人無疑是這個地球上最堅韌頑強的民族，即使在如中世紀一樣黑暗的澳洲白人種族主義橫行的時期，華人依然堅強地生存下來，薪火相傳，綿綿不絕。上帝賜予人類這塊豐饒的土地，每個民族都有權平等分享它的陽光、海洋和地底下無窮的寶藏。西元一九八七年，中國大陸的一些青年學子將目光從歐美大陸移向南半球，於是，數千報讀英語課程的中國留學生相繼踏上了這塊被稱為澳大利亞的孤獨大陸。其後二三年，幾萬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莽莽撞撞地闖進了這片美麗寧靜的大陸，他們知道這裏有袋鼠、無邊的牧場以及花花綠綠像塑料紙般的鈔票，其餘的就所知不多。但是，這些人具有早年淘金華工的冒險精神，僅僅八年，他們以自己的智慧、耐力與白人的主流社會、聯邦政府周旋，在移民的持久戰中埋葬了青春、愛情、幻想，終於成為這個富裕福利國家的新移民。在很長時間裏，這批留學生群體被稱為四十千，因為他們的總數大約超過四萬，在英文數字裏沒有“萬”，故以“千”為數。

人生本就是個大舞臺，什麼角色都可以在臺上亮相，正角也好，醜角也罷，皆於這個大舞臺上粉墨登場。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八年的留學歲月風雨如磐，四十千的故事有悲有喜，亦莊亦諧。幾位演技出色者被簇擁到舞臺中央，擺開架式，亮開嗓門，我唱罷來你登臺，你退場來我上場，甚或爭搶一番，大打出手，好一番熱鬧。有個叫胡建新的廣州學子，人稱“阿新”，便是這其中名頭響亮的人物，從國會議員、移民部長到聯邦總理，無人不知，也無人見了不頭疼，因為他是個很麻煩的怪人。故事就從阿新說起。

出國前後

阿新祖籍廣東順德，到了祖父這一輩才進了廣州城，也是下九流的貧民階級。廣東人習慣于在大名的最後一個字前加個“阿”字以爲小名，鄰裏街坊之間皆喚小名，以示親切友好，大名祇是在學堂裏才使喚。不知因何緣故，胡建新無論在學堂裏還是在街坊間都被喚作阿新，直至後來在澳大利亞聲名鵲起，這聲名亦是小名，竟無人想過阿新也應該有個大名。

凡識得阿新的人都知道他的形象實在不敢令人恭維。阿新在悉尼歌劇院前曾有一張自鳴得意的留影。照片拍得很寫意，人和大海、藍天、海鷗融合在一起，一副天人合一的意境。阿新常以此照示人，并若有其事地描述着。人要想進入飄飄欲仙的境界實在太難了，但站在歌劇院前空曠廣場上的他，却真真切切聽到了來自海天之際的天籟回音。

其實這張照片中的阿新完全稱得上其貌不揚，不修邊幅。在白熾的陽光下眯縫着雙眼，黝黑的瘦臉上顴骨突兀，一套灰色的舊西裝搭在精瘦的骨架上，讓人懷疑那西裝是路邊垃圾箱裏揀來的或是救世軍商店裏淘的二手貨，

米黃色碎花領帶鬆鬆垮垮地挂在脖子上，依稀可辨上面還粘着些不知名狀的污穢東西，也許是菜汁飯粒或汗垢之類。最有特徵的還是阿新的姿勢，小小的腦袋很自然地歪向右肩，好像脖子上得了軟骨癥。與阿新有過交往的人都不會忘記阿新那有趣的動作，無論走路或是說話，腦袋總是習慣地偏向右肩。

與阿新光着屁股一塊兒長大的伙伴後來也到了澳洲，向大家披露阿新過去的經歷，這很快就在中國學生群體中傳揚開去。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的日子苦悶乏味，他們需要八卦、奇聞軼事之類消息的刺激，阿新過去那些有嚼頭的經歷立即挑逗起大家的興趣。

據說阿新十二歲那年已經是廣州坊巷中赫赫有名的孩子王。那會兒廣州城裏基本上沒有青年人，都去海南島的椰林或山區農村“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了。偌大的廣州城儼然就是孩子王的天下，各自統領着一方地盤，當然也少不得會發生“邊界”的糾紛。那時的廣州城裏時常能看見孩子王統率一幫毛孩子爲保衛自己的地盤而“浴血奮戰”。某個夏夜，羊城上空星光燦爛，阿新正和一群孩子嬉鬧，這時哨兵報告有敵軍入侵，阿新立即以口哨集合手下的毛孩子與侵略者奮勇作戰。雙方相互廝打，不時有人負傷翻滾在地，哇哇哭叫。阿新則帶領着自己的士兵們，高喊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口號，前赴後繼，衝鋒陷陣。雙方奮戰猶酣之際，忽然來了幾個資深混混，阿新和敵軍頭目均被活捉，其他孩子們則作獼猴散。被抓住少不得“過堂”，但過程簡單極了，就是每人挨了十幾下皮帶。敵軍頭目是個草包，早已經被嚇得尿了褲子，趴在地上嗷嗷直叫。阿新知道自己的屁股也是血肉模糊，火辣辣的疼，但就是咬着牙不哭，瞪着自己那雙小三角眼高聲朗誦領袖語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話音未落，就覺得眼冒金星，一記耳光從左至右蓋在阿新的臉上。阿新旋即甩出一連串夾帶着尾音的廣州流行臟話。正覺得罵得過癮，沒提防又一記大耳光，這次顯然更重，因爲這耳光夾着一股陰風，忽喇喇實實在在地砸在阿新的左臉上。阿新感覺到脖子上骨頭移動的“咯嚓”聲，而後就人事不省，暈厥過去。

此後阿新的脖子就再沒有扳直過來，說話走路，腦袋就失去了平衡，甚而身子不動，張嘴說話那脖子也撐不住地要歪斜。阿新心裏一直爲此忿忿不平，

以至十幾年後逢人談起舊事依然如此。他媽的那個狗雜種，打耳光是有規矩的，通常是左右開弓；如果氣急了再來一個左右開弓；實在氣瘋了，也就是多加幾個左右開弓，速度更快些，力道更重些，但無論如何都會遵守規矩。那混蛋兩巴掌却都是從左至右，脖子這才被打偏了。阿新發誓以後一定要當警察，孩子王哪有警察威風。

若幹年後果然如願以償，阿新考進了廣東公安專科學校，學了幾套公安拳和檢查指紋、撬門開鎖之類的技術，畢了業就當上了警察，而且是法院的行刑隊。行刑隊就是專幹槍斃人的勾當，威風極了。阿新穿上警服的第一天，就大街小巷裏轉悠，尋找當年自己孩子王時的戰場。一幫少年正在街頭巷尾嬉鬧，見了阿新剛要作鳥獸散，即被喝住。少年們縮頭縮腦地回來。“誰是這的孩子王，給我站出來！”可是没人應答。阿新放緩了口氣：“別怕，我以前也是這兒的。”半晌才有一個胖小子畏畏縮縮走到跟前，承認自己是這班少年的頭兒，奶生奶氣還一臉傻氣。阿新伸手一把抓住小胖子胸前臟兮兮的紅領巾，曳到跟前，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扔下一句“真他媽的窩囊廢”，便拔腿離開。孩子們在原地傻愣了很久沒有回過神來。

幹了幾年行刑殺人的勾當，甚至還親手送行了自己兒時的鐵哥們阿賴，鬧得夜深人靜，阿新常被噩夢嚇醒。夢中阿賴扭曲的表情，將阿新驚出一身冷汗。

阿賴從前就是阿新孩時手下的一員幹將，跟着一塊“出生入死”。阿新考進公安學校後，阿賴也頂替退休的父親進了一家搪瓷廠做工，因為强奸了一名同廠的女工，在廣州城“嚴打”時被判了死刑。替阿賴送完行的那晚，阿新找到孩時的哥們一塊下酒館。衆人皆罵阿賴瞎了狗眼，找個破女人還挨了槍子，說着皆唏噓感嘆這女人的確是禍水；旋即又罵阿新是劊子手，什麼事不能幹竟去做殺人的勾當，還拿自家兄弟開刀。衆人罵了半宿，酒也喝了許多，才趑趄趑趄出了酒館，徑直去了那女人的家。衆人在門外發狠地搗騰了一番，最後拾起石頭、磚塊去砸那女人家的屋子，祇聽得裏頭鬼哭狼嚎，外頭的衆人才十分猙獰地哈哈大笑。末了有人不知從哪揀了祇破鞋挂在那女人家的門扣上，然後衆人才唱着《軍港之夜》，搖搖晃晃地回家去。自那以後，“色是刮骨鋼刀”成了阿新時常挂在嘴邊的口頭禪。

阿賴對着他槍口時，絕望、難以置信的眼神始終在阿新腦海裏盤旋，揮之不去。再執行行刑任務時，阿新手發抖，腳發軟，神思恍乎。上上下下見到他都跟遇到怪物似的，有人還小聲嘀咕，無非是說這人因為當劊子手弄出了神經病。阿新決定不再殺人了，不再幹警察了，打了幾回調動工作的報告，終於離開了行刑隊，去廣州市圖書館裏做了一名資料員。此後就像魚入大海一樣消失在書海之中。資料員的工作輕鬆愜意，阿新上班之後先泡一杯烏龍茶，然後挑一本有趣的書，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一邊喝茶一邊看書。圖書館的同事都知道這人以前是幹殺人勾當的，腦子有毛病，所以誰也不願去惹他。没有人打擾倒也清靜，為此阿新安安靜靜讀了許多雜書，還在報紙上發表一些豆腐塊大的隨筆雜文，筆名就是阿新。羊城的青年讀者對這個名字并不生疏，因為阿新的小品文時有機智幽默，將身邊的瑣事寫得詼諧風趣，常令讀者捧腹大笑。

八十年代出國潮風起雲湧，看着那些回國的人拿着國外花花綠綠的鈔票在眼前炫耀，聽着“國外遍地是黃金”、“國外的月亮都比起國內的更圓更亮”雲雲，再看着自己兜裏一個月幾十塊錢的工資，阿新也不禁動了出國的心思，看看國外究竟是個什麼樣吸引人的花花世界。

那時阿新在廣州有個女友叫阿芳，這個女人是讀了阿新的小品文後，通過報社找到阿新，屬於青年讀者找到才華橫溢作者的老套文學故事。阿新在圖書館裏一個僻靜的角落裏見到這位自己找上門來的女讀者。背景是一層一層、一摞一摞的書籍。這個背景很自然襯托出主人是多麼有學識、有修養，屬於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之類。那時是很流行文學青年的，阿新在接見這位女讀者之後，很快將阿芳變成了自己的女友。

阿新出國前在出租屋的家門口上貼了一個門大的“無”字後，即沒有向自己的女友告別，也沒有通知兒時的伙伴就悄然登上了出國的航班。翌日朋友們聞訊趕來，對着門上的“無”字好一陣議論。有的說這可以解釋為這裏已經無人居住，人去樓空；還有人說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是告訴小偷小摸者這裏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請不要白費力氣。最後還是阿芳說得最全面，她說這個“無”字有三層含義，一是說明主人姓胡，南方人胡、吳不分，而吳又諧音為無；二是說明黃鶴一去不復返；三是主人信奉“無為”哲學，阿

新在圖書館啃了一些道家哲學的著作，自以為道學頗深，因此在悄然離去時玩了把“無為”的把戲。

阿新去了澳大利亞不久，給國內老友及阿芳都寄了那張自己在悉尼歌劇院門前留影的照片，朋友們和女友都回信說他太有福氣了，已經見識了鼎鼎大名的悉尼歌劇院，肯定也聽了不少回世界一流的音樂會。三個月後，老友們寫信告之，阿芳已和一個小白臉好上了。阿新心想這女人也太性急了。後來老友們又寫信說，阿芳正準備結婚，原來阿新租的那間屋子現在已變成了阿芳的新房，不僅粉刷一新，房門上的“無”也被“囍”字取代。老友們建議要把阿芳從那屋子裏給轟出去，為阿新出出氣，祇要阿新點頭，朋友們就會采取果斷行動。但阿新却阻止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朋友們開始狐疑，阿新的腦子是不是真的出了毛病，變得這麼忍氣吞聲。

阿新初到悉尼很長一段日子一直無所作為，一則人地兩生，兩眼一摸黑；二則尚未遇到可乘之機。先是在唐人街上的餐館裏洗碗，一天十二個小時，那時留學生都戲稱這為“洗大餅”。在狹小的清潔間裏，看着滿是泡沫的水池、不斷送進來的盤碟、一陣陣飄進的油烟，還有禿頂香港老板半咒罵似的催促吆喝聲，阿新心底曾多次升起要殺人的念頭，真想抓起浸在水槽裏的大瓷碗，給那禿頂的腦瓜來個幹淨利落的開瓢，但是阿新還是克制住了，但絕不會忍氣吞聲。一天晚上，他悄悄返回餐館，憑着在公安學校裏曾經學到功夫，輕輕鬆鬆就打開餐館的後門，也無須開燈，借助窗外的燈光，輕車熟路地去了幾個地方，一是把兩個冰庫的電源統統切斷；二是將中央空調稍稍調高；最後對着所有爐竈搗鼓了一通，便飄然離去。第二天餐館不出所料地停業了，因為所有的魚肉都發出讓人作嘔的臭氣。警察和衛生檢疫部門的官員在現場監督，那個禿頂的香港老板不得不親自帶領員工進行清除腐臭的工作，并開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作為環境污染的賠償費。

阿新又去了一家服裝廠，老板是個越南華人，雖然身架與阿新相差無幾，也是一臉黧黑，高顴骨尖下巴，身板精瘦，一對小眼睛凶相畢露。比起先前的那個香港人，對阿新來說除了“歹毒”，再沒有其他形容詞，阿新在他面前甚至連犯罪的念頭也沒有了。阿新覺得每天的日子都很壓抑，却又無法一吐為

快。老板動不動就衝着在這裏幹活的中國留學生發火，隨即就是“笨豬”之類的一通臭罵。阿新想：他媽的你也是中國人，神氣什麼！阿新窩着火，暗自尋思着對付老板的辦法。一天晚上，悉尼遇上狂風暴雨，阿新召集幾個留學生工友冒雨撬開廠房，將所有窗戶，包括通風的氣窗統統打開，結果越南老板工廠裏的服裝成品、半成品以及匹布第二天統統成了尿布一樣的東西。

阿新第三次經人介紹進了一家希臘人開的五金廠幹活。阿新的運氣真是差極了，那個希臘人比起前兩位老板不僅凶狠有過之，而且還異常吝嗇。阿新原以為歐洲人都應該是金發碧眼，但這個希臘人竟是白皮膚、黑頭髮，一副在阿新看來不倫不類的模樣。阿新以為自己又遇到了“假洋鬼子”，結果這個假洋鬼子比真洋鬼子還凶惡。這個希臘人原先不過是希臘山區的貧苦農民，在澳大利亞向歐洲吸收移民的浪潮中，這個土頭土腦的農民携家帶眷來到新大陸，二十年之後成為這家中等規模工廠的老板。老頭六十多歲了，還整日一身油污地與工人一起幹活，脾氣大得嚇人，每隔一會兒就要罵人，而且是用英語和希臘語混雜着罵人。這裏的每個人每天都不免要挨上幾回罵，譬如喝水時間長了、蹲廁時間長了、多抽了幾次烟，甚至多看了幾眼時鐘，都會挨到老頭子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阿新本來就認為老頭子是個假洋鬼子，從心裏瞧不起這個希臘的鄉巴佬，因此遇上老頭子罵娘時，他就衝着老頭子陰陰地笑。于是老頭子盯上了阿新，兩個人一天對罵十幾回合，不分勝負，其他工人在一旁也幸灾樂禍地看熱鬧。老頭子一會兒英語，一會兒希臘語，罵得節奏明快，很有點兒山東快書的味道。阿新不會英語，祇會中國話和廣州土話，也不住地嘰裏呱啦回應着。老頭子聽不懂，不知道阿新在嘟囔什麼，常常氣得大罵中國人是傻瓜，連英語都不會說，祇會說鬼話。兩人對罵成了工廠裏的一出好戲。

阿新那天和希臘人的兒子發生了口角，因為阿新把活兒全搞砸了。老板的兒子吩咐阿新將一堆五金產品搬到大卡車上，可阿新的英文實在不讓人放心，又領會錯了，于是好一陣“**Yes**”、“**No**”後，阿新很自信說了聲“**Yes**”，結果老板兒子的嘴巴張開很久沒有合上，因為阿新并没有把那堆五金產品搬上車，反而將卡車上的半車子零件全部卸了下來，而且還堆在五金產品邊上。老板的兒子在阿新面前跳脚，揮舞着拳頭還罵了許多臟話，阿新聽懂了一句——

中國人都是下流坯子。阿新剛剛卸完大卡車，正累得想罵人，此時見到假洋鬼子的龜兒子在自己面前張牙舞爪，一時氣得熱血衝上腦門，對着假洋鬼子的兒子施展了一套公安的拳腳，將老板的兒子以及聞風趕來的老頭子揍得哭爹叫娘，然後都趴在那堆五金零件上口吐白沫。阿新悠悠地站在一邊，工人們跟着起哄。

阿新不得不離開希臘人的五金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阿新失業了很長時間。

民運搞手

人生際遇是很偶然的，機會來到你面前，你不要都不行。實際上亂世出英豪是歷史不變的規律，阿新覺得有機會他也可以成為英雄。這是他在圖書館讀史書時產生的念頭，這個念頭後來一直很強烈地影響着他的人生觀。阿新到澳洲一年多，都過着小人物的日子，甚至連正經打工的日子都找不到一兩段。阿新失業了很久，身上出國時帶來的鈔票也用得差不多了，可以說是一貧如洗。但是天賜良機，歷史終於也給了他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阿新去唐人街閒逛，本沒什麼目的，就是去中國人多的地方與人說說話，或者干脆不說話，祇是隨便走走。這時正是周日午後的時光，溫煦的陽光照着大街，路上的每一個人都在慵懶地走着。阿新有許多日子沒有去酒樓喝茶，留學讓他這個廣東人都快把喝茶這個傳統忘得差不多了。那天阿新是睡到吃午飯的時間才懶洋洋地起了床，這樣可以將早餐省了。其實所謂午餐，對他而言也不過就是一包方便面，他已經這樣吃了很久，這以後他就上唐人街來了。其實肚子還在半饑半飽地

打架，他當然沒想到自己會碰上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并影響了他今後好幾年。

遠遠見街頭聚着許多人，人聲鼎沸，隱約還聽見有人在人堆裏高聲叫喊。阿新想這架勢不是哪個少數民族在表演，就是賣狗皮膏藥的在吆喝。反正自己本就閑來無事，于是憑着好奇的本能快步擠進人堆去瞅個熱鬧。

祇見人群中央一方用幾張桌子拼成的臺子，有個中國男人正在臺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講。那人身材偉岸，戴一副挺氣派的眼鏡，舉手握拳的姿勢顯示着一派藝術家的風度，準確地說是個演員的氣質。這位同胞正說的是當下國內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學生絕食的事，他呼吁同胞們在一塊大白布上簽名，然後往捐款箱裏投錢，多少都可以，總之是獻出一顆中國心。

阿新擠到前排，看到白布上書寫着幾個大字：“聲援北京學生”。這些字是紅色的草書，阿新不知道那是人血寫的亦或紅墨水寫的，總之看上去鮮紅欲滴，異常醒目。白布上已經有些人的簽名，或中文，或英文，還有的是半中半英文的。阿新想中國人不願簽真實姓名那算什麼，于是毫不猶豫地就在白布的正中，簽上自己鬥大的名字，當然不是大名“胡建新”，而是“阿新”兩個赫然大字。白布後面幾個男女，個個神情凝重，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氣勢。但阿新一眼便知這些人也和他一樣，一貧如洗，經常失業流浪，靠着方便面為生。因為大家一樣，一臉的菜色。真是物以類聚，阿新忽然產生了一種找到歸屬的快感，甚至惡作劇地想到假如此刻有酒家侍者送來幾盤好菜，諸如姜蔥炒龍蝦之類，也許這些人的臉色就不這麼莊重了。

人堆裏有人議論正站在臺子上叫馬紅軍的英俊青年，因為他爺爺當過紅軍，所以爺爺給起了這樣一個亮響的革命名字。馬紅軍在國內可是樂團的小提琴演奏家。至于為什麼不當藝術家，却跑到澳大利亞來當演說家，誰也說不清楚。反正現在他的職業是一家酒吧裏的男招待。大概是講累了，馬紅軍從臺上跳下來。不知是不是鬼使神差，這時阿新竟陰差陽錯地爬上臺子，即興表演起自己海闊天空般神聊的功夫，倒也沒有人去阻攔。從康梁變法、五四運動，一直講到當下北京學生的絕食，講到後來身體裏竟產生出一種莫名的激動，阿新臉不變色心不跳聲稱自己這許多天寢食難安，日夜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

子擔憂，我們這些留學生身在海外，却心系國家，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聽到雷鳴般的掌聲，阿新心裏着實得意，没想到自己在演說上還這樣的天賦異稟。那日有幾百人向馬紅軍的捐款箱裏投錢，阿新因身無分文，因此祇能捐出一份口舌。

臺下，馬紅軍緊緊抱住阿新，熱淚盈眶，“我們是戰友，是同志！”阿新還沉浸在剛才演講的激動中，于是火綫入伍，加入馬紅軍上午才剛剛拉起來的留學生組織。雖然這個組織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名字，人也祇有七八條槍，但阿新覺得自己在留學中的黑暗日子已經過去了，終於找到組織了。有了組織一切就有了依靠，就有了個人的光明前途。

阿新給組織起了個響亮的名字：“中國民主研究會”，并提議以研究會的名義將街頭募捐款分幾筆給在天安門上集會的學生匯去，以示澳洲華人的支持與熱情。馬紅軍同意立即給北京學生匯款，以表示中國留學生的拳拳之心。晚上研究會就是唐人街角的一家不知名的小樓館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馬紅軍當選主席，阿新當選秘書長，另有十一個人成為委員。一天的演講讓馬紅軍的民主研究會在唐人街上一炮而紅，已有十來個中國留學生報名參加。阿新在當天晚上研究會的“一大”結束時上還像模像樣地做了一個簡要的閉幕報告。他看着圍着飯桌坐成一圈的代表們，正感到自己散發出領袖的氣質時，忽然發現主席團的委員們各個面露菜黃，一副疲憊不堪的神態。阿新知道他們與自己一樣是經常不吃早餐的，但從今往後至少可以少吃點方便面了，因為現在他們有錢，馬紅軍剛剛用白天的募捐款租下了一間在唐人酒樓上的八平米房間，作為研究會的辦公室，也是自己的栖身之所。那天的晚餐是阿新踏上澳洲以來吃得最好的，居然還有一道是澳洲龍蝦，大家歡天喜地地饕餮了一頓。

已近中午時分，坐在唐人酒樓裏飲茶的阿新正在順手翻閱着當天的華文報紙。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已成為澳洲媒體競相報導的熱點。國內學生運動局勢瞬息萬變，澳洲的媒體每天都滾動播放着北京時局的發展和社會各界對中國局勢、學生集會的關注，當然也包括馬紅軍和阿新他們的演講。研究會組織的留學生集會游行活動近來也時現報端和電視屏幕，有時甚至有記者找到酒樓裏與阿新一道喝茶，順便做個採訪。阿新覺得現在自己

簡直就是個大忙人，瘦弱的身影也出現在報紙上，照片裏身邊的馬紅軍人高馬大，無論是衣着還是個頭，都生生壓自己一頭，雖然仿佛自己祇是馬紅軍身邊的跟班阿四，顯得有些滑稽，但阿新依然覺得春風撫面，當然偶爾也會記起不久前自己還在唐人街上流浪式的身影，還在羨慕甚至嫉妒從酒樓裏出來的那些紅男綠女。可幾天的功夫，自己已時來運轉地挂上了秘書長的頭銜。人生的際遇在轉瞬間就如此天翻地覆，真是世事難料。這些變化的發生可能就是在幾秒鐘之內，就在他跳上臺演說的那一瞬，一切就都改變了。

如果没有國內學生絕食運動的堅持，馬紅軍、阿新的革命日子可能會好景不長，哪天大家把捐款花光了，還沒研究明白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式的民主，研究會就會樹倒猢猻散，大家從五湖四海來，最終還得歸于五湖四海，如同基督耶穌所說的那樣，塵歸塵土歸土。阿新們在心裏都很清楚，在澳大利亞研究民主終究不能當飯吃，沒有人會因為把在萬裏之外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研究得多明白、多透徹就賞你一頓免費的午餐。沒有錢，大家還得回家吃方便面。然而也許真是阿新吃龍蝦的時運不該絕，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北京的青年學子、市民與手執鋼槍的士兵發生了衝突，還有人倒在了血泊和火焰中，再也沒有站起來。當時天色灰濛濛，天亮之後全世界震驚了，電視裏反復播放着坦克、軍車開進天安門廣場的情景。

澳大利亞的吼聲是從悉尼唐人街對面的麥當勞廣場發出的，是由馬紅軍的嘹亮嗓子、阿新的沙啞嗓子以及幾千個中國留學生的吼聲組成的。那日大雨滂沱，廣場上竟沒有一人撐傘，大家紋絲不動地伫立在茫茫雨霧中，都默默流泪，雨水泪水已分不清誰是誰。雨水打濕了阿新的舊西裝，滿頭滿臉連着脖子裏都是雨水。阿新不去理會自己已全身濕透，繼續發表着高亢的演講，沉痛，無比的沉痛，但內心裏却升騰起自己稱之謂的民族情懷或犧牲精神。

狂風暴雨中喧鬧了整整一天，馬紅軍、阿新以及所有的研究會成員決定在這一天絕食一日，以示內心的悲憤和向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市民們致敬。這樣的日子，是無論什麼也吃不進去的，更不用說上酒樓吃龍蝦了。當然第二天中午馬紅軍、阿新一定會去酒樓，後來又在酒樓用了晚餐，其間阿新吃到自己在澳洲的第二頓龍蝦。

時勢造英雄，在澳大利亞這個寧靜的國度裏，距離中國大陸萬裏之外，中國人好政治的天分被充分調動起來，各路人馬高舉民主大旗，借着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事件，創山頭、辦團體、收人馬、搞募捐，悉尼城一夜之間冒出來由中國人自辦的民主社團竟不下十個，其中既有像馬紅軍、阿新這樣自創的澳洲“土著”民主社團，也有引進在美國、歐洲中國人創辦的民主團體在澳洲設立的分支機構。一時間華人社區裏人頭攢動，民主主席遍地開花，一派春光燦爛的景色。但是馬紅軍的民主研究會終究是悉尼這塊地盤上最引人矚目的大哥大。

第三日，馬紅軍便召集悉尼各派的中國人民主領袖們，決定在市政廳廣場再次召開追悼大會。追悼會由馬紅軍主持，與馬紅軍一同站在廣場主席臺上的除了阿新，還有新近冒出來的各路領袖們。望着臺下近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追悼會的人們，馬紅軍興奮不已：“太好了，以後這裏就是我們民主大革命的廣場，今天就是攻陷巴士底獄的日子！”

這一天，一千七百萬的澳大利亞人都在電視裏看到中國人神情肅穆的集會；這一天，聯邦總理霍克先生在首都堪培拉國會大廈前流下了熱淚，這一串泪珠感動了澳洲人民，也感動了中國的留學生。那時的澳洲居民絕對不會想到，這些中國的青年人會在不久的日後將澳洲朝野弄得焦頭爛額；更不會想到，北京的六月事件竟會改變這些在天邊的中國學生的命運軌迹。

民主研究會在那段時間裏一直紅紅火火，甚至從悉尼擴大到了堪培拉、墨爾本、布裏斯班，像開出的麥當勞連鎖店，雖然有些地方的研究會裏不過三五個人，但馬紅軍一律對外聲稱研究會已然超過三千人。六月裏那個初夏的早晨成了一個特殊的日子，此後就有了半月祭、月祭、百日祭，悉尼的市政廳廣場前熱鬧不斷，悉尼的警察們也格外的忙碌，他們要阻斷一切車輛，維持秩序，以便讓馬紅軍們的民主大軍在大街上浩浩蕩蕩、耀武揚威地通過。

那陣子阿新簡直忙極了，經常是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當然有時是和女人一起睡沙發。自從當上民主運動領袖之後，就有許多機會與革命的女戰友相處，包括促膝談心，就是那種和風細雨、春天般溫煦的談心，從月亮升起談到太陽升起，一切事情就在談心中做完了。阿新後來就選擇一個據說能理解阿

新幽默感的女子，堂而皇之地同居起來。從心底說，阿賴的教訓和阿新前脚剛走，阿珠後脚就帶了其他男人進屋的迫不及待的事實告訴阿新，女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色是刮骨鋼刀，所以現在自己與女人的關係祇是苟合，因為不管他是不是民主的領袖，祇要他是個男人，一個正當壯年的男人，都非常需要女人。阿新曾說，女人到了床上就很可愛，而下了床就面目可憎。

因為霍克總理的泣不成聲，兩行老淚挂在臉頰，這等于為澳洲工黨政府作了某種口頭上的表態。終于有一天，澳洲政府宣布給予兩萬左右的中國留學生以“特殊照顧”，他們可以延長在澳洲逗留的時間，且無論留學生中的“白民”還是“黑民”一律可以得到澳洲政府的照顧。所謂的“白民”是指那些還保留着留學簽證的中國人，這些人的簽證到期時可以無條件延簽；所謂“黑民”是指那些簽證已經過期，淪為非法滯留者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現在也可以恢復白民的身份。

阿新很早就屬於黑民的群體，他沒有錢繼續交學費，于是去申請了一張延長簽證卡。但阿新從來沒有為自己的黑民身份發過愁。在天安門事件之前讓阿新愁的是柴米油鹽，準確地說是那些方便面能不能填飽自己的肚子。如今阿新好歹大小也是個人物了，所有的華文報紙三天兩頭就會登出自己的頭像，雖然腦袋仍然還是習慣地偏向右邊，身上還是那套一成不變的灰色舊西裝，對於這樣一個知名的政治家，移民局的官員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將自己當作黑民給抓起來。

霍克總理的決定深得人心，澳洲幾家華文報紙均以最快的速度報導馬紅軍和阿新對此的講話。馬紅軍在講話中理所當然地代表起全體中國學生感謝澳洲政府的深明大義，澳洲政府之所以作出如此英明的決定，主要因為自己的努力游說的結果，否則就沒有中國留學生群體的“新生”與“解放”。阿新在發言中則相對低調得多，這僅僅是萬裏長征走出的第一步，我們要繼續與政府對話，爭取全體中國學生的永久居留。

這天，阿新照例來到研究會，祇見馬紅軍與一人相談正歡。

一見阿新，馬紅軍立即站起身介紹：“這位是悉尼大學的陳博士。這就是阿新，我們研究會的文膽。”

“您就是阿新先生，幸會幸會！在下陳炳峰。”來人很謙和地自我介紹并主動與阿新握手。

這位陳博士雖然六十多歲，頭髮花白，却風度翩翩，手掌間更有一分讓人意想不到的剛勁與有力。“阿新先生，您現在可是學生中的翹楚啊，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的演講敝人聽過多次，很精彩，也很感人。你與馬先生辦的研究會，專門研究大陸的民主，這是一個很難得的自由空間，希望能成為華人社會中有影響的時政舞臺。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願意盡我所能。”

陳博士一面領首微笑，一面訓練有素地從懷裏掏出自己的名片遞了上去。阿新接過名片，注意到名片上除了政治學博士的頭銜外，在左上角還有一個青天白日的徽章，一行小字寫着“中國國民黨紐澳地區國大代表”。

陳博士的真誠與溫文爾雅總給人相識恨晚的感覺。此後，陳炳峰來研究會的次數多了起來。也許是因為大家熟識的緣故，或許還有其他的原因，每當陳博士到來的時候，馬主席總是躬親接待。

陳炳峰也時常參加研究會裏的沙龍論壇，但與其他來參加的留學生不同，陳博士表現得總是很低調，也極少展示他一貫侃侃而談的風度，所以少有人關注。也許是因為他的特殊身份，沙龍裏發言的人常需自報家門，而來這裏的多是大陸來的學生，國共多年的關係，使得在大陸學子眼裏，他的身份的確與眾不同，所以陳博士祇好在沙龍後與馬紅軍、阿新私下交流，內容則包羅萬象地廣泛，除了與他在大學裏研究的大陸民主、時政有關的政治課題外，還包括研究會裏的社團運作、個人的喜好、經歷不等。有時阿新覺得陳博士甚至比自己更了解研究會裏的每一個人。

這天，阿新在研究會的活動公告中發現例行的沙龍活動地點被改在了澳華文教中心。

“怎麼會在這個地方？”阿新正在狐疑。

這時馬紅軍走了過來，顯然看出了阿新的心事。“這多虧了陳博士，現在我們研究會終于可以不用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了。人家已經幫我們聯系好了，

不用我們出一分錢，免費的。”馬紅軍得意地拍了拍阿新的肩膀，“以後我們可以每周五晚上都在那裏舉辦沙龍，怎麼樣？”

望着馬紅軍的神情，阿新沒說什麼，因為他知道這一切馬紅軍和陳炳峰都已經定下來了，而且公告也由馬紅軍登在了報紙上。阿新心裏很清楚那是個什麼地方，因為他曾經路過，就距離這不算太遠，在唐人街顯赫的位置，門前還挂着一面金燦燦的牌子——中國國民黨悉尼支部。

周五晚上的沙龍如期而至，馬紅軍還是有些不放心，提前和阿新到了會場。接待他們的是文教中心的邱女士，一個四十多歲、身體稍顯豐腴，但性情溫和的臺北人，另一個身份則是國民黨悉尼支部的書記。

會場正中是寬大的主席臺，背後的幕布上挂着孫中山的大幅畫像和青天白日的國民黨黨徽，兩側各插着許多面國民黨的黨旗，臺角處則懸挂著三民主義的對聯，再配上青綠色的地毯，氣氛莊重而氣派不凡。

邱女士熱情地向他們介紹着會場的情況，表示還可以請人幫忙對晚上的沙龍活動進行錄像和拍照，這些可以作為研究會的資料永久保存，費用則如陳博士交代過的一樣——免費。

寬大的會所、熱情的接待、無償的使用，對於像馬紅軍、阿新這樣的無產民主革命者而言，除了感激和笑納，還能再說什麼。

那晚研究會的沙龍熱烈而成功，還有記者到場拍照。大家都很滿意，除了阿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阿新總覺得有些無法說出的東西，或許是中國近代的內戰史吧，畢竟對於八十年代的大陸人來說，“臺灣”、“國民黨”實在太敏感了。

漸漸地，沙龍裏的人也有了與阿新一樣的感受，有人建議在活動前將主席臺上正面的國民黨黨徽遮蓋起來，將兩旁的青天白日旗也移到後臺，僅留下孫中山的畫像。但邱女士不同意，研究會在第一次來這裏時都沒有要求變動會場裏的設施，現在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是啊是啊，我們借人家的場地，在人家的屋檐下，也多為人家想想，這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別為了這點小事大家鬧得不愉快！”馬紅軍忙出來打圓場，息事寧人。但阿新和其他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接受研究會以青天白日為背景的照片被登在報紙上。馬主席和邱女士

祇得妥協。

由于沙龍活動結束時常常已近半夜，大家都累了，所以善後的人時常忘記將蓋在青天白日徽章上的幕布取下來，把那些國民黨的黨旗挪回原處。有時雖然把旗子歸了位，但因為很沉重，也祇是草草放了，不大規整。隔天文教中心的工作人員總要為此忙乎上一陣，抱怨自然傳到邱女士的耳朵裏。邱女士又找到阿新談了幾次，希望主席臺上的那些設施不要再被挪動，因為黨徽和黨旗是十分神聖莊嚴的，遮蓋黨徽、挪走黨旗對她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褻瀆行為，大陸人是不能理解國民黨人的心情，那是自國父起幾代國民黨人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國家象徵。邱女士說得在理，但却很難說服阿新他們。讓大陸來的學生接受“中華民國”的符號同樣強人所難。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後遺癥確實嚴重，海峽兩岸幾十年隔離造成的政治鴻溝比海峽還要深，誰都無法跨越。

幾天後，陳博士將馬紅軍、阿新等人找來，地點就在文教中心，邱女士也在場。阿新知道這是為什麼，但陳先生並沒有直接談到邱女士與研究會間發生的不愉快，而是回顧起了他青年時的過去。

陳博士毫不諱言自己在四十年代末參加北平共產黨外圍組織的經歷。他曾經熱烈地擁抱過馬克思主義，真心相信共產主義，也讀了不少馬列的書籍，還有毛澤東的書。那時國民黨非常腐敗，人心喪失殆盡，所以在戰場上祇有節節敗退，而共產黨得到民心，即將建立新國家的美好前景憧憬、鼓舞着像他一樣的年輕人為之奮鬥。“當時我還參加了在北平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如果不是1949年父親硬把我‘綁架’去了臺灣，說不定我現在會是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人生莫測啊！環境變了，很多東西也都會跟着變。雖然我在那時被歷史潮流卷到了臺灣，但時至今日我也不懷疑自己當年的激情。你們也許不相信，我現在依然相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是要建立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社會，但是那種社會祇在理想中，至少在很長時期內不可能實現。到了臺灣後我慢慢接受了三民主義，接受了你們所說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相較于共產主義，雖然不是完美的社會，却是有史以來最合理的制度。”

陳炳峰也談到了他的“國大”代表身份，還和共產黨的人大代表進行了一番比較，以此說明臺灣在民主政治方面比大陸更進步。“你們大陸來的學生雖

然反對共產黨鎮壓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但也不想接受在臺灣的國民黨。共產黨在大陸幾十年的教育都在醜化國民黨，就像國民黨在臺灣也醜化共產黨一樣。雙方隔閡很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彌合，所以你們對邱女士看待國民黨黨徽、黨旗的態度不認同，這一點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既然是借用人家的場所，起碼的尊重還是要的。中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大家都是中國人，應該禮尚往來，以誠相待。客人隨便移動主人的東西總是不禮貌。何況對於主人來說，這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如果你們擔心會拍到這些東西，可不可以對拍照的人事先有個交代，拍照時背對主席臺，或在角度上避開主席臺，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你們說呢？再說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現在還挂着中山先生的畫像，當年的八路軍軍帽上不也有青天白日嗎，這些對你們來說也沒什麼避諱和可怕的。”說完，陳博士用他那一貫慈祥的目光注視着阿新他們。

雖然話音不高，但陳博士的道理却如水銀泄地，讓人無懈可擊，阿新自然祇得接受，馬紅軍更在一旁一個勁地點頭稱是。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馬紅軍將阿新等幾個研究會的頭頭腦腦找到辦公室，向大家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準備在研究會的基礎上注冊成立一個新政黨——中國民主促進新黨。這確實是個驚人的舉動。因為此前海外還沒有誰提出要組織一個在政治上和共產黨相抗衡的政黨，之前的研究會充其量不過是個大家聚在一起談論國是的民間論壇，而如果是政黨，則有嚴格的綱領和紀律。這是阿新從未想過的。因為從大陸出去的人都知道，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祇有一個真正意義的政黨，如今馬紅軍想挑起這面大旗，這將是海外中國人的第一個政黨。這意味着什麼，實在太大膽了，這是馬紅軍能所想得出來的嗎？背後有沒有高人指點？阿新默不作聲。也許是這個決定宣布得太突然了，大家都在心裏暗自掂量，研究會裏一時寂靜無聲。

寂靜終被牆角一個洪亮而帶着濃重東北口音的發言所打破。

“我同意。”

大家扭頭回頭注視聲音轉來的地方，一個大塊頭的男人正站在那裏——關東北。

馬紅軍見有人贊同，立即來了精神，面露贊許：“好，東北，你說說看。”

“現在中國社會腐敗遍地，就是因為沒有一個與共產黨可以對抗的政黨。中國早應該向西方學習，推行雙黨制，朝野輪替、相互監督，執政黨就不敢像現在這樣為所欲為。這就是民主進步，是歷史潮流，我們應該先站出來開天辟地。我相信祇要有人先站出來，很快就會有人效仿我們。如果雙黨制能在國內推行，共產黨離倒臺的日子也就不遠了！”關東北毫不保留自己的想法。

關東北的經歷確實與眾不同。他出生在鬆花江邊的一個小城市，父親曾是大學裏的教授，文革中被打成了右派，關東北也因此受到連累，年紀小小時就蹲過牛棚，後來才被平反。他是研究會裏較早出國的一個，不知什麼原因大家都管他叫“關教授”，至于是否曾在國內教過書倒沒有人深究。關東北的話雖然不長，但在政治上的抱負可見一斑，這可能跟他的人生遭遇有關。

那天晚上馬紅軍的“新黨”算是成立了，事後並沒有在研究會裏公開，成員也祇是來開會的七八個人。由于關東北的鼎力支持，被馬紅軍排在了第二位，從那天晚上起成了“新黨”的副主席，負責起草黨的綱領。畢竟現在就要早下手為強，為將來回國執政做好準備。

三天後，馬紅軍再次召集大家到辦公室二次開會，關東北當場宣讀了黨的綱領，洋洋灑灑好幾頁紙。阿新發現除了照搬研究會裏的那些章程外，祇有一條與眾不同，簡而言之，黨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流血的手段在中國推翻專制，並在不久地將來，以政黨的面目回到中國。這引起了會場裏的一片唏噓。馬紅軍除了安靜眾人，並沒有意思打斷關東北的話。

關東北從抽屜中取出一摞資料放在桌面上，指着對眾人說：“這不是沒有道理的，牛一雁等民主人士已經在美國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共產黨的政權在兩年內就會完蛋，所以我們應該早做準備，大家盡一切可能回國內去發動武裝，就像當年共產黨對付國民黨那樣，農村包圍城市，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發動中國的民衆起來革命。現在國內已經民怨沸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是共產黨的最後堡壘了，一旦發生革命，國際上一定會大力支持，臺灣方面也會不遺餘力地支持我們裏應外合的行動。”

關東北的話今天看起來似乎很可笑，但那天晚上竟獲得大部分人的支持。

“這三天他們究竟都幹了些什麼？”阿新心中暗想，三天前大家還對成立新黨的事表現得猶豫不決，瞻前顧後，怎麼三天後就……

最後是表決。結果除了一二個人沉默，其餘人舉手都表示了同意。阿新則屬於少數派中的一個，因為他知道馬紅軍、關東北他們現在搞出的這個黨綱意味着什麼，這可能將是一條不歸之路，與自己出人頭地的初衷并不相符，甚至越來越遠。

看着自己起草的綱領獲得通過，關東北更加熱血沸騰：“祇要美國和臺灣在人員和物質上支持，我願意第一個返回東北，到農村去發動革命。”

這時一直不表態的馬紅軍終於開了口：“既然大家都認可，下步我準備請國民黨大洋洲的海工會主任和大家認識，具體探討今後的工作。”

聽到這些，阿新更是大吃一惊，倒不是因為馬紅軍今天才和大家講明他與臺灣人的關係，而是阿新在公安學校裏就被傳授過，這個“海工會”歷來都是臺灣國民黨政府下屬專門針對中國大陸而設立的特務機構。這不僅在當時，即使是現在的中國大陸人組織的民運團體內也一直都是諱莫如深的事。

阿新猜測着這個重要的特務頭子究竟是誰，大陸學子將和臺灣特務接觸，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心中不免緊張，這在不久之前還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九月初，這個神秘的海工會主任終於露面了，結果阿新見到的却是陳博士。那天陳炳峰來得比誰都早。

陳博士依然溫和地握着阿新的手，笑道：“胡先生，沒有想到吧。”

“的確沒有！”阿新也不回避，“沒想到特務頭子竟是你這樣的，電影上的特務都長得很陰險。”

“哈……”陳博士笑着，“臺灣的電影中共產黨的地下黨也是長相陰險，而且還很土，很沒文化。”

那晚討論的事不少，都是有關臺灣援助馬紅軍的研究會和新黨的問題。

一天，陳博士向大家表示已經得到了臺灣方面的承諾：一是同意分批選送大陸學生赴臺灣接受武裝訓練，為今後在大陸發動鬥爭做好準備；二是通過悉尼唐人街幾個臺灣華人社團，定期將活動經費通過這些社團轉給新黨；三是盡

快從臺灣運送一批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籍分發給馬紅軍的研究會，並通過研究會的沙龍分發給其他大陸的學生；四是邀請新黨成員在適當的時候訪問臺灣，觀摩臺灣的政治民主。

幾天後陳博士帶着悉尼臺灣總商會的葉會長與研究會裏的人見面，葉會長不僅代表悉尼臺灣總商會向馬紅軍當場捐贈了三萬澳幣，以示對馬主席直執追求民主自由品格的欽佩，還帶來了上百套印刷精美的《三民主義》，由馬紅軍分發給各地的民主研究會分店，並作為周末沙龍的禮品贈送給來參加的中國學子。馬紅軍當然也不會空手回禮，除了感謝葉會長的慷慨和陳博士的精心安排外，代表研究會特邀葉會長作為研究會的副會長參加今後沙龍的活動，葉會長也毫不推辭地接受了。

再過四天就到九月十二日，馬紅軍、阿新準備聯合各地民主研究會舉行一個天安門運動的“百日祭”，悉尼的活動還是放在文教中心。晚上，陳博士再次來到研究會，馬主席照例親自接待並奉上咖啡。陳博士一面關切地詢問籌備的情況，一面從隨身的公文包中掏出一盒錄像帶和幾張報紙交給馬紅軍：“這是臺灣方面專門為你們制作的‘天安門事件’的全部真相，前兩天剛寄過來，我現在祇有一盒，你翻錄完再把母帶還給我，到時可以播放這個。還有，這是《中央日報》，以後你們都能定期收到，雖然會比正常晚兩天，但都是空運過來的。”說着，陳炳峰隨手遞出一張二萬澳元的支票，用眼睛向馬紅軍示意了一下，馬紅軍收下了錄像帶和支票，沒說什麼就鎖進了抽屜裏，報紙則疊放在一旁的桌面上。

陳炳峰一走，馬紅軍就叫過關東北，交代他將錄像帶多復錄幾份，用最短的時間寄給各地的民主研究會，以便在百日祭的時候一同播放。

看着關東北離開，阿新才來到馬紅軍的桌前：“這行嗎？”

馬紅軍知道阿新指得是什麼：“沒什麼，絕對安全。陳博士說了，這祇會對我們的發展有好處，祇要那天活動氣勢大，就會有更多的地加入我們。至于播放的事，我已經交代給東北，你就不用操心了。為了中國的民主能早日實現，有時我們也不能太婦人之仁了！”說完，點着一根雪茄，靠在大班椅上，自顧自地抽起來，不再理會阿新。

阿新祇得默然退了出去。

十月初，陳炳峰再次來到研究會，這次主要是邀請研究會的幾個骨幹參加臺灣的“雙十”慶典。馬紅軍當然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而被陳博士點名參加的，除了關東北，還有阿新。由于被邀作嘉賓發言，馬紅軍在研究會裏熬了幾個晚上，終於弄出份三四張紙的發言稿，又讓阿新按自己的意思，花團錦簇般潤色了一番，才安心踏實。

“雙十”的慶典于唐人街最大最豪華的中華大酒樓舉行，筵開幾十桌，澳洲聯邦、州以及市三級政府都有官員蒞臨，僑社的頭面人物也到了不少，當然主要來賓都是國民黨人。阿新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國民黨人，心想不是都讓解放軍秋風掃落葉般差不多打掃幹淨了嗎，怎麼還有這麼多“殘渣餘孽”？這是很偏遠的澳大利亞，一下子可以冒出如此之多的國民黨反動派，那要是在紐約三藩市那些地方，還不滿街都是國民黨的遺老遺少？阿新也是頭一次見識這麼大場面的盛會，從前在廣州不是沒參加過聚餐，但跟街頭小巷的大排檔差不多等次，哪能跟眼前的氣派相比，而且每個作為貴賓出席盛會的人，胸前還別有顯示貴賓身份的燙金紅綢條子。看節目單時阿新發現馬紅軍的發言被排在很前的位置，宴會先由陳博士作為典禮的主持人代表國民黨致辭，接着是澳洲官方代表致賀詞，然後就是馬紅軍，後面還有一大串發言者，顯然主辦方是將馬紅軍作為大陸的代表給抬了出來。

那晚馬紅軍的發言猶如在會場引爆了一顆小核彈，震撼無遠弗屆。馬主席說，中華民國國慶不僅是臺灣兩千萬人民的國慶，也是十幾億大陸人民的國慶，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所界定的國家權限涵蓋了臺澎金馬和整個中國大陸，所以我今晚是代表悉尼的大陸留學生來參加自己國家的國慶。我不是客人，我和在座各位一樣，心情激動地參加國慶盛典，也許我比在座諸君更為激動，無比激動，因為臺灣海峽的阻隔，因為中共剝奪了人民自由的權利，我和千千萬萬大陸人民無緣參加這樣的國慶慶典。現在我有幸來到這裏，我是回家來了，回到祖國的懷抱，和同胞們一起慶祝我們國家的生日，普天同慶的偉大日子！國父孫中山先生親自創立的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民主政體，所以其政府理應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中共所建立的

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體，它在四十年暴政期間殘殺了幾千萬人民，就在今年六月四日，還以坦克裝甲車進攻天安門廣場，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流血慘案，這樣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這個所謂的人民共和國并不代表中國人民。因此我們要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推翻中共專制政權，完成國父孫先生統一中國的遺願。革命尚未成功，諸君尚需努力……

馬紅軍的確是個藝術家，演講中充分發揮着自己在舞臺上的天賦。典禮上掌聲經久不息，楊博士在主席臺邊領首微笑，馬紅軍的風采甚至蓋過了在場的所有人，成為那晚最耀眼的明星。第二天便有馬紅軍在慶典上激昂演說的照片被華文報紙刊載在有關“雙十”慶典新聞的頭版頭條。

但阿新明白，國民黨人是不會虧待馬紅軍的賣力演出的，而今天自己和馬紅軍一起被邀請，顯然是陳炳峰將他們看作是一根藤上長出的兩個瓜。對此，阿新感到了一絲從未有過的不安，因為馬紅軍是演員，而自己則不是。

這是大陸學子在悉尼頭一回參加臺灣方面舉辦的國慶晚宴，這個意義之大毋庸諱言。事後有人從邱女士那兒看到臺灣中華民國總統專為此事而發給國民黨悉尼支部的嘉獎令，方明白此事意義堪比天大地大。

由于與海工會走得太近，馬紅軍、關東北沉迷于自己的武裝鬥爭理論，研究會沙龍裏的議題也越來越由要民主走向了反專制，偏激、爭吵在沙龍裏也越來越多，這都讓阿新看在眼裏，怠慢了沙龍裏的活動，有時研究會裏一周也不見阿新的身影。共產黨在大陸執政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國民黨尚被共產黨趕到臺灣一隅幾十年都無力反擊，何況是幾個初到澳洲立足未穩、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真是一地雞毛。

逐出正統

中國人歷來有個習俗，任何事都要分出個門第高低，正宗旁門。在海外的中國民運團體也不能免俗。當時中國的海外民主派們是有正規軍的，就像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有中央軍、晉綏軍、西北軍、東北軍之分，即使連中央軍也得分出個黃埔系、保定系。無論馬紅軍、阿新的民主研究會在澳洲多麼熱絡，終究祇是這個地球偏遠一隅上土生土長、不入流的地方軍。在正宗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看來，馬紅軍們都祇是些旁門左道，祇有皈依了歐美中國海外民主派的門下，這些烏合之衆才能最終修成正果。

當時海外中國人爭取民主運動有兩派是不能不提的，一派在美國的紐約，叫“民主聯綫”，成員多是些出國較早的中國留學生，其中還有許多博士和碩士；另一派則在法國巴黎，是六月那個早晨之後從北京逃出來的廣場精英們組成的，叫“民主陣綫”。爲了早日修成正果，馬紅軍分別給紐約和巴黎的民主正宗人士拍去了傳真，要求皈依正宗，加入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洪流，接受真正的考驗，表態是十分的誠意和謙恭。

這天上午，歐美正宗人士不約而同地來信了，馬紅軍像嬰孩般興奮地接過秘書遞過來的傳真，如饑似渴地拜讀起來。但見馬主席剛才還是春風沐雨，陽光燦爛，一會兒的功夫就烏雲密布，接着“啪”地一聲將傳真拍在桌案上，電閃雷鳴般咆哮起來：“阿新，阿新。”在場的人驚得面面相覷，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見没人應答，馬紅軍這才反應過來，阿新最近來研究會的次數明顯少了許多，于是急忙叫人快去將阿新找來。過了許久，阿新才不急不忙地到了。

“你看看這個，這是什麼意思？”見到阿新，不等對方開口，馬紅軍就將剛才的傳真氣呼呼地推過桌面。

阿新早已了解馬紅軍的脾氣，從容地拾起兩封傳真，其實內容相當簡單，大體如此：一是對馬主席的研究會懇切加入表示歡迎；二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是神聖的運動，直接關係着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有朝一日大家必然回國執政，因此必須純潔加入者，絕不能讓投機者有機可逞；三是由于歐美的民主社團在澳洲已有分支和代表，所以加入的請求事宜已全權委托在澳洲的代表負責，希望馬紅軍等加入後充分服從領導，爲早日實現中國的民主共同奮鬥。

“阿新，我們可是澳洲最早成立起來的民主團體，現在不說第一，也是第二。我們好心加入他們，居然還想純潔我們。他們有什麼人在這兒，之前他們的代表在哪兒，現在反倒要我們去聽從他們的領導和擺步，我馬紅軍可咽不下這口氣！”馬紅軍依舊氣息未平，“你說我們是不是他們所說的投機者？他媽的什麼純潔，我看他們是想把我們純潔出去，把我們的研究會收編下來！他們那些人才需要好好純潔一下，聽說從北京逃亡出來的也他媽是魚龍混雜，什麼人都有。”

阿新又看了一遍傳真，也沒想到民主運動竟是這般的復雜。

于是馬紅軍決定不再找什麼中央軍了，當個地方軍也不錯，如今在澳洲的民主地盤上，有誰不買他的賬。

馬紅軍原以爲這澳洲他完全可以占山爲王，這塊新大陸就是他馬紅軍的天下。可好景不長，情勢就急轉直下，美國的“民主聯綫”和法國的“民主陣綫”紛紛出手，他們在澳洲的分部組織迅速擴大，很多本地的民運社團都紛紛

投降倒戈。後來情勢更加不妙，馬主席的研究會裏“變節者”也與日俱增，不是今天這個聲明退出，就是明天那個研究會分店打來電話，表示全體脫離，不再聽從馬主席的號令。馬主席手中三四頁的人員名單，不到一個月竟縮水了一多半。事態愈發嚴重了。

共產黨人說過“槍杆子裏出政權”，這千真萬確。在海外玩民主也要講遊戲規則。這個規則就是實力，就是人馬、就是花花綠綠的鈔票，所以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歷來都是最講實力的地方。沒有人馬就沒有實力；沒有實力就沒有辦法舉辦更多的募捐會；沒了募捐自然就沒有鈔票；沒了鈔票在民主的遊戲中就失去了發言權；沒了發言權還有誰會聽你的吆喝；沒有人聽你的，還談什麼領導；沒有領導，如何說自己能把握中國政治的走向；不能把握中國政治走向的人還能叫中國民運人士嗎？自海外有了中國民運人士，這就是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爲了這規則，不知有多少的中國民主精英們爲之折腰。所以對於阿新和馬紅軍來說，這絕對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還是個直接影響到將來要不要再回去吃方便面的問題。要知道吃過龍蝦的人是無論如何不會再想回頭去吃方便面的，除非他的腦殼進水。所以無論如何得穩住人心，不能讓民主研究會的這塊招牌被民運的正宗人士們給摘下來。馬紅軍和阿新苦思冥想，一時沒了對策，像遭霜打的茄子，蔫頭蔫腦。。

十二月的中旬，一個消息傳來，法國“民主陣綫”中央的兩位首腦級人物即將訪問澳大利亞，來人一位叫庫爾班木，是“民主陣綫”的副主席，另一位叫千大發，中央的秘書長。訪問活動除了與執政的工黨政府進行親善活動，體現海外人士爲中國民主不屈的風範外，就是順道慰問一下在這個位處地球偏遠大陸，但依然還在堅持中國“民主陣綫”的澳洲同仁們，雖然澳洲分部的旗號一個月前才正式打出來示人。

得到這個消息的阿新如獲至寶，很快宣布研究會作爲澳洲本地的華人社團，也將參加歡迎民運領袖訪澳的一系列重大活動。

“你這是玩什麼把戲？”馬紅軍不解地問，自從上次接到傳真後，馬紅軍就與正宗的民主人士們井水不犯河水了。

阿新故意賣着關子：“聽我的，到時就知道了。”

看着馬紅軍仍然是一臉的疑惑，阿新笑咪咪地說：“你老馬不是個藝術家嗎，你對這裏華人的文藝圈子很熟，能不能給我找些年輕漂亮的姑娘，越多越好！”

“這裏從中國大陸來的女性本來就不多，你找這麼多美女幹什麼！”馬紅軍還是沒弄明白。

“搞個美女鮮花隊，準備迎接我們遠道而來的法國客人啊？”阿新狡黠一笑。

“你不是要用美人計吧？我可以找些人來，可你也別胡來，這兩個可都是世界名人，弄不好把事情搞砸了，我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馬主席有點明白阿新的用意了，但還是擔心。

“你放心，出了事我一個人扛着。另外再幫我找一點他們的資料。”

“行，我去找找看。”看阿新表了態，馬紅軍這才放了心。

星期四的悉尼，晴空萬裏，艷陽高照。遠道而來的庫爾班木和千大發一前一後剛步出候機大廳，立即被在場等候的記者和迎接的人群圍住。鎂光燈下，庫爾班木和千大發笑吟吟地向衆人招手致意。這時歡迎的人群後面一陣騷動，祇見十數名身着艷裝、手捧鮮花的美女呼啦啦地擠進人群，將客人與迎接的人群隔開，把庫爾班木和千大發兩人牢牢地包圍在中間。這時阿新拉着馬紅軍擠進美女叢中，與庫爾班木和千大發緊緊握手。

“歡迎、歡迎，見到你們太高興了，記者們都來了，現在就在機場會議廳，準備與兩位見面呢！”阿新并不自我介紹，說完就拉起兩人在美女與鮮花的簇擁下款步走向會議廳。由于之前的聯系祇是傳真和書信，庫爾班木和千大發并不真正識得到底誰才是“民主陣綫”澳洲分部的同仁，祇大約知道個名姓，由于阿新沒有自報家門，加之美女與鮮花的魔力，此時的法國客人早已將阿新完全當作了自己人。這也難怪，那時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發展得實在太快，常常是中央和地方還來不及謀面，天下就已經紛紛樹起了皈依的招牌。

在美女、鮮花後面的才是庫爾班木和千大發自己的澳洲隊伍。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美女，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今天他們本應是這裏的主角，是嫡系，但現在却一下子變成配角和隨從，祇能被擠到記者會的角落裏，遠遠地看

着，一句話也插不上。

記者見面會由馬紅軍主持，記者們爭先恐後地提問題。因為這兩個法國來的客人是全球都閃耀的政治明星，他們的未來也許就昭示着中國的未來。

一位美聯社記者發問，“庫爾班木先生，你們是否準備成立中國人在海外的流亡政府？如果有，這個政府將設在法國還是美國？你們的政治綱領又是什麼？”

年輕的庫爾班木顯得當仁不讓，意氣風發：“我們現在叫民主陣綫，實際上就是代表了中國在海外的流亡政府。這次和我一同來的千先生就是這個流亡政府的秘書長。”說着指了指站在一旁的千大發，算是介紹，接着說，“我們的組織中央設在巴黎，因為法國政府與民衆對我們非常友好。你是美聯社的記者，我想請你轉告美國政府，他們的目光太短淺了。幾個月前我和千先生流亡到香港時，曾向你們的領事館求助，但你們拒絕收留我們。你們的政府失去了一個與中國未來打交道的極好機會，會為此後悔的！”

這時，中年的千大發在一旁接過話茬，“敝人和庫爾班木副主席此次訪問澳洲，就是爲了擴大民主陣綫在全球的影響力。作爲一個代表着中國命運、具有流亡政府職能的團體，民主陣綫代表了中國的未來。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訪問爭取澳洲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美國政府沒有收留我和其他中國的民主人士，他們已經認識到走錯了一步棋。我們一直致力于在中國大陸建立平等、公正、自由、法制和人權的民主政府，這就是我們的政治主張。”千大發的發言顯然更加老道。

“你們認爲何日可以入主中南海，你們有這種實力嗎？”一位法新社記者問。

依然是庫爾班木發言：“三年，我看三年之內中國就能完成民主革命。共產黨曾用三年時間打敗國民黨，我們也用三年時間建立民主政府。”

“中共有三百萬的軍隊，你們怎樣取得政權？你們準備建立軍隊嗎？法國政府能允許你們組建軍隊嗎？你們的士兵從哪裏來？”法新社記者接着問。

“我們反對暴力革命，走和平演變的道路，今天的東歐就是明天的中國。我說三年是保守估計，也許一年，也許三個月，我們就已經可以在天安門舉行

慶典活動，我個人對此充滿信心！”庫爾班木如同當初在天安門廣場上一樣豪情萬丈。

在場記者一陣嘩然，這個維吾爾族的小伙子一向口出狂言，而且目空一切。但是時勢造英雄，這樣的毛頭孩子居然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一呼百應，豈非咄咄怪事！

這位法新社記者繼續追問：“可你們現在是中共政府的通緝犯，又離開了中國，怎麼去領導中國的民主運動。任何國家的政權轉移都需要兩種政治力量在本土的較量，東歐國家的政權轉移也是這樣完成的。請問你們人在法國又如何在三個月內入主中南海？”

這時，千大發搶在庫爾班木前面說：“我們民主陣綫擔負着領導國內民主力量的重任，一旦條件成熟，我們流亡的民主人士就會返回中國進行民主活動。民主是世界潮流，我相信有三年時間，中國可以實現政權更迭，人民將自由行使民主的權利，民主政府也將應運而生。我們民主陣綫的全體同志都將親身見證共產大廈傾倒的歷史時刻。”

“假如你們取代了共產黨政府，庫爾班木先生會出任主席或總統，千大發先生會出任總理嗎？”澳洲《悉尼晨鋒報》的記者問。

庫爾班木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和千先生以及組織的現任主席沙先生，毫無疑問要對歷史負責，擔任未來民主政府的主要領導人。”

千大發則補充道，“我們倆的名利無足輕重，將來的民主政府是由全國大選產生的，由國會中的多數派組閣。我們如果成爲執政黨，在國會中占多數議席，我們這些民主運動的領導人有可能進入政府內閣。”畢竟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在國內時又曾做過中國最大的民營集團的總裁，千大發的說話更顯沉穩。

會場氣氛異常熱烈。庫爾班木與千大發身後是十數名美女做背景，這些美女的妖嬈充分展現出這個南半球國家的熱力四射，而民主運動加上美女又進一步證明民主是很有人性的，民主革命非常刺激。在場的記者很激動，因為偉大的東方古國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站在邊角的庫爾班木的澳洲同仁們也個個群情亢奮，他們毫不懷疑自己就是中國民主運動，不，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

代實踐者，是開國的功臣。果如他們的領袖們所言，將來自己回到國內那又將是怎樣一番景象，怎麼至少也可以弄個廳長、局長的當當，甚至是省長、部長，最差也得是個國會議員。大家聽着領袖對未來的憧憬，個個不由臉露喜色。

就在這熱烈之際，一句冰冷地提問澆滅了全場的熱情：“尊敬的庫爾班木先生，在北京學生們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你為什麼溜到飯館裏飲酒作樂？請告訴大家，這是不是真的？”阿新握着提問的話筒陰陰地問。

全場頓時鴉雀無聲，眼光齊刷刷地盯着阿新。

“這……”庫爾班木的笑容一下凝固在肥胖的臉上，面對“自己人”突然的發難，幾秒鐘後庫爾班木紅潤的臉盤變成了猪肝色，而後是青白色，“這，這是無耻的謠言！”當大家將目光轉向庫爾班木時，祇見這位副主席忽然昏迷倒地。

全場立刻大亂，還是臺下“民主陣綫”的澳洲同仁反應迅速，立即衝上臺一把抱住庫爾班木，然後又去搶馬紅軍的主持人位置，其中一人大聲疾呼：“大家不要慌，請安靜，我才是今天會議的主席，馬紅軍篡奪民主革命，欺騙公衆，阿新污蔑我們的領袖，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的聲音還是瞬間被淹沒在混亂中。

這時身後的美女們也撲倒在庫爾班木身上，把庫主席的頭枕在懷中，又是搖又是捏，還進行嘴對嘴的人工呼吸。

阿新覺得這一切真是恰到好處，又不失刺激，太有新聞價值了，躲在一旁自鳴得意。

這時有人站起來質問：“阿新，你丟中國人的臉，太丟中國人的臉了！”

“中國人的臉是什麼樣子？就像他這樣嗎？”阿新反問，用手指了指還躺美女懷中的庫爾班木。

在場沒有人可以回答。祇有千大發沉着地說：“當初的絕食行動很艱苦，許多年輕學生都得了絕食後遺癥。庫爾班木的病很嚴重，經常會出現短暫的昏迷情況。不過各位可以放心，庫爾班木副主席會好起來的。今天的記者會就開到這裏。”

這時，馬紅軍也從旁邊趕過來，悄聲對着阿新說：“你小子真絕，今天這個記者會可以稱得上盛況空前。你說這個庫爾班木沒事吧，不會鬧出人命來吧？”

“放心，那個庫爾班木沒事，他這是裝死，我注意到他幾次偷偷睜開眼睛看美女。我還注意到他和每個參加人工呼吸的美女都是真正的接吻……”阿新說得有模有樣。

“你胡說，哪有這等事！”

“不信，你看。”說着，阿新點指一名在臺上的美女，美女走了過來，阿新對着她的耳朵說了點什麼，美女笑着點點頭，返身回到臺上，走到庫爾班木身邊，拉開其他人，“我是護士，我來試試。”說着她俯下身子，很熟練地進行嘴對嘴的呼吸。

這時，阿新對馬紅軍說：“你去看看，準有好戲！”接着又找來幾個記者，包括自己的老朋友、《悉尼晨鋒報》的記者大衛，記者們順着阿新的指點，看到昏迷過去的庫爾班木正躺在地上，被勾在一個女人的懷裏，進行着接吻。

“你們將拍下絕對有新聞價值的照片。”阿新在一旁提示着。

與庫爾班木接吻的女子此時特意側過臉來讓記者們拍下正面的形象，記者們眼疾手快地搶拍這一組奇妙的鏡頭。當千大發們發現時，阿新和記者們已達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大多數人更不知道這些美女全部是由悉尼紅燈區的妓女與舞女組成的。

一場本應隆重的歡迎式被阿新導演成了一出鬧劇。千大發決定替庫爾班木挽回面子，于是當天晚上在喬治街的威斯理教堂舉行了空前未有的民主演講。阿新和馬紅軍也去了，但他們祇敢躲在牆角。千大發揚揚灑灑的幾個小時演講，就煽動了近百人當場報名參加民主陣綫。

恢復了常態的庫爾班木也站在臺上：“你們是火綫入黨，我代表民主陣綫中央祝賀你們的加入！朋友們，未來屬於我們，勝利屬於我們！”說着，伸出手指打出一個“V”型，那是他在不久前初夏裏的天安門廣場上經常打出的手式。然後庫爾班木帶頭唱起《義勇軍進行曲》，威斯理教堂回蕩着雄渾、悲

壯、蒼茫的歌聲……

歌聲方落，威斯理教堂裏集會的人還沉浸在激情之中，忽然牆角又傳來阿新陰陰的聲音。“庫爾班木主席，中國政府指控你公開嫖妓，請問你一共嫖妓過幾次？”

教堂裏霎時像是消了音，靜得可怕，這個問題與大會的氣氛極不協調，像是來自其他星球讓人莫名其妙的聲音，因此全場沒有人反應過來。第一個回神的是千大發，他平靜地說：“這是共產黨的惡意中傷，庫爾班木副主席是個正直的人，絕不是那些謠言可以擊倒的。朋友們，現在鬥爭很復雜，共產黨企圖用誣陷的手段刻意損害我們年輕的領袖，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千大發話音剛落，阿新又冷冷地問：“庫爾班木先生，中共為什麼不去指控其他學生領袖嫖妓，單單指控你呢！你真的就沒玩過妓女嗎？據說你還偷人家的老婆，那個臺灣歌星參加的四君子行動，曾經委托你照顧他在大陸的歌手老婆，你就照顧到和她上床，然後去天安門廣場的帳篷裏對她的丈夫說，你老婆一切都好，請放心絕食吧。你這次訪問澳大利亞是否是爲了帶這個女人回法國？我所知道這個女人現在已經到了堪培拉，你明天訪問堪培拉是否會和她約會？請你現在就如實告訴告訴大家……請不要再演悲情的苦肉計，我知道你沒有絕食後遺癥；請不要再昏迷過去，因爲這裏可比機場上臟得多。”

但是庫爾班木還是沒有聽阿新的勸，慢慢地倒下去，就像電影裏的慢鏡頭。

威斯理教堂那天擠得密不透風，連過道裏都擠滿了滿懷激情的中國學生，因此在庫爾班木昏死過去時，許多人爭相前去搶救自己的偶像，這些人并不知道今天上午在機場候機大樓已經發生過的一幕。由于人群擁擠，教堂發生了混亂，祇聽見桌椅乒乓和女人的尖叫。有人喊着要打倒阿新，許多人就去找阿新。此時阿新早已脫身，坐在唐人街的快餐店裏，與馬紅軍及衆朋友一起享受宵夜，大家樂不可支。

威斯理教堂的騷亂一直持續到下半夜，中國人撤離時，留下許多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滿地狼藉。從此威斯理教堂再沒有出借給中國人。上帝恐怕也不

喜歡中國人，因爲一個沒有受過基督文化熏陶的民族不可能尊重教堂的禮節，愛護上帝的財產。

澳大利亞所有報紙都在頭版報導了中國民運領袖首次訪問澳洲的消息，有關庫爾班木的報導更加詳細。各報頭版的照片都是庫爾班木、千大發與美女花團錦簇的畫面。庫爾班木與美女躺在花叢中表演接吻的照片更是轟動全澳洲。《悉尼晨鋒報》記者大衛在照片下面作了說明，庫爾班木因絕食後遺癥影響昏迷倒地，但他仍然可以在昏迷中親吻許多美女，據說這些美女全部是英王十字區的妓女，讓人不由想起共產黨官方曾經指控庫爾班木有嫖妓的行爲。

有關阿新戲謔法國客人的遊戲也成了記者們感興趣的話題。“民主陣綫”的同仁們十分惱火，阿新將他們領袖的澳洲之行弄成了桃色新聞，嚴重損害了民主的聲譽，因此必須討伐這個中共政府潛藏在澳洲、專門破壞海外中國民運的間諜分子阿新。

澳大利亞各民主團體在庫爾班木、千大發的招集下召開聯席會議，共同聲討民運敗類阿新的卑劣行爲。

千大發說：“當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正處在大發展之中，我們在國際上已經得到廣泛的承認，因此中共派出大量特務，專門瓦解民主力量，阿新這個人的面目現在很清楚，聽說他在國內就是警察，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出了國，一定是帶着任務混入民主隊伍裏的。這種人危害相當大，破壞我們的澳洲之行。這裏有民主研究會的代表嗎？”千大發用眼睛掃視着在座的人。

“我……是……”馬紅軍怯生生地應了一聲。

旁邊遂有人向庫爾班木、千大發介紹了馬紅軍的身份，庫爾班木緊接着說：“你們研究會怎麼能讓阿新這樣的人混進來。你不是一直都想加入民主陣綫嗎？如果願意，我可以馬上特批你的研究會作爲民主陣綫澳洲第二分部直屬中央總部領導，以前事就一筆勾銷，大家還是同志。但這是有條件的，你們要立即將阿新這樣的中共特務開除出去，否則我們很快可以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這個研究會實際就是中共設在澳洲專門破壞民運的特務組織，到時你也休在這裏立足。”

“可這些都是阿新背着我幹的，誰也不知道他是個中共特務。”馬紅軍想

把自己從這事裏盡快撇清。

“這不是討價還價，除非你們也是中共的特務！”千大發盯着馬紅軍步步緊逼。

“對，你必須現在就在這裏表個態！”庫爾班木也緊跟着施壓。

“好吧，我同意。”馬紅軍服軟了，心想，“阿新啊阿新，我早就叫你不要得罪這幫人，你偏不聽我的話才会有今天，對不住了，現在祇有弃車保帥。”

會後，關東北給阿新挂了電話，轉告了馬紅軍的話，阿新已經與研究會沒有什麼瓜葛了。關東北本想再安慰幾句，但阿新祇是淡淡的一句話：“我早已將馬紅軍，還有那些庫爾班木之類的，統統開除了！”說完不待對方再說什麼，便將電話挂了。

時來運轉

阿新離開研究會後逍遙了好一陣子，但銀行的存款很快又見了底，同居的女友也在一天傍晚不告而別，于是從前吃方便面的日子又恢復了。光棍的日子特別自由，阿新現在已少去唐人街上走動，每日午後吃過方便面，就到附近的圖書館看書，那可真是個清靜去處。偶爾阿新的思緒也會跳出書頁，想起以前在唐人街上那曾經山呼海嘯的日子，想起龍蝦、鮑魚、皇帝蟹的美味。一想到這些，在胃裏的泡面就開始翻騰，食道裏涌上許多酸味，刺激着喉頭發癢。

阿新吃了一段時間方便面，讀了一些古今中外的雜書，心境也變得十分清明。阿新相信今非昔比，自己已經是澳洲華人社會裏的知名人物，總有時來運轉的時候。這一天果然來了。澳大利亞政府批准成立中國學生基金會，由十六家華人社團共同負責運作，政府撥出一筆經費，主要是幫助貧困無助的中國留學生。政府任命當地著名的華人醫生黃先生擔任會長，再由黃會長任命一位常任秘書長，專職基金會的工作。這天阿新接到黃會長打來的電

話，詢問他是否願意出任這個秘書長，如果可以，第二天就能上班。

阿新與黃會長從前的關係算不上親近，無非是在一些酒會上或一些集會中時有碰面，雙方握手，說一些冠冕堂皇的應酬話。中國學生對黃會長還是十分敬重的，因為他真正關心中國留學生的命運，不像馬紅軍式的民運領袖總在沽名釣譽。阿新沒想到今天黃會長居然會慧眼相中自己。

“您為什麼選中我做您的助手？”阿新有些感激，也有些意外。

“我看中你的熱情，相信你有能力，也願意為大家做點事。”黃會長說得很簡單，但阿新却聽得很快慰，真是伯樂識中千裏馬。

秘書長是有薪水的，從政府給基金會的經費中給付。阿新感覺自己又變成了公務員，弄得好將來還可能當上政府官員，自己捨弃馬紅軍真是有先見之明，不懂的放棄就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基金會成立不久，阿新就起草了一份《致聯邦政府公開信》，呼吁澳大利亞政府關心中國學生的命運。現在中國學生雖然得到聯邦政府延長簽證的照顧，但他們還不能與遠在萬裏之外的家人團聚，他們在這裏沒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一個溫暖的家。政府應當允許中國學生的家人來澳團聚，並且考慮解決中國學生的永久居留問題，這是人道精神的體現。

這封公開信的英譯本被寄給聯邦政府裏所有部長和國會議員，并全文刊登在華文報紙上。公開信在政府內閣和國會裏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華人社會中挑起了有關居留的話題。澳大利亞政府一向以慷慨大方、充滿人情味著稱于世，十幾年來接受過十幾萬印度支那的難民，現在應當繼續承擔國際義務，保護這兩萬遠離祖國的中國學生。由于北京的六月事件，一些青年現在不可能回到祖國。

國會終於開會討論阿新的公開信。反對黨議員指責政府沒有處理好中國學生的問題，反對政府接受這批學生。反對黨領袖何華德強調這些中國人不是政治難民，他們必須回到自己的地方。執政的工黨在國會辯論中占了上風，工黨認為歐美各國都在承擔保護中國學生的責任，澳洲政府沒有理由不去承擔國際義務。雙方唇槍舌劍的場面令中國學生大開眼界。

阿新以基金會的名義，也召開關於中國學生居留的特別會議，邀請各界華

人代表參加，民主團體的頭頭腦腦也在被邀請之列，其中就有阿新的老上級馬紅軍。

會議上，阿新認為現在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居留要求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執政的工黨政府也有解決中國學生問題的意向，大家應當做好輿論宣傳，讓朝野上下以及澳洲公眾同情中國學生的處境。

“現在首要的任務是爭取國會議員的支持。我們現在不能搞過去的那種雕蟲小技了，工黨議員多數支持我們，大家應該爭取更多的國會議員，包括反對黨的同情。我們的底線是要求給予中國學生某種保證，也就是相對的安定生活，並且允許家屬團聚。我們的更高要求是讓全體中國學生能够永久居留。現在我請各位同意我起草的《致國會議員公開信》，并簽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經發給各位公開信的打印稿，請先看一遍，然後我們再繼續討論。”阿新對在座的參會者如是說。

阿新的公開信已由一位資深翻譯譯成文字優美的英文稿。看着阿新在衆人中有如衆星捧月，馬紅軍暗暗罵道：“狐假虎威！”

這份公開信由十六家華人社團和十二個中國學生團體簽名支持，以基金會的名義直接寄給一百多位國會議員。在國會召開會議時反對黨的聲音的確小了許多。形勢對中國學生十分有利。

阿新決定乘勝追擊，擒賊擒王。他起草了《致霍克總理公開信》，信中淋漓盡致誇獎了霍克在天安門事件後泣不成聲的場景，吹捧霍克像慈父一樣關愛中國學生，並且對總理光輝的人性大加贊嘆，是偉大的政治家，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

有人置疑這封公開信會不會太肉麻了。

“怎麼會？”阿新說，“西方政治家和中國人其實都一樣，喜歡有人抬轎子，你把轎子抬到山頂上，讓坐轎子的老爺領悟到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樂趣，你就會得到加倍的獎賞。”

黃會長也聽得雲裏霧裏，他實在不能理解大陸來的中國人。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很奇特，但往往也很深刻，其他地方來的華人無法接受這種深刻。大陸人都愛談政治，這可能因為大陸是個出政治家的地方。

“那就發給總理辦公室，希望你說的有道理。”會長最終還是同意了。

阿新說的當然有理。總理霍克代表政府宣布中國學生可以得到在澳大利亞的四年臨時居住權利，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也可以赴澳團聚，期間享受一切福利待遇，包括醫療、教育、子女津貼、失業救濟金等等，四年之後再根據中國局勢決定去留。

澳洲七號、九號、十號電視臺都播出了霍克總理與黃會長，還有阿新的握手鏡頭。霍克在鏡頭前宣稱祇要中國學生在四年期間熱愛澳大利亞，他們都可以永遠地留在這個國度。阿新在鏡頭前則作為基金會的發言人表示，中國留學生萬分感激工黨政府的決定，中國學生一定會遵守這裏的每一項法度，辛勤勞動，用雙手創造財富，為澳大利亞的經濟復蘇貢獻力量，以答謝澳洲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學生的厚愛。阿新與總理緊緊握手，握了很久很久。

所有的電視觀眾都看見阿新的熱淚順着臉頰滴落在衣襟上，阿新激動地渾身熱血沸騰，仿佛是抗戰時期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歷盡艱辛，冒着槍林彈雨終於到達了延安，又像是迷失的孩子一下子撲進母親的懷裏，又哭又笑……在電視機前的中國學生都認為阿新表演得恰到好處，那泪水在該流的時候真的就流了出來。華文報紙有一則評論是這樣描述阿新熱淚盈眶的感人場面：阿新哭了，他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激之情化作一股熱淚奪眶而出，這不是阿新一個人的眼淚，而是兩萬人在流淚，兩萬顆心在一起跳動，阿新的泪水與霍克的泪水，一樣具有歷史的價值與現實意義。其實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流淚了，一種冬去春來、苦盡甘來的幸福感覺。

阿新一時間由民運名人變成了留學生中的政治名人，留學生中不少人都讀過他的那三篇公開信，都明白這些對中國學生的四年臨時居留起了多大的作用，而且阿新在電視頻幕上熱淚縱橫的神情一定會感動千千萬萬善良的澳洲民衆。許多電話打到基金會的辦公室，都想跟阿新聊聊自己在異國他鄉土地上生活的艱難。有些女性還專程送來鮮花，將阿新的居所變成了花園。與阿新同住的哥們每日生活在鮮花叢中，滿室的芬芳確實令人陶醉。大家都勸阿新應該抓緊時機，在這些多情而且善解人意的女性中挑選一個作為夫人或者女秘書，因為阿新已經是華人社區中的公眾人物，出席酒會，會見來賓，絕不能形單影

祇，有損形象。

“女人是禍水！”阿新說，“我已經被女人出賣兩次，一而再，再而三，你們說我要被出賣多少次？色是刮骨鋼刀，”阿新嘴上這麼說，心裏其實却很想。

馬紅軍和各路民運團體的頭頭腦腦們也忙得不亦樂乎，各色招待會、大大小小的集會層出不窮，政治、民主與居留等事情全部亂七八糟地攪在了一起。

馬紅軍站在市政廳廣場向參加集會的人群發表演講：“過去的民主研究會，現在的民主陣綫澳洲第二分部一直都是中國學生的堅強後盾。我們現在從事的是前無有古人的事業！在我和我的同仁共同參與和制定下，終於促成了今天基金會成功游說國會議員與政府首腦的成果。我們與澳洲各界，特別是政界都保持着長期良好的關係，本人與霍克總理是多年的老朋友，十年前敝人到悉尼演出時，霍克先生就與我結識，并曾親自走上舞臺與我握手。十年後故人重逢，霍克依然記着我‘馬紅軍’這三個字。”馬紅軍說在這次居留決定公布之前，自己已和澳洲朝野的上上下下，尤其是那些決策性人物舉行過多次秘密的私人會談，如果没有自己的影響力和苦口婆心的游說，就沒有中國留學生們今天四年的居留決定。他祇是在這一重要歷史時刻發揮了應當發揮的作用。馬紅軍在臺上說得手舞足蹈，臺下掌聲熱烈，有人帶頭高喊：“馬主席萬歲！”馬主席一時有些不知所措，但最終還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回之以熱烈鼓掌，也跟着人群振臂高呼。

阿新成為社交界的名人，無論是社團名流聚會、政界懇談會、新聞記者發布會，還是各種名目的晚會，阿新都是座上賓或特邀代表。聯邦政府或是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隔三差五地派出代表與基金會及十六家華人團體代表會談，了解中國學生的生活、學習狀況。基金會實際上成了政府與中國學生之間的橋梁。阿新有必要去唐人街西裝店裏做套新西服，公眾人物没有一套像樣的行頭是很不體面的。阿新把那件曾經風裏來雨裏去的舊西裝扔進了紅十字會的回收箱，他的舊西裝可能會被送去非洲救濟難民。穿上深藍色、全毛料雙排扣的新款西服，對着鏡子，阿新顯得非常滿意，祇是身材依然瘦小，不够高大雄壯，因此缺少那種威武偉岸的大丈夫風度。阿新也換了皮包，現在用的是真皮密碼箱，澳洲的政府官員、社會名流都使用這種公文箱。阿新又買了幾條新款領帶，不

是法國貨就是意大利的。烏槍換大炮之後，走在唐人街上的感覺就是與以往不同。阿新自然是唐人街那幾家有名酒樓的常客，這都是交際應酬的需要。阿新整裝一新準備出門時，同住的哥們就會揶揄一番：“阿新又吃龍蝦去啦。”

阿新全身上下大體都是可以修補的，從前那種寒酸相被修補的沒有丁點兒影子，如今阿新看上去是個很體面的人物，從他出門時的步履匆匆就可以看出是個日理萬機的大忙人。但是阿新還是有個破綻是無法修補的，就是那個小小的腦袋扛不住，總要偏向右肩，這是歷史的錯誤，已經沒法改正。好在澳洲公眾和中國學生對阿新的歪腦袋形象很熟悉，如果有朝一日將它扳直了，公眾還可能一時接受不了。阿新偶爾也會在浴室的鏡子前將自己好好打量一番。

天安門事件之前抵達澳洲的中國學生基本上安居樂業，他們的家人也正在辦理團聚手續。基金會的中心任務應該轉變，阿新將目光投向那些剛剛到達這塊新大陸的同胞。僅僅幾個月，又有兩三萬同胞以留學名義踏上這片國土。馬紅軍和民主團體的頭頭們也用同樣的眼光審視着這些同胞。

在獲得四年的臨時居留後，中國學生們開始忙於自己的生活，他們要在這裏開墾出新家園，中國人勤勞、節儉、忍辱負重、任勞任怨，幾年之後就會成為殷實人家。現在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已經到頭，安寧的生活才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因此大陸學子們陸續離開民主的隊伍，回歸自己的安樂窩，民主運動的最終目的也還是為了能過上好日子。

而澳大利亞的中國民運團體在海外中國人的民運史上也可以算是首屈一指，有名有姓的團體就有十二個，不知名的則多如牛毛，一派諸侯割據的局面，中間少不了烽烟四起，團體間的口舌指責，無論規模、技巧還是魄力，都令遠在歐美的中央領袖們傷透了腦筋。

如今天下太平，所有的中國人民運團體都逃不脫凋敝的結局，有的只剩下寥寥數人，甚至只剩下個光杆的主席，或是開成了夫妻店。馬紅軍曾經號稱三千人的大軍，充其量也祇不過一二十人。馬主席在給巴黎總部的電文中聲稱，中國民主運動到了最嚴峻的時刻，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現在就是考驗，我絕不會做民主運動的逃兵……

現在澳洲又增加了幾萬中國來的留學生，這不啻上天給了馬主席一塊大餡

餅。馬紅軍帶着十幾號人，終日去散發傳單。唐人街自不用說，馬紅軍在那裏親自督陣，其他中國學生密集居住的區域，那些電綫杆、紅綠燈柱子以及商店櫥窗，到處都貼着馬紅軍招兵買馬的廣告和傳單。凡是有熱血、有抱負的中國青年，請立即聚合到馬主席的大旗之下，凡如此者皆有機會留在澳大利亞。這一招果然很靈驗，為了留在澳大利亞，上門打聽的人絡繹不絕，每人交六十元入黨費，四十元材料費，這樣就有了近萬元鈔票的進賬，馬主席一時又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了。

馬主席棋先一招，其他各路民主社團也跟着捨命追趕，每天都在招兵買馬，各自擴充隊伍，以致澳大利亞的民主戰士人數一時間成了全球之最。馬紅軍氣勢如虹地宣告，我們這裏才是海外中國民運真正的大本營！

一九九零年天安門事件的周年祭集會上，各路英雄紛紛亮相，爭相表演，這是一個顯示實力的競技場。馬紅軍的演說使會場達到瘋狂的高潮：“我們澳大利亞的民主力量已經達到全世界中國民主力量的二分之一，中國民主的希望不在歐美，而在這裏，就在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身上。從悉尼的民主廣場，我們將一路披荊斬棘，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一起在北京升起民主自由勝利的旗幟……”馬紅軍煽情的吼聲震撼着整個市政廳廣場。馬紅軍的完美演出已為自己奠定了澳洲中國留學生領袖的基礎，並且成為天安門事件後到達澳洲的中國留學生的“大救星”。

馬紅軍之類的民主政治家們忙於造勢的時候，阿新正在做許多婆婆媽媽的事情。阿新早已與這些民主革命的隊伍揮別了，他不需要為自己宣傳。阿新認為留學生的民主革命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應該是全心全意服務的時代，就像八十年代初中國將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與服務人民生活方面，馬紅軍之流還在熱衷政治，這與馬戲團小丑的表演沒什麼兩樣。

天安門事件後進入澳洲的中國學生目前面臨令人擔憂的艱難處境，他們的入境簽證通常祇有半年，多數人成為逾期滯留者。這些人抱怨澳洲政府不能一碗水端平，早來一步的中國學生可以有四年臨時居留的資格，晚一步來的就祇能當黑民，終日像老鼠一樣鑽洞避光，過膽戰心驚的日子。

正在此時，基金會收到新南威爾士州移民局的指令，要求基金會聯系下屬

十六家華人團體共同協助政府維持社會安全，移民局的文件中列出一萬多名中國學生逾期居留者的名單，聲稱如果這些人不能自動離境，移民局將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基金會召開理事會，十六家華人社團代表出席，一致通過了敦請聯邦政府關注天安門事件後抵澳的中國學生命運的報告，并派遣阿新代表基金會與新南威爾士州的移民局進行商洽。

阿新拜會了新州移民局局長歐文先生，報告了有關天安門事件之後抵澳中國學生的困境，提交了十六家華人社團共同署名的建設性報告，請求對凡是已經抵達澳洲的中國留學生一律開放四年臨居的權利與福利資格，理由是霍克總理在為中國學生運動流泪的時候，這些人在中國都知道了，他們非常感動，因此紛紛來澳大利亞投奔；他們中有的人在中國參加過爭取民主的活動，對於那些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到達澳大利亞，却從沒有參加過中國民主行動的中國學生，工黨政府都能大度地給予四年臨居的權利，因此這些天安門事件之後來投奔的中國學生更有理由獲得政府的保護，霍克總理及其政府更會愛惜這些幾經周折才最終踏上澳洲土地的人們。阿新的推理在今天近乎荒誕，但在當時却無懈可擊。

歐文先生的思維是西方人標準的判斷和推理，因此無法理解阿新中國式的推理。阿新去見移民部長韓德先生。韓德不像歐文那樣魁梧，個兒精瘦，與阿新的身材極相似，祇是腳和腿都長一些。阿新是帶着翻譯去見韓德部長的，雖然來澳洲時間也不算短了，但阿新的英文確沒有多大的長進。如法炮制後阿新將他的思維擺到部長的面前，可韓德也弄不明白，阿新看到部長與翻譯談了很久，結果祇有韓德的搖頭。

“你玩過魔方嗎？韓德先生。”阿新問韓德。

“沒有玩過，那東西是小孩的遊戲。”對方的回答更簡潔。

“尊敬的部長閣下，您有空應該玩玩，很有意思，魔方也是哲學，中國人的思維與魔方一樣，是沒有規則中的規則，是模糊意識產生的模糊規律。您有興趣可以了解一點中國的文化，那很有意思。”

“中國文化太深奧了，我捉摸不透。不過阿新先生，對於你的事，我建議你可以直接給總理辦公室寫信，那也許會有幫助。”說完韓德也是把雙手一

攤，一副愛莫能助的表情。

阿新因此進了總理府，還與霍克總理進行了長達一小時十分鐘的會談。

會客廳的正中挂着一幅劉海粟的《迎客鬆》，阿新立刻想起人民大會堂或者中南海懷仁堂裏也總是挂着一幅這樣的黃山迎客鬆，當然那是從紀錄片或電視上看到的。阿新連北京城都沒進過，更不用說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懷仁堂了。但是現在阿新就坐在迎客鬆下面與一國總理平等對話。這個觸景生情的聯想使阿新感覺肩上的擔子很沉重，因此阿新開口的第一句話當然就是巴結討好的恭維：“尊敬的霍克先生！感謝您在百忙之中能親自接見我。您對中國畫的鑒賞力實在太深刻了，太有獨到見解了，這張劉海粟的山水畫代表着中國畫的最高藝術成就。”

“這是我訪問中國的時候，你們的鄧小平先生送的。這畫很優秀，但我個人不太會欣賞中國畫，中國畫的意境有時太深奧了，就像中國的太極。”霍克比劃着。

阿新的第二句話就够得上十足的肉麻：“您是澳大利亞歷史上任期最長、威望最高、最受人民喜愛的總理，您在澳大利亞經濟衰退時期臨危受命，力挽狂瀾，引導國家經濟從低谷走向繁榮……”

霍克先生顯然很受用，中國人的奉承功力登峰造極。于是兩人在十分友好、融洽的氣氛中進行了親切友善的交談。

有關這次談話的內容不久被各家報紙登在了頭版，阿新的頭像下方注明：中國學生基金會秘書長、學生領袖阿新。中國人與澳大利亞人都讀過報紙上的內容，天安門事件後抵達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基本是逐字逐句地將報導從頭到尾地通讀了三遍以上，希望從中找出自己命運的軌迹。大概是霍克總理被阿新“抬轎子”的功夫弄得有些暈暈乎乎，鬧不清東南西北，所以發表了震驚朝野的講話，表示天安門事件之後到達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不能直接獲得四年臨居，因為國會沒有授權他作出這種特別決定，但他本人非常同情這些中國學生，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願意幫助這些不願返回家園的中國青年；如果這些中國學生具有恐懼回國的理由，他們可以申請政治難民，就像目前滯留澳大利亞的東歐難民一樣，澳大利亞政府會考慮這些中國學生的特殊政治背景。

“做政治難民去吧，放心去吧，澳大利亞政府已經說得够明白了。”阿新被辦公室還有家裏的電話鈴聲吵得徹夜不眠，嗓子已經像破鑼一樣沙啞，但他仍然很有精神地對每一個打進電話的人說。阿新同住的幾個哥們早已分別逃到朋友家裏“避難”，電話的鈴聲也經弄得他們精神失常。

兩萬中國留學生在很短時間內向政府移民部遞交了政治難民申請。這些中國人并不知道難民的定義是什麼，自己怎麼就去做了難民。他們向阿新請教，阿新自己也沒搞清楚難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前祇聽說過猶太難民、非洲難民、越南難民之類，而且都是全村、全鄉、全城、全國人民一起逃亡，是那種驚天動地、拖兒帶女、哭天喊地的大逃亡，漫山遍野、江河湖海，到處都是螞蟻般爬動的人群，他們在戰火彌漫中，兵匪強盜槍口下死裏逃生，虎口餘生，九死一生，如此的幸存者才可稱之為難民。中國留學生是自願交了學費，在中國官方嚴格審查下，搖搖擺擺坐着波音飛機來到澳大利亞，他們是想到外面看看世界，因為都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這樣的現代淘金者就是政治難民嗎？阿新被弄得很糊塗，他想這回是霍克在玩魔方，老霍克口頭上說不了解中國的哲學，其實却深諳此道，還把自己玩了個稀裏糊塗。

根據澳大利亞移民條例，凡在境內申請難民者，在等待審理決定期間，可以居住于澳大利亞境內。阿新和基金會的理事們如釋重負，移民局不能强行遣送中國學生，盡管這些人沒有合法簽證。中國人又一次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但還是有許多中國學生提出疑問，如果審理結果對個人不利，比方申請被駁回，中國學生就不可以繼續呆在這裏，霍克並沒有保證所有人都會留下。阿新笑着說：“基金會的法律顧問已經提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數字，根據移民部難民委員會日前審理難民的進度和程序，如果將這兩萬個申請全部審理一遍，至少需要五十年。到時你們都是老華僑了。”基金會的法律顧問也同時告訴阿新，依據移民條例，這些遞交難民申請的中國人是不能外出打工的，否則也會被移民局當作違法者遣送出境。阿新對於自己有足夠能力保護這些可憐的同胞深信不疑，霍克與韓德這些政治家對保護中國學生的承諾不會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的！

中國人的難民申請表像雪片般飛往各州的移民局，理由更是五花八門，怪

誕不經，不知所雲。既然是政治避難，就需要編造故事，聲稱自己在天安門事件期間是如何支持學生運動，如何受到政府的壓力，情節不但曲折，內容更是離奇。

馬紅軍以及其他民運團體的牛司令、楊政委、朱參謀之流也都坐在辦公室裏接待同胞，為這些初來乍到的中國人代辦申請表，祇要填寫難民申請表，繳納了會費，當場就能搖身成為民主運動的鬥士，再交一筆手續費，還可以得到馬主席煞有介事開出的證明，向移民局證實申請人是如何火線入黨，經歷了怎樣的血火洗禮，去過大使館、領事館示威，因此害怕返回中國，一旦回去祇會像譚嗣同、秋瑾一樣地掉腦袋。這張薄薄的證明有着非同小可的威力，可以表明你就是民主自由的政治難民，絕對不能再回國；不單是你，還有你的兄弟姐妹、親朋好友都可以因此得到民主的蔭庇，也是當然的難民；將這份證明收好，去交給移民局，就可以高枕無憂地等着做澳大利亞的永久居民了。

馬主席祇是收了許多勞務費，這些錢不是會費，是依據按勞取酬的原則收取的費用，因此馬紅軍和其他的民運的領袖們都將勞務費心安理得地放在自己的口袋裏。他們個個都是西裝革履，西裝有許多口袋，每個口袋都很大，這樣就可以裝許多鈔票，然後再存到保險櫃裏，就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還可以作為遺產傳給子孫萬代。中國學生交了表之後也以為自己進了保險櫃，憑着馬主席與政府官員的親密關係、信誓旦旦的保證，還有移民代理編造的那些鬼都不相信但人可能相信，尤其是洋人還信以為真的故事，自己大概就是政治難民了。這些新來的同胞不是一點都不犯愁，他們如此做了難民，尚在祖國大陸的親人怎麼辦，他們要是知道自己去澳大利亞做了難民，一定會膽戰心驚過日子，親人昨天或依依不捨或興高采烈地離開家，奔赴異國他鄉，轉眼就變成了今天陌生的政治難民，有誰會理解這個中的緣由？

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難民潮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是霍克總理，準確地說是澳大利亞政府親自發動的，大多數的中國學生為了安定地留下來，美好地活下去，還沒完全弄明白什麼是難民，就被動地參入了這支政治難民的大軍。他們在這塊國土上度過了短暫的太平歲月，他們都做過無比美好的夢，憧憬着夢醒之後的清明早晨，明天的太陽一定比今天更溫暖。

居權風潮

中國學生的居留事業不會這麼輕鬆獲得成功，不可能祇瀟灑走一回就到達成功的彼岸。沒有一些人拋頭顱灑熱血，怎麼可能奪取最後的勝利。蘇聯人犧牲了三千萬，法國人做了亡國奴，英國人整天挨德國飛機轟炸，美國人在諾曼底海灘扔下無數屍體，因此才換來了戰後半個多世紀的天下和平。中國學生一滴血不流是不可以的，來得容易去亦容易，所以還是來得困難一些更牢靠。

一九九〇年的十二月，聖誕節即將到來，澳大利亞正沉浸在全民狂歡夜的前夕，移民局有義務掃蕩一切污泥濁水，將所有有可能破壞節日氣氛、制造不安定因素的非法滯留者抓起來，保證國民度過快樂的聖誕節。于是僅僅數日之內，就有數千人被捕，分別關進各州的拘留中心，移民局特別行動隊為此得到聯邦移民部的嘉獎。移民部長韓德很快簽署了遞解令，有趣的是部長同時下達秘密指令，中國學生多留幾天，其他民族的立即驅逐出境。韓德對各州移民局局長解釋，中國學生問題復雜，需要同中國學生基金會通氣。

阿新在收到移民部發出的傳真之前已得到風聲。他陪着黃會長去悉尼維拉拘留中心慰問受到委屈的同胞。維拉中心關着三十多位中國學生。移民局特別行動隊根據中國人的舉報，閃電式地抓獲了這些違法的中國學生。維拉中心主任喬治先生向黃會長和阿新解釋，特別行動隊此次行動不是專門對付中國學生，但正好碰上了，這就祇能怪他們的運氣不好了。喬治攤開雙手，聳了聳肩，那意思是深表遺憾、愛莫能助。

阿新又尋問到底是誰向移民局通風報的信。“這是保密的，阿新先生，我無可奉告，”喬治直接拒絕了阿新的要求，“甚至連我本人也不清楚。反正是一個中國人又一個中國人給特別行動隊打的電話。”說着取出花名冊一一解釋。喬治說有十一人是在一家肉類加工廠做黑工，特別行動隊接到舉報之後迅速包圍這家工廠，瓮中捉鱉，十一名中國學生全部落網；另外一些中國人分別在工廠、農場或在床上被捕。所有被捕者都違反移民條例。

除了維拉中心以外，各州移民局的拘留中心也都關着一些中國學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被人舉報。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

“還是先設法營救被捕者吧！”從維拉中心出來，黃會長要求阿新立即與政府的移民局官員進行交涉。

阿新去找了新南威爾士州移民局的局長歐文先生。但歐文却把球踢給了韓德部長，自己祇是在執行移民部的命令，搜捕簽證條例違法者。州移民局的特別行動隊與各市的移民局是在接到舉報電話後才行動的，但他們對中國來的留學生特別寬宏。在行動之前歐文局長對此事很慎重，還親自請示了韓德部長，在收到部長親筆簽署的搜捕文件後才進行突擊行動的，而這些中國學生全部違反了移民法，這是有充分證據證明的。

阿新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韓德居然會下令抓中國學生，他不是一直表示會殷殷關懷、愛護中國的學生嗎？難道一個政治家會在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阿新請求歐文局長能否出示一下韓德的批示，但身材魁梧的歐文爽朗地回絕了，這是政府機密文件，不便泄露。

“我是政府下屬組織的官員，基金會是移民部的附屬機構，我有權利要求看到這樣的文件。”阿新說。

“不，阿新先生，你可能誤會了，”歐文說，“基金會祇是民間社團，因此是没有權力獲得政府内部重要批文，當然公開的文件是可以看看的，移民部和政府機構過去也給基金會發過一些文件。另外，阿新先生你目前還不是政府公務員，祇有澳大利亞的公民才有資格出任政府職務，你現在連永久居民都不是。”最後一句話仿佛是在奚落阿新。

阿新十分光火，歐文這家伙如此囂張，簡直可惡至極。

阿新祇好再次去找部長韓德。但韓德的秘書說部長先生最近很忙，祇有等幾天才能有空與阿新見面。

阿新見了韓德就開始告狀：“……歐文先生是白澳種族主義者，不適合當新州移民局的局長。”

“不，不，阿新先生，我看你是誤會了，歐文他非常喜歡中國人，他正準備去中國訪問呢！”韓德說。

“他已經抓了三十幾個中國學生。”

“可這些人無一例外都觸犯了移民條例。”韓德早有準備。

“可他們都是政治難民，受到聯合國難民公署的保護，怎麼能抓他們？”

“這些中國人正在申請難民，因此還不是難民。根據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一九五八年通過的移民條例，這些人是沒有工作權利的，但他們却在打黑工，這不利于保護他們的正當權利。”韓德說得有根有據，“有個中國學生沒有申請難民，他的學生簽證已過期六個月；還有一個雖然申請了難民，但移民部通知他去面談時却没有去，因此他的個案被取消了，已經成為非法滯留者。”

“難怪這麼久不見我，看來韓德今日是做足了準備。”阿新心想，口中解釋，“尊敬的部長先生，中國現在還很貧窮落後，中國留學生為了來澳大利亞，大部分人都是舉債交學費的，他們在這裏不去打工，沒有收入，怎麼可能生存？這不公平！”

“我也十分同情他們的處境。但澳大利亞是法制國家，誰都要遵守法律。”韓德接着說，“這是移民法的明文規定，白紙黑字，我個人也無能為力。”

“移民法就不能修改嗎？一九五八年通過的法規怎麼可以三十幾年不變？

您是部長，也是國會的前排議員，你就不能提議修改移民條例嗎？”阿新有些着急了，今天看來是有力使不上。

韓德依然不緊不慢：“移民條例每年都要修改，但是申請難民者不能自動獲得工作權利這一條始終沒有變，因為它符合澳大利亞國民的利益。現在澳大利亞經濟蕭條，失業率高居不下，移民部不能發給兩萬中國學生工作許可證。澳大利亞國民有10%的人都没有工作，政府首先要考慮解決本國國民的就業問題。”

“那些關押在各州拘留中心的一百多名中國學生怎麼辦？”阿新想知道政府準備怎麼處置那些已經被拘留的人。

“現在政府還沒有決定。阿新先生，你最好能勸他們自動離境，這樣會很體面的。我可以給你透露個消息，各州移民局下屬的特別行動隊對中國學生問題一直很慎重，祇要你們中國人自己不告密，通常移民局會給中國學生方便。我知道中國學生都有工作，都是納稅人，但有人告密，這是記錄在案，特別行動隊如果不去行動或拖延行動就是瀆職，這在澳大利亞是很嚴重的。”

阿新沒有興趣再和韓德繼續沒有結果地糾纏下去。他知道今天肯定是無法說服韓德的，再多口舌也祇是浪費時間。

阿新直接去找霍克總理，但這回的會面沒有被安排在會客廳。阿新本希望能再次坐在那幅迎客鬆圖下，但霍克的秘書却叫阿新到辦公室的外間喝咖啡。

阿新甫見霍克就情不自禁握着他的手，激動地說：“謝謝您能再次接見我。”阿新感到自己的眼泪已經在眼眶裏打轉。

“別急，阿新先生，有話坐下來慢慢說。”霍克總理一如既往地耐心。

“我們是不是老朋友？”

“當然，我們永遠是朋友。”

“那朋友的朋友算不算朋友？”

“也算吧！”

“可我有一百多位朋友最近被韓德先生的移民部抓了，他們也是您的朋友，請您伸伸援手吧！”阿新依然很激動。

“中國人民都是我的朋友，鄧小平先生、胡耀邦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霍克眨着狡黠的眼睛，微笑着說。

阿新聽到這話的味道不對。這時女秘書端出兩杯咖啡，阿新覺得女秘書很有氣質，心想總理的秘書就是與眾不同。

阿新喝了幾口濃咖啡，覺得腦子清醒了許多，這霍老頭是政壇老手，連任四屆總理，可以說不僅聰明絕頂，而且十分狡猾，今天我一定要有個結果。于是定了定神，開始繞起了彎子，“總理先生，澳大利亞是個高福利國家，因此從理論上說澳洲沒有窮人，國民豐衣足食。”

“貧富差異還是存在的，我是說相對意義上的貧困還是存在的。澳大利亞政府保證每個失業者領取救濟金，每個老人有一份養老金，所以可以說國民豐衣足食。”霍克想弄清阿新究竟是什麼意思，所以順着往下說。

“您之前做過全國工會的主席，你最了解工薪階層中相對低收入階層的困難，因此您的政策是保護工人的利益。澳大利亞工黨的擁護者主要是工人。”

“噢，工黨不是工人黨，但工人始終是工黨的重要支持者，現在有越來越多資本雄厚的企業家、金融家、農場主和富有的商人、律師、醫生也成為工黨的支持者。”

“如果中國學生有困難，政府會不會幫助他們？”

“你們的基金會就是政府特設的，專門幫助中國來澳學生的機構。你們的工作卓有成效，我本人和內閣成員非常感謝你們的敬業精神。”這老家伙真鬼，把球又踢了過來。

“可兩三萬中國學生正在等候難民審理，他們可能要等待很長的時間，基金會沒有足夠的錢養活他們，您知道政府撥給基金會的經費是很有限的。”

“基金會是十六家華人社團組成的，政府從財政預算中撥出一部分作為基金會的一些開支，十六家華人社團也應當提供資助，基金會不能全部依賴政府撥款。中國人應當幫助中國人，現在兩萬中國學生有困難，十六家華人社團以及在澳的四十萬定居華人有義務出錢出力支助同胞。中國有句俗話，衆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伸手幫一把就可以幫助中國學生度過眼前暫時的難關。”這老家伙鬼極了，簡直是在耍賴。

“中國學生還很年輕，身體都很強壯，許多人有一技之長，他們很想為澳

大利亞的經濟復蘇出力，他們不願坐在家裏吃閑飯。總理先生一向鼓勵青年奮發圖強，請總理先生給中國學生發揮才能的機會。”

“我知道到澳大利亞來的中國學生都受過良好教育，我本人也希望中國學生成為建設這裏的出色人才。”

“可韓德先生告訴我，這些中國學生不能出去工作。”

“是的，這是法律的規定，不是韓德先生個人的決定。”

“政府是不是應該考慮為這些沒有收入的人解決吃住的問題，好讓他們安心等待政府的審理結果呢？”

霍克總理沉思好一會兒，然後說：“政府可以考慮由紅十字會出面幫助中國學生，或由移民部適量發放工作許可證。”

這時阿新又看到漂亮的女秘書端出兩杯茶水，不由地多看了幾眼，不禁脫口，“他媽的，這女人真漂亮。”一旁不知趣的翻譯竟給翻譯了出來，當然隱去了前三個字。霍克聽了哈哈大笑，女秘書則對阿新莞爾一笑，並說了聲“謝謝”就退了出去。

阿新紅着臉，心裏罵那翻譯：“誰叫你什麼話都翻譯。”不好意思地端起茶杯，一口氣連喝了幾口，幹咳了一聲，這才開口：“好茶哪！總理先生，這茶是不是龍井茶，真是好茶哪！”

霍克臉上綻開了花：“這是鄧小平先生送給我的頂級龍井茶。中國人很好客。”

阿新覺得現在的氣氛好極了，霍克老頭顯然好說話，霍克為中國人流過淚，韓德和歐文就沒有流過。于是趕忙趁熱打鐵：“中國學生盼着您給發工作許可證，您看什麼時候可以簽發正式的批文，我代表中國學生謝謝您的關懷和幫助。”

“這事需要內閣討論決定，內閣需要聽取各部門的意見。你可以告訴中國學生，聯邦政府一定會妥善解決中國學生的困難，同時也請轉告基金會和所屬的各華人社團，政府希望華人社團與政府一道出面幫助中國學生，中國人向來就有樂於助人的美德。”

“我一定把您的話帶給中國學生和華人各界。”

阿新把話題又轉到維拉中心和各州的拘留中心：“現在全國的拘留中心關押着一百多名的中國學生，總理打算怎麼辦？”

“現在各州拘留中心關了五千多非法滯留者，其中很少一些人是中國學生。他們都違反移民法。”

“中國學生爲了謀生去打工，實際上也是爲政府分憂解愁，減輕政府的負擔，不應該將他們關進拘留中心。如果這兩萬人不去工作，每日坐在國會大廈門口請政府給口飯吃，也會讓政府很傷腦筋的。據我所知，來自斯裏蘭卡、中東、東歐和前南斯拉夫地區的難民，都受到政府的救濟，他們沒有像中國學生那樣陷入困境，應該說中國學生現在的不安定生活政府是有責任的。”阿新想進一步爲留學生的工作許可撬開一點縫。

“阿新先生，澳大利亞是個法制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次移民部掃蕩非法移民的行動，已經抓了幾千人，有幾十個民族。我本人不好偏袒中國學生。澳大利亞是個多民族國家，我們大家都在致力於建設多元文化的社會。”霍克的口風依舊很緊。

“中國學生申請難民，依據移民法，他們不是非法移民，這與其他民族的情況不同。”

“非法工作是嚴重的違法行爲。我沒有早些考慮中國學生的工作許可問題，這是非常遺憾的。”

“總理先生，您的意思是這批學生沒救了嗎？”

“我想移民部會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的，您可以找韓德先生談談具體的辦法。”

“中國學生已經向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總理先生是否考慮過他們回國的安全呢？”阿新想再找些理由試圖突破一下。

“澳大利亞政府是不會向中國官方提供這些人在這裏的情況，因此我相信不會有什麼麻煩。”

“可移民部實際上已經公開宣布天安門事件後抵達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基本上都申請政治庇護的事實，中國政府對此十分清楚，總理先生如何保證這些人的安全？”阿新步步緊逼。

這時霍克狡詐地問，“那四個中國女學生申請難民了嗎？”

“申請了。”阿新知道霍克指的是被關押在維拉中心的四名中國女學生，她們在賣春中被人舉報。

霍克似笑非笑地問：“你看她們像政治難民嗎？”

“我沒看過這些人的案宗。”阿新想回避一下。

“其中一個可以留下，其餘的必須離境，政府不允許非法賣淫，這也損害中國學生的形象。”

“爲什麼可以留下一個？”阿新不解。

“她是艾滋病患者，可以留下來治療。”

阿新倒抽了一口冷氣，沒有再說什麼。

阿新走出霍克辦公室時心裏空蕩蕩的，盡管此次會談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結果——霍克答應解決中國學生的生活困難和工作問題，但是霍克也已經告訴阿新，那一百多名身陷囹圄的中國學生沒有希望繼續留下來。

有道是禍不單行，中國學生的工作許可證還沒有下文，各拘留中心的中國學生還在期待被釋放的時候，各州移民局的特別行動隊又開始掃蕩，一夜之間抓走了幾千黑民，其中又有二百名左右的中國學生被捕。事情發生就在平安夜的前一天。中國學生大批被捕的消息像瘟疫一樣擴散，忽然之間中國學生從地面上消失了，全部轉入地下活動，就像洪水來臨前夕螞蟻搬家一樣四處逃竄。沒有平安夜，沒有聖誕樹，也沒有新年除夕夜，中國學生的小社會裏充滿了悲哀和絕望。

馬紅軍一時也找不到自己的下屬，開不了沙龍，實在很無奈。他找到阿新生商量對策。

阿新本不想見他，但一想到這說到底還是中國人居留權的事，於是說：“你要找人去登個廣告，就說定于某月某日某時在市政廳廣場或者什麼地方召開大會，到那時你就能見到你的人。”

馬紅軍覺得很有道理，就在幾家華文報上登出有關集會的廣告。那天在悉尼的市政廳廣場上，忽然冒出一萬多中國學生，馬紅軍和其他民主團體的頭頭們真是又驚又喜，他們第一次明白了廣告的威力。

中國學生在悉尼的市政廳廣場上大搖大擺，他們知道中國人分散就會被人欺負，聚在一起就有無窮的威懾力量，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移民局特別行動隊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在這時跑到廣場上公開抓人，那祇會淹沒在中國學生的汪洋大海裏。中國學生從地底下冒出來，站在廣場上喊喊口號，發泄一下幾日來胸中的悶氣，互相打聽着消息，詢問基金會與政府談判的進度，然後復又鑽到地下去了，繼續和移民局打游擊戰。

阿新這次真的感到被霍克老頭、還有那個背信弃義的韓德騙了，他決定懲罰一下霍克和移民部，于是在萬人大會上聲嘶力竭地喊着：“和談不成，我們還能用什麼辦法解決？”全場萬名中國學生衆口一詞地聲討移民部。一場真正顯示中國人智慧與力量的群眾運動揭開了序幕。

這個序幕是因為一個中國學生被遞解離境而啓開。第一批接到了部長韓德簽署遞解令的是那三個被霍克指出沒有患艾滋病的中國女留學生，還有一個爲了女人爭風吃醋、結果被情敵舉報的中國男人，他同樣是沒有申請難民而成爲非法滯留者。這個男人在遞解令上簽了字，等于寫了自首書。第二天一大早這個男人就被要求收拾行李，在移民局官員的護送之下自動離境，踏上回國的航班。阿新認爲這個男人很可憐，爲了一個女人就讓移民局特別行動隊赤條條地從床上拎起來，現在又灰溜溜蓬頭垢面地回國見老婆孩子和父老鄉親，男人的血性究竟都哪兒去了？但這是個很不好的先例，嚴重影響了維拉拘留中心裏中國學生的心理，擾亂了軍心。阿新整日穿梭于基金會的辦公室和維拉中心之間，安撫着中國學生愈發緊張的神經。

阿新以基金會秘書長身份可以在維拉拘留中心裏暢通無阻地出入。阿新還利用這層身份在這裏建立了秘密的學生組織，聯合在押的所有學生拖延移民局官員的審查和遣返。阿新已和在押的學生秘密策劃了一個重大的行動，一場大風暴就要來臨了。

時鐘指向正午十二點，維拉拘留中心的中國學生都在各自的房間裏靜坐，這是中心午餐的時間，但沒有一個中國學生去餐廳。當班的警員還沒察覺到什麼異樣氣氛。十二點三十分，主任喬治先生走進餐廳正準備用餐，一個值班的警員跑來報告，中國學生沒有一個人來吃飯。

喬治勃然變色：“中國學生難道都逃跑了嗎？”

“先生，沒有。”那個警員回答道。

喬治急忙帶上人去中國學生關押的區域巡查。

中國人絕食了，就跟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場景一樣。喬治非常害怕這樣的事在維拉中心再現，中國人太喜歡拿絕食作游戲，而且可以七天七夜不吃東西，要是真有人死在這，那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喬治二話沒說，操起電話就向局長歐文報告，這個報告最終一直打到了霍克的總理府。

一點正，絕食者代表將一份宣言交給了喬治，這個代表就是這次絕食的帶頭人，也是阿新物色的中心在押學生的領導人。很快，當天下午一家悉尼的華文報紙以特號的形式報導了在維拉中心裏發生的事件，還刊登了那份絕食宣言，并以最快的速度在唐人街以及中國學生聚居的地區發售，甚至免費贈閱。

一九九一年的元旦，澳大利亞舉國歡慶，情人港和歌劇院將通宵達旦地舉行狂歡慶祝。中國學生選擇在這一天作爲絕食的日子，分明是有意破壞節日的氣氛，不讓上至霍克、下至喬治這樣的政府官員過一個安靜的假日。

兩點正，一萬多中國人又集合在市政廳的廣場上，樂隊奏響《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馬紅軍站在高臺上，用深沉的語調宣讀着來自維拉拘留中心裏的絕食宣言。全場氣氛肅穆、凝重。風蕭蕭兮易水寒，許多人流淚。

馬紅軍泪水嘩嘩地流着，他怒吼着：“我們的同胞正在受難，他們可能死去，他們是爲了我們這些人去絕食，去抗爭！朋友們，同學們，戰友們，向移民部討回公道的時刻到了，我們再也不能任人宰割！如果我們反抗，我們的同胞就會繼續被捕，一千個，一萬個！移民部在悉尼的西區又建立了新的拘留中心，可以關押一萬人……我們大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我們爲什麼要生活在黑暗的地下室，心驚肉跳地時時躲避着警察的抓捕，我們也是人，也有有權利生活在一樣陽光下！”

廣場上吼聲震耳欲聾，圍觀的澳大利亞人紛紛往後退，他們看到的是駭人的圖景，中國人扭曲着臉，瞪着紅腫的眼睛，像瘋子一樣嚎叫。這一天本應是喜慶、輕鬆、浪漫、狂歡的日子，中國人爲什麼在市政廳廣場上群魔亂舞？警察似乎無動于衷，他們僅僅在廣場周圍走來走去維持秩序。

中國學生再一次被聯合起來，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兩個和尚、三個和尚或者更多的和尚挑水，還是有水喝的，而且喝不完。

阿新在夜色朦朧中提着密碼箱走進維拉中心，他手下的幾個臨時秘書、幹事也都提着公文箱，顯然有些沉重，阿新的腦袋和右肩一起往下沉去，但步履仍然矯健，徑直往中國學生的區域走去。在會客室裏，阿新見到絕食的代表，他們一共五個人。阿新聽到警員腳步聲遠去了，立即示意手下人迅速打開公文箱，裏面全部是漢堡包、三明治、火腿、香腸、意大利餡餅、面包和牛奶之類高蛋白食品。阿新告訴大家要特別小心，小口小口地消滅這些食品，千萬莫讓警衛聽見吃東西的咀嚼聲。

“我們要絕食到哪天？”帶頭的學生問。

“直到霍克和韓德跪下來求饒的那一天。反正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阿新陰陰地說着。說到玩心計，霍老頭是玩不過我們中國人的。

中國人在維拉拘留中心絕食的消息，通過媒體的報導傳遍世界各地。美國之音、BBC、CNN在第二天的新聞節目中都播放了這條消息，歐美各大報紙也紛紛仿效，一時間國際輿論沸沸揚揚，霍克政府顯然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正在加利福利亞海灘曬太陽的布什總統也給霍克去了電話，詢問中國人到底出了什麼事，可千萬別在澳大利亞鬧出第二個天安門事件來。

霍克正在澳大利亞北部的大堡礁上與家人度假，他立即給移民部的韓德挂了電話，詳細了解了中國人的絕食情況，指令韓德必須馬上親自去悉尼督陣，“如果這事鬧大了，你的政治仕途第一個結束。韓德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韓德這時正躺在黃金海岸別墅的海水浴池裏享受着陽光，接了霍克的電話，除了連聲說“是”，就是“馬上”。放下電話，他立即叫秘書接通了歐文局長的電話，劈頭蓋臉將歐文罵了個狗血淋頭。

新年之夜，韓德召集各州移民局局長到他的部長辦公室開會。局長們到了堪培拉時都哭喪着臉，中國人真的很麻煩，愉快的新年假期也不讓人快活。此時的袋鼠的國度裏，已不止維拉中心一個發生了中國人的絕食事件，絕食像倒

掉的多米諾骨牌，在各州拘留中心的中國人中漫延開來，移民局的局長們紛紛報告了各自拘留中心裏的絕食狀況。

“現在該怎麼辦，還抓不抓中國人？”局長們一起看着韓德，期待着部長的最後決定。

韓德摸着自己的鷹勾鼻，沉吟半晌，“政府的行動必須繼續，但可以靈活點，看上去像中國人的，就想辦法讓他們自己跑掉。”

“但南韓人、馬來人、菲律賓人、越南人與中國人統統一個樣，沒有辦法分清！”

“那就招聘一些中國人翻譯，隨行動隊一同行動，抓到亞洲人就叫翻譯用中國話審問，會講中國話的就統統放掉。”還是部長的水平高。

“南洋和印度支那的華裔也會講中國話。”

“你們問清楚從哪兒來的，不是中國來的統統抓起來！”韓德的態度斬釘截鐵。

“那中國人在拘留中心裏的絕食怎麼辦，如果死亡了怎麼處理？”

韓德終於發火了：“絕不能讓一個人餓死，不行就給他們打營養液，各局救護車全部進入緊急狀態。我不管你們用什麼辦法，總之絕不能有一個人因為絕食死亡，你們聽明白了沒有！”

局長們心事重重地離開堪培拉，他們害怕中國人，更害怕因此毀了自己的前程。

維拉中心的絕食進入第五天。連日來歐文局長親自到每個關押室慰問中國學生，百般請求中國人多少能吃一點。歐文局長和中心主任喬治先生感到自己幾乎是在乞求這些絕食的人，生怕第一個死亡的人從維拉中心開始，這裏是中國學生絕食行動的大本營，這裏也關押着最多的中國人。歐文和喬治幾天寢食不安，面如土色，但他們驚訝地發現五天過去了，絕食的學生代表們反而面色紅潤，意氣風發。歐文百思不得其解，難道中國人有什麼秘密？

“你知道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時的那個學生領袖嗎？”歐文問喬治說。

“就是那叫庫爾班木的家伙？”自從中心發生絕食事件以來，喬治就對中國學生一律徹底沒了好感。

“是的，據說他就祇號召別人去絕食，而自己根本沒有絕食，因此才很有氣力地和中國的官員大聲辯論。”歐文想這裏的中國人一定也和庫爾班木一樣，背地裏幹了點什麼。

“不可思議！”喬治恍然大悟。

“這些狡猾的中國人一定是吃了東西。一定是那個阿新叫人把食物偷偷帶進來的。如果阿新再有來探視，你就派人盯住他，一定要人贓俱獲，我要你親自搜查阿新帶來的每一樣東西！”歐文下了命令。

當晚喬治親自守着門崗，阿新和手下神氣活現地又來探望，喬治指示警衛檢查阿新等人帶來的隨身物品。

阿新厲聲拒絕：“誰敢開我的箱子，這裏面都是文件。”

“阿新先生，抱歉，這是這裏的規矩，我有責任保證這裏的安全，公事公辦，開箱！”喬治裝着很負責。

阿新無奈，被警衛讓到一邊。幾祇箱子統統被打開，除了食品，什麼也沒有。

喬治冷笑着：“阿新先生，這就是你說的文件？你帶這些食品幹什麼？你們中國人狡猾、虛偽、莫名其妙！”

阿新和他帶來的人被拒絕進入維拉中心。

維拉拘留中心的絕食持續了六天終於作罷，各州拘留中心的絕食行動也同時偃旗息鼓。

絕食雖然結束，但爭取學生權利的行動並沒有結束。阿新和華人社團的領袖們連夜開會，制定營救計劃。阿新為首的“爭取中國學生權利游說團”在拂曉正式成立，目標祇有一個，游說所能游說的聯邦國會議員，爭取在押的中國學生早日獲釋。游說團發表了由阿新執筆的《致國會議員公開信》，描繪了中國學生在拘留中心裏的艱難處境和心中的顧慮，聲稱這些中國學生普遍患了精神抑鬱癥，如果他們一旦被遣送，情何以堪；對於慕名而來的中國學子，袋鼠國的信譽和聲望也將一敗塗地。

阿新率領一支精幹的游說團住進堪培拉的一家汽車旅館裏。一百多位議員名單由游說團的成員進行合理的排列組合，然後分頭去做工作。雖然近在咫

尺，但阿新並沒有去拜訪霍克和韓德。游說活動進行得很順利，許多議員都被中國人友好地請去中餐館用餐或喝茶，在這樣輕鬆愜意的會談氣氛中，國會議員們紛紛對被捕的中國學生深表同情。看來，請客吃飯也是革命需要，吃了別人就嘴軟，吃喝風不能助長，但也不能一概禁止。

那晚阿新與游說團的成員正商議着第二天的活動安排，電話鈴響了。維拉中心裏一個福建來的中國學生已經寫好了自首書準備回國。這個人在絕食之後就一直哭哭笑笑，瘋瘋癲癲。

“我馬上趕回去，你們一定要設法阻止他回國，瘋子也要留下來，現在是關鍵時刻。”阿新放下電話，拎着公文箱匆匆離開旅館。

已是午夜，首都通往悉尼的高速公路上烟雨蒙蒙。阿新將汽車的油門踩到一百五十邁，反正這車子不是阿新的，阿新沒有錢買這部全新的沃爾沃，這車子是馬紅軍領導的研究會買下的——馬主席的專座。情況緊急，阿新就從馬紅軍手上借來，馬紅軍也挂了這個游說團的副主席。

阿新一路上壓死了幾祇野兔，可能撞死或撞傷了一頭袋鼠，終於沒有遇上警察，將車子開到悉尼。阿新敲開一個華人醫生的家，這是個精神病專科醫生，曾與阿新一起走進維拉中心給中國學生看過病。“非常抱歉這麼晚沒有預約就來打攪，實在是情況緊急。”阿新望着醫生一直在打哈欠，“有個福建的學生神經有毛病，你能出份證明嗎？”醫生先洗了臉，又泡了茶，然後才不慌不忙地打開電腦開始工作。阿新就在醫生的家裏起草了一份報告，以基金會的名義向內閣政府和移民部陳情。稱這個來自中國福建的學生因為長期被關押在維拉中心，身心受到摧殘，致使患上嚴重的抑鬱癥，人格分裂。根據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澳大利亞政府該應對病人進行救治，直至完全康復。如果強行迫使病人回國，會損害工黨政府的國際形象，一個身心健康的中國青年在澳大利亞住了兩年後，被當作瘋子扔回中國，這是讓人難以想象的。由于病人神志不清，不可能為自己行為後果負責，所以在遞解書上的簽字當然無效，而且容易被人誤解這是在某種外力引導之下簽的字。

天亮之後，阿新的報告由基金會黃會長親自翻譯成英文，蓋上基金會的章分別傳真給總理府、移民部和新州移民局局長的辦公室。九點正，政府內閣、

移民部的首腦們就會看到這份報告。這份報告還附着那位精神病醫生的診斷證明。

也是九點正，阿新走進維拉拘留中心，將報告親手交給喬治先生，然後去見了那個瘋子。

福建學生正蜷縮在關押室的角落裏，臉色蠟黃，見有人來將身子縮得更小，還不住地叨念：“不要碰我，我要回家……”這家伙是徹頭徹尾被嚇瘋了。

“你別怕，我是來救你的！”阿新試圖接近瘋子。

“我要回家。”

“這兒就是你的家，你已經回家了。”阿新想給那人一點安慰。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有人會送你上飛機，你不要怕。”阿新說。

那人衝着阿新呵呵地傻笑。

阿新嘆了口氣，要求去見其他的被押中國學生，然後又去見了喬治主任，要求看那個福建學生的遞解令。

喬治找出遞解令，面若冰霜地衝着阿新說：“這是本人接到的命令，當事人已經簽了字。”阿新看了看遞解令，從容地從西裝口袋裏取出一支筆，將瘋子簽名的地方畫了幾道杠杠。喬治見狀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從阿新手中奪過遞解令，但為時已晚，上面的簽名已基本上被塗去了。阿新瀟灑地揮手告別。喬治在後面跳腳，“你這混蛋，你要進監獄的！”

移民部部署的遣送瘋子行動由于阿新的惡作劇不得不推遲，原定星期六上午十一點由中國民航將瘋子帶回去，因為文件上的簽字被塗改，移民部祇得延遲了這次行動。

歐文親自去維拉中心找瘋子談話，帶去的翻譯是個福建人，可以與瘋子用福建的土話交談。但是瘋子比幾日前更顯瘋勁，無論是中國的普通話還是福建的土話他都聽不懂，他不明白歐文和譯員在那裏嘰咕什麼。歐文告訴瘋子，祇要在這張紙上簽字就可以回家。那瘋子口中祇是不住地念叨“我要回家”，却把雙手套在長袖襯衫的袖管裏。喬治在一旁向局長解釋，“這家伙心裏是想着

回家，把他的手弄出來簽字，他是瘋子，懂什麼！”歐文沒有吭聲，帶着翻譯走到關押室的走廊上抽烟，直至喬治從監禁室裏出來。歐文才又問了問瘋子的飲食情況。

“特別能吃，給什麼吃什麼。”喬治說。

“這樣就好，要特別小心，千萬別出事！”歐文交代完帶着翻譯離開。

阿新對於歐文的探訪情況了若指掌，維拉中心學生組織的耳目在中心各處巡視，隨時通報着情況。中心內的公用電話基本上成為中國人的專用電話。阿新連日來非常疲憊，那晚很放心地睡去，而且一覺睡到太陽照到屁股上把他燙醒。阿新以為一夜平安無事，準備吃過早點再去維拉走一趟。他想還是先給維拉中心打個電話，這時才發現電話的話筒昨晚沒有放好，所以一晚上也沒有一個電話，讓他可以一直睡到上午十一點多。他覺得有點不對勁，游說團還在堪培拉，維拉中心情況很緊急，怎麼可能一個電話都沒有。

他給維拉中心挂電話找學生代表。對方在電話裏氣急敗壞地衝阿新嚷：“你的電話出了什麼毛病，一夜都挂不通，那個瘋子一早就被押走了，據說是空軍的專機運走的，現在已經飛到太平洋了，再晚幾個小時說不定就到廣州了。”

阿新放下電話頹然地坐在沙發上發呆。他沒有料到政府會動用空軍的專機押送一名中國瘋子，一名瘋子竟然享受如此的待遇，外國人的思維和行事才真正是不可思議。這個瘋子是個信號，移民部已經失去耐性，要採取強硬的行動來解決令他們傷透腦筋的在押中國學生問題，事情越拖延下去就越被動。

阿新憂心忡忡，仰靠在沙發上閉目沉思。長堤已經決了口子，堤壩奔潰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劇烈抗爭

維拉拘留中心關着一個叫林向東的中國學生，他是第一批被捕的三十幾個人中的一個，也是被霍克與韓德點過名的非法滯留者。此人很早就申請了難民，後來搬家所以沒有收到移民部去面試的通知，申請資格因此也被取消了，列入非法滯留者的花名冊。根據移民法，林向東在被捕後數日之內就必須離境，因為輿論的壓力，林向東能够多住些日子，但是韓德和歐文都沒有忘記這個能够殺雞駭猴的典型。其他人包括那三個賣春的中國女學生都保留合法的申請資格，移民部尚不敢大批遣送。歐文局長和喬治主任正在商討一個强行遣送而又安全的計劃，試探中國人的反應。阿新和維拉中心裏在押的學生組織也在加緊活動，他們此次行動不僅震動朝野，就連遠在日內瓦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也被驚動了。

那是一個周六的傍晚，喬治主任和中心裏的多數警員都回家度周末，值班的警員人數不多。正是用晚餐的時間，中國學生懶洋洋地留在運動場上，沒有一點去吃飯的意思。大門口值班的警員正在聊天；崗哨們有的去餐廳用

餐，有的剛剛和中國學生打過籃球，已經去了衛生間衝涼。中國學生三三兩兩慢慢地朝第一道哨崗靠近，警衛們還在聊天，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這時突然有人高喊：“難民們，爲了自由，衝啊！”霎時間在運動場上的一百多名中國學生會聚在一起，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向第一道大門衝去，哨崗還沒反應過來，中國學生已經衝過了第一道崗，徑直向中心的大門衝去。第一道哨崗急忙朝天鳴槍，但奔跑的人沒一個猶豫，仍然不顧一切地往前衝。此時中心大門口已經有十幾個看守趕到，大鐵門被上了加鎖，而逃亡的人群也衝到了跟前，和阻攔的看守扭打在一起，中國學生仗着人多，占了上風，很快將警員團團圍住，沒收了他們的警械，有人搜出了鑰匙，强行打開最後一道關押的閘門，中國學生像潮水一樣涌了出來。拘留中心外面幾部面包車和貨車已經等候在道邊。接應的人衝着重獲自由的學生大喊：兄弟們上車！現在立即分散，所有車輛出了這條大道之後往不同方向和不同道路分散，維拉中心肯定已經向附近的警局報了警，我們的速度要快！

一百多人剛剛上車，遠處就傳來了警笛聲。逃生的車子瘋一般急速駛出大道，聽到四面八方鳴叫的警笛，載着中國學生的車子四處亂竄，破舊的面包車和貨車發出刺耳的發動機轟鳴聲……夜色愈來愈濃，爲中國人的逃亡創造了良機，周圍的居民以爲門外發生了警匪槍戰，嚇着個個關門閉戶。這一帶是野郊，本就十分偏僻，警笛嘶鳴，警犬狂吠加上朝天鳴放的槍聲，使居民陷入極度恐慌之中，有人給電視臺打電話請求幫助、有人報警，維拉中心一帶亂成了一鍋粥。有五十九名中國學生被抓獲，他們或迷失方向，或者被警察追上，或者躲在灌木叢中被警犬找到，總之這些人很倒霉，但仍有一百零五名中國學生逃亡成功，這是澳大利亞自建立拘留中心以來，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的越獄行動。

當地報紙，包括英文大報都暗示阿新可能是此次越獄行動的策劃者和直接的指揮者，因為事情發生的當天，阿新三次進出維拉中心，會見的都是同一個上海籍的學生，而這個來自上海的學生正是在維拉中心實施逃亡的組織者之一。一切迹象表明，阿新與越獄行動有着十分明顯的關聯。

《悉尼晨鋒報》登出了對維拉中心負責人喬治主任的採訪。喬治聲稱在此

次中國人暴動中，有七名警員受傷，拘留中心裏的財物損失達一百多萬元，因為中國人破壞了中心內的許多通訊設備，這些設備是在警員交接班以及用餐的瞬間被破壞的，說明中國人蓄謀已久；中心的探照燈也被切斷綫路，以致在夜色掩護下逃走了一百多人。喬治聲稱，維拉暴動的策劃者、指揮者應當受到法律制裁。

澳大利亞華文報紙則對傳言中的幕後策劃者阿新進行了採訪。阿新聲明他對這次的大逃亡一無所知，對發生這樣的事件也深感痛心疾首，但他相信中國學生本來就不應該關在像維拉中心這樣的拘留所裏，這是納粹種族主義行爲，是對人權和自由的踐踏。政府抓捕關押中國學生，是因他們非法打工而起，但没有收入，中國學生又怎麼可能在這裏生存，爲了生存中國學生不得不打黑工，這雖然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但這是法律的不公和缺失造成的，令人遺憾。政府對此一直反應遲鈍，甚至無視這些不公與缺失可能造成的後果，所以中國學生的逃亡行動是對政府漠視華人生存權的抗議，中國學生逃亡的行爲完全令人理解和同情！

世界各地的新聞媒介迅速報導了大逃亡的消息，作爲不久前中國學生絕食行動的續集，中國學生在澳大利亞的命運引起了各方關注，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的關注。《紐約時報》刊登了採訪加利先生的報導，加利先生表示澳大利亞發生這樣的事件是很令人遺憾的，澳大利亞政府應當採取更加積極的姿態與中國學生對話。衆所周知，中國難民的問題一直是個敏感的問題，不僅澳大利亞，美國和歐洲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是由于天安門事件引發的，西方各國政府在處理時通常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我本人希望澳大利亞政府也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加利的講話是重要的輿論武器，中國學生與澳大利亞政府的又一輪對話已經不可避免，公衆輿論也呼吁政府盡快解決中國學生的問題。

移民部與中國學生代表會談的地點設在了悉尼市新州移民局的大樓內。這座大樓的四周幾乎都是華人的地盤，唐人街就在大樓的斜對面。由于出于對一九九七共產黨接收香港和一直不斷的臺海緊張局勢的擔心，香港、臺灣的商人、技術人員、管理人才如潮水般涌進澳大利亞，唐人街四周的店肆商號和摩

天大樓一個一個被中國人蠶食，以致移民總局大樓孤零零地座落在中國人的地盤間。此次談判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聯邦移民部的韓德部長，中國學生代表團則以“爭取中國學生權利議會游說團”爲主組成，阿新被大家推舉爲代表團的團長。

雙方已經是老相識了，握手之後各自落座。

“部長先生昨晚沒休息好嗎？”阿新看出韓德一臉的疲憊。

“昨晚和聯合國的秘書長加利先生通了電話，少睡了一些。阿新先生我看你的精神倒是很好啊。”

“我說呢，難怪部長先生今天精神狀態不大好。”阿新說得有點得意。

韓德與阿新各自坐在圓桌兩邊的中央位置，馬紅軍等人也作爲代表分坐在阿新兩側，歐文、喬治等移民局的政府官員則坐在韓德兩側。

韓德開門見山：“澳大利亞與中國不同，這是個法制國家，不允許搞什麼群眾運動，人民遵紀守法，愛好和平，安居樂業，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動。此次暴力事件的發生令人痛心，因爲中國人的越獄行爲，澳大利亞人民對中國學生的同情心消失了，事態變得非常嚴重。我本人也無法向公衆解釋這個事件是個偶然事件。阿新先生，你很有才華，如果會說英語，將來也可以當部長。塗改簽名的行爲是侵犯個人權益，蔑視國家法律，移民部本可以起訴你，但出于寬容，移民部免于起訴你的違法行爲。至于此次暴動，有傳言說阿新先生是策劃者。我本人寧願相信這個暴力行動與你毫不相幹。”韓德的話說得綿裏藏針，但氣勢上却泰山壓頂。

“噢，那我在這裏得感謝部長先生給了我新生。部長先生一定知道在維拉中心的中國人都愛喝酒，苦悶無聊的人喝上幾杯就會忘記自己像動物一樣被關在籠子裏。酒精的好處在于不僅使人忘記痛苦，而且使人感動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我的老朋友霍克先生年輕時愛喝酒，那時的霍克一定比現在可愛得多。聽人說維拉中心的中國學生那天下午喝了許多的酒，因爲是周末，那裏沒有酒吧，也沒有俱樂部消遣，更沒有女人可以約會，所以祇好借酒澆愁。人在被酒精麻痹的狀況下是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而且據我所知，維拉中心裏的看守一直很鬆懈，而且還有警衛在當職時喝酒的現象，這樣才會出現大家都不願見

到的結果。這些中國學生我想當時一定是神志不清的，他們沒有和警衛衝突，實際上他們是憑着向往自由的本能衝過哨崗。所以有的新聞報導是不正確的，也沒有根據，把中國學生的行動隨意誇大，還傳到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那裏，真是小題大做。”阿新說得面無懼色。

“你是說中國學生那天下午喝了酒？”韓德問道，一面用目光向坐在一旁的喬治詢問。

“是的，我給他們買了酒，那天下午兩點送進去的。”阿新解釋得很自然。

“我們的看守沒有報告阿新送過酒。”歐文局長低低地聲音向韓德報告。

“我有許多辦法可以把酒送進維拉中心，這可以問喬治先生，”阿新顯然聽到了歐文向韓德說的話，“不信我們可以再試試。”

“我本人認為這些關押的中國人行爲都有些不正常，可以考慮他們也許喝多了酒。”韓德顯得很大度。

阿新知道對方並不願意將事態擴大，更不願意與中國學生對簿公堂，部長還想繼續當部長，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快息事寧人，中國人是很麻煩的。阿新接觸過一些西方的政治家，他們認為與中國人溝通很困難，與中國人講道理更費勁，這可能與中國人的哲學、政治信仰、文化傳統、人際交往方式有關係。

“移民部不會追究維拉中心逃亡者的刑事責任，但是中國人也應當知恩圖報，對於移民部的工作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澳大利亞是個有一百多個民族共居的國家，每個種族平等相處，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我們抓了上萬人陸續遣送了，就留下中國學生，我們已經很難辦，其他族裔社區很有意見，移民部為你們說了許多好話，你們還鬧出大事……”韓德繼續說着。

“那部長先生會不會考慮將中國人都放了呢，而且以後不再抓中國人，這樣就不會有麻煩，也不會再給您，尊敬的部長先生增加精神負擔。我相信如果這樣，部長先生從今往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阿新抓住韓德的話借題發揮。

“阿新先生很幽默，都說中國人不懂得幽默，阿新先生是中國人，但很幽默。”韓德又開阿新的話，“現在請歐文局長繼續我們剛才的話題，你們可以

磋商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

“好，那就由我們的馬紅軍先生與歐文局長繼續洽談。”阿新也收起鋒芒。

“我是非常熱愛中國文化的，我家裏收藏着明清時期的瓷器，還有唐伯虎的美人圖。中國人有悠久的文明歷史，我知道在兩千多年前你們就出了孔子、老子和莊子。宋美齡女士是你們的第一夫人，她的演說曾經迷倒了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周恩來先生風度優雅，連美國的尼克鬆總統也對其的風度贊嘆不已。中國人不應當做出粗魯莽撞、不理智的行爲，任何問題都可以進行磋商，我本人厭惡任何暴力行動。”歐文一上來就將學生逃亡的事件定義為暴力事件。

“是的，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從來就熱愛和平，但對不友好的人同樣是毫不留情的。中國人就曾把侵犯的日本法西斯趕出自己的家園。”馬紅軍打斷歐文的發言，慷慨激昂。

“中國非常偉大，中國人民在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發奮圖強，中國的經濟成就令全世界矚目，因此我建議維拉拘留中心以及各州拘留中心關押的中國學生自願返回中國，參加中國的經濟建設。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很多人發了財，他們炒股票，從事房地產，都很會賺錢。中國學生回到自己的國家一樣可以大有作為，將來還可以隨時到澳大利亞旅遊度假。”歐文的腔調與韓德的如出一轍。

阿新看出歐文不懷好意，拉住馬紅軍，親自對付這個家伙。“歐文先生一定知道中國人講的四海為家的意思。中國有句老話，‘既來之，則安之’。兩百年來，中國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太平洋上祇有幾千人的小島上也有中國人開的餐館和工廠，中國人走到哪裏就以哪裏為家，用勤勞的雙手建設新家園。沒有中國人的艱苦創業，怎麼有今天維多利亞州的新金山。澳大利亞幅員遼闊，國土與中國差不多，中國大陸住了十二億人，這裏祇有一千七百萬，因此兩萬人從中國搬到澳大利亞居住，澳大利亞不會有什麼為難。這裏的人民熱情好客，平易近人；這片美麗的國土需要更多的人去開拓，墾荒。我知道霍克總理、部長先生，還有您，歐文先生，都有意讓中國學生留下來建設澳大利亞，盛情難却，因此我們選擇留在這塊豐饒、富足、自由和無限迷人的第二

故鄉……”

“阿新先生扯遠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關在拘留中心的中國人問題，他們違反移民條例，移民部沒有理由釋放這些人，這會引起法律上的麻煩，影響聯邦政府的聲望。澳大利亞不同于中國，中國祇有一個執政黨，澳大利亞是多黨制國家，反對黨可以尋找各種理由攻擊政府，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小心。釋放中國人沒有法律根據！”歐文再次重申了不能釋放中國學生的理由。

“中國人問題是一個整體，不可能分割。維拉中心裏的中國學生不是孤立的群體，因此我們討論的問題應該是天安門事件後進入澳大利亞的所有中國學生的基本生存問題。聯邦政府鼓勵這些中國人申請難民，但又拒絕給予他們工作的權利。中國學生爲了活下去才不得不去打黑工，移民部却以此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尊敬的韓德先生、歐文先生，你們的行爲已經違背了聯合國難民公約，我和我的同胞有權利向聯合國難民公署控告移民部官員嚴重侵犯人權的粗暴行徑。”阿新說得理直氣壯。

韓德本想靠在舒服的椅背上聽雙方的辯論，聽到這突然扳直了身子，歐文聳了聳肩，沒有說什麼，把寬大的背往後抵靠在椅背上，那意思退避三捨。

韓德祇好再次出馬：“關於中國學生的工作問題，移民部已經着手安排，很快就會有消息的。”

“請問部長先生，有具體的時間表嗎？我可以很坦白地說，天安門事件之後進入澳大利亞的兩萬中國學生一直在打工，并且規規矩矩地納稅，他們這樣做是合法還是非法？移民部還繼續抓這些中國學生嗎？都抓了還往哪兒放？您的許諾可能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兌現，聯邦政府和部長先生還要拖延多久才給中國學生發放工作許可證？中國學生不可能餓着肚子等待移民部的恩賜。有句中國老話：遠水解不了近渴。部長先生，如果您手下的特別行動隊有興趣，我現在就可以將一些中國人的姓名和地址告訴他們，部長先生現在就可以下令將這些中國學生統統抓起來。”阿新單刀直入地針鋒相對。

話不投機半句多，韓德很尷尬，想盡早結束今天的對話，故作輕鬆地說：“今天我們的會談很愉快，讓我充分了解了中國學生的立場和觀點，我希望還有機會與各位進一步會談。”

局長歐文這時立即接上話：“韓德部長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要參加，今天大家就談到這裏吧！”

雙方的握手很有意思，阿新與韓德祇是輕輕碰了碰手，而不是以前總有的熱情用力，部長祇伸出一祇手輕輕搭在阿新的手掌邊緣，然後就匆匆抽出手來伸給其他人。阿新知道，韓德對他已經不抱希望，開始疏遠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是到了和政府分道揚鑣的時候。

阿新帶着代表團離開會議室時，對着韓德陰陰地說：“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惹急了也會咬人。後會有期。”

翻譯將這句話譯了很久，韓德終於聽明白了。“兔子咬人也不會疼！”韓德鎮靜地回應，并用中國話衝着阿新說了聲“再見”。

代表團的成員正在基金會辦公室開會，談論與移民部的對策之時，維拉中心打來告急電話，移民部長今天簽發了遞解林向東出境的命令。阿新罵了一句很粗魯的廣東話。韓德顯然是在會談結束之後就簽發了遞解令，這分明是在給中國人下馬威。林向東也真倒霉，一百多人都跑走了，他偏偏被逮了回來。

阿新衝着電話囑咐：“轉告林向東千萬別簽字，我們會設法阻止的。”說完放下電話，對着代表團成員將情況描述了一遍，隨後說：“現在祇有一條路，盡量發動多的中國人到維拉中心去示威，可以喊打倒韓德的口號，目前還不要打倒霍克或打倒聯邦政府，這樣可以孤立韓德這個混蛋。明白嗎？”

阿新徹夜未眠，翌日九點，維拉拘留中心門口聚集了五千多中國學生，馬紅軍準備了許多標語，包括打倒韓德部長，再踩上一祇腳，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口號。維拉中心內的五十九名中國人也舉着標語在中心內游行，高喊打到韓德和喬治的口號。

喬治向歐文和韓德告急，并向當地警察署求援，請求調集警察保衛維拉中心。中國人要再次暴動啦！

馬紅軍擒着喇叭，衝着拘留中心裏面高聲叫嚷：“叫喬治滾出來說話，否則我們就衝進去。”喬治出來見中國學生時，面色蒼白，連聲說他祇是負責看守這裏，中國學生有什麼事應該去找歐文先生和韓德部長。

阿新說：“喬治先生，我把這裏的五十九人交給你，少一個人我們就不會放過你。”說着攥了攥拳頭。

喬治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阿新先生，我不能擔保，我說話不算，這要歐文局長說了才行。”話音未落，對面的五千餘人已經振臂高呼口號。喬治先生沒見過這種架勢，嚇得說不出話來。

大約百餘名警察趕到現場，護住維拉中心大門，隔離開集會的人群。

馬紅軍衝着帶隊的警察署長和喬治喊：“祇要我一聲令下，你們守得住嗎？喬治先生，請你馬上給韓德先生和歐文先生打電話，請他們立即收回遞解令，如果膽敢強行遣送林向東，這裏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喬治驚恐地看着大門口黑壓壓的中國學生，他此刻想到俄國大帝的預言，東方的巨龍一旦蘇醒過來，黃禍會漫及歐洲大陸。

時近中午，歐文局長才氣喘吁吁地趕到現場。一見阿新，歐文就怒氣衝衝地說：“阿新先生，你是基金會的職員，有責任協助政府平息中國學生的騷亂，你的薪水是政府發的，你的職務是移民部任命的。”

“我的職務是基金會會長任命的，與韓德先生沒有關係。我的薪水是中國學生發的，天安門事件前後進入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有四萬多人，他們每天都在向聯邦政府納稅，政府才有錢給基金會撥款，請問是我們給政府交錢，還是政府給我們錢？這裏的中國留學生養活了成千上萬澳大利亞的失業者 and 老人，而這些納稅的中國學生沒有享受任何社會福利，還要被抓起來遣返，局長先生，你說這合理嗎？政府欠中國學生太多了！尊敬的歐文先生，四萬多中國學生在澳大利亞所創造的財富是無法估量的，沒有一個民族會像中國人這樣祇知道默默耕耘而不管收獲。現在我們在這裏集會，祇是爲了討還公正。澳大利亞法律規定任何人有游行集會的自由，你怎麼能說這是騷亂呢？”阿新毫不遲疑地反擊。

歐文氣憤地叫嚷：“你們，你們沒有向警察局提出申請，舉行集會就是非法的。”“對，你們以前集會都提交申請報告，但這次你們沒有申請就舉行公開集會，所以你們必須立即撤離，回去辦好手續才能舉行集會。”警察署長也在一旁幫腔。

“我們不回去，現在可以補辦申請手續。”馬紅軍見對方有人助陣，也上來幫忙。

“這不符合手續，請你們馬上撤離，否則我們祇有驅散你們。”警察署長一面下令警察立即行動，百餘名警察拿出警棍揮舞着逼進集會的中國學生。“請你們立即解散，否則我命令警察強行驅散你們。”警察署長再次強調。

“來吧，你們敢嗎？”馬紅軍看見警察逼上來，反而來了性子，衝着中國學生下令，“把這些警察包圍起來，看看到底誰厲害。”說着帶頭繳了署長手中的警棍，中國學生蜂擁而上，歐文、喬治還有警察署長被迫退進了維拉中心的門崗內。歐文惱羞成怒，“你們這樣做是犯法的，你們要坐牢的。”

中國學生逼近了大鐵門，崗哨持槍在手，虎視眈眈地看着黑壓壓的人群，警察署長找不到自己帶來的警察，他的手下早已被人群包圍在中間。

歐文打完給韓德部長的電話，出來與阿新對話：“韓德先生已經同意暫停遞解，現在你可以勸說這裏的人都回去了吧。”

阿新和代表團成員並沒有走，而是在一部面包車裏舉行臨時會議。馬紅軍洋洋自得：“今天這個場面足夠嚇住這些混賬東西的吧！”“我們不能輕敵，我擔心這裏有詐，韓德老奸巨猾，我們還是要提防他一手。隊伍可以拉回去，但維拉中心這裏應當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一旦發生情況立即通知大家。各位今天也要二十四小時呆在辦公室或家裏，隨時準備。我的意思這幾天很關鍵。”阿新說得很認真。

那晚維拉中心一夜太平無事。阿新在中心呆到晚上九點探視時間結束才離開。每隔一小時維拉中心就有人向阿新報告情況。第二天白天也很平靜。阿新在下午去睡了幾個小時。晚上六點阿新又準備去維拉中心探視，但他感覺一直很不好，說不出是爲什麼，總覺得可能要出事。

阿新臨走前還在叮囑馬紅軍等人，目前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大戰前的寧靜，各位千萬不要麻痹大意，隨時和我保持聯繫。

阿新在九點探視時間到點才離開維拉中心。他開車去唐人街買了一盒盒飯，然後回辦公室。他給馬紅軍等代表團的成員又一一挂了電話，再次叮囑他們晚上不要離開辦公室。

零點剛過，維拉中心的緊急電話就驚醒了阿新。林向東被喬治叫去談話，由五名警衛強行帶走。阿新給代表團成員挂電話，可馬紅軍和那些民運團體的主席們都跟人間蒸發似的，既不在辦公室也不在家裏辦，都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祇有秘書在辦公室值班。阿新衝着秘書們氣急敗壞地說：“去把那些混賬東西找回來，出大事了。”

半個小時後，阿新的大哥大又響了起來。維拉中心的所有崗哨都換上了軍士，每人都持着自動衝鋒槍，還有五十名軍士包圍着喬治的辦公室。阿新本來非常困，兩天沒睡好覺，深更半夜又找不到馬紅軍他們，無力通知足夠的人馬去對付新的情況。

阿新祇好又給馬紅軍的研究會打電話，秘書說馬先生和一幫主席們都去了當地一家著名的賭廳——文華社，但今晚手氣實在太差，正在罵娘，誰也不敢勸，輸錢的人急紅了眼，弄不好要殺人的。

阿新狠狠地罵了一句：“狗娘養的，都是一幫混蛋！”

阿新復給其他幾個代表團成員打電話，叫他們迅速趕到維拉中心，十萬火急，請廣大中國學生幫幫忙，盡可能多通知一些人去。阿新給維拉中心去電話，電話局自動回音“電話綫路有故障”。媽的，喬治這家伙竟把電話切斷了！阿新給一些朋友去電話，將他們從被窩裏叫起來，並請求朋友們去動員他們認識的學生，立即去維拉中心，而且要帶上小刀之類的武器。

凌晨三點多，阿新趕到維拉中心，已經有一些中國學生在那裏等候。三點三十分，維拉中心門口聚集了二三百號中國學生。

阿新上前對着軍士中一個帶着上尉軍銜的人喊：“請你通知喬治先生，我要見他。”

十分鐘後，上尉走出來，“喬治先生已經睡下了很久，不能見客。”

阿新掏出一把匕首，然後對同胞們說：“我們做給那幫混賬東西看看。”許多帶了刀或匕首的中國學生都亮出了家伙，包括水果刀。

微明的夜色中刀光閃閃、寒氣森森。上尉退後一步下令，所有軍士將槍栓拉得咔嚓作響。上尉走向阿新厲聲喝道：“叫你們的人把刀都收起來。”

“請把喬治先生叫醒，如果他不出來，我們就集體自殺。”阿新面無表

情，將刀尖對準自己的胸口，持刀的中國學生也都跟着阿新將刀尖指向胸口。

上尉愕然，轉身對一個士兵說：“快去報告喬治先生。”幾分鐘後喬治出來了。

“三更半夜你們想幹什麼？”喬治一見阿新就怒不可遏。

阿新收起刀子，對視着喬治，“你們把林向東怎麼啦？”

“沒有怎麼，”喬治一副無所謂的態度，“我祇是找他談談話，現在他已經回去休息了。”

“爲什麼半夜三更找林向東，爲什麼這裏換成了軍人，爲什麼電話綫路中斷，爲什麼……”

不等阿新把話說完，喬治就打斷了阿新的話：“阿新先生，這是維拉中心，找個在押的人談話是我的職責所在，我在執行公務，這很正常。你們是要在這兒鬧事嗎，軍士是支援我們中心的，這是霍克總理親自批准的。至于電話綫路，我不太清楚，也許是哪個地方出了毛病，你應該去問電話局。”

“你把林向東叫出來，我想見他。”

“這恐怕有困難，林向東已經睡下，他是在押人員，在不被釋放前是不能離開內崗到外面來，這是拘留中心的規定，而且現在也不是規定的探視時間。”喬治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阿新的要求。

“見不到林向東你會有更大的困難，我們集體自殺給你看。”阿新說得更堅決，將刀再次對準自己的胸膛

“你們不能這樣，”喬治說，“我去看看林向東睡着了沒有。”喬治慌裏慌張地走進拘留中心，過了一會他果然帶着林向東出來，但林向東必須站在大鐵門裏面，由兩名軍士和幾名警衛押着。

“林向東不能走出鐵門，那就等于釋放。”喬治解釋。

林向東一見外面的阿新就高喊起來：“阿新，我完了，他們的飛機已經準備好了，天亮就要把我押走。”

阿新見林向東衝着自己喊，也大聲回應：“你不能簽字，千萬別簽字，一簽就完了，我們會馬上想辦法的。記住千萬別簽字”。

一聽到“簽字”兩個字，林向東就嗚嗚哭起來，身體也隨之癱軟下去，旋

即被旁邊的軍士架住。“我簽了，他們逼我的，我沒有辦法，嗚嗚……”林向東放聲大哭。喬治立即叫人將林向東押了回去。

一切都結束了。天亮之後，一架飛機掠過維拉遼闊的原野，矯健地飛向天空，飛機在幾百個疲憊不堪的中國人頭上盤旋，然後悠然自得地飛上朝霞映紅的藍天。阿新仰望着漸漸遠去的飛機，心像斷了綫的風箏一樣飄渺。

天亮之後馬紅軍的“援軍”依然沒有出現，後來人們才知道馬紅軍和幾位民運領袖一夜狂賭爛飲，當押解着林向東的飛機飛上藍天時，他們已經像死豬一樣睡去，呼嚕聲比飛機的引擎聲還要宏亮。幾百個中國人傻乎乎地與軍人對峙着，最終在火紅的朝暉中撤離。

林向東是被綁架上押解的飛機，而且還血淋淋地被鐵錚錚的手銬銬着，由兩個人高馬大的軍士架上飛機。阿新最終還是在維拉中心見到了部長韓德。當他習慣性地伸出手去表示應有的禮節時，韓德的手却去辦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林向東天亮就要上飛機，這是他的自願簽名，其餘中國學生也必須在一周內全部離開各州拘留中心，無論自願還是非自願，一律遣返中國。”阿新接過官方文件，無法看懂上面的英文，但他看得懂韓德草草的簽名。

“如果中國人真正騷動起來，工黨可能因此下臺。”阿新冷冷地說。
“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吧！”韓德先是冷笑着，轉瞬就凶狠地說，“澳大利亞的法律是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政府的部隊和警察有足夠力量平息任何騷亂，阿新先生還是回去勸告中國學生三思而後行吧”。

“部長先生請不要後悔！”說完，阿新將文件扔在地上，然後大踏步往外走。身後是韓德一串的冷笑。其實阿新心中此時也陷入了絕望。

阿新走在維拉中心監房的過道上，聽見監房的另一頭傳出林向東的嚎叫，淒厲而悲慘。日後阿新才知道，林向東那天凌晨被押回來後，企圖用剃須刀自殺。他出國前曾是一家大型紡織廠的保衛科長，僅僅因為想多賺點錢，就告別妻子和八歲的女兒獨自出來闖世界。美麗的妻子是名護士，全家人為了他東挪西借地湊了十二萬才讓他一年多前來到這裏。他非常愛自己的妻子，說實話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一個大活人竟沒碰過一個別的女人，但他沒覺得自己老土，

也沒覺得太委屈。原來也就想出來賺兩年錢，轉悠轉悠就回家，現在債才還了一點，却要被當作非法偷渡遞解出境，還寫了自首書，自己有什麼面目去對面對當初妻子那般切的眼神。自己的一生已經完了，還要坑害妻子和女兒，他們將永遠生活在自己的陰影之下。絕不能讓家人為了自己毀了未來的生活！

這一切被巡查的警衛發現，結果又是一頓毒打，還被救護車送進了醫院，最後被渾身是傷地解上了飛機。林向東走了，他不會回來了。

絕食請願

當馬紅軍和各路民運主席們睡眼惺忪地來到基金會的辦公室，他們還不知道一夜之間天下大變。當會長和阿新布告了凌晨的情況，馬紅軍等人才徹底清醒過來。基金會特別會議作出決議，以全體在澳中國學生的名義向工黨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議，并通過報紙通知所有的中國人下午在悉尼市政廳廣場上集會。

下午一點，悉尼市政廳廣場聚集着，浩大的集會人群。阿新特意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裝站在主席臺上，對着臺下黑壓壓的人頭朗聲說道：“林向東的血告訴我們，對政府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這裏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戰勝一切困難險阻，爭取我們生存的空間……我們需要組織一千個身體強壯的同胞，帶上帳篷，去國會大廈廣場絕食抗議。星期一上午五時就出發，在議員們上班之前到達國會大廈廣場。朋友們，這次絕食是真正的絕食，無限期的絕食，絕食行動的後果無法預料。另外我們需要同胞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為這次行動募捐。這事關幾百名在澳大利亞各州拘留中心內

在押同胞的命運，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命運！”

馬紅軍這時站定在阿新的左邊，舉起阿新左手，一同大聲疾呼：“同胞們，戰友們，林向東的血不能白流，我們要向澳大利亞社會討回公道，向移民部討還血債！”

關東北不知何時也從後臺徑直走到前臺，舉起阿新的右手，用他那特有的東北聲調疾呼，他將第一個報名，準備捐軀赴難，用生命保護自己的同胞。

臺下掌聲如雷，口號聲震天動地。而站在兩個高大的人中間，又被人舉起雙手，短小的阿新像被活脫脫地吊着。

從悉尼開車上利物浦公路，然後轉入高速公路，兩個多小時就可以抵達堪培拉。國會議員，政府官員通常在上午九點前十分鐘經過廣場，進入國會。中國人在這之前已經到達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依次按方陣席地而坐。參加絕食的有一千二百人，這遠遠多過原定的一千人的目標。

阿新、馬紅軍和關東北作為絕食者的代表，佇立在國會大廈門前最高一級的臺階上，三人手裏都捧着一疊《嚴正聲明》。驚愕無比的國會議員和部長們拾級而上時都能收到一份《嚴正聲明》。這天正是國會例會的時間，一百多個議員都看到中國人的方陣和獵獵作響的旗幟與標語。

韓德部長走上臺階時，阿新冷冷地說：“部長先生，請好好讀一讀這份聲明，我很遺憾，你這個部長當不長了，中國人會把你拉下馬的！”

部長回頭望了望中國人的方陣隊伍，額上沁出汗珠。阿新忽然發現，五十出頭的移民部長幾天裏老了许多。

韓德問：“你們向警察局申請集會了嗎？”

“為什麼需要申請，難道準備自殺的人還需要警察批准嗎？”

部長不再說話，臉色異常蒼白，步履遲緩地走進國會大廈自動旋轉的玻璃門。

阿新起草的《嚴正聲明》即是一份公開信，分明也是一份抗議書。聲明對霍克政府提出了四點強硬的要求：一、立即派出慰問團赴上海，向林向東本人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承擔林向東的一切醫療費用，并且撥出專款作為林向東的

撫恤金；二、立即無條件釋放拘留中心的所有中國學生；三、立即發放工作許可證；四、移民部必須在電視報紙上公開向中國學生道歉。

正午時分，聞訊而來的新聞記者已達數百人，澳大利亞三家主要電視臺的新聞轉播車已在午間新聞裏報導了中國學生絕食的現場情況。國會議員們神色疲憊地步出國會大廈時，阿新下令方陣隊伍開始“表演”——搖動旗幟，高呼“要工作，要生存”的口號。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站在國會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這麼多的中國人要在這裏呆多久才會離開，一上午山呼海嘯般地喊叫吵得整座國會大樓“嗡嗡”作響，什麼事都無法正常地辦下去，也沒有心情辦下去。全澳洲，也許是全世界的人都開着電視，關注着廣場上中國人的表演。

《悉尼晨鋒報》的記者大衛也趕到現場，在人群中找到阿新，便操起自己記者的職業本色對阿新進行了採訪：“阿新先生，你們這次絕食行動是不是從天安門廣場學生那裏學來的？”

“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也是向老祖宗學的，中國人在兩千年前就會以絕食的手段保護自身的權利。”

“你們準備絕食多長時間？”

“直到政府妥協或者我們死亡的那一天！”阿新說出這句話時，一股無名的悲壯從心頭湧起，鼻頭不由得一酸，“中國學生的舉動是被迫的，希望能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體諒。”

這時，一旁的澳大利亞九號電視臺記者問道：“你們不怕政府使用強硬手段驅逐嗎？那時你們該怎麼辦？”

“在澳大利亞的土地上，中國人雖然勤奮，但始終是少數族裔，他們的權利一直難于被平等地保護。中國學生今天決定到這兒來，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我們寧願死也不會後退半步！因為中國學生的生存已經沒有後退的空間了。”

記者又問：“美國總統布什先生下周訪問堪培拉，國會大廈廣場將舉行閱兵式，這是有關澳大利亞的聲譽問題，你們到那時還要占據廣場嗎？”

“我們祇是希望政府盡快和我們舉行談判，同意我們提出的四點合理請

求，解決中國學生的生存問題，那時我們就會把廣場還給政府。”

“如果政府沒有誠意和你們談判呢？”

“那麼政府就不得不取消閱兵式或另找地方了，霍克先生也可以和布什總統一起觀看我們的絕食，我相信布什總統也許會喜歡的。”

下午三點三十分，政府代表在國會大廈內接見了絕食中國人的代表。政府方面代表是個移民部的部長助理，中方代表是阿新、馬紅軍與關東北。但會談沒有進行下去，中國人就憤怒地退場了。阿新在大廈門口對記者說：“如果總理或部長們沒有誠意解決問題，不參加談判，我們恕不奉陪。”馬紅軍也說，“政府沒有誠意，我們沒有必要談判，政府有能耐就等着瞧。”關東北也表示如果我們當中要是一個人死去，我們就要求工黨政府下臺，倒要看看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當天晚上，中國人支開帳篷，開始了宿營。堪培拉的初夏晚間很冷，中國人幾個人擠在一個帳篷裏，身上蓋着毛毯，開始了奇妙緊張的絕食第一夜生活。電視臺的三部轉播車在空曠的廣場上顯出黝黑的骨架。阿新和馬紅軍、關東北擠在一個帳篷裏商量對策。他們心中并不踏實，畢竟是在一塊陌生的國土上進行這種對抗性鬥爭，阿新有一種很灰暗的預感。阿新相信人的身上有種與天地感應的直覺，而直覺告訴他此次凶多吉少。

一千多名中國人的絕食行動進入第三天，國會大廈門前的廣場上就蜂鳴着救護車刺耳的聲音，此後救護車的嘈雜響聲就再也沒有消失過，直到中國學生離開國會大廈廣場的那一天。

記者們推舉出代表會見聯邦政府的副總理豪維先生，他們聲稱國會大廈廣場照這樣發展會出人命，這些中國人是鐵了心要將絕食進行到底，希望政府能從人道的角度，做出選擇。此時政府與學生代表的談判已經進行了四輪，從第二輪開始移民部的韓德部長就親自坐陣，但談判進展得很不順利，韓德已經忍無可忍阿新的嬉笑怒罵。第四輪時霍克總理親自出馬，但是霍克也無法消除雙方的敵意情緒，這樣的談判是不可能有結果的。

霍克表示他已指示各州移民局馬上發放工作許可，但其他三個條件無法接

受。澳大利亞是主權國家，國家的國格和政府的聲譽是不可以放棄的。林向東事件純屬偶然，此類流血事件今後不會再發生。

阿新回敬道：“國格當然重要，但保護人的權利和自由更為重要，這才是自由世界的普世價值。林向東的人格遭到粗暴的踐踏，政府難道可以置若罔聞？沒有人格的國家會有國格的尊嚴嗎？尊敬的總理先生，韓德先生就是制造林向東案的罪魁禍首，這樣的部長能够維護國家的尊嚴嗎？我代表四萬多中國學生要求部長立即引咎辭職，并接受法律制裁。”

霍克“嚥”地站起來，惱羞成怒地盯着阿新。雙方不歡而散。政府没有安排新一輪對話的意思。

記者們對於要求韓德先生引咎辭職的問題尤為敏感。國會議員和部長們没有不害怕記者的，記者是無冕法官，議員和部長們的私生活也逃不過記者的眼睛。他們在風流快活的時刻，某個暗處可能就躲着一個記者，鎂光燈閃耀之後一切就嗚呼哀哉。有時記者的窮追猛打也讓官員們措手不及，一句話稍有閃失，就可能毀了一生的政治前途，所以澳大利亞的政治家們都十分討好巴結記者，因為記者還會捕風捉影，含沙射影，引導公衆的注意力，反對黨議員也會利用記者提供的材料在國會上大舉進攻，受攻擊者通常百口莫辨，無招架之力。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此時唯一的選擇是丟卒保車，這樣就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宦海風波，政治家從此走完政治生涯。

阿新在國會大廈廣場舉行了多次新聞發布會，對移民部的韓德進行猛烈的抨擊，韓德立即成了記者們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對部長韓德的考證鋪天蓋地，從工作到私生活；反對黨的議員們也利用國會，直斥韓德惹惱中國人的愚蠢做法，動用空軍專機更是浪費納稅人的錢，現在還把國會廣場變成共產主義的天安門廣場。盡管在野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的議員拼命吹口哨，跺地板或者幹脆將皮鞋脫下來在桌子上敲打，但霍老頭畢竟老謀深算，竭力為老朋友作着辯護。

也該韓德走霉運，在霍克上臺為韓德辯解時，廣場上傳來一陣高過一陣“韓德下臺”的口號，這聲音透過玻璃傳到議會大廳，讓國會議員們聽得清清楚楚。眼見霍克在反對黨議員的責難中漸漸招架不住，作為工黨議員的議長先

生也坐不住了，他準備宣布休會，好讓霍克有個喘息的機會，但在野黨的議員們紛紛拍桌子，反對這一決定，要求繼續。可憐的議長，這個頭髮花白的老頭，英國風度的紳士吃不住這種喧鬧，祇好收回成命，宣布會議繼續進行。

這次國會緊急會議本來是討論怎樣對付國會廣場上的中國人，結果却開成了對移民部的問責大會。第二天，總理府向新聞界發布消息，韓德先生已經向總理遞交了辭呈。小道消息則說，霍克泪流接受了辭呈，然後兩位在一起二十餘年的老頭抱頭痛哭。

韓德道別霍克和自己的部屬，依依惜別地走出國會大廈時，阿新發現韓德比前些日子更老了，背好像也有點駝，神情恍惚。記者們立即像水桶般圍上去伸出話筒進行着落井下口般的採訪。阿新也是被記者們簇擁着走到韓德身邊，兩個老朋友再一次見面。

《紐約時報》的女記者問韓德：“部長先生，你對於辭職有什麼話要說？”

韓德此刻竭力保持着以往的風度：“請不要再叫我部長，我已經向霍克先生辭職了，對此我無可奉告。”

女記者又將話筒移到阿新的嘴邊，問阿新對此的看法。

阿新很自信，“我建議韓德先生可以去開辦一間移民事務所，為中國學生的居留申請服務。我保證動員中國學生都去韓德先生的事務所提交申請，這既方便中國學生，韓德先生也可以賺很多錢，我相信韓德先生有足够的智慧幫助中國學生擺脫困境。”

英國BBC電臺的記者也問韓德：“你打算在國會呆多久，會參加下屆大選嗎？”韓德依然保持沉默，無可奉告。

BBC的記者問阿新：“你認為下一任部長會比前任更好嗎？”

“如果韓德先生能够繼續當移民部長，我相信他會做得比以前好！”

《悉尼晨鋒報》記者大衛也擠到人前採訪韓德：“韓德先生，有人說你對中國人一直懷有偏見，是嗎？”

聽到這話，韓德慌忙搖頭辯解：“没有，絕對不可能，我對中國人很友好，我一向尊重中國的文化。但中國人太複雜，太不容易理解。我希望今後有

機會能去訪問中國。”

“中國人喜歡對抗，崇尚暴力，中國功夫就是以暴易暴。現在是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是在和人類和平進步的潮流相對抗，你個人所領導的每一次行動都很具有對抗性，你能對此做些解釋嗎？”大衛也將問題擺到阿新的眼前。

“這是一種誤解，中國人最熱愛和平，但中國人也具有反抗欺辱的精神。日本法西斯曾經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中國人當然要為自己的命運和生存抗爭，直到入侵者宣布投降。中國功夫是用來強身健體的，不是以暴易暴的工具，保護自己祇是各國人民生存的本能和手段。二戰時期盟軍不也用戰爭來消滅戰爭，爭取人類和平嗎？中國學生在澳大利亞受到不公正的、不人道的待遇，中國學生當然有權利採取行動進行訴求。他們在這裏絕食，許多人已經昏迷不醒，正在搶救，這樣的行動雖然很激烈，但不是非理性和對抗的。我們一直呼吁政府拿出誠意與中國學生對話，盡快解決問題。在我看來，中國功夫比起西方的拳擊和橄欖球來，已經和平得多了。”

阿新和韓德最後握手告別。阿新望着韓德送出臨別贈言：“請認真考慮我的建議，也希望您今後能多一些對中國人的認識，我們依然還是朋友。”聽了阿新的話，韓德面無表情地走下臺階，從此走完了他的政治生涯。

阿新、馬紅軍和關東北三人在絕食進行到第五天時也已經昏迷不醒，一起被送進了醫院。國會大廈廣場的中國人大多數進了一回醫院，挂過葡萄糖。葡萄糖當然是有營養的，人類吃的所有東西最後都要變成葡萄糖才可以被吸收，不能變成葡萄糖的統統作為糞便排泄除去。因為進過一回醫院，讓葡萄糖水滋潤了一回，因此中國人回到廣場又可以堅持絕食下去。阿新和馬紅軍、關東北在挂了幾瓶葡萄糖水之後，于下午四點左右回到國會大廈廣場。

《澳大利亞人報》記者問阿新：“布什總統過兩天就要到國會大廈廣場檢閱海陸空三軍，政府會採取措施清場，請問你們有何對策？”

“我們祇希望政府盡快拿出誠意，解決爭端，現在這也是我們所不願意見到的。第五輪的對話就在明日上午舉行，我本人對這次會談不抱任何幻想。這裏的中國學生已經經歷了極大的痛苦，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但對於弱者，政府却没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情和人道。我知道澳大利亞公眾通過電視的實況轉播

看到這裏絕食的人昏倒在地，許多人都給媒體打電話，要求轉達他們的關心和問候。我想借此機會向澳大利亞公眾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第五輪會談在絕食的第六天進行。實際上談判雙方都迫切希望會談成功。政府方面強行清場，可能發生流血事件。這個國家偏居一隅，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都沒有燒到這個南半球的大陸，因此這個國家的人民見不得流血，萬一有人因此死在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工黨政府可能就祇有下臺一種選擇了。因此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國人撤離國會大廈廣場。

霍克走進會議廳時心中已經有數，這次會談祇能成功不能失敗。阿新和絕食的中國人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些絕食的人開始出現動搖，不知道這將持續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阿新連日來對記者的演說都顯示出十分強硬的態度，阿新的煽情和悲壯贏得了民心，但政府的口氣也很強硬，政府要求絕食者離開廣場之後才可以進一步對話。阿新認為已經到了背水一戰的地步，中國人沒有多少體力可以再支撐下去，如果政府強行清場，局面將更加難以收拾，中國留學生祇能灰溜溜地退出廣場。因此阿新和絕食領導者們決定作出某種妥協，中國人應該體面地離開這裏。阿新走進旋轉玻璃門時對着全體參加會面的代表們說：“今天，我們一定要有成果，政府和我們都撐不下去了。”

第五輪會談雖然在凝重的氣氛中進行，但雙方很快達成一紙協議。政府立即發放工作許可，無條件釋放在押的中國學生，并通過澳大利亞駐上海總領事館協助尋找林向東，給予一定數額的醫療補助。政府的這些承諾與中國人當初提出的四點要求雖有點差距，但對阿新來說，對在這裏已經熬了六天的絕食者來說，已經是個非常滿意的結果了。六天的風餐露宿，饑腸轆轆，以及在生死之間搏鬥的時候過去了，絕食行動終於成功了。阿新第一次發現自己的直覺出了問題，但是他對此十分欣慰。阿新和馬紅軍、關東北等絕食代表站在國會大廈臺階上向着一千多勇士們揮手致意，電視轉播臺第一時間向全國觀眾播放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在絕食的六天中，中國駐堪培拉大使館官員也一直關注着中國學生的命運，每天都有大使館的官員到現場慰問同胞，并且送來大量的礦泉水和日常用品，并協助救治。

當阿新率領一千多勇士準備返回悉尼的時候，大使館的幾名官員專門前來送行，阿新答謝着，“感謝祖國對我們的關懷，請相信我們內心的愛國熱忱。我特別請你們轉達在澳大利亞的所有中國留學生們對林向東先生的關心。林向東先生不是叛國者，我們希望國內能妥善安置他。”

一名教育參贊說：“祖國歡迎大家回國，包括那些說過錯話、做過錯事的都可以既往不咎。你們留下來，將來可以成為愛國華僑，你們回國去，將是祖國經濟建設的寶貴人才。關於林向東問題，我們會和國內打招呼，請放心。”

阿新用力握住參贊的手：“太感謝你們，感謝祖國。我們澳大利亞留學生身後是強大的祖國，我們決不會辜負祖國和人民的希望。”

絕食的隊伍浩浩蕩蕩回到悉尼，受到兩萬多中國同胞的歡迎。中國人在唐人街大擺慶功宴，彈冠相慶，觥籌交錯。第二天悉尼上空萬裏無雲，陽光燦爛。下午，華人社團組織了舞龍舞獅活動，慶祝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日子。這一天從維拉中心釋放出來的中國難友也都參加到了慶祝的活動中，身輕氣爽。慶祝活動的主持人想請阿新上臺講話，誰都知道阿新是第一功臣，可誰也沒看到阿新，馬紅軍和關東北已經繪聲繪色地講了很長時間他們領導絕食行動的英雄故事，却仍然找不到阿新。

小報總編

六天六夜沒有好好合過眼，阿新此時正躺在床上，希望能睡上一個長長美美的覺。但阿新仍然睡不踏實，因為政府決定解散基金會。這等於說從今往後沒有基金會，沒有會長，自然也不需要什麼所謂的秘書長了，一切又都歸于原點。阿新沒有興趣再去參加什麼慶功會，有時阿新也想，還是馬紅軍、關東北他們活得自在，手上有人、有研究會，雖然誰都知道那些民主組織什麼名堂也不搞出來，祇是賺難民錢的機器，但至少不用像自己這樣為了方便面東奔西跑。自己雖然轟轟烈烈，但到頭來還得為找個活路發愁。

阿新失業的消息很快傳遍唐人街。知名度實際上也可以換錢。才失業一天，慰問的電話就紛至踏來，有人表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阿新，如果阿新打算成立什麼社團，他們也願意參加，並且可以交很高的入會費。阿新無意再去拉什麼隊伍，自從被馬紅軍開除後，阿新自認為已經很清楚這些草頭王的本來面目，自己沒有必要再去與馬紅軍、關東北之流為伍，步他們的後塵。從前又不是沒吃過方便

面，而且這一陣時間都是酒肉穿腸過，沉澱了不少脂肪，吃吃快方便面倒也無妨，還助于減少多餘的脂肪。阿新這般安慰自己。

阿新在家裏閉門謝客了沒幾天，《新大陸時報》的社長尤大力就找上門，邀請阿新去自己的報社當總編輯。阿新沒有拒絕，搖身一變，成為堂堂正正的報社老總。阿新上任的第一天，一身西裝革履，手提公文箱，很體面地走在阿斯菲爾區的大街上，與熙來攘往的熟人不斷點頭致意。

說起阿斯菲爾的淵源，早先這裏曾是歐洲白人移民的聚居區，店肆商號找不到一個中國的形象文字。此地毗鄰市中心，是悉尼西區的門戶，所有從市中心西去的列車都要從這裏經過，悉尼市內三條主要公路幹綫，兩條穿過阿斯菲爾，連通國家高速公路，直達堪培拉、墨爾本、阿斯雷德、佩斯等大城市，因此這裏是悉尼的交通樞紐。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阿斯菲爾成為繁華大鎮。中國學生進軍澳大利亞自然首選悉尼，到了悉尼不知怎麼就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三五成群地在這裏落戶，慢慢地成了中國學生到悉尼後的第二故鄉。一家香港人移居阿斯菲爾，開了一間雜貨店；另一家越南華人也遷居此地，也開了一間雜貨店，這就是華人在阿斯菲爾區創業的起步。一九九零年，中國學生在這裏開起了公司、商店，實際上這些中國學生都不是這兒的永久居民，但中國人并不總甘于做打工仔，他們想當老板。兩年之後，這個以白人為主體的商業繁華大鎮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地盤。由于受到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白人老板紛紛出讓商店，中國學生初生牛犢不怕虎，竟然統統將這些商號店鋪買下，重新裝修，改換門庭，堂堂皇皇寫上中國大字，一條大街一字排開，百來家中國學生的商埠、公司，中國大陸城的氣派就彰顯出來。這些中國人用打工掙來的血汗錢買下白人的生意，大膽地挂牌營業，像模像樣地做起老板。也許因為在這個地區居住的學生以上海人居多，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是誰人先起的頭，總之這個區又被人喚作為小上海。

這一代的中國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很懂得怎麼樣占領上層建築，控制輿論宣傳。在從事商業活動的同時，中國人的文化也在小上海發揚光大。有這麼多老板，就要有很多的文化生活。老板們閑來需要讀報消遣，豆芽般的英文報紙大抵上是看不大懂的，他們想看印着方正中文的報紙，內容除了新聞，也少

不了風花雪月。當然在這裏成名立腕的老板們還有人為自己樹碑立傳，吹吹打打抬轎子；而且幾萬中國學生中不甘寂寞的人太多了，誰都想出人頭地，于是中國學生中就有人自費辦了報社，華文周報、華文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趣的是這些文化人也看中了小上海這塊風水寶地，他們在中國學生開辦的雜貨店、肉鋪、魚店、快餐店、服裝店等等商號的樓上租一間十幾平米的房間，就一本正經地挂出了報社的名號，而且這名字都十分響亮堂皇，貫以世界、環球、新大陸、國際、東方、中華等字樣，讓外人乍一看，定然以為是一家國際大報社，擁有成千上百的員工，不俗的影響力，實際上祇是三五個中國學生湊在一塊的瞎折騰，甚至還有一個人的孤軍奮戰。由于文化太繁榮了，所有文化人都向這裏的小老板伸手要廣告費，那些學生老板們也很頭疼，但是老板們也有很開心的時候，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明白喉舌的重要性，老板們忍痛出血，其實也祇要二三百澳元，有時僅須幾十元，就可以為你量身定做篇專訪，在報紙的頭版登出老板紅光滿面的可愛照片，附上一篇洋洋灑灑幾千字歌功頌德的文章，一個才當上雜貨店沒幾天的學生小老板通常都會搖身一變，被報紙樹立成或是民族的驕傲、華夏的楷模，或是陳嘉庚式的僑領、艱苦創業的奇才，再不然也是個風度翩翩的儒商。總之賺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弘揚中國文化，為中華民族爭光。小老板們則會將這樣的文章從報上小心翼翼地裁剪下來，貼在店鋪中最顯眼的地方。倘若有幾家報刊都報導過這樣吹捧的文章，就都剪下來一溜兒排開，整整齐齊地貼在店堂的牆上，久而久之那牆上就成了報欄，老板的照片就在那報欄上對着所有顧客諂媚地傻笑。

對於許多吃閑飯的大陸文人，小上海是很寬容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裏養着許多在大陸讀過中文系、寫過姑且稱之為文學作品的文人騷客；也養了一批在大陸沒有當成作家，而能在這裏終於成為作家的作家們。小飯館裏也會時不時舉行各種名目的文人聚會，詩人們聚集餐桌前，吟詩作對，把酒當歌，抒發一下懷才不遇的感慨。小上海的各色文學協會名目繁多，譬如國際筆會悉尼分會、國際作家聯盟悉尼分會、亞洲作家協會、東方文學協會、世界華人文學聯合會、澳華作家協會、澳華文聯等等，其名字之響亮令人瞠目結舌。

小上海有一則流傳甚廣的笑話，說是阿新某日拎着沉甸甸的公文箱去報社

上班，過馬路時正好撞上紅燈，阿新在等綠燈時漫不經心地掃視着身邊一同等待的人，突然發現身旁的十數個同胞竟統統都是報刊社長或總編。小上海還有一則挖苦文人的笑話，說有一個中國學生和一幫麻將桌上的哥們打賭，這人說他正午十二時站在小上海那條名叫利物浦的通衢大街上往天空拋三個雞蛋，保準能砸在社長、總編或作家協會主席的腦袋上。朋友們不信，就都去看熱鬧，那三個雞蛋果然一個不差地全部砸在社長總編主席的腦袋上。

盡管如此，報社總編這個職位對阿新來說還是很具挑戰性的。阿新將尤大力為他印制的名片寄了一百多張給國內的朋友，還有在《羊城晚報》的舊識編輯，阿新知道這些名片會產生很大的效應。在中國大陸，報社總編的職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當的。國內的朋友不可能知曉阿新的報社祇有三個人，一個老板兼社長，一個總編兼記者，一個打字員兼勤雜，而銷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勉強靠着每個月不定的廣告費維持着。但朋友們祇要知道阿新有出息了，已經當上報社的總編這就很好，面子上也就有了光彩。

阿新接受總編這個職位後，找到尤大力第一句話就是“老哥，你想不想打開銷路，我有辦法讓報紙財源廣進。”

“你有什麼辦法？”尤大力聽了當然高興。

“找點刺激的話題，保證就能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來。”

阿新在《新大陸時報》上开辟了名為“胡說胡有理”的專欄，推出的第一個話題就是——女人。阿新在這個話題裏對女性肆無忌憚的攻擊，語言犀利刺激而又很有挑逗性，報紙立即受到所有人的關注，也包括女人們的關注。《新大陸時報》的銷售量果然立竿見影般扶搖直上，小上海的老板們都想把自家的廣告做到這家報紙上，廣告廣告就是廣而告知，祇有有人氣的報紙，才會有人願意掏鈔票在上面登廣告。《新大陸時報》終于起死回生，正因為阿新的加盟，阿新的知名度才救了報社。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正是因為阿新寫的那些不入流的文章男女皆喜歡，所以才洛陽紙貴。

其實阿新對女人的攻擊是自己內心作祟，祇是自己不承認而已。雖然“色是刮骨鋼刀”被阿新時常挂在路邊，但從前他還是很欣賞女人的，包括女人美妙的胴體。阿新有過兩個女人，但現在都弃他而去，跑到別人的床上。阿新大

男人的內心受到太嚴重的傷害，甚至有點扭曲，這樣就很自然會去傷害，確切地說是報復女人。阿新沒有別的本事可以直接傷害女人，于是祇能用這種口誅筆伐的辦法。復仇的人絕不可能理智，但是失去理智的阿新却能顯示出另一種不凡的才能。女人話題連載三章之後，報社毫不意外地接到許多女讀者的電話。有些人說，阿新這些年卧薪嘗膽為中國學生做了許多好事，中國學生不會忘記，但是阿新的話題實在太出格，做女人真不容易，做母親更難，黃河邊上有個“黃河的母親”塑像，潔白高雅慈母一般，這才是中國女人的真實寫照；阿新被人背叛過，但不能說所有女人都是壞女人，如果阿新需要女人，祇要在女人的話題裏說上幾句讓女人中聽的好話，然後說明自己很需要女人的照顧，自然有人願意為他穿針引線，自古美女配英雄，大英雄又何患無妻呢？

阿新不為所動，繼續他的話題，而且一期比一期的話題尖刻，所有的女人都坐不住，包括小上海的那些前衛派的新女性。

在一次酒會上，《中國快報》的社長有意戲謔阿新：“喂，老弟你該找個女人，你要是有漂亮的小姐擁在懷裏，你的女人話題一定會變得好溫柔。”

阿新却冷不妨冒出一句：“老哥你有過手淫嗎？”

那個社長剛灌下一大口冰鎮啤酒，阿新的話把他噙得將才下肚的啤酒一股腦全部當衆噴了出來，又是流泪又是鼻涕。在座的人等皆面面相覷，驚駭不已，誰也沒有想到有人會在公衆場合講如此露骨的言語。

阿新鎮定地說：“老哥你肯定有過，沒有的男人可能有毛病。各位女士和先生請不必大驚小怪。食色，性也。醫學認為手淫是有利于單身男人和女人的身心健康。我這個人一直有手淫的習慣，我没有女人，手淫幫助我解決了人的欲望，這樣我可以將精力用于正當的事業上。我的下一篇關於女人的話題，將是告訴男人們要以手淫代替女人。諸位都明白，這裏中國人中的男女數量很不平衡，女人實在太少了，那麼多男人找不到女人，這個問題和我們爭取居權的事業同樣重要。没有女人的男人可以用手淫解决，這是光明磊落的行為，又不傷害別人，没有必要覺得羞耻。老哥，你老實說你手淫過嗎？”

“你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快報的社長尷尬地說。阿新則陰陰地笑着去找自己的位子。

受到阿新奚落的《中國快報》社長靈機一動，編發了阿新在文人酒會上有關手淫話題的花邊新聞，還特意加了一段編者按，鼓動人們開展爭鳴，表示自己的報紙將與《新大陸時報》互動，開辟女人花絮專欄，共同討論女人的話題，凡讀過阿新專欄的讀者也可以在《中國快報》的專欄裏發表爭鳴，而且稿酬從優。

那時中國學生正是無所事事的時候，移民部一時不會將中國學生投進拘留中心，關於居權的事情還很渺茫，除了打工就無事可做。阿新的女人話題很有挑逗性，至少能給平淡乏味的生活增加點玫瑰的色彩。許多中國人都參與了話題的爭鳴活動，有些還相當的無聊，但《中國快報》老總却最喜歡這些文章，美國的《花花公子》不就是這樣才風靡世界的嗎。快報的社長同樣在為報紙的生存和自己的生計犯愁，他對外宣稱快報的印刷有五千份，可知情的人說快報最多發行不會超過五百份，連報社的老板自己都三個月沒領到薪水。自從搭上了女人話題，快報的發行量也如破土的竹子節節高。看着每個月銷售的成績單，社長自鳴得意，這下總算是找到了成功的秘訣，說到底這有一半還得歸功于阿新。他給阿新去電話表示感謝，并坦白地承認從十五歲起自己就開始手淫，那就像吸毒一樣充滿着快感和刺激。阿新在電話另一頭冷笑：“放心吧，我會在專欄裏順便補上一句，您真的從來沒有手淫過。”

快報的零售量持續上升，老總對外號稱已經突破五萬份，這當然又是胡話。就算四萬多的中國學生都去買這樣的街邊小報，人手一份也不可能有五萬份，但是關於女人的話題的確救活了兩家奄奄一息的小報。

這一天快報的社長接到了小上海知名女作家夢露的文稿，看完之後興奮地對合伙人說：“我們這下要發一回了，大家都去跑廣告，就說夢露小姐的文章一旦發表，比在悉尼扔一顆原子彈還厲害。這是性感肉彈。能和肉彈一起刊發的廣告一定威力無邊。”

據說快報還真的弄來了一批廣告費。幾日後快報用整個版面發表了夢露關於阿新的話題，悉尼的中國學生社區再次沸騰起來。

夢露說阿新討厭女人是很正常的，因為這個男人可能已經陽痿，就如同南極上空的臭氧層問題一樣。現在男人們的陽痿問題非常嚴重，許多優秀的男人

都有這毛病。阿新那活兒肯定也出了同樣的狀況。阿新現在與太監無異，因此在女人面前抬不起頭，打不起精神。否則也不會將色是刮骨鋼刀這樣的話挂在路邊，作為擋箭牌來遮掩自己的無能。胡弄不了女人，女人走人了，因此就寫女人話題，這是阿新在文字上進行的手淫活動……

夢露可是當地中國學生中響當當的人物，小上海上的新女性，前衛派作家。她的文章擅長描寫女性對性愛的渴望和撲朔迷離的女性隱私世界；還聲稱極為崇拜勞倫斯的才華，說勞倫斯對性愛的感覺超凡脫俗，一個女人如果能像查特萊夫人那樣瘋狂地愛過，這個女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人，即使被教會宣布下地獄也無妨。

夢露關於阿新的話題毫無疑問一下子成為公眾的話題。許多人祇看到阿新外表的光環，一個公眾式的人物。夢露的文章却為大家打開了另一扇窗戶，中國學生從這扇窗戶窺見了阿新的隱私。沒有人不喜歡探聽他人的隱私，沒有什麼東西會比挑逗的花邊新聞更具轟動性。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因為實在太有噱頭現在也不是新聞，祇有人咬人才可以咬出某種新聞。時報和快報都有人咬人的話題，一家是女人話題、一家是男人話題，把所有的人都吵得熱熱乎乎、坐立不安。在澳洲過了許多年苦悶的日子，如今生活中終於有了開心的話題，中國留學生就像是從冬眠中蘇醒過來的蛇，充滿着春天的朝氣和原始本能的騷動。這個世界被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兩把火燒得紅彤彤。煽情的語言才能真正將男人和女人火熱的欲望撩撥起來。為了居權與工黨政府艱苦鬥爭的日子雖然還未結束，但現在終於暫時太平了，大家都很疲憊，需要休息，需要生活的調味劑，不是那種神經緊繃繃的，而是一種軟乎乎的、輕鬆談諧甚至玩世不恭的文化。男人和女人的話題本來就是永恒的話題，沒有男人和女人的風流故事，這個世界就會枯燥無味。幽深的皇宮裏祇有女人和已經女人化的男人，因此三宮六院死氣沉沉，仿佛是浮出地面的陵園。阿新與夢露都深知男人和女人的七情六欲，也都知道人們在腦殼的某個陰暗角落需要些什麼。

阿新很快用自己的筆在報紙上專門為夢露作了回應。夢露的芳名不是這個女人的真名，這個女人的名字是個謎。阿新考證說這個女人把名字取成夢露，是把自己幻想成知名的美利堅性感女星瑪麗蓮·夢露一樣的女人，說明她不僅

崇拜性感尤物，還有很嚴重的幻想癥。阿新說，全世界都會記得瑪麗蓮•夢露那個永垂史冊的經典鏡頭。裙子恰在被風刮起在空中飄揚，美人用手護住欲起的裙子，露出迷人的大腿，風韻含蓄而又充滿誘惑，迷倒了成千上萬的男人，包括鼎鼎大名的肯尼迪總統和他的同胞弟弟，可見夢露的魅力光芒四射，所向披靡，對男人具有多強的殺傷力。三十多年來公衆都說瑪麗蓮•夢露是被總統殺死的，總統既然選擇了政治就不能去風流，人不可能什麼都占了，于是在瘋狂過後將性感女人變成了冰冷的屍體。阿新說，這個來自大上海的夢露并不性感，因此非要起個性感名字自我安慰，就像中國老百姓給小孩子起名字通常要查五行一樣，缺什麼就在姓名字補什麼，如五行若缺水，就考慮起個有三點水偏旁的名字。這個夢露五行缺性感，就需要找個性感女人作為偶像。

阿新不知還從哪裏查到夢露的私生活，因此津津樂道起夢露生活中的男人們。夢露的第一個男人是個鄉下少年。夢露在高中結束之後去無錫鄉下外婆家裏度假，結識了村裏的一位同齡少年。一個明月清朗的夜晚，夢露與少年下河去摸魚，摸來摸去就摸到河灘邊的一片西瓜地裏，兩人便像西瓜與藤蔓似的在瓜畦瓜溝裏抱成一團，翻雲覆雨。夢露的第二個男人是大學詩社裏的學長。在一個草長鶯飛、狂蝶漫野的春天裏，黃浦江涌動着不息的潮水，學長和夢露在外灘吟誦詩句，從普希金、萊蒙托夫到徐志摩、戴望舒。雨巷裏丁香一樣的女子很美，很溫柔，很朦朧，黃埔江升騰着霧氣使一切都顯得柔美和浪漫，年輕的男女最容易被此景勾引，因此心潮起伏，後來年青的學長就拉着夢露去了外灘的公園。夢露的第三個男人是自己的姐夫。姐夫在床上粗野蠻勁，有着美國西部牛仔的野性力量。夢露的第四個男人則是一位風流倜儻的老詩人，夢露小鳥依人一樣依偎在老詩人溫暖的懷抱裏。夢露曾對友人說過姜還是老的辣。據阿新考證，夢露在中國大陸交往過的男人就不下十個，有名有姓可以立即打電話去核實的就有五六個。根據夢露自己透露的生辰掐指一算，夢露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國時年方二十三，當時是一家出版社的文學編輯。二十三歲本應還是個很稚嫩很單純的年華，但夢露已經很成熟，她在短短的幾年裏創造出中國千千萬萬婦女幾輩子也創造不出的驚人奇跡，真是沒有虛度光陰。

阿新進一步介紹夢露的情史。夢露到澳大利亞不是來留學，而是來嫁人

的。夢露住在一個白人家裏當住家女傭時，不到三個月就披上婚紗，至于什麼時候就和房東的兒子上了床這已經無關緊要，總之很快就從住家女傭搖身變成了女主人。因此夢露雖說也是中國到這兒的留學生，但她從來沒有參加大家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樣的女人是個崇洋媚外的典型。據說她的洋丈夫還是個癩子，不知道那男人的活兒有沒有殘廢，因為除了丈夫夢露同時還有別的男人，說明夢露並沒有吃飽。

阿新與夢露你來我往的筆戰讓中國留學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看得紅紅火火。

墨爾本有個福建的留學生自稱是家傳的風水先生。說來也怪，此人不久前與人打賭，說霍克總理不出一個月就會下臺，被親密戰友基廷財長取而代之。事過二十多天，基廷果然當了總理，霍老頭垂頭喪氣回家寫自傳。此人便在報上自我吹噓，還在墨爾本一份中國學生辦的《太陽報》上發表文章說，時報和快報不要再鬧了，他預測到掃帚星在橫掃悉尼上空時將降下大火。一個不貞潔的中國女人和一個不頂事的中國男人這樣鬧下去，老天爺說干脆把火加大些。這位風水先生還說，從前發大水，上帝留下一葉方舟，方舟上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因此人類得以繁衍。如今上帝要發大火，也留下一葉方舟在悉尼北部海灣，方舟上也有一男一女，男的叫阿新，女的叫夢露……

《太陽報》的老板三個月前就已經登報，願意以一千元出讓報社，但一直賣不出去。在一次酒宴上偶遇這位風水先生，相見恨晚哪！

那晚風水先生因為搓麻將輸了一千元。他對着《太陽報》的老板坦誠表示自己身無分文，作為那一千元的補償，今後可以免費為報社看風水。可報社的老板回答的更是爽利，一千元足可以買下整個報社，你還是去借錢還債吧。

風水先生祇得答應想辦法讓《太陽報》重放光芒，賺回那一千元，到時老板也就不用賣報社了。

《太陽報》果然光芒萬丈，老板嘻笑顏開，放出風聲說現在就是有人出五萬元，他也不準備出讓。風水先生的預言文章滿紙胡言，但人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上帝留下一男一女在大海方舟上，不是選擇金童玉女，而是偏偏留下阿新這樣性無能的男人和一個淫蕩女人。中國學生們饒有興趣地討論着風水先生

的預言，猜測夢露會不會因此和阿新上床。其實那會兒沒有人會把風水先生的胡言亂語當回事，人們祇是將這些當作窮開心的笑料。

但大火真的從天而降，像是在一夜之間，悉尼城幾乎葬身在火海之中。火光映紅了天空與大海，火舌如群魔亂舞，吞噬着民房、野獸、森林和大地，灰燼灑滿原野和殘存的屋舍樹林，并且隨風吹進千家萬戶，灑落在女人細密的秀發之中。

澳大利亞政府在很短時間內調集了強大的人力和救火設施，空軍出動了飛機進行滅火，科學家進行人工降雨。馬紅軍、關東北等人也組織了人馬奔赴已被熊熊烈火包圍的森林地帶、國家公園區域，參與救火行動。阿新作爲實地記者深入第一線採訪。中國的留學生在這場世紀之火中表現得十分英勇，澳洲主要報紙都作了客觀的報導。《悉尼晨鋒報》記者大衛說，這些中國人已經將澳洲當作自己的家園，家園失火，救火當然義不容辭。中國學生看了這則報導很高興，這說明澳大利亞公衆已經將中國大陸來的學子當作自己的家人，這是民意，而民意往往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

悉尼的這場大火燒毀了無數的房舍、田園和牧場，幾座風景如畫的國家森林公園亦毀于火海，成千上萬的樹熊和袋鼠在大火中葬身，更多的動物流離失所。雖然悉尼的大火沒有像《太陽報》所預言的那樣導致世界末日，上帝也沒有祇讓這個地球上留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但是這場天災已經令悉尼市郊滿目瘡痍。大火前後持續了一個月，在最肆虐的那幾天，悉尼城四周火勢如虎，整個城市有可能被火焰吞噬，悉尼市民寢食不安，因爲從沙漠刮來強烈的熱風暴，猶如給還在熊熊燃燒的大火澆上了一瓢油，整個城市悶熱如同火爐。

阿新從火線上回來後狠狠地睡了兩天兩夜，然後又精神十足地坐在總編的旋轉椅上，繼續投入與夢露關於男人女人的筆戰中。

澳大利亞的主流社會也一直在觀注着中國人內部的動態，後來大概也是認爲性話題有助于提高收視率，因此九號電視臺安排了關於夢露的專題採訪。這天阿新在小上海的一家酒樓飲茶後，剛剛下樓步出大門，對面有個女子很親熱地呼喚着自己的名字，阿新歪着脖子看去，這不是夢露嗎？真是冤家路窄！對面的夢露又召喚他：“阿新你過來，快過來呀，這些記者是九號臺的，他們要

拍我的專輯，他們說沒有你在鏡頭上亮相就不夠戲份，你來幫幫忙，這是要上電視的……”

夢露身邊站着三個白人記者，扛着沉重的攝像機和架子，對阿新叫着，哈羅，密斯特阿新，哦，密斯特新……

阿新隔着大街對記者擺手，高聲回應，“這是個瘋女人，我不跟瘋婆子打交道。”但夢露還是和三個記者穿過街走到跟前

“密斯夢露說你是瘋子，”一個記者笑着說，“這很有趣，我們想錄制有關你們之間的對話。”

“我不會跟這種女人對話。”

“爲什麼？”另一個記者詫异地問，“密斯夢露很有意思，她的觀點很新潮。”

“不！”阿新說，“我對她的觀點包括她，都沒什麼興趣，這女人太幹瘦了。”說完，阿新朝記者們揮揮手，算是告別，扭頭大踏步地往報社去了。

三個記者却鍥而不捨，扛着攝像機緊緊跟着，但阿新大步流星極力擺脫，很快消失在熙攘的人流之中。記者們見沒有辦法，祇好回頭對夢露說：“這次看來祇好就拍你一個人了，非常遺憾，沒有對手戲，這個專輯的收視率可能不會高。”夢露很丟面子，她本來對九號臺記者許諾自己叫阿新上電視沒有問題，沒想到阿新一點面子也不給，而且當着街上的許多人看她的笑話，夢露覺得非常委屈。後來九號臺晚間播了夢露的專訪，夢露在節目中指名道姓說阿新是個上不了臺面的人，見了記者就灰溜溜地跑掉。記者在專訪中間夢露和阿新有沒有上過床，“阿新！”夢露說，“他這個人有陽痿毛病。”記者繼續問：“你是怎麼知道他有這個問題？”夢露的回答很簡單：“直覺。”直覺告訴她這個男人屬於很沒有品味的那類，而且是很差勁中最差勁的那一種，因此這樣的男人都有本能的自卑感，見到電視臺記者嚇得跑路就不足爲奇了，因爲害怕曝光。

阿新加盟《新大陸時報》，可以說是社長尤大力的慧眼識珠，也是尤大力走投無路下的孤注一擲。毫無疑問，尤大力這一步棋下得好。在澳大利亞華文報紙林林總總的名單上，時報獨樹一幟，擁有廣泛的讀者群。

時報的報社是一間十幾平米的閣樓，藍色調的牆上挂着中國書畫，透着濃厚的書卷氣；屏風隔開的三個小間各有用場，社長室實際上是堆集報紙的場所，包括那些很長時間都沒有被賣掉的舊報紙，從地上一直壘到天花板，厚厚的灰塵蒙着那些發黃的紙張。社長尤大力很少會呆在社長室裏，大多時間都在總編室裏工作。所謂的總編室就是時報編輯部，從記者、編輯到總編祇有阿新一個人，因此社長尤大力就要與阿新一起編輯、校對、拼版、剪貼、復印以及外出採訪，有時還要兼做點清潔工的雜活。每期報紙印出之後，尤大力都會開着自己的那部舊面包車，帶上阿新與打字員杰西卡小姐去拉報紙，然後挨個送到各個報攤和華人雜貨店。報社的另一小間是打字室，杰西卡小姐半天在這裏工作，另外半天在餐館裏當侍應小姐，尤大力所能付給杰西卡的工資很低，因此她不得不另外兼職，就是這間打字室也堆放着許多報紙與雜物。尤大力從前在國內從沒幹過報紙，不知道怎麼就鬼使神差地喜歡上了這個行當。有天他在工廠與猶太的老板吵嘴，猶太老板罵他窩囊廢，他就扔下手上的活對着猶太佬說不幹了，自己要辦個報社！猶太老板嘲弄他是要買報紙還是要辦報，你的錢能買幾份報紙？他覺得自尊心受到太大傷害，從前在部隊當軍官時總是訓斥士兵，現在輪到他自己挨訓斥，而且是被一個猶太肥佬像訓兒子一樣狠狠地訓了一通。尤大力就是在這種民族氣概的鼓舞下辦起了報紙，一年下來，賠了許多辛苦錢不說，人也老了好幾歲。辦報之前是沒有白發的，如今白發已經絲絲縷縷地爬滿了腦殼。現在再想去幹別的也不成，老板不會要一個白發老頭，因此祇能繼續咬牙幹下去。阿新離開基金會之後，尤大力就極力邀請阿新入伙，尤大力自己寫不出轟動性的文章，阿新却諳熟中國人的心理。一個小小的專欄所產生的連鎖反應，使這麼一家原本在小上海上都名不見經傳的小報現在不說揚名天下，至少在悉尼的華人圈子中也名聲在外。尤大力還當選澳大利亞華文傳媒協會的理事。其實尤大力也有苦難言，辦報紙沒有錢在哪都是件苦差事，況且在這個袋鼠都比華人更多的地方。尤大力當選理事的消息一發布，阿新就在報紙上替他大大地吹噓了一番，算是為時報做足了宣傳。尤大力知道報社能有今天的成就，全仰賴着阿新的足智多謀，可如何能延續銷量的熱度，成了尤大力的新煩惱。

“老哥您別急，我有新話題了。”阿新安慰尤大力。

“什麼話題？”

“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公衆話題，保證敏感！”阿新說得十分有把握。

阿新的新話題出籠了——“抗戰夫妻”。何謂抗戰夫妻？阿新如是解釋：中國八年抗戰死了幾千萬人，戰禍頻仍，苦了老百姓，許多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丈夫找不着老婆，老婆不知丈夫是死是活，因此就發生抗戰夫妻的故事，也就是找不到老婆的男人和找不到老公的女人臨時住在一起，相依為命，共渡苦難人生。男人女人住在一塊兒日久生情，情如夫妻，甚至生兒育女，這就非常麻煩。哪大戰爭結束，丈夫老婆都回家去找原配，抗戰夫妻的關係就可能結束。如果抗戰夫妻實在太恩愛，而且還有了兒女，這樣的人間故事非常精彩也非常殘酷。阿新說，我要寫出抗戰夫妻在澳大利亞今天的新故事，四萬多中國人在這裏忍受着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和寂寞，于是一個又一個的露水夫妻出現了，雖然他們和她們在萬里之外的故鄉可能已經有妻子或丈夫，但這樣的露水夫妻也絕對不是沒有溫馨的情感，這就是抗戰夫妻。從工黨政府宣布給予天安門事件之前到達澳大利亞的中國人以四年臨時居留，並且允許他們家庭團聚開始，新的故事也就發生了。許多中國人的老婆或丈夫興衝衝從大洋彼岸趕來團聚，雖然那些臨時家庭在結發夫妻的面前迅速解體，有的轉入地下，但總會留下些蛛絲馬迹耐人尋味。而國內的妻子和丈夫們由于多年的獨守空房，也并非所有人都能保持一份內心的寧靜，因為他們同樣也是人，也需要丈夫妻子們的傾心一吻，于是許多團聚夫妻發現了中間的隔閡，昔日同床同枕的枕邊人如今却形同陌路。

阿新的新話題毫無疑問是個熱門，所有把老婆留在祖國大後方的男人，慌慌張張在半夜給老婆去電話。有人打回電話時聽到小兒子或小女兒接電話，就問你媽媽去哪兒了？兒子或女兒會說跳舞去啦，今天是星期六。于是星期六的晚上這人準就一夜失眠，星期天神經兮兮去找朋友訴苦。

阿新說，抗戰夫妻本就是漂泊途中寂寞人的歸宿。留守女士們熬不住漫長寒冷的冬夜，如果一天遇上同樣熬不住孤獨與寂寞的留守男士，兩人就發現許多共同語言，就碰出火花，溫暖了心懷，溫暖了人間，這樣的男女關係、這樣

的第三者關係閃爍着人性的光輝。留守女士的丈夫和留守男士的妻子他們除了等待，同樣也需要慰藉。阿新聲稱，無論在中國或在澳大利亞所建立起來的抗戰夫妻家庭都是符合人情和國情的，我們應當以寬容的眼光看待這樣的新生事物。

阿新又講述了另一個故事，一個絕對真實的故事，因為故事的主角就是阿新的一位朋友。這個男人有了個漂亮的未婚妻，那個女人後來在出國潮中要去澳大利亞留學，男人借錢替自己的未婚妻辦了手續。男人有個朋友也要去澳大利亞留學，于是就買了同一天同一班飛機去那個出袋鼠的地方。男人在機場上對着自己的朋友說，請幫我照顧好她，我就把她托付給你了。朋友臨上飛機前拍着胸脯保證，一定會完璧歸趙，如果有一點閃失就不回來見你！這個男人無限欣慰和感激地望着載着未婚妻和朋友的飛機最終消失在去澳大利亞的藍天白雲裏。後來朋友的確沒有再回來，而自己的女人却和朋友牽手走進了悉尼的教堂。

這個話題很刺激，有噱頭，也很容易讓人勾起記憶。有人說這是阿新瞎編的，但阿新則一本正經地說這回全是真的，沒有半點杜撰。阿新繼續為抗戰夫妻詭辯，因為有了抗戰夫妻這樣的新型家庭關係，社會才變得很安定。有人在前方為下一代的幸福生活而勞累，有人在大後方五年八年的等待，并且擔負着撫養教育子女的重任，就像歌兒裏唱的，軍功章裏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待到山花爛漫時，夫妻重逢在陽光下的悉尼歌劇院或者月光下的故鄉，我們都應該緊緊擁抱，說一聲過去的就讓它永遠過去吧，一起向前看……

“胡說胡有理”的“抗戰夫妻”話題引發了中國學生的思鄉情懷，由此引出了許多關於家庭倫理、道德情操、忠誠仁義的話題。古老的諸子百家言論不斷被引證，從《道德經》到《傳雷家書》，這一脉相傳的中國道德說教文字以及這些文字所涵蓋的傳統思想全部面對嚴峻的挑戰，給許多苟合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理論空白和精神困惑。阿新的一家之言對游蕩在異國他鄉的中國青年有着深刻的影響，許多終日忙于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失去了知識的力量和判斷事物的能力，人雲亦雲成為這幾萬中國人群體的時尚和精神病態。阿新聲稱存在即是一切，存在即是合理，同胞們沒有必要去背負道德的十字架，也沒有必

要在神父面前懺悔，我們是無罪的，所有的悲劇都歸咎于殘酷的生活本身。

悉尼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方正先生也給時報投稿，義正辭嚴地批駁阿新的觀點。存在不等于合理，這個世界存在的許多現象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人們才會去試圖改變這些不合理的現象。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身就是向舊制度的挑戰，我們不能說這些舊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就不應當廢除。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驗證明了市場經濟是目前最好的經濟形態，計劃經濟亦被證明是不合理的經濟形態，盡管它在中國存在了四十幾年。阿新所說的“抗戰夫妻”這種提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同義詞，為這種家庭關係正名甚至鼓吹美化，就是一種變態的心理反應。每一個人人都應遵循現代的社會規範，包括道德規範，這是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的主要依據。西方社會所出現的一種家庭復歸、道德復歸以及人類復歸大自然的哲學意識，充分表現出人類理性的覺醒、道德良知和人性的復蘇。阿新所一再挑起的關於女人男人話題除了眼界低俗，並沒有什麼值得恭維。阿新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如此不堪的言論不僅有失水準，而且令人失望。

阿新與方正博士的論戰持續了好一段時間。阿新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所表現的是殘酷的真實，博士的嚴于律己、潔身自好所昭示的是崇高的理想。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既需要真實也需要理想，因此希望阿新和博士繼續論戰下去，起碼可以使日子過得不那麼無聊乏味。

阿新說我們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裏，因此我們戲弄人生，瀟灑走一回；博士說我們努力改變現實，追求完美的社會制度，所以我們不能戲弄人生，戲弄本身就是自暴自棄，阿新的所謂瀟灑其實是一種自我墮落。阿新說博士的完善社會不過是謊言世界，真實比謊言醜陋，但真實很可愛；博士說阿新這種人既做好事也做壞事，他的靈魂徘徊在善與惡之間，所以他沒有信仰，因此靈魂必將沒有歸宿。阿新代表了迷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我們要拯救這些迷途的羔羊。阿新說博士勸我們做個好人、博士希望我們成為馴服的羔羊，但博士真的不食人間烟火，殊不知人太善了要被人欺負，羊太馴服了就要任人宰割，我們不需要哲學也不需要神學，我們要居留權要很多錢，要生活對我們公平一些；博士說阿新胡言亂語，有理說不清，後來干脆挂出免戰牌，說做博士論文很忙，無心戀戰，砍柴的不和放羊的閑話，那會誤了幹活。

阿新在博士退出論戰之後還特意寫了篇《送別》的文章算是給退出的博士踐行。博士要走了，時報和阿新都依依不捨。博士先生千萬不要去砍柴，細皮嫩肉的一介飽學之士，哪像上山砍柴的農人？博士還是回圖書館作學問，沒柴燒時說一聲就行，阿新和報社同仁可以替博士去砍柴，反正也用不了多少力氣和功夫。阿新倒是喜歡做個羊倌，唱唱“信天游”什麼的，還可以和十八歲的小妹妹坐在小河邊談情說愛，餓了也可以獨自在河邊架起篝火吃烤羊肉，那真是鮮得不得了。不過阿新也可以做個砍柴夫，柴夫不一定就沒有文化，鐘子期也是個柴夫，却能真正理解伯牙的琴聲和心聲，可謂知音難覓，所以做柴夫也很快活。博士認為砍柴和放羊的閑話會誤了幹活，這是博士的清高和少見多怪，子期和伯牙閑話音樂話題，就沒誤了砍柴活。

博士看了阿新的《送別》，苦笑。

沒有人出來論戰，報社一時也失去新鮮話題，有許多學生耐不住寂寞就給阿新打電話，詢問下一個話題將是什麼。看來漂泊在這塊新大陸上中國學生們的日子除了打工，太孤寂、太乏味了，生活需要調味品，無論這是不是阿新在胡扯，否則這長長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被迫辭職

天安門事件之後抵達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沒有過上幾天清閑的日子，災難又一次降臨在他們的頭上。移民部難民審查委員會着手處理中國學生難民個案，一些個案很快走完初審程序，但幾乎都以失敗的結果告終。申請者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仲裁委員會上訴，但關鍵的問題在於上訴者已自動失去了工作的權利，而且這種上訴明擺着也祇是走走過場而已。中國學生覺得自己又被霍克出賣了，當初沒有霍克總理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哪兒會冒出這麼多的政治難民。現在霍克下臺了，新的政府又不認賬了，聲稱中國學生不是政治難民，移民部特別行動隊又開始抓人，中國學生被捕者日益增多，維拉中心又關進了數十名中國學生。

中國學生的基金會早已不復存在，澳大利亞土地上中國人的民主隊伍實在太多，却没有誰可以號令天下。關東北說自己是大學的副教授，高級知識分子，號令天下理所當然是他；馬紅軍說自己民主革命的資歷最老，是悉尼最早起來搞民主、反專制的，過去的經歷也比關東北輝煌，

二十多個國家的元首都曾與他親切握手交談，他才是當之無愧的不二人選。此外還有諸如陳紅軍、關西北等各派別的民運領袖也站出來，稱自己才是美國、法國等民主派在澳大利亞的真實代表，馬紅軍和關東北不過是民運中的冒牌貨，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精英，祇有由他們出面，和澳大利亞政府談判才是實至名歸。

在衆說紛紜、各方唇槍舌劍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阿新在報上也開辟了選舉民運領袖的話題，關東北最先被拿來開涮。

關東北其實是錢鐘書先生《圍城》中所說的“克來敦大學”的副教授。因為在大學畢業後曾長期于國內的政府機關中供職，這位令人尊敬的關先生從未在教育或研究機構當過職，因此決不可能當過副教授，實際上連個助教也不算。如果他可以拿出自己的教授證書，那一定是在黑市上買的，因為這種假文憑在大陸廣東、海南、福建一帶的地攤上比比皆是，至多花上一百元人民幣就可以搞到一本裝潢精美、美倫美奐的證明，而且需要是什麼大學的都可以，北至清華，南至中山，應有盡有，真正的物美價廉。關先生常吹噓自己在國內受了政治迫害，是逃到澳洲的中共官員，所以是個名符其實的民運領袖和政治難民。實際上關先生算不上中共官員，因為他還沒有被要求加入共產黨，在國內時連個小小的科長也沒當上，更不知道他的逃亡經歷從哪來，是誰逼的他。據可靠的消息，他是一九九〇年從東北某公司被派到在悉尼設立的辦事處工作，在任期將屆滿由于十分留戀澳大利亞的風俗人情和生活，背着辦事處，私下向澳大利亞的移民局遞交了獨立技術移民的申請。但申請很快被駁回，因為審查官說他的年齡實在太大，其次獨立類別的技術移民應在境外入紙申請。據說這位審理官還提出質疑，關先生沒有大學任教履歷，如何做得了副教授？關東北于是惱羞成怒，堂堂科班出身的人才，竟被小小的移民官嘲弄，真是虎落平陽遭犬欺，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向單位打了辭職報告，不要那個鐵飯碗，幾萬中國學生都可以賴在這裏不走，自己為什麼不可以。于是二次向移民局遞交了申請，這回可是貨真價實地申請了政治難民。關先生大學的同窗也在悉尼，可以作證，關東北不是副教授；關先生先前的同事也願意作證，關先生脫離工作單位，擅自留在國外，已經犯了嚴重錯誤，但不是逃亡，因為單位的檔案裏至今

還有他當年的辭職報告。

說完關東北，接下來就輪到馬紅軍。說起馬主席的家事，可謂源遠流長，長輩們不是老紅軍，就是老革命，這一點千真萬確，因為單從馬主席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馬主席從小就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純粹的根正苗紅，出國前才剛剛入了共產黨，可一到澳大利亞怎麼就立即面目全非，整天喊着要推翻自己曾經朝思暮想加入的共產黨，還說這許多年都給共產黨給騙了。真不知道是馬主席是在國內被自己的親友長輩蒙蔽了這許多年，還是到了國外才被人給騙了。說到和外國元首握過手，這確有其事，榮幸之至，每回演出結束後，國家元首當然要被安排走上舞臺和從中國遠道而來的藝人們一一握手，這祇是出于禮節上的尊敬，自然而然，没必要大驚小怪。但馬主席那時還不是舞臺上的主角，因此祇可能被安排在後排不起眼的位置，可仗着他個高手長，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後排伸出手去，這絕對有機會剛好抓住某個外國元首的手指或手掌。可以想象，在那樣熱烈的場合下，反正都是握手，又有誰會計較和哪支伸過來的手多握一下。至于親切交談那就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為除了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好像還沒人有聽過馬主席用第二種言語說過一句話，試想當年又怎麼可能用多種外語言與外國元首們親切交談呢？馬主席現在不拉小提琴專門吹口琴，所以嘴上的功夫日益長進，憑着這身絕技在悉尼的民主社團中身輕如燕，游刃有餘。

阿新和美國派、法國派的民主鬥士們很久沒有正面交鋒，從前阿新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不恭，叫那個庫爾班木的副主席在悉尼出盡了洋相。後來因為居權的事，與工黨政府鬥智鬥勇，大家利益一致，才沒有二話。

阿新說美國派的民主人士才是真正的新革命，資格當然比起馬紅軍來還要老，是馬爺爺那一輩的新革命，已經老得差不多沒有人記得起來這些人都是幹什麼的。法國派的則是真正的逃亡者，可不是關東北那樣的假逃亡，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沒幾個鐘點，見到風吹草動的他們就已經像澳洲的野兔一樣飛快地溜出國境，而且口袋裏都揣滿了美元英鎊，絕對不是他人造謠的中國人民幣。無論如何，美國派和法國派都有真正教授級的人物，絕不是關東北那種冒牌的“克來敦”教授，這些人中有相當的社會精英，但這些人狼狽逃竄時無不選擇

了美利堅合衆國或是法蘭西共和國，因為在這個世道上，美利堅像徵財富、霸主和現代文明；法蘭西像徵自由、平等和博愛。澳大利亞的現任總理基廷先生自己都看不起澳洲，說澳大利亞是地球的屁股，那些偉大中國的精英們當然也不會看得上澳大利亞。目前深深熱愛澳洲這片土地的民主戰士們，不過是流亡精英分子領導下的蝦兵蟹將，這些人不能算是精英分子。雖然說老子英雄兒好漢有些道理，但老子還是老子，兒子還是兒子，不能混爲一談，否則就乾坤大亂了。澳大利亞的民主派人物與在美國、法國的精英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為有些領袖連大學的門檻在哪都不清楚，更不可能知道何謂精英。阿新聲稱，當地有個著名的民主領袖居然不會寫情書，還曾找過自己請爲代寫，作爲酬勞，是一頓金唐大酒樓的皇帝蟹，味道美極了。

阿新自嘲地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澳大利亞這塊土地如此荒涼，太不適合精英們成長了，這塊土地祇能生產自己這種混混式的人物。民運領袖們不要再打內戰了，選舉是個好東西，整天喊着要民主的領袖們難道會不了解嗎？祇管選來就是，選上誰，誰就是統帥，既公開又公平，還能和平解決爭議，用不着領袖們這麼整天臉紅脖子粗地吵嘴架，讓洋人看中國人的笑話。這就像澳洲報紙評論聯邦大選時很精辟的一句話：“基廷與候信都是王八蛋，兩個王八蛋中選出一個，誰選上誰就是總理。”如今民運的統帥也是一樣，在幾個王八蛋中選一個，誰上了誰就是這裏中國民運的統帥。馬紅軍、關東北和各路民主派的人士紛爭不停，其實大可不必，誰當了統帥也還是王八蛋。

阿新還在調侃各路民運領袖的時候，移民部又抓了幾十個超期滯留的中國學生，而後形勢更加急劇惡化，各州都有壞消息傳到報社，中國學生被捕的人數又在迅速增加。

這天阿新正和尤大力討論着中國學生被捕的消息，馬紅軍和關東北一同找到報社，提議要和移民部打一場官司或者再上堪培拉絕食靜坐。

馬紅軍說：“我們準備動員大家發起一場官司，原告是所有中國留澳學生，被告是移民部，我們要指控那個鮑格斯，雖然他替代了韓德，但他一樣是個虐待狂，專門和中國學生過不去。他召集成立的難民審查委員會嚴重失職，

并且違反聯合國難民公約。我們可以向同胞籌款，聘請大律師團爲大家辯護。”

關東北也在一旁忙着幫腔：“對，這場官司打下去，就是十年八年的也不用當心，反正拖着，移民部就不能抓人，大家就可以高枕無憂地等待官司結果。”

見兩人講得那麼輕巧，阿新很不以爲然：“當初遞交難民申請時，律師也說過審理如此之多的個案需要十年二十年的，現在才多久大家又惶惶不可終日，律師爲了掙錢，全是胡說八道。”

“管他有什麼結果，官司打起來就有戲唱，工黨政府一貫就是吃軟怕硬。阿新，你難道忘了我們那次在國會廣場上氣吞山河的壯舉？”馬紅軍說着，眼神中又溢出當初的驕傲。

“對，不給基廷點顏色看看，聯邦政府祇會越來越猖狂。基廷是個愛爾蘭人，生性好鬥，他是要我們和他鬥一鬥，這頭愛爾蘭豬是不見刀子不落泪的。阿新你怎麼突然間軟蛋啦？”關東北跟着慫恿。

阿新眯縫着小眼睛看着眼前這兩個彪形大漢，心想：“這兩個家伙到底要玩什麼把戲？”之前無論自己在報紙上怎麼奚落他們，他們現在好像一點也不記仇。有人說阿新是小上海上的一支筆，阿新自己有時也沒覺得這個稱號有什麼誇張。事實上坊間能與阿新筆戰的人少見，能戰勝的至少目前還沒有，馬紅軍與關東北也祇能佯裝不在乎阿新的冷嘲熱諷，表現出落落大方的君子風度。

阿新本不想配合馬紅軍他們，但一想這畢竟是關系到全體中國學生的事，還是應該有所行動，于是挪動了一下靠在椅子上的身子：“好吧，我配合你們。可這事以誰爲主呢？”阿新邊說，邊用眼睛瞟了瞟兩人。

“我來。”關東北嗓門大，先聲奪人。

自打絕食後，關東北的名氣現在可是大大蓋過了老資格的馬紅軍。因為國會廣場上關東北數次被記者拍到由救護車送進醫院。真是個爲了大家利益不惜獻身的楷模！祇是阿新暗覺得他昏厥的次數有點多。可不管怎麼樣，關東北是大家公認的“英雄”，甚至在研究會裏，馬主席的眼皮子底下，關東北也有了自己的信徒。現在的關東北已不再是當初那個開會祇會坐在角落裏的關東北了。

“就你，能召集到幾個人？還是以我為主。”馬紅軍也當仁不讓。

在自己的報社裏見有人劍拔弩張，尤大力急忙拉開兩人：“算了，算了，都是為大家做事，何必這麼激動嘛，到時大家都盡量多動員人去，越多聲勢越大越好，到時大家共同主持，我和阿新也一定會去。”這才算勸開兩人。隨後四人又研究起集會時的方案。

這回中國人沒有去市政廳廣場集合，他們選擇在市中心火車站前面的貝爾蒙公園，這是阿新的主意。中國學生中許多人已經上了黑名單，如果移民局將市政廳廣場全面封鎖，誰也別想跑掉，祇能束手就擒。貝爾蒙公園處在中央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總站的交通要衝，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大家可以一哄而散，不至于被一網打盡。

那天貝爾蒙公園裏慵懶地躺在草地上睡覺的澳洲土著很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領地被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占領了，通常這個公園裏祇有白鴿、海鷗、土著人和啤酒瓶，但現在土著人不得不爬起來滾到公園的角落裏，因為中國人實在太多了。馬紅軍說參加集會的有兩萬多人。阿新說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會少于一萬。總而言之中國人已經很久沒有舉行這麼大規模的集會了，幾家悉尼的主要電視臺都到現場做了實況轉播。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大嗓門，平常湊到一塊說些閑話也像是在吵架，現在馬紅軍、關東北更是衝着高音喇叭喊叫，臺底下萬眾歡呼，來來往往的悉尼居民都駐足觀看這些中國人究竟又要幹什麼，為什麼這個城市會一下子冒出這麼多黃種人？他們聽到一陣又一陣熱浪般的中國話，各色橫七豎八的條幅標語占滿了整個公園。這時一種厭惡之情油然而生，在這個以白人為主的城市裏，黃種人竟然耀武揚威，稱霸城市，白人社會顯然感到受到了幹擾，這是很荒唐、很滑稽的。

此時臨時搭起的主席臺上出現了小小的騷亂，馬紅軍和關東北又在為誰是今天的主角爭執不下。馬紅軍說今天他號召來的人馬最多，理應由他主持大會。關東北則譏笑他連一句英文也不會講，又怎麼能主持這個大會，讓全澳洲、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今天集會的意義。

兩人的口角變成了對麥克風的爭奪，阿新站在主席臺的一側，冷冷地看着兩個人你來我往的“遊戲”，他并不想上去勸架。臺下的中國人不知道馬紅軍

和關東北在主席上在導演什麼節目。有人說是那是兩人在相互謙讓。那話筒就在兩人手上傳來傳去。而後馬紅軍和關東北的手下也紛紛跳上臺，頓時主席臺上變成了橄欖球賽，臺下衆目睽睽，一場精彩的比賽開始了。

澳大利亞電視九號臺的女記者沒看出端倪，上前不解地問阿新臺上這究竟發生了什麼。

“祇有一個話筒，馬先生和關先生在互相謙讓呢？”阿新故意將話反着說。

“為什麼不事先多準備幾支？馬先生和關先生，還有其他人就不用這樣了。”記者沒明白阿新的真實意思。

“就算有兩支，對他們來說也不够。”

女記者茫然地看着阿新冷峻的神情，不知所措地退到場地邊上。

話筒後來被馬紅軍的手下抱在懷裏，從人堆中奮勇爬出來。那人看見臺角的阿新就喊：“老哥，快來救救我！”

阿新裝着沒有聽見，九號臺的女記者見那人後腿被人抱住，沉重而響亮地摔在臺子上，好心上前接過話筒，轉交給了阿新。于是臺上的人又一窩蜂地擁向臺角。阿新立即將話筒還給了記者，那意思你看給誰就給誰。女記者不知所措，一會兒準備將話筒往馬紅軍那邊送，一會兒又打算往關東北這裏遞，很是為難。

“把它給我，”關東北衝着這位金發碧眼的年輕女士用英語說，聽得出關東北的語言相當溫柔，相當風趣，充分表現出男士的風度和修養。隨後馬紅軍也用生硬英語單詞夾着中國話嘟囔了一陣，但沒有人明白他都說了些什麼，其實就連馬紅軍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對不對。女記者見馬紅軍說得很費勁，滿頭大汗，大約是出于憐憫，就將手中話筒遞給了馬紅軍，并對關東北莞爾一笑，說了聲“抱歉”。

女記者當然不知道話筒這麼一遞簡直是送給馬紅軍整個世界。說時遲那時快，關東北突然撲上來緊緊抓住話筒的電綫使勁，將麥克風分成應話筒和電綫兩個部分，話筒在馬紅軍的手中，而關東北則擒着麥克風的電綫。臺上頓時又亂成一團，馬紅軍與關東北齊齊滾在地板上，爭得不分上下。阿新就走到他們

身子的中間，用皮鞋後跟使勁地跺了兩腳，兩人疼得齙牙咧嘴才鬆了手。阿新將話筒和電綫從兩人手中奪過，走到記者身邊，接起麥克風，拿在手中，得意地笑着。馬關二人從地板上爬起身，怒目圓睜地衝着阿新破口大罵，中文夾着英語，女記者皺着眉頭退到臺下。

這時阿新喝住衆人：“想不想要話筒，想要就給我住嘴。”馬紅軍和關東北果然很聽話，都盯着阿新準備將手中的話筒交給誰。

阿新悠悠地說：“你們做個遊戲，誰贏了這話筒就歸誰，誰也不許反悔！”

“他媽的什麼遊戲？”

“你把我們當猴耍！”

“很簡單，你們都做過，不管我是耍猴耍馬還是要牛，你們給我聽好了，哪個輸了就給我滾到一邊，現在先叫你們的人統統下臺去，別在臺上哄哄叫，這像什麼話！”阿新命令着。

馬紅軍和關東北面面相覷，但還是先叫手下人都退到臺下。阿新這才說：“現在你們開始，錘子、剪刀、布，你們都會吧！”

“這是小孩把戲，誰不會。”馬紅軍說。

“要玩就玩高智商的。”關東北也說。

“對，就是給那些智力沒成熟人玩的，誰贏了誰就可以拿到這個話筒。規矩我來定，你們不服就下臺去，要不現在就開始。”阿新說着，晃了晃手中的話筒。

馬紅軍，關東北當然在這時誰也不願先到臺下去。兩人呼吸急促，雙目直勾勾地盯住對方。結果還是馬紅軍技高一籌。

阿新衝關東北說：“願賭服輸。這個遊戲雖然很簡單，但看來你果然不是教授水平，現在按照規矩，請你到邊上去呆着去。”

關東北忿忿不平地罵着娘，退到主席臺邊上。

馬紅軍接過話筒，整了整西裝，拉正了剛才被扯歪的領帶，氣宇軒昂地立在主席臺中央，他知道現在整個世界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馬紅軍的演說持續了半個小時，雖然大部分都是廢話，大家也已經都聽過千遍萬遍，但臺下的人

群仍然情緒高漲。他們這時太需要一個人來指導方向。

“……每人出三百元，祇要三百元，積少成多，我們就有足够的經費和移民部打一場空前未有的官司。同胞們，衆人拾柴火焰高，現在我宣布籌款活動正式開始。大家排成縱隊，我的研究會會計和工作人員會爲大家登記并開具收據。祇要你們交了錢，就可以永遠地呆在這裏，成爲這裏的新移民。”馬紅軍極盡所能地煽動着。

這時，關東北又衝過來大聲疾呼：“馬紅軍，你不能一個人拿走這筆錢，說好了這必須由大家共同管理。”

可馬紅軍根本没理睬關東北的狂呼尖叫，他命令手下人將事先準備的桌子搬到前臺作爲登記處，做好收錢的準備。同時依然對着話筒高聲煽動：“交三百元的同胞算是參加打官司的成員，不足三百元的算是支援同胞打官司，大家都是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同胞們有多少錢就出多少錢。”

馬紅軍立于主席臺中央，檢閱着人們如潮水般地涌向主席臺下掏錢、捐款的恢弘氣勢。

關東北衝着阿新半哭喪着說：“阿新你得站出來作主啊，這些錢可都是大家的血汗，必須共同管理，姓馬的怎麼能獨吞。”

馬紅軍聽了，在一旁不耐煩地說：“不用麻煩兩位了，研究會完全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好這些捐款，這些錢我一定會專款專用，統統用來請律師、打官司，我馬紅軍以人格保證，絕不會有一分錢中飽私囊。”

阿新冷冷地說“莎士比亞說過金錢是婊子。”

那天會計向馬紅軍報告，總共收到一百零五萬三千六百元捐款。三人都很吃驚，百萬澳元對中國的窮學生來說可是個天文數字，中國人實在太可怕了，隨便喊幾聲口號就可以籌集到百萬巨款。

關東北則繼續堅持這麼多錢不能祇由馬紅軍一個人掌管，要成立捐款基金會，請各界共同參加，監督這筆錢的運作。

阿新衝着馬紅軍說出最後一句話：“馬主席，你如今是百萬富翁了，這錢可都是同胞的血汗，你得掂量掂量它的分量。”

馬紅軍再次拍着胸脯發誓：“二位盡管放心，祇要願意，你們現在就可以

是我研究會的副主席，負責監督這筆錢的使用。但你們放心，我絕對會用這筆錢敲開國會的大門，叫基廷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厲害。我盡快去找大律師。”

兩個多月過去了，找大律師的消息依然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可中國學生却一個又一個被各州移民局關進拘留中心，包括那些向馬紅軍踴躍捐款的熱血青年。

《新大陸時報》上开辟了百萬捐款的話題。馬主席至今還在找律師，可能還要再找上一年半載，到時候仍然可能找不到，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等待馬主席給一個說法。馬主席曾發誓一定會救大家脫離苦海，祇要那時交了三百澳元，大家都是馬紅軍的親人，這世上那裏有自家人不救自家人的道理。可這正是馬主席給大家的一個誤區。澳大利亞是公正、平等的國家，如果中國學生爭取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就有希望獲得居留，這與交不交三百元其實沒關系。移民部的鮑格斯部長還沒有犯糊塗，他絕不會說凡是交給馬主席三百元者就可以居留，凡是不給的就統統拉去拘留中心。

馬紅軍看了大為光火，在自己新購買的獨立辦公室裏將嶄新的大班桌拍着啪啪的響：“這一定又是阿新，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關東北見馬紅軍撈了這麼多油水也很不是滋味。他姓馬的有什麼本事，不會拉兩下小提琴嗎？居然讓他這麼輕輕鬆鬆就賺了一百萬，不就是仗着自己搞了個烏研究會嗎？正在馬紅軍整日泡在酒樓和俱樂部裏的時候，關東北也另立門戶，挑出自己的大旗。

這天下午，還在貝爾蒙公園裏，關東北舉行了開張大會，宣布自己因為看不慣馬主席不能領導大家與移民部交涉的所作所為，直言進諫，結果在研究會裏受到小人的排擠，深表失望，所以決定與馬紅軍徹底決裂，劃清界綫，成立自己的關氏“民主研究會”。在解決大家居留權利的關鍵時刻，自己作為一位公眾人物，祇有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為大家盡力，絕不會像馬主席那樣裹錢“揚長而去”。

那天來看熱鬧的也站滿了一大片公園草坪，當然開張大會還有一項重要的程序必不可少——募捐。有了馬主席兩個月前的前車之鑒，捐款人數已大大減少。因為大家知道馬主席現在已經身家百萬，而關主席還是窮光蛋，如果今後

又出個馬東北之類的，大家哪還有這麼多的錢捐這個捐那個，所以還是等等看吧。

關東北沒有公布賬目，但據身邊的人透露，那天的捐款大約也在十萬左右。相比于馬百萬，關十萬祇能算個中產。不過關十萬已經很滿足了，很快就給自己的研究會買了一部二手奔馳，雖然沒有馬百萬的沃爾沃貴，但怎麼也是臺奔馳。當然組織就是他，他也就是組織，因此奔馳就是他的專座。餘下的錢租辦公室，作辦公費，其實也是自己的生活費。至于打官司的事，有馬百萬至今都還在物色在先，我老關當然也要一步一步來，畢竟要找到個好律師不容易，總不能耽誤了大家的事。

那些又一次交了錢的同胞祇有望洋興嘆，全當運氣不好，在老虎機前打了水漂。其實中國學生早已被小上海上各種各樣的民主領袖們磨練出了好脾氣——遇事能忍就忍。這樣每當關東北駕着奔馳車兜風或者把車子開到停車場內，中國學生見着了還會客氣地對着關東北點頭致意，關東北則一身豪氣地朝同胞們揮揮手，那意思：沒問題，你們的事都沒問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看着馬主席、關主席簡單易行的發迹，不少有心人也不甘人後，紛紛效仿，一時間小上海的報紙上內容又熱鬧異常，像打開了一個萬花筒。今天這個民主黨開幕，明天那個反專制聯盟誓師，報紙的標題下面總是羅列了一串串像糖葫蘆似的主席、副主席、理事們的名單。久而久之，大家發現了一個秘密，怎麼這個黨和那個聯盟的人員名單那麼雷同，難道領袖們都在擠一個屋檐下辦公嗎？除此以外，報紙上還時不時爆出個公開聲明，表示對自己何時何地參加了某某黨，什麼時候多了個副主席的頭銜全然不知，對這個新頭銜當然也不會負什麼責任。

民主領袖們的一舉一動一時間成為小上海上不得不看的風景，馬主席更是其中的風雲人物。因為在那串糖葫蘆似的主席的名單中，馬紅軍這三個字已經成了常客，而且馬主席的撰文也常躍然紙上，內容則多是指責這個黨、那個陣綫“偽民主”、“假正宗”的口誅筆伐。當然除了這些，民主領袖們的一切一切，包括花邊趣事也成為矚目的焦點。也許是與馬主席有過一段交情的緣故，《新大陸時報》在第二版專門开辟了一個新欄目，由總編阿新先生親自執筆，

專門報導馬主席的“領袖風采”。

四月二日《新大陸時報》報導，自從成為新貴之後，民主研究會的馬主席現在身邊美女環伴，最近辦公室又換了叫娜拉的女秘書，而且這回還是個貨真價實的洋妞。昨日午後，馬紅軍携女秘書款款走進維多利亞大廈，很隨便就為女秘書買了一件紅色貂皮大衣，價值五千多Dolla。馬紅軍已經許多年不打工，屬於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職業民主革命家，又是從哪兒弄來這麼多錢給女人送殷勤呢？

幾日後，又是一則更轟動性的新聞。一個上海留學生去逛一家地下妓院。這個妓院是兩房一廳的高級公寓，住着從上海和哈爾濱來的兩名中國女人，悉尼留學生的行話稱這種妓院為一鳳一巢，雙鳳一窩。上海男人選擇了從哈爾濱來的那個，他在客廳裏見到這個女人就發覺這簡直是埃及艷后，美麗性感，風情萬種，如出水芙蓉一樣鮮嫩。那個上海女學生顯然生育過，而且三十多歲却可以做姑媽，因此上海男人看都不願多看一眼。上海男人在鳳巢裏享受一番之後，哈爾濱女人說：“如果你喜歡我，可以經常來，下回記得買點女人喜歡的禮物。”上海男人聽着很嗲的聲音骨頭都酥了，滿口答應。但那女人的另一句話把上海男人驚得從床上跳了起來：“馬紅軍前天送了我一條項鏈，翡翠的，珠寶店老板說值一萬多呢！”上海男人慌張地結了賬，拉上褲子，奪路而逃。一路上，上海男人忿忿不平，他交過三百元給馬紅軍，那娘們說馬紅軍出手闊綽，一條項鏈就值一萬多，這一萬多裏面是不是就有自己的那三百元。他媽的與其交給馬紅軍去逛妓窩，不如自己用呢。當晚他就給報社去了電話。

上海男人的艷遇很快被登了出來，悉尼城裏好不熱鬧，不僅中國學生給馬主席去電話，詢問自己捐款的去處，那些妓女們也在晚間致電馬主席，聲稱自己的身價遠遠超過那個哈爾濱姑娘，懇求馬紅軍去驗明正身。後來甚至連紅燈區的挂牌洋妓女也千方百計地致電馬主席，邀請馬先生視察全世界著名的英王十字區。

馬紅軍氣急敗壞地打電話給阿新，聲嘶力竭地威脅：“你給我閉上臭嘴，否則我叫黑道的朋友給你看！”

很快《新大陸時報》在頭版又登出矚目的消息——馬紅軍醜聞敗露，女秘

書離家出走。當然女秘書出走得穿上那件紅色的貂皮大衣，且原因已經查明，主要是擔心自己染上艾滋病，馬主席很可能從哪個妓女那裏帶回了艾滋病毒。

這回是個陌生的男人給阿新打電話，說自己是唐人街上三合會的黑幫，要阿新立馬閉嘴，否則會就被五馬分尸，扔進太平洋喂鯊魚。

阿新又寫了一篇百萬富翁的專題，他說那個來電話的男人可能是三合會的人，馬主席既然身家百萬，自然很容易雇到幾個打手。雖然自己孤陋寡聞，但黑道上的一些行話也略知一二。據他所知，黑道上不用“五馬分尸”這樣過分粗魯的言語，而是說“修理修理”。因此那人是不是黑道上的朋友就很有疑問，也有可能是馬主席手下人冒充的。如果這讓黑道上的朋友知道，馬主席如此膽大妄為，敗壞自己的名聲，一定會好好“修理修理”馬先生的。因此倒要奉勸馬主席趕緊去唐人街給三合會的朋友賠禮道歉，并送上一份厚禮，三合會是那麼容易被胡弄的嗎？

讀了阿新文章的中國學生把電話打到報社，詢問有關馬紅軍的事究竟是真是假。阿新說你們還是自己去問問馬主席吧，他現在正在文華社裏打老虎機。有些人去了文華社俱樂部，果真見着馬主席正在老虎機前忙碌。中國學生太善良太懦弱，竟沒有一個人上去質問自己的領袖，這些錢都喂了老虎，以後哪還有錢打官司？

阿新在文章裏又專門描述了馬主席打老虎機的英雄氣概。文華社俱樂部一名職員透露，馬主席昨晚一共往老虎機的嘴巴裏送了一萬多Dolla。馬主席玩老虎機的氣勢就是與眾不同的，身價百萬的人物祇會玩百元的老虎機，絕不玩那些五元十元的小把戲，否則何以顯示氣派和身份？當然這一萬多元鈔票很快喂了老虎。馬主席打老虎時還有個習慣，一旦老虎吃了錢而又十分吝嗇絕不吐出一元兩元時，馬主席就會很習慣地狠命敲打，已經有好幾架機子叫大家的馬主席給敲壞了。但待應生從不敢阻攔，因為那時馬主席已經輸得像祇咆哮的老虎。馬主席雖然不是武松，但還是這樣“打死”了幾祇大老虎。但這也不要緊，文華社的唐老板說了，機器祇要修一下就可以繼續用，馬先生可是大主顧，千萬不可得罪。據不完全統計，馬主席在悉尼的幾個俱樂部裏已經花去二十幾萬元喂老虎。明天，還有明天的明天，馬紅軍還會繼續不懈地

打“老虎”。

馬紅軍被阿新的文章弄得很沒面子。每回他在老虎機上玩得正開心的時候，偶一回頭，就仿佛看到許多中國學生正虎視眈眈地盯着自己，監視着自己的一舉一動，那些眼神不言而寓。馬紅軍覺得渾身不自在，于是打電話給另一家報社——《中國快報》要求被採訪，當然這種被採訪從來不會是免費的。至于錢，現在對馬主席而言還是問題嗎？報社的社長親自跑到馬紅軍的“民主”辦公室，這種採訪無疑是送錢上門，誰會拒絕，何況馬百萬也算中國學生中的“名人”，最近他的新聞不少，報社已經冷清了好一陣，現在有了馬百萬，還愁什麼！

“給我連上十天的頭版頭條。”馬紅軍蹣着腿，說着甩手將一張五千元支票扔在大班桌上，支票像一祇蝴蝶，輕巧地滑過桌面被社長敏捷地按住。

“馬主席，對我們報社您就一百個放心吧，一切OK！”

第二天《中國快報》的頭版就有了馬紅軍自己的專欄。醒目的大紅標題報導着中國留澳學生代表馬紅軍先生與律師會晤，準備和移民部打官司的情況，并配有馬先生與律師、移民部官員握手的照片，內容十分豐富。

馬主席透過報紙向大家解釋，他買過的紅色貂皮大衣，那是花他妹妹的錢，他妹妹在國內是做大買賣的。他以人格擔保，以他正直的人品絕不可能去過紅燈區，是有人妒火中燒才會編出這種下作無耻的新聞，損害他的名譽，自己將保留對此起訴的權利。馬紅軍還聲明他在俱樂部裏瀟灑的錢也都是他在北京的妹妹給的，絕對沒有花大家一分錢。

但《新大陸時報》很快追蹤揭底，馬主席的妹妹是北京一家紡織廠的女工，從前在崗的工資帶獎金不過每月兩百六十九元。馬主席祇有兄妹二人，沒有聽說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馬主席所說的妹妹，可能是某個情人或者風月場裏的姑娘，因為這些女人通常喜歡管男人叫哥哥，也喜歡別人管她們叫妹妹。有些妹妹是很有錢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那裏面的財寶就價值連城。但現在沒有杜十娘這樣有情有義有骨氣的風塵女子，現在的妹妹祇認錢不認人，她們用青春換來的錢怎麼可能慷慨地交給馬哥哥去打老虎機呢，這是

萬萬不可能的。那馬主席打老虎機的錢是從哪來的呢？

消息一出，馬紅軍實在坐來住了，在一個凌晨給阿新挂電話，惡狠狠地叫着：“姓胡的，你聽清楚了，我要請律師告你，你死定啦！”

阿新在電話一頭依然不急不忙地說：“你是用小妹妹的錢還是用學生的捐款和我打官司啊？”

“你就等着法庭的傳票吧！”

“我看你還是省省心吧！告我還是拿着那些錢去喂老虎機？你小心有朝一日被大家吃了！”

馬紅軍氣得哇哇大叫，把話筒摔得乒乓響。

阿新更來勁了，第二天的專欄裏說研究會的馬先生發現與移民部打官司無異于以卵擊石，已經正式決定不再找大律師打官司，應該和移民部對話，現在馬主席可以將錢用在刀刃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俱樂部裏與美女們把酒共歡了。

阿新的話再次撩撥起中國學生的神經，數千名交了錢的中國人立即致電馬紅軍辦公室或者幹脆跑去馬紅軍的民主研究會詢問實情，結果當然是找不到馬主席。女秘書說馬主席沒有說不打官司了，同胞們別上小報的當，那是阿新別有用心的挑撥離間。馬主席要準備打兩個官司，一個和移民部，另一個和阿新。至于錢，當然是用大家的捐款，總不能叫馬先生個人出錢吧！有人攻擊為大家服務的馬先生，損害了他的形象，也直接影響了大家和移民部的官司進度，這樣的人當然是大家共同的敵人。

同胞們沒有話說，祇得問和移民部的官司何時可以開打，已經拖了半年多了。

秘書是位可愛的小姐，杏眼圓睜，嗔怒喝道：這麼一場史無前例的官司要做多少案頭工作，馬先生經常爲了大家的事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好幾次還差點病倒在案前。大家却偏聽偏信，輕信小報的流言，不知好歹。有消息自然會通知大家的。大家還是回去耐心等待消息。

同胞們心生奇怪，馬主席昨天晚上間不是還被人看見在俱樂部裏與人豪飲，走得時候還有美女相伴，難道這也是在夜以繼日地爲同胞謀幸福？總之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這錢主動送到人家的荷包裏，想要回來不是那麼容易的。

终于有一天，馬紅軍通過報紙通知大家，终于找到大律師了，這確實像當年哥倫布找到新大陸一樣振奮人心，而且這位大律師還國際知名，中國學生官司將由大律師領銜的整個律師團接受，這個架勢一擺出來，移民部長鮑格斯先生肯定要吃不好睡不着了。消息更進一步說，所有曾經交足三百元者都可以在今後某個時刻接到一封律師函，說明他們已受到律師的保護。沒有交足三百元者需要盡快補交不足的部分，同時還要多付一百五十元，因為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了；如果從未交過錢的中國國胞也想加入打官司的集體，則需要一次性交足一千五百元，且祇有三天期限，三天之後再多的錢也不要了。

于是馬紅軍的辦公室前又排起長龍，就在第三天期限即將臨近時仍有百餘人在樓梯口、過道裏和門外邊等候着。但時間不等人，眼見最後的期限將至，這些留學生不得不推選代表與馬主席商談，請求馬主席能仁慈地將時間再延長些，大家願意每人交一千六百元，其中多出的一百元就算是給馬主席和辦公職員的加班費。馬主席很爽快地全部答應了，但有一個簡單的條件，就是這些後來者必須答應加入民主研究會。代表代為傳達了馬主席的“指示”，對於如此優厚的條件，大家自然歡呼雀躍，沒有一個人反對，同聲贊嘆馬主席的慷慨仗義。馬紅軍滿面春風地站在樓梯口，俯視着眼下的芸芸衆生，郎聲問：“你們說中國應不應該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專制、推行民主！有人質疑我們，大家能不能答應？”衆人沒有遲疑地跟着高呼。馬紅軍很滿意地大手一揮，對手下人說：“給他們開票吧。”

幾天後《中國快報》登出讀者來信，大意是要求馬紅軍再延長時間，因為害怕移民局的搜捕行動，許多中國人聞風而逃，都躲在鄉下農場去了，那裏沒有中文報紙，根本不知道馬主席在幫着留學生打官司，希望馬主席能聽到大家的呼聲，同宗同源，伸出援救之手……馬主席的回應很快見諸報紙，表示非常同情這些同胞的不幸遭遇，他和大律師經過艱苦的談判，大律師同意延長時間，增補名額，但費用有所提高，因為要增加名額，還有許多的手續需要辦理，現在的費用是每人三千元，一次性付清。律師表示交了錢就可以高枕無憂。于是許多中國學生不辭辛苦地從遙遠的鄉村趕到悉尼城裏來交錢。他們拿着馬主席簽名的收據，如釋重負。

馬紅軍是袋鼠國裏第一個靠着辦理政治庇護發迹起來的中國學生，環視周圍還打着民主旗號，却在不分晝夜開着的士的司機主席們，不由自鳴得意，自己已經是個身家百萬、在臺上振臂一呼、臺下應者雲集的人物了。

這日馬紅軍給《新大陸時報》的社長尤大力挂電話，約定正午十點在新梅紅酒樓吃早茶，并故作神秘地表示，如社長能大駕賞光，將介紹認識一位神秘的客人，相信這對今後報社的發展頗有良益。

“去呀，幹嘛不去，鐵公雞自己要準備出血了。”尤大力將馬紅軍請客，還要介紹人認識的事跟阿新一說，阿新已明白了七八分。

“他說的這個神秘的人物會是誰呢？”尤大力還在揣測。

“你去了就知道。”

尤大力將信將疑地去了新梅紅酒樓，這是一家唐人街上新開的酒樓。尤大力到時，請客的人却還未出現。過了二十分鐘，馬主席終於來了，一身素色的名牌西裝，一個愛馬仕的提包，手腕上一塊勞力士表，一枚明晃晃金戒套在右手的無名指上，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樣。

見尤大力已經到了，馬紅軍滿臉堆笑地迎上前，握住尤大力的手，熱情地寒暄：“尤社長，真是對不住啊！你瞧我現在是忙得脚前顧不了脚後，讓你久等了，真是對不起。”

見馬紅軍稱呼自己社長，尤大力也禮尚往來：“哪裏哪裏，馬主席你可是衆所周知的大忙人。今天找我來有什麼貴幹，祇管吩咐，不用這麼客氣嘛。”尤大力想看看馬紅軍今天葫蘆裏究竟要賣什麼藥。

“不急，不急，老朋友了，好久不見了，邊吃邊聊，邊吃邊聊。”說着，馬紅軍抬手招呼Waiter點菜。

兩人一邊吃一邊聊。席間馬紅軍說得無非是些自己為中國學生爭取居權，如何不辭辛苦，自掏腰包，甚至不惜得罪自己在政府裏的朋友這類的話；一會又說自己的民主研究會現在如何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贊賞，組織的集會是怎樣的人員衆多，自己每次去大使館遞書，大使都必親自接見，聽他的訓言，現在自己不僅是“中國民主研究會”的主席，還在三四家的什麼民主黨裏當着理事長、監事長、副主席之類的要職，自己全然是全澳中國留學生的代言人，連州

議員們見他有時都要預約。聽着馬紅軍滔滔不絕、似真似假的表白，尤大力祇顧吃着新上來的菜，並不時隨聲附和上兩句，不讓馬紅軍感到冷場，直到馬紅軍自己也覺得說累了。

這時馬紅軍給尤大力倒滿一杯紅酒，接着舉起杯，衝着尤大力：“老尤啊，你要真的體諒我，我可全部都是爲了大家好，沒一點私心。有人不了解我，以爲我借這個怎麼怎麼樣了，說我吃人血饅頭，其實那都是小人造的謠。我可全是一片真心啊！我們這麼多年的交情，你老尤還不了解我嗎？今後你老尤有什麼需要幫忙的，祇管衝我開口，我要說一個不字，就不是人！來，幹了這杯。”說着自己先一飲而進，並招呼着尤大力也乾了。

“馬主席不是說今天還有一位神秘的客人嗎？”不見還有其他人來，尤大力不解地問。

“喔，神秘的客人，”馬紅軍在桌面上放定酒杯，狡黠一笑，“那個客人就是我，我是擔心你尤大社長不肯賞光，不得以才出此下策，希望尤社長你不要見怪。來，我這裏自罰一杯算是謝罪，老尤你一定不要往心裏去！”

尤大力眯縫着眼，幹笑了兩聲算是回應：“馬主席你何必這麼客氣呢，有什麼事打個招呼，我馬首是瞻就是了。”

馬紅軍又一杯紅酒下肚，見尤大力對此沒什麼不愠，才故作關心地話鋒一轉問道：“老尤，這辦報紙很辛苦吧！”

“是啊，起早貪黑，有時連我自己都不想幹了，錢又不多，也沒什麼意思。”尤大力順着馬紅軍的話往下說。

“不如這樣，你把報社賣給我吧，開個價，我絕對不會讓朋友吃虧。”馬紅軍拍着胸口保證。

“可那是我的命根子，賣了我能幹什麼去？”
見尤大力拒絕，馬紅軍換了口氣，“我也可以請你當總編。”
“那也不行，我現在不敢說是老板，但好歹在報社裏還能自己說得算！”
“那這樣，我給你一筆固定的廣告費，每月三千，你看怎麼樣？”
“這麼多錢，你是有條件吧！”尤大力盯地馬紅軍。
見尤大力這樣警惕地看着自己，馬紅軍突然哈哈大笑，“老尤啊老尤，我

說你，嘿，姜還是老的辣，聰明！當着明人不說暗語，那我也實話實說不瞞你，祇有一個條件——讓那個家伙滾蛋，報社可以另請高明嘛。這裏的高人有的是，祇要你能出得起價，什麼樣的人沒有？這個你不用擔心。”

“馬主席在這裏想必是有些誤會，”尤大力知道馬紅軍指的那人就是阿新，“這我可不敢接受你的好意。馬主席想要辦個報紙還不容易，肯定能比我辦得好，又何必盯着我那個破飯碗呢？到時我還要仰仗你馬主席留口飯啊！”尤大力說得很客氣，並不想去得罪馬紅軍這號人。

“誰不知道那個姓胡的是徹頭徹尾、沽名釣譽的小人，我接觸過，最了解。這樣吧，我給你兩天時間考慮，過了時間你要錢也沒有，我可不希望和尤社長你在報界裏打對臺戲的喲！”馬紅軍的口氣變得生硬，盯着尤大力。

“好吧，容我考慮考慮。”尤大力想來個緩兵之計，先離開這個是非的鴻門宴。

尤大力回到報社，打字員小姐說阿新先生留了信給他。尤大力很驚訝，阿新從來做事都祇在桌上留個便條的。尤大力接過信，狐疑地拆開，裏面是一封辭職報告。尤大力嘆口氣：“唉，這個阿新啊！”

當晚尤大力請阿新到報社喝酒，一隻烤雞，一碟花生米，幾盤涼菜，還有一瓶法國白蘭地，兩人喝得爛醉，全癱在地板上過了一夜。

福人鷄店

阿新開了一間鷄肉店，取名“福人”，在小上海大街的最拐角處，大約八平方，但窄得像個過道。尤大力專門為小店拍了一張照片，免費登在《新大陸時報》上，算是為阿新作廣告宣傳。照片裏阿新站在店門口，歪着腦袋笑盈盈地雙手提着一副對聯，一邊寫的是“恢復元氣滋陰壯陽”，另一邊寫的是“青春常駐寶刀不老”。

開業頭幾日，阿新的小店門庭若市，生意興隆，來的客人多是中國學生，大家主要是來看個稀奇，順帶表達一下對阿新的感激之情。畢竟阿新好歹也曾是中國留學生圈子中的“名人”，又為大家出過力，雖然文章有時胡言亂語，但多少可以給大家帶來點樂子，如今棄文從商，總得表示點心意，花點錢買一隻雞也算對阿新的支持。沒過多久，人們見不到新鮮，去的也就少了。福人鷄店頓時門庭冷落車馬稀。尤大力為此特意撰文，報導了阿新小店生意蕭條的狀況，希望大家能辛苦多走幾步去照顧一下。但多數人都無動于衷，畢竟打工賺來辛苦錢不多，也不容易。有讀者給報社打電話，質問尤大力為什麼不去請回阿新繼

續寫專欄，他們可以天天看阿新的文章，但不可能天天去買老母雞；也有讀者問，阿新為什麼不去開一家超級市場，什麼貨都有生意就好做了。尤大力在心裏苦笑，阿新就是下輩子也沒有錢開超級市場。

福人鷄店的雇員祇有一個，就是阿新本人。在店裏無所事事時，老板兼伙計的阿新就去旁邊的市政廳圖書館弄來一些雜書，當然都是中文圖書，對於全是豆芽文的英語書阿新向來不屑一顧，當然也看不懂。然後就坐在店裏的玻璃櫃臺後面悠閑地看書，偶爾有顧客來，就懶洋洋地起身去應付一番。

有朋友上門光顧時，阿新也會自我打趣，說自己開店純粹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做生意與搞政治一樣，如果能做到無為而治，就會達到藝術的境界。

“賣雞肉也是藝術？是啊，也祇有你這樣的名人會這麼認為”朋友故意戲謔阿新。

“當然是藝術。”阿新一臉正經，“上帝創造萬物皆是藝術之作。鷄乃鳳凰族，百鳥之王。一唱雄雞天下白，百鳥齊鳴大地蘇醒。鷄亦是萬物之靈，雄雞長鳴與母雞搶窩皆為至善至美的藝術造型。現在你所看到的是鷄的裸體藝術品，赤裸的真實比任何修飾過的東西都更加接近藝術真諦。假如你買了老母雞回家炖湯，則已歸入飲食藝術的範疇。有人喜歡玩高雅，其實最自然的東西最高雅，大地萬物哪件東西不可以成為藝術作品！”阿新言猶未盡，“這開店賣雞肉也是有品味有格調的，等魚上鉤是道家的生活規則，撒網捕魚為漁民的生存方式。我喜歡等魚上鉤。”

聽着阿新自嘲式的胡說，朋友不免奚落：“你玩高雅，魚不上鉤就沒有藝術，沒有高雅也沒有飯吃。”

“魚不上鉤也是藝術，姜太公釣魚不在魚而在釣，這釣竿浮于水面的畫面就是超凡脫俗的藝術作品。我開鷄店不在于鷄店生意而在于開店，過程本身就是藝術，行為藝術。”

“算了吧，你繼續玩高雅吧，手頭缺錢時別不好意思，給兄弟來個電話，千萬別祇知道吃方便面。”

朋友拎着一堆雞肉與幾隻老母雞離去，阿新復又坐在椅子上，翹起二郎腿

讀書。

忽聽到有女子聲音喚他，阿新以為是自己走神，但又分明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然後聽到幾下敲玻璃的聲音。阿新歪着腦袋仰起頭，看見夢露親切的笑臉。

“稀客啊，稀客，沒想到夢露小姐親自光臨。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打筆戰了。”阿新立即起身打招呼。

“誰也沒想到大名鼎鼎的阿新先生能下海經商，你開鷄店真是中國留學生的巨大損失，悉尼不能沒有你的聲音。”夢露半調侃着說。

“承蒙過獎，江山代有人才出，我早就該宣告退休了，擺擺攤子清靜人生。怎麼你今天也是來買鷄肉的嗎？”阿新裝出一副市儈的樣子。

“挑隻祇鷄。”夢露一邊瞅了瞅店裏的裝潢，一邊漫不經心地說。

阿新精心挑了兩隻鷄。“你看這幾隻老母鷄勁足，你喝了鷄湯一定感覺很好，清肺去火，強筋壯骨，還滋陰壯陽，悉尼就算再來一場大火，我也相信你能在熊熊大火中進行熱身運動。”

“你也該日日喝鷄湯，鷄湯對陽痿毛病有明顯功效，這我可專門問過老中醫的。”夢露不屑，一句話直指阿新的痛處。

這時進來一個白種男人，一把勾着夢露的腰，親了一下夢露的臉。

“這是湯姆，文學博士，研究郁達夫的專家，你可以和他說中文，”夢露目不斜視地介紹着。

“他媽這個女人活的也太真實了，換起男人來一點也不含糊。”阿新心裏嘀咕着，一邊歪着脖子上下打量起這位博士來。湯姆瘦挑的個子，沒有老外那種常見的、與生俱來的魁梧身材。不過郁達夫是風流情種，這家伙想必也是。

阿新和湯姆握手問好，第二句話便毫不客氣地直截了當道，“我本人并不喜歡郁達夫。”

“為什麼？”湯姆有些詫異，連聲問。

“郁達夫有病態，好像世界末日要來了，就拼命地性開放和意志沉淪。”

“你不了解郁達夫，他很偉大很有才華！”湯姆急白了臉。

“對，郁達夫很討女人喜歡。”

“但他也很勇敢地死在日本人的槍口下！”

“日本人在南京可殺了三十幾萬的中國人。”阿新想說郁達夫與南京三十幾萬的中國老百姓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不一樣，郁達夫不是平民！”湯姆糾正道。

“哪兒不一樣？郁達夫當然是平民，不過比其他平民多睡過幾個女人！”阿新想故意抬杠激怒對方。

“你這個人太沒有修養！郁達夫的作品屬於世界文學的精品，郁達夫是你們中國人的驕傲，你懂嗎？”湯姆顯得有些激動。

“我沒覺得中國出了個郁達夫中國人就可以很驕傲。不就是玩過女人，寫了一本《沉淪》。”阿新繼續挑釁。

“一個民族需要有一種民族精神、民族靈魂，在我看來，郁達夫先生就是你們中國的民族魂！”湯姆說得很正色。

“那請問湯姆博士，你是哪個民族？”

“我是德意志民族，我出身德國世襲貴族，我祖父承襲侯爵。”看得出來，湯姆為此很驕傲。

“你祖父、你父親也是法西斯吧？”阿新拋出圈套。

“我祖父參加一戰，我父親參加二戰，我們家族是世襲貴族，無法逃避參戰”湯姆辯解。

“那德意志民族的靈魂是什麼？是侵略、屠殺、法西斯主義、暴行和瘋狂嗎？”阿新故意將話題引向歧途。

“德國人已經深深地懺悔，德國政府和人民的懺悔是徹底和真誠的！”對阿新的提問，湯姆顯得有些被動。

“你怎樣看待希特勒，他曾經可是你們德意志的民族魂！”

“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怪胎，德意志民族是善于反思的民族。”

“德國人怎麼會喜歡郁達夫？德國人以嚴謹著稱，你為什麼喜歡鼓吹性開放的郁達夫？”

“郁達夫很像德國詩人席勒，是個狂熱的愛國者。”湯姆依舊很認真。

“你研究郁達夫恐怕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你是靠政府的救濟金過日子

吧！”阿新亮出了最終的底牌。

“你這人太粗俗！”夢露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出來幫腔。

“我祇是平民，你的湯姆和郁達夫都是貴族，所以我們話不投機。”阿新覺得自己挑釁成功，顯得很得意。

湯姆挽着夢露離去。阿新在背後道別：“歡迎你們有空常來敝店侃文學，隨便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什麼的。還有別忘了一定要溫火炖鷄，給湯姆先生多喝幾點，別讓他那麼瘦。還有，別忘了提醒他，色是刮骨鋼刀……”

夢露用英語罵了一句很不雅觀的髒話，阿新陰陰地笑了。

福人鷄店的生意實在清淡，除了幾位老朋友來光顧外，很少有人會拐到街角。現在馬紅軍正在領着自己的人馬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就像泡沫劇，看似紅紅火火，却乏善可陳，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個皆大歡喜的大結局，人們已經逐漸淡忘了曾經還有個叫阿新的家伙。偶爾三兩個中國學生去街尾角看看阿新，但也祇是純粹懷着憐憫的心情，遠遠地觀察。倘被阿新發現，才尷尬地走進店裏，詢問一些如馬紅軍打官司、居留權有無希望之類的問題。阿新總是像預言家一樣對這些人說，官司打不起來，馬紅軍是百萬富翁，為什麼要去打與自己兩不相幹的官司呢？這些人聽了聽，苦笑地走了。阿新覺得和他們談正經事不行，你給他們人血饅頭，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吃下去，魯迅的吶喊沒有什麼作用。馬紅軍分明是拿中國學生當猴耍，那些以居留、民主、人權名義籌來的大把鈔票不是被馬紅軍們拿去賄賂女人，就是扔進了賭場。可這些人還要在各種場合替姓馬的高呼、捧場。什麼烏民主研究會，全他媽是一班挂羊頭賣狗肉的貨色。

阿新越想越心煩，幹脆把腳擱在玻璃櫃臺上，操起一本臺灣出版的《1995 閏八月》讀起來，不再去想和馬紅軍的事。臺灣人說閏八月有災難從天而降，共產黨的軍隊會跨過臺灣海峽解放臺灣。阿新想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真的出兵臺灣，又會有螞蟻一樣多的臺灣人涌入澳洲，這些臺灣人一定也會哭哭啼啼說自己受到政治迫害，譬如說自己是資本家，或者是地主、資本家的兒子、孫子，或者是國民黨、民進黨的要員，而且還可以舉出可怕的例子做證據，譬如北越共軍打到南越統一越南之後，南越的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分子統統被沒

收財產，被趕進集中營勞改，死亡者不計其數。甚至總理基廷也會模仿着霍克，留下一沓清汨，然後寬宏大度地說，你們去申請政治難民吧。阿新認為那時候臺灣同胞中也會涌現像馬紅軍、關東北這樣的人物，而且無論大陸人、臺灣人，祇要是中國人，人性都是一樣的。臺灣人比大陸人有錢，要是集資打官司，就不是交三百元、三千元，可能會出三萬元，那麼多臺灣的馬紅軍就是千萬或億萬富翁。也不知道臺灣同胞中有没有像自己這樣的小人。

“這裏有人嗎？”這時有人在櫃臺前問。

阿新頭也沒抬就說：“我就是人。”

“這裏有人嗎？”對方又問了一遍。

阿新忽然醒悟，對方說的都是英文。祇見到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子正瞅着自己。

阿新連忙將書擱下，站起來有禮貌地問：“我能幫你什麼忙？”

那女子露出迷人的微笑，“我想買些鷄胸脯。”

阿新帶上軟手套，從玻璃冷櫃中取出一大塊鷄胸脯，問那女子要割多少。

“一公斤。”

阿新選了最好的部位切下一塊鷄脯肉，阿新認為這樣迷人的女子應當吃上好的鷄肉。

那女子問阿新是不是中國人。

“是的。”

“你這個小店生意不好。”對方很直接。

“我的小店就是為像你這樣漂亮的女人開的。”

那女人聽懂了：“你這人真有趣。我原來的男友也是中國人，他是香港人。”

阿新想問你的男友很優秀嗎？但一時想不起英文的“優秀”該怎樣說，祇好用“Good”這樣的大眾語言。

“當然，非常好，中國男人不打女友。”

阿新心想，難道祇要不打老婆就是好男人，那這樣的男人也太好當了。

“可你們為什麼分手呢？”

“我和他去看橄欖球比賽，我愛上了一個橄欖球運動員，他是個高大的黑人。”

阿新差點叫出聲來，心想這麼可愛的女人竟是個國際主義戰士，亞非拉人民和澳大利亞人民的戰鬥友誼牢不可破啊。

“你是哪個民族的？”

“波蘭。”

“波蘭是個了不起的民族，音樂家非常多，波蘭的女人都非常迷人！”阿新恭維道。

那女子笑得很燦爛：“你這個中國人很有意思。喜歡波蘭女人嗎？”

“喜歡的不得了！但波蘭女人都很高大，我怕打不過波蘭女人。”

那女子咯咯咯地笑得更歡暢了：“你這人太有意思了，中國人很幽默。”

“不，不，中國人缺少幽默，祇是我還有點幽默。”

那女子美麗白皙的臉上笑成一朵紅玫瑰，“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安妮。”

“我叫阿新。”

波蘭女人學着叫“阿新”，可模仿了幾遍還是沒能把阿新的音發好。

“中國人的名字的確很難叫，不過你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大衛、吉米、史蒂芬、查爾斯、威廉、艾森豪威爾、邱吉爾、羅斯福、肯尼迪、尼克鬆，隨便哪個都可以，祇要你喜歡！”阿新一口氣說出一長串洋文姓字。

“那我就叫你卓別林，行嗎？”

“太好了，我怎麼就沒想到他！我這個小店就改名為卓別林鷄店。”

安妮聽阿新結結巴巴的英語很費勁，但是基本上明白阿新的意思。“再見，卓別林先生，我會經常找你聊天的，你不討厭吧？”

“怎麼會呢？歡迎你這樣漂亮的小姐經常來。”

安妮走後，阿新在櫃臺後面愣了好一會，他依稀還能聞到安妮身上留下的迷人香水味。他媽的，波蘭女人太可愛了，中國女人為什麼那麼令人討厭，女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樣。之前所以沒有找到好女人，歸根結底是因為祇在中國人的圈子裏找來找去，真是傻透了！早應該胸懷坦蕩，放眼世界，而且祇要保證做到不打老婆，就可以是優秀的男人。做外國女人的男朋友也太舒服了。再說

人家白種女人的綫條、五官有多好，該凸的凸，該凹的凹，豐滿、性感，就是比中國女人有味，自己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那日阿新百無聊賴地靠在椅背上養神，小上海大街上紅男綠女從他眼皮底下走過，阿新的腦海裏却始終縈繞着那個叫安妮的女人。阿新此時很想聽聽安妮清朗的笑聲，竟然一時忘了時時提醒自己的口頭禪。

正在發愣之際，安妮又走到阿新的眼前，阿新還以為是幻覺。

“卓別林先生，你好嗎？”安妮衝着阿新打招呼。

阿新激動地一下子跳起來，“安妮小姐，真的是你嗎？”

安妮問道：“沒有人來買你的雞肉，你為什麼不關了鷄店呢？”

“我開店是為了等你回來啊。”

安妮笑着說，“你真有趣，你是為我開店？”

“當然，我可以為你做任何事情。你的男友那個橄欖球運動員好嗎？”

“我們拜拜了”安妮有點沮喪。

“拜拜啦？真抱歉！”阿新心頭不由暗喜。

“黑人真粗野，他喝多了酒就打我。”

“那也是，黑人的祖先是非洲叢林裏的野蠻人，打女人是黑人的原始風俗。你們分手真好。”

“你很高興？”

“是的，不，我是替你高興，至少不會再挨打了。”阿新有些語無倫次，“我還是請你喝啤酒吧。”說着阿新去拿啤酒，一人一瓶就這樣對喝，沒有杯子。

“安妮，祝賀你獲得自由！”

“我很自由。”

“我的意思是你從黑人的拳頭下解放出來。”

“你真有趣。”

阿新將椅子讓給安妮，自己幹脆坐在鷄店的玻璃櫃上與安妮碰杯。其實阿新說了這麼多話主要是用英語單詞勉強湊合起來的，有時還不小心說出中國話，然後輔以手勢、表情，這樣對話可以基本繼續下去。他們喝了一個小時，

也沒有任何顧客來打擾。

“你喝了五瓶啤酒，你有些醉了，你會打我嗎？”安妮楚楚動人地問。

阿新借着醉意表白，“怎麼會呢，我喜歡你。”

“你真的喜歡我？”

“真的，我發誓！我從前沒有和白種女人交朋友，我現在知道波蘭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你想吻我嗎？”

“頭一回見你就想。”

安妮起身抱住阿新的脖子就親，大概是用力太猛，阿新屁股下面的玻璃櫃被壓得嘎吱作響。

尤大力到店裏看望阿新，從報社走到阿新鷄店其實就十分鐘的路，因此尤大力能經常來這裏和阿新閑聊，順便買點雞肉回去。他不相信會有一個白種金髮女人和阿新抱在一起親嘴，而且還是在福人鷄店的櫃臺上，光天化日之下，外面是行人熙來攘往的大街，旁若無人地膠在一塊，這個阿新難道發瘋了……尤大力就在店門口耐心等待，他知道這個親嘴不會太長久，阿新一向身體虛弱，底氣不足，不可能進行馬拉鬆式的親嘴，時間長了這小子就沒氣了。果然阿新從那金髮女人懷裏掙脫出來，一張瘦臉漲成猪肝色，大氣不接小氣地喘了一會兒。

阿新見到尤大力在站在店外衝着自己笑，有些結結巴巴地招呼，“大力，這是安妮，波蘭的。”

尤大力這才進了店門，友好地與安妮握了握手，自我介紹：“我是阿新的朋友，尤大力，叫我大力吧。”

“我的男友不叫阿新了，他叫卓別林！”安妮認真地糾正。

尤大力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笑着說：“對、對，阿新這個名字太土氣了。”說着將頭轉向阿新道，“卓別林先生，恭喜你，你的女朋友太漂亮了。”接着又衝着安妮說道：“非常感謝你幫助我的朋友卓別林先生，他還是個處男呢。”

安妮顯得很驚異，問阿新：“親愛的，你真的還是個處男嗎，真可憐，我

的寶貝。”

阿新本來想說自己不是處男，比尤大力還有經驗，但是安妮已經將自己當作寶貝，又一把將阿新的腦袋樓在懷裏。阿新感覺到自己的腦袋在鬆軟香酥的懷抱裏、在兩個軟球之間滾來滾去，像掉進懸崖下面，差點窒息，發不出聲音來。

《新大陸時報》的“風情世界”欄目登出尤大力的專稿——中波人民心連心，副題是：卓別林和安妮以及處男。文章見報後夢露第一個出現在福人鷄店裏。

“真有這回事？”夢露打聽道。

“安妮在公司上班，我回頭要去接她。”阿新也不回避。

“這個女人一定很漂亮吧？”

“肯定比你漂亮。”

“那你行嗎？聽說你有點毛病。”

“你這是什麼話！”阿新聽出其中的戲謔味道，“我這人就這個毛病，在醜女人面前那玩意兒不靈光，在漂亮的小姐面前就特別強壯。安妮太漂亮了。”

“阿新，我跟你說實話，我從前睡過的中國男人真的不行，我不是說每個人都陽痿，這些男人很緊張，我還沒什麼感覺，他們就已經癱軟如泥，真的跟撒尿一樣。你怎麼罵我都行，我這可全是真話，也是經驗之談。”夢露說得很露骨。

“我其實一開始就相信你的感覺，可你對中國男人也太刻薄了。男人之所以稱為男人，就是因為身上挂着那個雄性的東西，你把中國男人貶得一文不值，是你運氣不好，沒有遇到中國男人中的英雄好漢。英雄總是愛美女嘛，你要是能長得再漂亮一些，肯定能碰上好男人！”阿新反擊。

“你認為我長得很醜？”

“有一首歌不是我很醜但我很溫柔嗎？”

“我們無錫人哪一點醜啦？”夢露對自己的長相一直很自信。

“你當然不能算醜，但也說不上很漂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並不是說蘇

杭女子個個都漂亮。我不知道那些中國男人和外國男人爲什麼喜歡和你上床。你說實話，鬼佬真就很棒嗎？”

“這一點外國男人真的很棒，一點不誇張，你的體格太小了。”說着，夢露還特意拿手比劃着，“我原來還打算找個中國男人，可是你這混蛋已經把我搞得很臭，現在誰敢找我！”

阿新給夢露遞了杯可口可樂說道：“別生那麼大氣，那還不是逗樂解悶。其實男人們都罵你，是因爲心中憋着悶氣沒地方發泄，恰好你又出來刺激男人，所以都把你當成泄氣的靶子。別說女人瞧不起男人，中國男人自個也瞧不起自己。從前梁小兵有一首詩叫《中國，我的鑰匙丟了》，說中國男人找不到自己的魂，所以才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你們女人也不怎樣，什麼樣的女人就有什麼樣的男人！你們女人想做女強人，幹一番事業，又怕找不到愛情嫁不了老公。女人說男女平等就不要生兒育女，和男人一樣一身輕鬆爲事業奮鬥，這樣的女人沒有女人味怎麼找得到男子漢。女人總說男人見一個女人愛一個，不專心、風流、色鬼，但是男人風流時還不是去找女人，那些女人又爲什麼不自重，喜歡當第三者呢？沒有壞女人會有壞男人嗎？你夢露不是也常拉上我們的男同胞上什麼喬治街的小旅館嗎？你就不考慮到這些男人還有留守女士與孩子在國內翹首企盼自己的男人和父親風風光光回家團圓，你說是你風流還是你拉去的男人風流？如果男人都低級庸俗，女人也高雅不到哪兒去！你們四處尋找男子漢，我們男人也在尋找女人本色的女人。”

阿新頓了頓，看了看夢露，接着說：“失去靈魂的男人、女人都祇是一個空殼，找到了也沒有意思。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變來的，男人、女人的精神、精氣與精髓都是一體的。我們想換個環境呼吸大海上吹來的新鮮空氣，療治身體內部的痼疾。你說你也與許多西方人親密無間地溝通過，你也没能治好自己的東方病，所以你就和中國男人和好吧，反正你這東方病也是治不好的。我看西方人也患西方病，那麼多人吸毒，酗酒，打老婆，殺人或自殺，警匪一家，黑道稱霸。西方社會以爲東方文化、儒家思想、老莊哲學可以治好西方病，不遠萬裏去中國參觀學習，虔誠膜拜。但是中國人的藥方玄而又玄，不着邊際，故弄玄虛以顯示高深莫測，西方人是永遠也學不會的，至多就學點針灸、推拿

和氣功的皮毛，那是不可能根治西方人積澱已深的西方病。你的那個湯姆研究鬱達夫，是不是想找到治病藥方，他找對人了！鬱達夫本人就得了東方病，他們兩人中西合璧，這就病就全了，東、西方病都有了就不用治。你和湯姆誰也治不好對方的病，幹脆就不用治病。也許這就是世紀末的病態表現，每個人都有病；也許這跟太陽黑子爆炸、黑洞、厄爾尼諾現象或者酸雨什麼的有關係，你看這世界氣候不是愈來愈熱了嗎？悉尼就突然燒起大火，中國華東鬧完水災華南也要參加進來湊熱鬧，我覺得什麼都不對，都有毛病。”

夢露和阿新聊了整整一個下午，直至阿新說要得關店去接安妮時，夢露才提了一祇老母雞和幾斤雞內臟要離開。

夢露笑盈盈地與阿新道別：“阿新，哦，卓別林先生，我們談得很投機，看來真是不打不相識。”

“回去炖你的老母雞吧，記住我剛才說的方法，火不要太大，時間久一點味道更好。好好補補，你太苗條了！”阿新囑咐。

星期六日的晚上，阿新挽着安妮去悉尼歌劇院。安妮說這場歌劇特別好，是莫斯科交響樂團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芭蕾舞演員都是前蘇聯的著名藝術家。阿新當然知道天鵝湖中的天鵝之死，也知道柴可夫斯基，但真的從來沒有進過歌劇院。阿新的音樂細胞可能早就被兒時的那幾個老混混的響亮耳光給統統掃光了。但波蘭是個出音樂家的國度，安妮同樣也不能沒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貝多芬、莫扎特，因此阿新也挽着這個波蘭女人去悉尼歌劇院高雅地走一回。

在天鵝將死的時候，安妮藍幽幽的眼睛裏，泪水盈滿了眼眶。阿新看得也十分感動，但自己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擠出泪水。看天鵝之死不會動情等于沒有音樂修養，這個道理阿新當然知道。阿新扭頭看看別的男人女人們有沒有掉眼泪，忽然看到不遠處夢露的小眼睛也糊着泪水，旁邊的那個德國佬湯姆也很動情。阿新不敢再扭頭亂看。媽的連夢露也理解天鵝之死，就自己一個不懂！阿新後來一直將腰杆挺得很直，似莊重、似深沉地等到整場歌劇散場。

不久，《新大陸時報》登出兩則石破天驚的消息。一則是本報前知名專欄

作家阿新先生與波蘭女友安妮瀟灑分手；另一則則是著名先鋒派女作家夢露女士昨晚在寓所內服安眠藥自殺。

中國學生的詢問電話沒完沒了，尤大力表示報社也在追蹤報道。最後報導進行了更正，因為夢露還活着。

阿新確實和安妮分手了，實在是因為體力不支。安妮才二十一歲，正是豆蔻年華不知疲倦的時候，阿新原本的小體格，加上差不多人到中年，不可能日日與安妮親昵，這樣兩人就出現了差異。除了文化上的差異、語言上的差異，還有性能力上的差異。安妮對阿新說：“我很喜歡你，你很幽默、很有情趣，但是你不能滿足我，我們不能同居，我還需要更強壯的男人。你可以來找我，祇要你需要我就會來，我真的很喜歡你……你要多喝一些鷄湯，你找我的時候就給我電話……”尤大力去小上海那間老咖啡店喝下午茶時正撞上阿新與安妮。阿新說他們已經談妥了，愉快分手。尤大力當然不知道是阿新體力不支、超負荷運轉才被安妮請下場去做替補隊員的。

夢露女士確實自殺，但屬於未遂。夢露那天和幾個朋友開車去堪培拉的賭場，原來準備在那裏過夜玩個痛快，但幾個人都走背運，很快就將荷包裏的錢輸個精光，連住旅館的錢也付不起，祇好提前打道回府。夢露饑腸轆轆地回到家時，連聲喊湯姆給弄點吃的，自己已經餓壞了，却祇見到德國佬正在床上與另外一個女人如漆似膠，而且聲音嘹響，根本不理會夢露的嗥聲嗥氣。那時的情景可想而知，夢露像母狼一樣撲上去，一通發狠似的連抓帶咬，外帶拳打腳踢，德國佬與那個女人就一起遍體鱗傷了。後來夢露開車去王子俱樂部喝酒，一直喝到下半夜，心裏窩着火沒處發泄，有幾分醉意又回到家裏。但德國佬早已經帶着女人撤退了，房間裏空蕩蕩的，除了還留着剛才污濁的氣味。夢露平時就有失眠癥，每晚都要吃兩粒安眠藥才能入睡，那晚她將半瓶安眠藥都吃了下去。夢露臨死之前德國佬又鬼使神差地回家，才及時發現將夢露送進了醫院，好在時間還來得及。

阿新和夢露都是失戀，而且都是被戀人遺棄，因此中國學生覺得他們之間有着某種共同點。有讀者向報社投稿，調侃阿新與夢露有朝一日會因此成為夫妻，這世上還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阿新那天洗完澡換上一身新買的襯裝，然後去花店買了一束鮮花，其中有一朵是紅玫瑰，開車去看望夢露。

夢露正斜倚在床上看書。阿新在一旁找了個空瓶子裝了水、插上花自我欣賞了一陣，然後對夢露說，“很抱歉，最近鷄店生意實在忙，沒能早些來看你。”

夢露一臉的不屑，“你的鷄店怎麼生意突然紅火了？是不是天下男人都得了陽痿癥，都趕着炖老母鷄。”

阿新倒不生氣，不緊不慢地說：“你這人真損！天下男人都出毛病，女人該怎麼辦？你怎麼不考慮沒有男人的天下，女人怎麼過日子！”

“你的鷄店沒有紅火，你的臉到紅火了，你也會不好意思！”
“臉紅火了嗎？這是本色！我通常充當紅臉，打抱不平、仗義執言。”
夢露不想再和阿新抬杠，轉過臉瞅着阿新送來的花，幽幽地說：“謝謝你，這花真漂亮。屋裏沒有椅子，你坐我床沿吧。”

阿新坐在床沿邊，鼻子裏嗅出女人的香氣。“你的那個德國佬上哪兒去啦？”

“走了，也許回德國了，誰知道。這房子是我租的，他是個窮光蛋。”
“那是，研究郁達夫怎麼會有錢。”
“你開鷄店，賺了多少錢？”
“我開店就是為了開店，不在乎賺不賺錢。”
“我看，你和湯姆一個德性，上回看歌劇的門票還是那個波蘭女人出的錢吧！”

“那倒是。安妮懂音樂，你也懂，女人懂音樂就顯得比較有修養。我想你的德國佬也是沒錢買門票的吧。”
“你們都一樣。”

“算了吧，別老把我和德國佬扯到一塊，我這個人至少不會腳踏兩隻船。再說了，德國鬼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也真是，怎麼會想到自殺，你又不是沒見過男人。”

夢露嘆了口氣：“我現在也後悔，可能是酒喝多昏了頭，他媽的竟敢在我

的房子我的床上和別的破女人尋歡。”說着說着，夢露又激動起來。

“他崇拜鬱達夫，當然也崇拜女人。你還爲他傷心？”

“是啊，犯得着嗎？我又不愁沒有男人，你說呢？”

“我看也是，這麼多中國男人沒有女人，再醜的女人也是緊俏物資。”

“他媽的，你又在說我醜。”

“我就打個比方，你當然不醜，死過一回的女人比從前更有魅力，會有一些敢死隊員、衝鋒隊員向着你奮勇前進的。”

“去你的，我又不是大篷車誰都可以搭，我是主動挑選男人，不是讓男人來挑。我現在去王子俱樂部立刻就可以找到白種男人做朋友，而且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

“紳士時代就像騎士時代一樣已經成爲歷史，紳士總是和淑女做情人的，你是良家婦女嗎？”

“那你說我是哪種女人？”

“你是個復雜的矛盾體。你認爲現代人應當具有前衛思想，因此你大肆鼓吹，無所顧忌甚至出言不遜，但實際上骨子裏還是個傳統的女人，一旦發現男友和別的女人在一起一樣會尋死覓活，一點也灑脫不了，更不是你自己所說的前衛派風度。你的生活看起來很隨意，很不在乎，可以和許許多多男人上床，實際上你心裏清楚，這些男人都不愛你，和你的關係祇有性；同樣你也不愛他們，需要的祇是感官上的享樂。你這人心氣很高，因此容易得罪朋友。實際上你没有朋友没有情人。你喝酒，抽烟還抽大麻，試圖麻醉自己忘記痛苦，其實說到底你這人非常脆弱，祇是你自己不承認。我看你就是個用酒精與毒品制造的虛幻前衛派女人的形象。”阿新說得倒很誠懇。

夢露仰面靠在高枕上吐着烟圈，很久沒有說話。阿新不得不承認那些烟圈很漂亮，如白色花環連串地弧旋上升。阿新想到童年時用肥皂液吹出的五彩斑斕的泡泡，少年時代需要夢幻和憧憬，不真實的遙遠虛無的世界是最美麗的境界；而人一旦長大成年，袒露着的是醜陋但真實的世界，人必須面對這種現實的殘忍。阿新很同情夢露，有思想的女人總是與孤單苦澀一起渡日，因爲這個世界祇需要平庸的女人。

“你還是少抽一些烟，你的肺部大概已經烏黑一片，那是要損壽折命的。”阿新勸。

“活那麼長幹什麼，七老八十沒有牙齒的老太婆難看死了。我祇要活四十歲，轟轟烈烈痛痛快活四十年就知足了。”夢露說着，給阿新遞上一根烟，

“抽過大麻嗎？沒有吧。我每次做愛之前就抽點，騰雲駕霧舒服極了。我要是衛生部長或者大法官，就宣布大麻合法。我和許多知識分子討論過毒品泛濫的問題，大麻不能列爲毒品。這個世界已經亂七八糟了，還不讓人抽點自我陶醉？這又不對社會構成環境污染和破壞。科學家和醫生都提出過報告，證實大麻對人體的危害非常之少。政府本身就很荒唐，說抽烟有害身體，要求在烟殼上印上這些字眼，然後從制造商那裏抽稅。這與婊子有什麼不同，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西方國家現在普遍生活富裕，精神貧困，讓公衆抽些大麻就不再抱怨生活，就會飄飄然進入極樂世界。我真不明白政府爲什麼要禁止大麻合法化。我所認識的一些大學教授、醫生，他們都抽點大麻，哪個人頹廢墮落、萎靡不振？我看他們因爲抽了大麻工作起來特別順心，有精神。你也抽一點吧，我這支烟裏就有大麻，你没聞到香味？”

“我還以爲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呢，我就奇怪什麼香水會有這麼撩人、這麼具有催眠作用的氣味。我還以爲你故意弄這種誘惑人的香水陰謀拉人下水。”

“就你，瘦骨伶仃我没有興趣，我要找男人也會找個身強力壯的男人。”夢露說着，但眼睛裏却很朦朧。

“我看你是很想和我上床。”不等夢露張口，阿新俯身吻了下去，用嘴堵住了女人的嘴……

阿新的小店多了一個股東——夢露。《新大陸時報》發布消息說本報前總編阿新先生和知名女作家夢露小姐已然墜入愛河，兩人乾脆合伙開起夫妻店，整日耳鬢廝磨，故報社決定獎勵那位預言準確的讀者。這個消息見報之後，阿新的小店生意立刻紅火起來。中國學生們就爲了去看看夢露與阿新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順便買隻老母雞。櫃臺裏，夢露忙得不亦樂乎，一邊招呼客人，一邊以阿新爲例反復證明老母雞的神奇功能：“我現在每日給阿新喝雞湯，他已經相當強壯。”

阿新在邊上聽着，忽然發現夢露實在是個難得的推銷人才，這個女人本身就是廣告，同胞們主要衝夢露而來，這些人和夢露調侃上幾分鐘就十分舒服，夢露可以講很多露骨的黃色玩笑，撥弄得男人們心裏都麻酥酥的。這雞店就整日熱熱鬧鬧，生意滔滔。

一天安妮帶着一伙波蘭人來到店裏，他們要去野炊，需要許多的雞肉。一進店，安妮就摟着阿新的脖子，如若無人地當衆親吻了很長時間，大家歡天喜地在一旁看熱鬧，有人還不無羨慕地感嘆阿新艷福不淺，安妮不忘舊情。這個接吻就像好萊塢電影裏愛情的火爆場面。

安妮一走阿新就看出夢露妒火中燒。他吹了一聲很長的口哨，徑直走過去輕輕摟着夢露的肩膀，搖了搖說：“別生氣，剛才那是電影裏的鏡頭，不是真實的。”

“你想不想看看美國式的火爆鏡頭，我可以和店門口所有的同胞也來這麼一手！”夢露的口氣辣味十足。

“別，別把同胞們給嚇着，太火爆了的不適合中國國情”阿新連忙制止。

“你敢再和安妮親熱，小心你的是非根！”夢露一把甩開阿新的手。

“你不會的，”阿新依舊嬉皮笑臉，“你現在還用得着。”

“我當然會，美國女人可以做到的事我爲什麼就不敢！”夢露說得不但堅決，還惡狠狠的。

阿新心想這個女人本來就有些歇斯底裏，“你當真？你捨得？你會這麼狠心？”

“有什麼捨不得，滿大街都是男人，我上哪兒沒地方找這玩意兒。”

聽到這滿不在乎的口氣，阿新當真害怕起來。那個美國女人因爲受到老公的性虐待才奮起反抗，當然值得同情。問題在于這是非根是不能剪掉的，一人起頭萬人呼應，這男人世界就永無寧日了。你可以將老公一刀捅死或者五馬分尸，但萬萬不能去剪是非根。女人沒有什麼頭腦，包括夢露這樣的女人也會犯糊塗。假如一時興起把男人那東西剪除，那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報上說自法庭判決美國女人剪去老公的是非根是合法的自衛行動之後，許多地方都發生女人把男人的東西一刀了斷的悲慘故事。夢露在性生活方面有些變態，哪天阿

新四脚八叉睡死過去，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變成太監，那可慘啦！

于是阿新滿臉堆笑：“親愛的，想想我們的共同事業，想想這店的生意多紅火，有朝一日就會發展成公司，前途光明無限。”

“那今晚我一個人去王子俱樂部，咱們公平交易。我要試試我還能不能夠長吻二十分鐘。”

夢露并不搭理阿新，果然去了王子俱樂部，而且沒有回家。阿新的店第二天到十一點開門。夢露十二點才出現在店裏。

“找到你的白馬王子了？”阿新作出一副關心地樣子問。

夢露看上去很疲憊，“他媽的那家伙是個變態狂，我當時找不到刀子，沒有辦法把他的東西剪掉。我現在困極了，去給我弄點熱茶來。”

阿新立即去泡了杯烏龍茶。“我昨夜也沒有回家，我在安妮那裏過夜。安妮好溫柔，她說我隨時可以打電話和她約會。”

“行了，我們現在扯平，你不要再去找安妮了。”

“那好吧，我們一起創辦雞肉公司，我做總裁，你當總經理。”

“我們都忙于雞店生意，報社很有意見，他們沒有我們的文章就沒有銷路。”夢露說。

阿新安慰道：“我們的集團發達以後就把這裏所有華文報紙，包括《新報》《星島日報》《華聲日報》《自立快報》統統買下來，我們自己辦報紙。有錢人都玩報紙和電視臺。澳洲巨富有兩個，一個是梅鐸，住在美國，控制世界許多大報；一個是帕克，住在澳洲，控制九號臺。這說明世界上最富有者除了石油國總統、國王，恐怕就是新聞巨子了。我們夫唱婦隨，有一天興許能從雞店起步走向國際。等我們都成了新聞巨頭，也不要扔了老本行，繼續寫自己的專欄。”

可是阿新和夢露的宏願還沒邁出第一步就意外結束了。那天夢露大麻抽得過量，做愛之後本應該先去淋浴，却去廚房取了一把明晃晃的不銹鋼水果刀，昏昏沉沉就上了床，她在迷糊中仿佛看見那個美國女人把丈夫的是非根一刀切下來，非常痛快淋灑，于是她去撩撥弄阿新的那個東西，那玩意兒此時軟綿綿不好除掉，她習慣性地想到應該讓它站起來，然後可以聽到“咔嚓”一聲，

就像切西瓜的聲音一樣。阿新體力不大強壯，每回與夢露折騰之後都要昏睡半晌才可以緩過氣來。阿新對於夢露的習慣性動作有所反應，并且可能感覺到了刺眼的刀光，就眯縫着眼睛去尋找那耀目的光點，駭然發現夢露正跪在床上，一手持刀，一手正撥弄他的東西，時刻準備着下手切去他的命根子。阿新大吼一聲順勢滾下床去，然後鯉魚打挺跳起來，光着身子衝進衛生間一下就將門關死。阿新躲在衛生間裏一夜沒有出來。

夢露像死豬一樣躺倒，直至第二天太陽照在那柄鋼刀上發出明亮的光芒才蘇醒過來。她睡眼惺忪地望着身邊的鋼刀，模糊記得自己是拿過鋼刀去找阿新，當時的動機是要除掉那個不大中用的家伙，換上一副強壯的家伙。她嚇得在床上和床下尋找那是非根或者一些蛛絲馬迹，沒有發現任何綫索。她開始找阿新，這才發現衛生間關着始終沒有動靜。

“裏面有人嗎？”夢露敲了敲門。

“有”裏面傳來阿新的聲音。

“出來呀，我憋不住了。”

“你把刀子放到廚房去我就出來。”

夢露去放了刀子，回來就問：“那東西還在嗎？”

“大概還在。”

“現在平安無事，你讓我進去，我實在憋不住。”夢露催促道。

阿新這才開了門，光着身子，用手緊緊護着下體，鬼鬼祟祟出來，見夢露手上確實沒有刀子才放了心。

“你昨夜就睡在裏面？”

“我没有睡，坐在馬桶上思考人類的命運。”

阿新當天就搬出了夢露的公寓，回到老窩與幾個光棍哥們繼續混日子。鷄店關門了。

阿新和夢露舉行了隆重的分手儀式，就兩人。他們去了歌劇院的悉尼碼頭情侶酒吧訂了雅座，在迷人的燭光中喝着香檳酒，直到東方發白。

阿新握着夢露纖細的小手。

夢露說：“你想我的時候就給我電話，我們還可以約會，還是情人。”

“我想女人時通常去抓鬬，抓到安妮就是想安妮，抓到你就是想你。”

夢露一把抽回自己的手，“別臭美了，安妮回波蘭了，這可是你告訴我的。”

阿新狡黠地笑了笑。

重振小報

阿新來找尤大力，底氣十足：“老哥，需要錢嗎？”

尤大力聽說阿新自從關了雞肉店後手上是有些錢。

“那你入股吧，以後這個報社就是我們哥倆共同的事業。”尤大力回答的也很乾脆，報社需要的是阿新這樣可以帶來生機的人，而不是馬紅軍不到六個月的支票。

這回阿新重新當上了報社的總編，還兼任報社的副董事長。報社從此有了正副董事長，至于董事會其他成員，暫時空缺，有人願意出錢就可以做董事。

那日阿新請尤大力去圓中苑酒店吃飯。席間，尤大力拉着阿新的手：“兄弟我從前對不起你，老哥我也是有苦難言！”

“老哥，以前的事過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你我兄弟，以後別再說這些客套話。現在報社也有我的一份。馬紅軍不給廣告費，我們照樣可以把報紙弄得紅火起來，大不了我還回去吃方便面。”阿新顯得很寬容。

阿新上任不久，澳大利亞就爆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那天夜裏十一點，床邊的電話突然鈴聲大作。聽筒裏尤大

力急促而興奮地嚷着：“兄弟快起來，快起來，有天大的消息，聯邦議員威爾遜被人殺了！”

“就是那個經常在電視上露面的反黑議員？空手道九段高手？”

“沒錯，威爾遜在半個小時前死在自己的家門口。快點，我十分鐘後到你那裏，記得帶上錄音機，搶新聞。”

“好，我馬上準備。”

阿新曾經跟這個威爾遜議員打過交道，此人在澳大利亞聲震朝野，現在被殺了，他想這則新聞如果做得好，小報就會立即翻身，揚名立萬。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那怕付出代價也要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重振小報。

阿新和尤大力驅車趕往悉尼西區費菲市的威爾遜家。那裏是澳大利亞著名的越南城，黑社會的老巢。越南城的區域包括卡市和費菲市，卡市是商業重鎮，費菲市是生活區，幾乎所有黑社會的重要頭目都住在費菲市。一路上兩人熱烈討論着威爾遜議員的種種傳聞。

“這個國家自成立聯邦以來從來未發生過議員遭謀殺的事件，澳大利亞一向被認為是這個地球上最太平的國家。在這裏做政治家實在太容易了。澳大利亞政治還不算金權政治，但仍時有爆出政治家的腐敗醜聞，黑社會與政治家的黑箱作業、金錢交易也屢屢見報。這個威爾遜能够長期在越南城那個鬼地方當選議員，恐怕也難逃金權交易。”

“聽說威爾遜在打擊黑幫勢力方面是不遺餘力和朝野共知的，他本人我想怎麼也不至于涉黑，我估計他是惹惱了黑幫才被幹掉的。”

阿新與尤大力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華人記者，但是主流社會的新聞記者已經來了幾十人。悉尼警察局的戴維局長正在介紹事件的情況。

根據法醫初步鑒定，威爾遜死于左輪手槍之下，有三顆子彈擊中胸部，議員當場斃命。威爾遜的女友肖伊文小姐當時就在威爾遜身邊兩米的距離目睹了慘案發生的全過程，但是肖小姐並沒有看清凶手的面目，因為凶手躲在暗處，行凶之後又坐上一輛紅色的日產跑車逃離現場。鄰居羅伯特夫婦聽到槍聲也跑出來，但祇見到一輛紅色的跑車從門前駛過，沒能看清車牌。羅伯特先生說，

開車的是個亞裔人，個子瘦小。警方在接到報警後五分鐘就趕到并封鎖了現場，警察已找到了六顆子彈的彈殼。威爾遜議員此前在越南城新亞俱樂部裏與朋友喝完酒後開車回的家。肖小姐聽到汽車引擎聲開門出來，兩人先是熱烈擁吻，然後一起給新買的荷頓轎車罩上車罩，就在此時，從右前方黑暗的樹叢裏射來六顆子彈，威爾遜沒有來得及留下什麼話就當場身亡。在此之前威爾遜的一部舊車曾被人縱火燒毀，新買的車在幾天前又被人潑上油漆，因此威爾遜買了車罩保護自己的新車。殺手顯然十分了解威爾遜議員的行程，因此選擇在這個時機下手。

戴維局長介紹完情況後下令記者離開現場，因為時值夜深，記者的喧嘩會影響鄰近居民的生活。阿新和尤大力也被警方趕出封鎖區，但並沒有馬上離開，而是找了塊草坪坐下。

阿新對着尤大力半問半自語道：“這個威爾遜議員一定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舊車被毀，新車又遭人潑漆，這是明顯的恐嚇和警告，可他為什麼無動于衷，既不向議會報告，也不要求警方調查？我相信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威爾遜的死亡是個導火索，以威爾遜一向的為人，這裏一定有新聞，說不定還是個……”阿新話到嘴邊又不說了。

“我們應該去問問羅伯特夫婦，興許可以問出點意想不到的東西。”尤大力也同意阿新的觀點。“等天亮了再去敲門，否則警方會出面幹預的。”

兩個人說完起身，回到車裏將就地睡了一覺。

天亮之後警方繼續封鎖現場，但已無權干涉記者的行動。阿新和尤大力去敲羅伯特家的門。是羅伯特先生出來開的門，見是兩名陌生的亞裔人立即就想把門關上。

“我們是記者，警方允許我們採訪你們夫婦，我們祇想問幾句話就走。”尤大力隔着門縫解釋。

猶豫片刻後，羅伯特先生終於還是開了門，重新審視了兩人幾秒鐘，才將兩人讓進了客廳。

談到威爾遜議員，羅伯特顯得很激動，自己一夜沒合眼，怎麼也不相信威爾遜議員會被人謀殺。這時羅伯特夫人給阿新他們沏了兩杯咖啡，才坐定到自

己丈夫的身邊。

“威爾遜先生是個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作為鄰居，他經常和我打網球。”羅伯特一臉的惋惜。

羅伯特夫人也同意丈夫的觀點，除了點頭，還有些憤慨。“我們和威爾遜為鄰十幾年，大家關係都非常好。歹徒太殘暴了！”

“可能是這裏的越南黑幫幹的。”羅伯特說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為什麼，你怎麼知道是越南黑幫幹的？”阿新立即追問。

“這裏可是衆所周知的越南黑幫老巢，威爾遜議員曾說這裏已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交易中心，他生前一直和黑幫作對。”羅伯特想也沒想就說出了答案。

尤大力的英語比阿新強些，所以與羅伯特夫婦的溝通大部分都是由他完成。

“威爾遜議員有什麼私人恩怨嗎？譬如金錢、女人？”尤大力想進一步了解威爾遜為人的全部。

“威爾遜先生一直都是個正派人，不會和別人結下私仇，大家都這麼認為。”見尤大力質疑威爾遜的人品，羅伯特說得很肯定。

“威爾遜的妻子死了二十多年，威爾遜先生與肖伊文小姐才同居半年，這麼漫長的歲月，威爾遜身邊難道就沒有其他女人？”

“威爾遜先生很愛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和三歲的兒子以及肚子裏五個月大的孩子一起死于車禍，這一切對他來說太不幸了。威爾遜先生很長時間沒有和女人來往，”羅伯特先生頓了頓才接着說，“後來才有過一些女友。”

“都是些什麼人？”

“有越南人、華人、好像還有白俄羅斯人、塞爾維亞人。”

“這麼多種族的女人，像個聯合國，他們之間就沒鬧什麼糾紛？”

“威爾遜先生原先有個女友叫蘇珊，是個越南人。威爾遜先生與肖伊文小姐同居之前，蘇珊經常住在威爾遜先生家裏。”

“這個蘇珊住在哪裏？”尤大力覺得這可以挖掘一下。

“她好像是這裏新亞俱樂部的女招待，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找她。”

尤大力又問：“肖小姐與威爾遜同居之後，蘇珊來找過威爾遜嗎？”

“他們有過一次爭吵，是肖小姐與蘇珊，她們後來扭打到花園裏被我看見了，蘇珊的臉還被肖小姐抓破了。”羅伯特夫人接着說，“蘇珊找到我家，向我要了點藥水，還是我幫她塗的。”

從羅伯特家出來，阿新和尤大力趕回報社。當天上午報社就增刊了關於威爾遜議員身亡案件的特號，這是最早關於議員死訊的獨家報道，而且出自一家華文小報。中國學生們將信將疑，直到晚間新聞播出這條重要消息，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威爾遜議員一向同情中國學生的命運，多次在議會裏為中國學生的居留提案大聲疾呼，因此和中國學生各團體關係親密。威爾遜議員在許多公開場合也發表掃黑的強力宣言，被人們視為澳大利亞少數正直勇敢政治家的典範。晚間新聞播出之後，中國學生在談及威爾遜的死訊時無不震驚和悲痛。有關威爾遜議員身亡事件震驚了朝野，國會議員們紛紛發表談話，聲稱澳大利亞不能容許這樣猖獗的犯罪活動，政治家的生命必須受到保護。基廷總理也發表沉痛聲明，責令警方成立特別行動小組，由聯邦聲名顯赫的高級警官瓊斯先生親自指揮，全力破案。

澳大利亞所有媒體都把威爾遜的死作為新聞熱點，但沒有哪家報紙在報導威爾遜死亡消息方面可以和《新大陸時報》媲美，這是因為阿新和尤大力掌握了最特別的材料。阿新在一篇專稿中聲稱，威爾遜議員的死亡有很復雜的背景，可以認為有以下幾種可能：第一，威爾遜先生因為極力倡導掃毒和反黑而遭黑幫勢力的殺害；第二，威爾遜先生因為發表反對波黑穆斯林政府的演講而遭極端宗教分子的謀殺；第三，威爾遜先生因為在女人問題上不太檢點，可能遭致殺身之禍；第四，威爾遜先生可能與黑幫同流合污，因黑幫內訌而死，且殺手可能是越南人或越南華人。

《新大陸時報》开辟了威爾遜議員專欄，大幅度報導與威爾遜有關的一切消息，包括花邊桃色新聞。與此相反，警方則出言謹慎。警方發言人接受記者採訪時暗示像《新大陸時報》這樣的華文小報報導完全是道聽途說，毫無依據，警方從來沒有說過凶手來自越南的背景。

那天晚上阿新與尤大力一起又去了新亞俱樂部，在那裏一直坐等到凌晨二

點俱樂部關門時才離開。他們在停車場見到了威爾遜議員的前女友蘇珊小姐。

見蘇珊出來時身後沒有跟着其他人，阿新和尤大力于是走了過去。

“你是蘇珊小姐嗎？”尤大力問。

蘇珊警惕地問：“你們是什麼人？”

“別害怕，我們是《新大陸時報》的記者，在俱樂部裏等了幾個小時，就為和你說上幾句話。”阿新解釋。

“我們祇是想了解一些關於威爾遜議員的事，你能幫我們的忙嗎？”尤大力補充。

“我不知道，你們還是去問警方吧。”

“你曾是威爾遜議員的女朋友，我們祇是想知道威爾遜為什麼又去和肖小姐好了？”

“肖是個婊子！勾引威爾遜，不要臉！”

“肖是威爾遜秘書，他們認識多久才同居？”

“肖和威爾遜一見面的那天下午，他們就在辦公室裏做愛。我從俱樂部下了班去找威爾遜時發現他們還在沙發上鬼混。你們中國女人真不要臉！”

見蘇珊罵中國人，阿新有些尷尬：“嗯，蘇珊小姐，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你和肖小姐吵過架嗎？”

“這個婊子把我的臉抓破了，她個頭比我大，我打不過這個臭婊子！”見阿新實在沒有惡意，蘇珊才娓娓道來。

“你會為此懷恨在心，請殺手把威爾遜幹掉嗎？”阿新問得很直接。

“哼，我哥哥是越竹幫的，他當時想替我出氣，但他的老板不同意。”蘇珊仍然忿忿不平。

“為什麼？威爾遜與越竹幫的老板有關係？”

“他們一直都是好朋友。”

“可威爾遜從來都是反幫會勢力的英雄，怎麼可能成為越竹幫老板的朋友？”

“要真是反對幫會，威爾遜能在這裏呆到今天嗎？”

“你認為威爾遜是誰殺的？”

“總之不可能是越竹幫的老板叫人殺的。”

“這裏到底有幾個幫會？”

“七八個吧，但最有實力的祇有兩個，控制着越南城大部分的地盤，一個是越竹幫，另一個就是華福會。華福會成員都是越南逃難出來的華人。越南城華裔占多數，他們勢力更強。”

“現在越南城裏毒品和武器交易由誰控制？”

“當然是華福會。越竹幫祇做東南亞的生意，華福會做大生意，他們和美國幫會都有生意來往。我看威爾遜可能是被華福會的人幹掉的。你們千萬別說是我說的。聽說有一個叫阿新的中國人盡胡言亂語，在報上說威爾遜是越南黑幫幹掉的，我哥哥的老板正想收拾這個人。”

阿新聽了臉色煞白：“你所說的那個阿新就是我。請你告訴老板，我們報社可從來沒有想過要得罪任何人，更沒有說過越竹幫是殺人凶手。蘇珊小姐，有機會我們能否可以和你哥哥談一談？最好是當面談談！”

“我不知道，也許他不願意見記者。”

阿新把名片遞給了蘇珊，解釋道：“這裏也許有些誤會，我們真的希望能見見你哥哥，解釋清楚，如果他願意和我們見面，請給我電話。千萬記得轉告他，我們報社無意得罪幫會。”

《新大陸時報》在頭版發表了長篇報導。威爾遜議員的一貫言行是為遮人耳目，他與黑幫，特別是當地越竹幫關係更是非比尋常，在越竹幫老大兒子結婚時，威爾遜還親自主持婚禮，這有當年的錄像帶為證。威爾遜的私生活也有問題，他長期和多個民族的女人保持關係，威爾遜議員現任女友肖伊文小姐是他的秘書，可上班的第一天，威爾遜就在議員辦公室和肖小姐鬼混，然後拋棄了越南女友。這種偽君子居然受到基廷總理和工黨政府的器重。

《新大陸時報》的消息驚天動地。這一天晚間新聞播出了基廷總理的講話。電視裏基廷氣勢汹汹稱有個別不負責任的華文報紙蓄意歪曲事實，造謠惑眾，惡意中傷威爾遜議員。這些報紙的編者濫用新聞自由的權利，給警方的調查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幹擾。我要警告這些華文報紙，立即停止對威爾遜議員的人身攻擊。接着屏幕上是瓊斯警官接受記者公開採訪的畫面。瓊斯警官稱有些

華文報紙聲稱威爾遜議員與黑幫有關係，這完全沒有根據。警方已展開全面調查，有關威爾遜議員的死因很快就會水落石出，公眾應當相信警方的能力，絕不會讓凶手逍遙法外。

這天阿新接到蘇珊的電話，她哥哥已經同意見《新大陸時報》的記者，地點就在新亞俱樂部，時間是晚上的十一點半。為了這次會面，阿新和尤大力兩人可謂是煞費苦心，畢竟見的人是當地赫赫有名的黑幫，會不會有危險？阿新問尤大力要不要準備武器。尤大力說在小上海可以買到手槍，一把左輪叫價五百元。阿新說，那我搞一祇。尤大力出面找了小上海的黑道人物去買手槍。

小上海從前是白人地盤，主要是意大利黑手黨的勢力範圍。現在小上海上黑幫中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居多，在小上海上開店辦公司的中國人，必須按月交納保護費。這些黑幫的後臺是香港的三合會，所收的保護費有一半要交給三合會。商號店肆沒有人敢違抗，除非這些大陸學生背景的小老板和黑道有着特殊的關係。你在小上海可以買到任何東西，至于手槍和子彈，那更是小菜一碟，祇要去某個雜貨店樓上就可以交易，而且幾十種武器任你挑選。如果你願意多花些錢，還可以弄到合法的持槍證，保證貨真價實。

阿新和尤大力一邊挑選着槍，一邊不免為自己憂心忡忡。小上海上的黑幫現在還沒有與自己衝突，如果哪天要是他們真被惹惱了，自己被幹掉祇會像殺祇小雞一樣容易。這些幫會分子有些還是留學生社團裏有頭有臉的人物。阿新沒有明白過來，什麼時候黑社會就在小上海悄然興起，甚至可以祇手遮天，阿新原以為自己大小也是人物，現在看來其實狗屁不是，祇需一顆小小子彈就可以叫自己永遠閉上嘴。

阿新和尤大力各弄了一支手槍，準備全副武裝地去赴這次無法確定結果的會面。

當他們走進新亞俱樂部時，發現所有人好像都在盯着他們，目光是那樣的懷不懷好意。

越南城的晚上是個連鬼都不願意出門的地方。這裏的鬥毆和槍擊事件在澳大利亞是出了名的。外面的人到越南城吃飯，一定要有幾個同伴壯膽。威爾遜臨死之前就在新亞俱樂部喝酒，這可是越竹幫的勢力範圍。

蘇珊將阿新和尤大力引進一個小房間，隨後就退身把門帶上。祇見幾個紋身的越南青年立即將阿新等人圍住。他們的紋身圖案都一樣，右手臂上紋着龍蛇圖案，一枝黑色梅花嵌在龍蛇之間，那是幫會的標志。

一個坐在沙發上、留着長發的男人上下瞟了阿新和尤大力幾眼，接着打開一瓶人頭馬，給茶幾上的酒杯倒滿，這才發話：“你們是記者，就是你們要找我？”那個男人顯然是蘇珊的哥哥。

大力連忙解釋，聲音却有些發顫：“蘇珊告訴我們，威爾遜與你們的越竹幫有些關係，我們祇想了解一些情況。”

那個男人陰沉地問：“你們想知道什麼？威爾遜的事與我們無關。”

“你怎麼知道越竹幫和威爾遜凶殺案沒有關係？你在幫內是頭目嗎？”阿新接着問。

“我是什麼不重要，我們與威爾遜無冤無仇，沒有必要幹掉一個議員去驚動警方，你明白嗎？”蘇珊的哥哥沒有停下，仍自顧自地喝着酒。

“威爾遜與越竹幫老大是好朋友嗎？”

“我不知道。”

“威爾遜參與販毒？”

這時蘇珊的哥哥突然抬起頭，目光緊緊落在阿新的臉上，厲聲道：“你們的好奇心太重了，除非你們想哪天尸首漂浮在海上。快滾吧，要不是我妹妹，你們早就被做了。”

阿新努力克制着，讓自己鎮靜一點：“能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嗎，你認為威爾遜死亡和華福會的人有關係嗎？”

“那你們自己去問華福會的人吧。”

“哪能找到他們？”阿新依然不願放棄。

“中華俱樂部。”蘇珊的哥哥吐出五個字。

阿新和尤大力被那幾個越南青年押着，急匆匆地從後門離開了新亞俱樂部，走到停車場，兩人正準備鑽進車子，忽然有人用槍頂住了他們的後腦。祇聽見背後的人惡狠狠地威脅：“小子，聽清楚嘍，越竹幫和威爾遜的事沒關係，如果你們再敢在報紙上胡說八道，你的家裏人就等着收尸吧！”說着阿新

和尤大力兩人的腦袋上重重挨了一槍托，便痛得倒在地上，緊接着一頓暈天黑地的脚踢，兩人除了雙手緊緊捂住腦殼，其他部位就任人處置了。好一陣，剛才說話人才喝住了其他人，繼續厲聲喝道：“小子，先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下次就沒有這麼便宜你們了！”說完，幾個人杳杳地走進俱樂部。

阿新與尤大力躺在地上，直到沒有了脚步聲，才緩緩地爬起來，相互攙着鑽進了車子。尤大力先摸了摸車裏的皮箱，槍還在，這才放下心，那可是花七百多元才買的，這些錢對他們來說不是個小數目。

發動了車子，尤大力才瞅着阿新說：“我腦殼疼得都要炸開了，眼也看不清路。”

“我也是，全身疼，說不定要死了。我們去附近的診所看看。”阿新也鼻青臉腫，頭上還有血迹。

尤大力把車開到路邊一家小診所，這是一家典型的家庭診所。阿新去敲門，醫生是位亞裔，一問才知是個香港人，可以用中國話交談。

“我們被俱樂部裏的歹徒打傷了，你能幫我們看看嗎。我覺得腦殼開裂，不知道流出的是血漿還是腦漿。”阿新捂着頭說。

“放心，那一定不是腦漿，否則你不會還站在這兒說話，進來吧！”香港人招手示意兩人進去。

進了診所，醫生先給阿新做了檢查，沒有大問題，祇是腦袋有一個小裂痕，縫幾針就沒事。

“需要打麻藥嗎？”阿新問。

“當然。”

阿新躺在病床上讓醫生縫了幾針，心想今天真够倒霉的，這腦殼以後不知道還管不管用，會不會有後遺癥，譬如腦震蕩什麼的。

醫生仿佛看出了阿新的心事，“你會没事的。”

“醫生，我的腦袋有裂痕，會不會影響智商，我原來的智商很高的。”

“我看你原來的智商就有問題，否則誰會到這裏來惹是生非。”

阿新不說話了。

醫生又給尤大力檢查。尤大力的腦袋腫得像座山包。從診所出來，阿新和

尤大力的頭上都纏着紗布，活像裹着個大粽子。

《新大陸時報》很快登出夜探新亞俱樂部的歷險故事。阿新沒有敢點出蘇珊和她的哥哥的名字，但基本上將那晚的經歷寫了出來，包括去醫生那裏看急診的細節。阿新在報導中聲稱，爲了早日揭開凶案的內幕，本報記者不惜冒着生命危險，掌握了比警方更詳細的線索，威爾遜議員雖然不是被越竹幫幹掉的，但可以肯定地說威爾遜之死與黑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本報將繼續追蹤報導，敬希垂注。

這一天，澳大利亞舉國下半旗，爲威爾遜舉行哀悼。聯邦總理率領部長們盡數出席了葬禮。先是總理基廷先生致辭，而後是亡者家屬講話。肖伊文身着一襲黑色長裙，面帶哀愁地站在臺上念講稿，念到一半竟泣不成聲。電視機前的觀眾和到場的來賓無不爲之唏噓嘆惋。長長的送靈隊伍。基廷總理親自扶柩，議員們分列兩旁抬靈。總理夫人挽着肖伊文，在鮮花撒過的街道上緩緩走過，成千上萬的越南人和華人在街道兩側目送着這支空前盛大的送葬隊伍。

隆重的葬禮儀式，瀰漫着巨大悲痛氛圍。阿新觀摩了葬禮的整個過程，也編寫了一篇威爾遜葬禮的報導，但落筆的角度却與衆不同，既不渲染葬禮上悲涼蕭瑟的氣氛，也沒說越南城萬人空巷，市民向威爾遜告別的壯觀場面，更沒有去寫許多百姓向靈柩拋灑鮮花、仰天哭叫、感人肺腑的場景。阿新的報道集中在工黨黨團內爭奪由誰來填補威爾遜空出的議員席位這一敏感問題上。文章說現在工黨中“左”、“中”、“右”三派都在爭奪威爾遜先生留下的這個議員席位，并在送葬過程中一路爭吵。誰都知道費菲市歷來是工黨的傳統勢力範圍，威爾遜先生本人已經連任這個選區議員十幾年。正是因爲威爾遜與越南城黑幫勢力都有密切關係，因此才可以得到足够的經費參加競選，當然黑幫也操縱了選票。費菲市作爲工黨可靠的選區，其他在野黨人自己也沒有信心勝選，因此威爾遜先生空出的席位實際上祇能由工黨內的人士來填補，就是由參加葬禮的一些工黨人士來決定到底最終會由誰來頂替威爾遜先生的議席。

阿新在報導中特別強調越南城中各界社團領袖出席葬禮的情況。這些領袖中會不會就有凶殺案的幕後主使者或者知情者呢？威爾遜議員的遇難顯然與政治、金錢有關，金權政治已經成爲這一特定社區的標志，有了金權政治就會有

謀殺，威爾遜的死亡祇是個信號。肖伊文小姐遠在中國的丈夫李明不可能是主謀者，因爲他沒有介入金權政治；肖小組以前的男友們也不可能是主謀者，因爲他們祇對女人的身體感興趣；肖伊文小姐本人更不可能去謀殺威爾遜，因爲她剛剛以和威爾遜同居的名義向移民局入紙申請定居。這個很善于利用各種關係的女人，居留權還沒有到手前是不可能放棄威爾遜的。現在威爾遜死亡的線索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威爾遜的朋友把威爾遜殺了，這個朋友是某個幫會的老板。阿新聲稱警方可能知道是誰下令殺了威爾遜，但是不敢公布真相，因爲這會影響工黨的聲譽，甚至動搖整個澳大利亞的政治制度。

阿新的文章像枚重磅炸彈，很快成爲留學生中乃至華人社區裏的搶手貨，《新大陸時報》當天的發行量甚至超過幾家當地已經創辦了很久的華文報紙。阿新當然也成爲聯邦政府、警方以及越南城黑幫注目的對象。報社在當天下午就接到過幾個匿名的電話，威脅將收拾時報裏的幾祇蠢豬。

尤大力不免擔心：“我們現在可是在老虎嘴邊拔須了。”

“不用怕！他們剛剛幹掉了威爾遜，事態已經很嚴重了，現在還不敢這麼快對我們下手，否則祇會引火燒身，證明我們報導事實確鑿，這幫人不是蠢豬。”阿新雖然口頭上安慰着尤大力，但心中也不免七上八下，不知道除了那幾個恐嚇電話，明天還會發生什麼。

阿新和尤大力正在報社裏喝啤酒，談論着人們對文章的反應。這時候電話響了。一個男人自報家門是來自越南的華人，費菲市的漢斯•胡議員。

“請問議員先生有何貴幹？”尤大力接的電話。

對方低沉着聲音：“我知道誰是殺害威爾遜議員的凶手。”

“那您能告訴我嗎？”

“今晚十點你們到費菲市黑酒吧後面的停車場，我會在那裏。”

阿新知道這個議員，是個律師，曾以無黨派的身份參加上屆費菲市市長的競選，但沒有成功。

看來此行又是深入虎穴，凶多吉少。阿新和尤大力帶上手槍，在夜幕下驅車趕往會面的地點。

兩人按照約定，準時找到黑酒吧後面的停車場。正用目光四下搜尋之際，

遠處的一部車突然朝他們閃了閃車燈。阿新和尤大力雙目對視了一下，掏出槍上了膛，藏放在口袋裏，然後推開車門，一前一後向那部車走去。

胡議員正在車上等着他們，兩人上了車，等阿新、尤大力一自我介紹完畢，胡議員就搶先開口：“我最近一直在關注你們的《新大陸時報》，你們很敬業，也很正直。我早幾年就知道阿新先生，我很欣賞你的膽識和才華，所以我要把真相告訴你們。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們，我知道我活不了太久。我無黨無派，一向與幫會井水不犯河水。我的選民都是本分的華人和越南人。費菲市已經成為黑幫和毒品交易的黑窩，我個人對此却無能為力，這讓我很痛心，也很失望。威爾遜議員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也曾是他的私人律師。我相信威爾遜在為幫會做事。大約一個月前我得到消息，黑道上的華福會要幹掉威爾遜，據說威爾遜捅了馬蜂窩，華福會的老大要拿掉威爾遜，另外物色人選為幫會工作，我也被列入黑名單，他們認為我也礙事，而且知道太多關於威爾遜的事情。我提醒過威爾遜他有麻煩了，但他却不以為然；我說子彈要比空手道厲害，威爾遜却認為在澳大利亞沒有人會那麼愚蠢，去謀殺一個政治家。幾天後他的汽車果然被人縱火焚燒，而且就在家門口。威爾遜一定猜到是誰幹的，所以去找過華福會，然後又買了部荷頓新車。那天他在辦公室裏喝咖啡，忽然看到自己的新車就在辦公室的門口被人噴上亂七八糟的油漆，祇好將車子弄到修車廠去重新噴漆，然後買了車單，他害怕那幫人再找他的麻煩。我曾提醒他這恐怕要出大事，可威爾遜還是認為這祇會有些警告，不會要他的命。大約就在威爾遜死前一個小時，我在新亞俱樂部對威爾遜說，有可靠的消息，在黑幫的謀殺名單上他的名字已經被打上了三個紅叉，這意味着什麼！我希望他能報警，可威爾遜却說幫會狗膽包天，要了議員的命他們自己也會性命不保。”

漢斯•胡一口氣說了很多，令阿新、尤大力吃驚地張着嘴，好半天都沒有合攏。

“黑幫為什麼非要謀殺威爾遜議員呢？”阿新問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可能威爾遜覺得自己老了，或者對原來的某些東西感到厭倦了，想金盆洗手。但他太自信了，認為和幫會已經講清楚了，事情也該擺平了。可一個小時後他就死了。”

“那您怎麼知道威爾遜馬上會被幹掉？”

“我當然是看到他們內部的指令，我有朋友也在幫會裏做事。”

“您為什麼不報警？”

“威爾遜都不相信會有謀殺，警方會相信我所說的嗎？而且我也不想惹是生非。你們有所不知，警方內部也有幫會的人。”

“您的意思是警方完全可能知道是誰殺了威爾遜。”

“應該是吧，我想警方最終不會披露這個消息，讓公眾看到的祇是調查一直在進行，這一切不會有最終結果的，等一年兩年之後公眾就可能慢慢忘記。警察內部現在腐敗透頂，警方高層也有被幫會收買的。我認為工黨和聯盟黨的高層人物中也有幫會的人，許多競選經費來路不明，實際上極可能就是由幫會提供的，公眾無法了解金權政治的內幕。在這件事上，我也同樣受到威脅。我有意二度競選費菲市長，但華福會並不喜歡看到這樣，他們有自己的候選人，他們曾給我遞話，要我退出競選，否則後果自負。但我不會屈服。費菲市不應該成為暴力和毒品交易的中心，我要恢復費菲市的正常生活，確保公眾不受幫會的欺壓和勒索，提高華人在這裏的地位。”

“所以您也成為了幫會討厭，甚至謀殺的對象，是嗎？”阿新問，“可您為什麼不尋求警方的保護呢？”

“我已經向警方要求保護，我們現在可能正處在警方的監視之下。明晚我將在十號臺中亮相，公布威爾遜義議員死亡的真相並表明我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脅。接下來，華福會很可能就要來幹掉我了。”胡議員嘆了一口氣，頗為擔憂地說：“這裏的警察其實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可靠，我擔心最終可能就死在警方的手裏。你不知道，越南城的警察和幫會關係密切，我實在不相信這些警察。今天找二位來，就是想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訴媒體。如果我死了，公眾會從報紙上了解一個華人議員死亡的內幕以及澳洲政治中最黑暗、最醜陋的一面。”

“您為什麼不設法去國外躲一陣子，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我是走不了的，因為我是重要證人，警方不允許我離境。再說我的家人還在這，我走了，家人怎麼辦？”

阿新與尤大力鑽出胡議員的坐車時已經心跳加速。尤大力一邊警惕地四下

張望，一邊問阿新，“你看周圍有人嗎？警察躲在哪裏？”

“他媽的誰知道，這個停車場陰森森的，就覺得有許多眼睛盯着我們。”阿新隨口應着。

兩人慌慌張張鑽進自己的車子。尤大力以平日裏最嫻熟的技术迅速發動起車子，車子駛出費菲市區的時速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邁，通常在這裏車速是不允許超過八十邁的。

“還再能加快點嗎？”

“這都快一百三了，”聽着阿新的催促，尤大力說，“小日本的底盤也就祇比你的屁股重點，哪能快得了。”

“你這輛破車也該換了。”

“你我都是窮光蛋，你的車也就一千多買的，七七年的三菱，扔了都没人要。”

“等以後發達了咱倆就買歐洲車，奔馳、法拉利、勞斯萊斯。”阿新想調節一下此該車內凝重的氣氛。

“我有錢就把報社弄大，幾百號人的大報社。對車我没有興趣，有現成的就行。”

“你把油門踩到底，我覺得有人追我們。”

尤大力將車速加到一百五十邁時，車子像快散了架，到處都在震顫。尤大力緊緊握住方向盤，“不行啊老弟，這車子怕是要插上翅膀飛了。”

阿新扭頭望望身後瘋似地倒退着的公路標志牌，“我們已經上了利物浦路，後面没什麼車。”

“你再看路邊陰影下面有没有警察埋伏着，我的駕駛證祇剩下兩分，再扣就没了。”尤大力還不放心。

“那就扣我的。我們現在處境可是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天上可能還有飛機。”

“離費菲市很遠了，我把車速調低點，我覺得身上這副老骨頭都要震散架了。”

“老哥，聽人說這費菲市有點像紐約的唐人街，警察也怕上街。你聽說了

嗎？現在這一帶房價跌得厲害，許多居民都遷走了，就因為黑幫實在太囂張，街頭槍戰和入屋搶劫案件居全國之首，費菲已列入澳大利亞犯罪率最高的區域。老哥你將來發達了，可千萬別在這裏買房子！”阿新不自覺又聊到幫會的事。

“就是現在這兒有人送我房子，我也不敢住！”尤大力一邊開車一邊說。

阿新與尤大力回到報社後仍驚魂不定。尤大力開了一瓶軒尼詩，與阿新大口對飲了幾杯才說：“這個胡議員也真是，那麼個鬼地方的破市長有什麼好當的，真要搭上一條命？我還以為澳大利亞是最和平安寧的地方，他媽的也這麼多黑社會！我們得在報上登個聲明，請求警方和讀者保護我們的人身安全。”

阿新與尤大力討論了一晚上也没有個結果，最後兩人擠在辦公室裏湊合着睡了一晚。

關於夜訪漢斯•胡議員的報導發表之後，社會各界又是一片驚慌，阿新和尤大力却躲起來睡覺，報社裏祇留了打字員杰西卡小姐一人。報社同時登出聲明，聲稱越南城的黑幫現在不僅要幹掉漢斯•胡，還要幹掉與此有關的人員，包括報導採訪的記者，因此呼吁所有的關心《新大陸時報》的中國人關注，如果報社因此遭了殃，希望同胞去國會大廈廣場示威，要求懲辦凶手，清除警方和政府内部的貪官污吏。

不出所料，漢斯•胡終究没有逃過黑幫的魔掌，在自己的森林別墅裏死去，法醫鑒定是中毒身亡。這一天離費菲市長競選日祇有十四天。

《新大陸時報》以黑框開出整個版面，悼念這位堅強不屈的華人議員。阿新和尤大力冒險去參加了追悼會。

追悼會後，阿新和尤大力走進一家咖啡廳，兩人相對無語，許久阿新打破緘默像是對尤大力說又像自言自語，喃喃道：“我現在没有選擇餘地，祇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我相信我命大福大，在中國學生獲得居留權之前，閻王爺不會叫我去報到的。”

“阿新,我給你透個消息，聽說政府內閣正在準備討論中國學生的居留方案，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結果了。”尤大力說。

“天上不會掉下餡餅，還要靠我們爭取。”

坐了一個小時, 阿新提議去海灘上走走。

正是午後時光, 陽光暖融融地照着邦迪海灘, 上千人在沙灘上進行着日光浴。這裏曬太陽的姑娘是全世界最美的。年輕漂亮的女子身着比基尼, 赤橙黃綠青藍紫地點綴着白晃晃的沙灘; 那些裸浴的愛好者幹脆趴在浴巾上, 享受着日光浴帶來的徹底快樂, 日光曬紅的胴體閃耀着誘人的光芒; 這裏也是衝浪者天堂, 勇敢的少年在藍色的波濤上歌唱, 讓生命宣泄着野性的力量。

阿新和尤大力走下海灘, 向大海走去。一路上目不暇給, 生命在赤裸地叫喊, 紅男綠女與蔚藍色海洋一道歌唱生活, 歌唱愛情, 歌唱充滿希望的明天。

阿新的皮鞋在海水浸濕的淺灘上留下歪歪斜斜的足迹。尤大力說: “我女兒喜歡拾貝殼, 我帶她去過青島, 我們在沙灘上拾貝殼, 五彩繽紛的貝殼。我真盼望有一天我能帶着女兒來這裏拾貝殼。”

阿新和尤大力脫了鞋襪走在淺灘上, 就像澳洲的小企鵝搖搖晃晃地在海水與大地之間走着。

揆閣戰舌

《新大陸時報》上重新开辟了居留的話題。據可靠消息, 連日來政府內閣都在開會, 其中一個主要議題就是關於四萬多名中國學生的居留問題。阿新在報紙上呼吁中國學生應當消除前嫌, 團結一致, 盡快組織強大的游說團與政府談判, 爭取聯邦政府早日通過解決中國學生的法案, 這是最後的鬥爭。

報社辦公桌上的電話鈴聲就沒有斷過, 此起彼伏的鈴聲預示着長期孤寂、消沉、頹廢、墮落的中國學生群體忽然蘇醒了。

當晚澳大利亞九號臺的新聞節目播出了基廷總理的講話。閣揆基廷聲稱威爾遜議員的死亡使他的女友肖伊文女士處于極度痛苦之中, 基于人道主義原則, 政府將以特殊類別為由批准肖伊文女士定居澳大利亞的申請。

阿新認為應當抓住肖小姐居權安排這個契機, 為衆多留學生爭取居權。在居留的話題中阿新指出, 我們歡迎聯邦政府給予肖小姐澳大利亞的居留權, 但有一個道理是必須要講清楚, 肖小姐可以定居, 四萬多肖小姐的同胞也應

當享有同樣的權利，也可以申請定居。因為他們比肖伊文更痛苦，長期過着非人的生活。不能因為肖小姐是死去的議員的情人就能以特殊類別留下來，要留就請允許所有的中國學生一起留下來，政府必須一碗水端平。澳大利亞是一個自由、平等、公正的民主國家，中國學生有權去堪培拉國會大廈靜坐、請願、絕食。

阿新極具煽風點火的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學生對於居留已經不抱希望，他們在阿新一個又一個話題裏尋找着刺激，自我麻醉，日子也就很快過去。大家也不再相信整天祇在街頭叫嚷“民主”的領袖。馬紅軍拿了百萬以後就很少在街頭現身，華文報紙上出現他的消息也越來越少，仿佛人間蒸發，那場和移民部的官司無疾而終，當然更不可能去跟阿新打什麼嘴皮官司。留學生們在無望中一次又一次出錢、出熱情去換取信任和希望，終果等來的却是更大的失望。這次中國學生們仿佛又看到了曙光，他們留在這塊土地上的熱情再次被煽動起來。對，要留大家一起留，要走大家一起走。

繼而《新大陸時報》登出《致基廷總理暨工黨政府的公開信》，要求廣大中國學生簽名，報社將在周末于小上海的街口設點，徵集簽名。阿新感慨地說：“我們已經等得太久，我們需要居留！政府宣布給予肖伊文居留的消息實際上給了中國人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

小上海一下子成了中國人的集市。

望着簽名的人潮，阿新對尤大力說：“我們的同胞的嫉妒心理可以轉化成極大的能量。柏楊說中國人醜陋，我們現在也很醜陋。我們正在利用同胞的狹隘和求生本能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

尤大力說：“祇要目的是崇高的，現在手段已經不重要了。你看我們同胞凝聚起來的力量有多大，真正可以移山倒海！”

簽名冊上很快留下了兩萬五千多個不一的姓名，阿新的心中祇留下了四個字：打鐵趁熱。

尤大力說：“有消息透露，內閣成員中多數傾向解決中國學生問題。”

“對，我們這一招等于促使政府下了決心。”阿新認為。

尤大力以報社和全體中國學生名義給基廷的總理府打電話，要求面見基廷

總理，并寄出有兩萬多簽名的《致基廷總理暨內閣政府公開信》。”

三天之後基廷的秘書來電話，時間訂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基廷總理將在堪培拉的國會大廈第四會議室接見中國學生代表。于是，一個中國留澳學生委員會迅速成立，除了口才突出的尤大力、阿新任正、副主任外，各方面代表十四人任委員，其中也包括了像馬紅軍、關東北等民主派頭頭。

對於馬紅軍等人的入選，阿新對其他人解釋，雖然這些“領袖們”有些令人討厭，但他們都是“黨閥”，在留學生中還有一定影響力，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樣作為留學生，他們也有權利要求聯邦政府給予居留，因此他們成為一部分留學生的民意代表也是合情合理的，這樣可以團結和聯系到更多的人，使得與政府的對話更有全面性，當然在委員會中馬紅軍們要約束自己的言行。

正是澳大利亞春暖花開的季節，首都堪培拉已是花的海洋、花的絢麗世界。中國學生代表團一律身着深色西裝，系着寶藍色領帶，面帶微笑走進國會大廈旋轉玻璃大門。

會談還是被安排在大廈的第四會議廳舉行，阿新來過這裏已經多次了，從前是霍克，現在是基廷。望着周圍既熟習又陌生的環境，阿新在心中默默地三遍告訴自己：我又回來了。這才扭過頭對着代表團的衆人說：“今天我們代表着近五萬名留學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大家請記住，我們的背後是十萬祇眼睛，正看着我們。中國學生問題已經成為反對黨攻擊政府的炮彈，我預感政府也不想再這麼無休止地拖延下去了，所以我們必須抓住這次機會。前幾天我和代表團的團長尤先生專門見過反對黨的領袖侯信博士。他已經明確表態如果反對黨聯盟上臺執政，中國學生問題將很快得到妥善的解決。他表示將在下一次國會的大會上就中國學生目前的艱難處境問責聯邦政府和移民部。我認為現在主動權就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所以今天無論如何大家要挺起精神，據理力爭，這是大家的最後一戰。”

不久，基廷總理和移民部長鮑格斯帶着一幹政府官員微笑地也走進會議室。

雙方在橢圓形會議桌分列兩邊列坐。中國留澳學生代表團中除了阿新等人，還特意請來了一名翻譯，畢竟阿新這些人的英語并不完全靈光。

總理基廷首先發言：“聯邦政府一直有誠意解決中國學生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很棘手，你們知道嗎？如果光是解決中國人的問題，政府可能會很被動。因為前南斯拉夫的難民，斯裏蘭卡的難民，波斯灣戰爭的難民，非洲國家的難民等等，還有南亞的難民，他們和中國人一樣，都有歷史遺留的問題。澳大利亞是個講人道的國家，政府很難全部一次性地解決這麼多人的居留問題。”說着，基廷掃視了一下坐在對面代表團成員，“現在經濟蕭條還沒有完全過去，澳大利亞這兩年的失業率還在兩位數以上高企不下，聯邦政府有許多困難。你們有什麼好辦法？”

阿新是代表團的主談判手，他接過基廷的話茬：“總理閣下，澳大利亞是移民國家，歡迎符合資格的外來者是歷來的國策，不應因經濟衰退而被拋棄。前任總理霍克在天安門事件時曾在全世界電視觀眾面前為中國學生流下眼淚，我們希望他的眼淚不要白流，不是一種政治表演，他給予中國留學生四年臨居權的政策應當得到延續，並得到妥善解決。”

基廷總理認真地聽着，臉上挂着招牌式的微笑，這是他的習慣。一米八四的基廷向來都是俯視電視鏡頭，顯示他特有的高大、權威和風度，他的笑容也顯露着自信的威嚴。

移民部部長鮑格斯插話：“大家都知道，移民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它需要考慮人口增長幅度、消費市場情況、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社會福利以及環境污染等等問題。澳大利亞不可能盲目引進新移民，我們必須保證每個澳大利亞居民都過上富足的生活。如果四萬多中國人群體以及戰爭造成的其他難民都留在澳大利亞，由于語言障礙而難以找到工作，又要求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和救濟，那麼現任政府在大選時許諾的降低失業率的目標可能就不能對選民兌現了。”

“中國留學生中有許多可以造就的高科技和管理人才，中國政府在他們身上已經投資了許多錢，聯邦政府如果全盤接收下來，實際上是接受了一筆巨額的財富。四萬多中國學生之中有一半已經獲得了四年臨時居留權利，他們在這項特殊政策的幫助下可以一樣享受社會的福利，但他們之中祇有一百多人去領取失業救濟金。在失業率高達10%以上的經濟大蕭條中，中國學生基本上人人

有一份工作，向政府納稅，因此我們不是伸手派，是自食其力者；不是包袱，而是奉獻者。所以部長閣下請不必擔心政府的救濟金會被中國學生領光。”阿新據理力爭。

基廷總理說：“我這裏有一份移民部的報告，報告預測如果我們收留這四萬多中國學生，那麼五年之內就會有至少三十萬他們的親屬移民到這裏，這個數字是很保守的。五年以後這三十萬人還會擔保更龐大的新移民進入澳大利亞。十年內可能有上百萬甚至更多的中國人移居到這裏，這將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體制造成不可估量的衝擊。我相信澳大利亞政府和國民還沒有做好承受這種衝擊的準備。”

阿新說：“總理先生，我以為澳大利亞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室礙了經濟的發展。移民政策一直是朝野爭鋒的焦點。不瞞你說，在此次會談之前，我們專門拜會了反對黨領袖候信博士，候信博士認為現任政府在處理中國學生問題上已經浪費了太多納稅人的錢，卻把問題搞得一團糟。候信博士說如果反對黨執政，中國學生問題早已妥善解決。現任政府在中國學生問題上已經失分，這將會影響下屆大選。”

鮑格斯說：“那你們有什麼具體方案嗎？如果政府考慮中國學生群體居留問題，就需要廣泛徵求社會各界包括民族社區的意見。阿新先生剛才說反對黨聯盟一旦執政就會留下中國學生，這是謊言，十足的政治謊言。”鮑格斯因激動嗓音提高了八度，繼續說：“反對黨聯盟曾經攻擊霍克先生給予中國學生四年臨居是幹了一件蠢事，他們在國會辯論時一再批評政府對中國學生太軟弱。現在反對黨站在一邊煽風點火，企圖利用中國學生問題攻擊政府，我相信你們可以分辨是非，唯有工黨政府才是真正關心中國學生群體的利益。你們如果有具體的方案可以提供給移民部。”

“我們事前曾做了一份可行性報告，其中有兩個方案可供政府參考。第一方案是將四萬多中國學生作為一個整體去考慮，政府在1993-1994年度的移民配額中，我指的是包括幾年來的配額餘額部分、特殊類別部分，加上正常的難民、人道配額，一次性撥出四萬多名額，幹淨利落地解決中國學生群體問題。如果政府有難處，我們的第二種方案是分兩步走，由于天安門事件之前進入澳

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已經獲得四年臨時居留，而且霍克先生代表工黨政府已經保證在四年之後不會強迫這些人離開，那麼政府無疑要兌現承諾，這部分中國人群體應無條件取得在澳大利亞的居留權，并在1993-1994年度內一次性解決；在這之後來的，建議給予兩年臨居權，再通過配額申請永久居留，分期分批解決，這是我們代表團所有成員的共識，希望得到政府積極的回應。”說着，阿新起身通過旁邊的秘書遞上一份資料。

“你們的建議很具參考性，我和總理先生會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移民部有信心處理好中國學生的問題。我們還要研究更為具體的方案，譬如天安門事件後進入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應該有個時間界限，難道今天到達的中國人也可以歸入因天安門事件影響的特殊群體嗎？美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時間界限是九零年的四月。我還要指出，許多中國學生實際上屬於非法居民，根據移民法，這些人必須離境等候申請結果，這是個很棘手的技術問題。我所說的這些情況祇是全部情況的一部分，中國人群體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群體，這需要做許多具體工作才能妥善解決這個群體遺留的問題。”鮑格斯說。

總理基廷說道：“好吧，今天就談到這裏，我會指示移民部和各州移民局成立專門調查小組開展工作，在處理中國留學生問題上，相信我們做得不會比其他國家差，也不會比其他政黨差。”

對話進行了將近一個上午，阿新和代表團成員步出國會大廈時興奮不已，從基廷和鮑格斯的口氣中已經可以隱隱分析出政府的意圖，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居留問題可望解決，即使天安門事件之後來到澳大利亞的同胞暫時不能居留，但也有望得到妥善安置。于是代表團成員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當地進行的一年一度花展。首都堪培拉到處盛開着美麗的鬱金香和金合歡。

這時，馬紅軍搶在人前提議：“走，我們去賭一把，今天是我們大家的幸運日。”

關東北一聽賭也不由地手癢，仿佛已經看見了寶藍色的賭桌上晃眼的撲克和來來往往的籌碼，但還是不忘拿馬紅軍開涮：“對，大家一起去，雖然老馬賭的是大家的血汗錢，不過今天這日子確實應該陪馬主席賭一把。”

阿新也跟着起哄：“走，去賭一把，大家一起去，贏了歸咱們，輸了由老

馬出錢。”

馬紅軍聽了兩人的話，祇是不太高興地哼了一聲，並沒有說話。

在關東北的帶領下，大家進了一家當地知名的賭場。一幫人在賭桌前玩了幾個小時，竟然全是贏家，果然是個好兆頭。阿新下注最小，却也贏了一箱啤酒的錢。馬紅軍當然是這幫人中最財大氣粗的一個，下注也最大，不覺間竟贏了一萬多澳元。

關東北看着馬紅軍面前落着高高的籌碼，直咽口水，于是招呼大家：“走呀各位，今天老馬贏得最多，應該請客，我們找家西餐洋派洋派！”

馬紅軍還沒來得及拒絕，就被一伙人七嘴八舌的恭維話捧上了天，半推半就地答應了。

在關東北的提議下，大家找到了附近的希爾頓飯店。衆人進了西餐廳，關東北一面招手示意Waiter，一面說：“今兒大喜之日，他媽的把人頭馬、XO，什麼幹邑拿破侖都點上，反正今天老馬贏的錢够我們喝的。”

這一頓飯吃了四個多小時，光喝酒就花了四千多元。

阿新的臉紅得像猴子屁股，滿嘴是醺人的酒氣，樂哈哈地說：“現在我太懷念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歲月，要是再搞一回土改運動，大家先搶了馬主席的家，開倉分財寶，大家一起共產。那日子真風光哪！”

關東北素來酒量就好得出名，今天更是放開海量，已經連灌了兩瓶的人頭馬XO，也醉醺醺地說：“我這人要是生在亂世，肯定揭竿而起，我們東北從來都出英雄豪傑，其實盡是土匪馬棒，張作霖就是個大土匪。我才不會帶人去搶馬紅軍那點破東西，姓馬的姓牛的財主們自個都會把金銀財寶送到我府上，那是大排場。阿新祇是個當民兵隊長的料，我關東北才是將軍胚子，生不逢時吶！”

看着連關東北都在嬉笑自己，馬紅軍坐不住了，搖搖晃晃地站起，一手端着酒杯，一邊直着舌頭嚷道：“你關東北別吹牛了，將軍？算了吧！昨天你借了我三百塊去還賭債，現在是不是連方便面都吃不起了，還做夢當將軍。還錢、還錢。”

在座的人哄笑起來。望着衆人的嬉笑，關東北有點下不來臺，祇好幹笑着

自嘲：“這算得了什麼，現在是虎落平陽，總有一天你馬紅軍要稱我關大爺。人有興時也有背時，大丈夫能屈能伸，兩千年前我的先祖關公就屈尊曹營，這是能屈，後來統兵荊州，威震四方，這是能伸。你懂個屁！”

“老關，關公什麼時候成你家的祖先啦？”不知誰在繼續起哄。

“你看你連這點道理都不懂，中國人說八百年前是一家，我都往遠算到兩千年，這關姓的不是一家人還是外人呀！”

“先別說這不着邊的，欠我的錢總該還了吧，你今日贏了一百多，就先還我。你現在還在當孫子，等什麼時候做了大爺再說。還錢吧！”馬紅軍說着，伸手做出要掏兜的準備。

關東北見狀，急忙架住馬紅軍的手，“我的馬主席，你瞧瞧，你瞧瞧，我現在正等着錢用，誰不知道你馬百萬啊，還在乎這區區一百多嗎？再說了，宰相肚子能撐船，你還能和我這個窮人一般見識？明天再說、明天再說。”

大伙聽了又是一陣哄笑。

阿新說：“你關東北不也撈了不少大家搞居留的錢嗎，真的都沒了？小心哪天開批鬥會，你跟馬紅軍一塊上臺戴高帽，坐飛機。”阿新知道關東北除了酒量大，賭癮在留學生中也是出了名的，可沒想到他會輸得如此麻利。

“你阿新有沒有搞錯，你完全混淆了階級界限，鬥地主老財差不多，我現在可也是貧下中農，我還想參加打土豪分田地，弄點馬紅軍的財產呢？”關東北反問道。

看關東北不作解釋，阿新更相信了自己的判斷：“你啊，你啊，頂多是個流氓無產者，搞了這麼多同胞的血汗錢，游手好閑，不務正業。要革命，先得殺了你們這幫無賴，然後大家才能歡歡喜喜地分財產過日子。”

馬紅軍見阿新連自己也罵了，不禁悻怒：“你阿新嘴也太缺德了，誰是地主老財啦！你們都看見我的運氣好，幾個小時就贏了萬把塊錢。我馬紅軍向來走得直、站得正，不怕別人嚼舌根。誰不知道你阿新祇會在報紙上胡說八道。我老馬這幾年爲了中國學生的事嘔心瀝血，不是你胡言亂語就能抹殺的。”

聽着馬紅軍的“辯白”，阿新正準備站起來揭揭馬紅軍的老底，尤大力這時忙出來打圓場，又開話題：“我們大家都往前看，祇要學生居留的事大獲成

功，從前再有什麼過節，大家就一筆勾銷吧。和爲貴、和爲貴。我們今日喝的是慶功酒，爲苦日子就要結束，來，大家都把酒滿上，再幹一杯。”

衆人皆舉起酒杯很響亮地碰杯，爲了明天舉杯痛飲，所有的苦難都過去了，所有惴惴不安的日子都過去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澳大利亞政府宣布了關係中國學生的居留法案。中午十二點ABC電臺最先播出了這條消息，但是最先聽到這條新聞的却不是與法案關係最密切的中國人，因爲所有中國學生都在忙着打工掙錢，沒有人會想到電臺裏會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消息。那些邊打工邊聽着收音機的中國學生，都把頻道固定在音樂節目上，讓輕鬆的或者喧囂的音樂灌滿耳朵，讓時間在音樂之聲中消融。一個普通的澳大利亞人無意中聽到這則消息，之後轉告了他所認識的中國學生，那個中國人竟不相信幸福會這樣悄悄地來到，但他還是將消息傳遞了出去，于是一傳十、十傳百。新大陸時報社的電話機又忙碌起來，阿新安慰着所有急于證實消息的同胞。從中午到黃昏，有關中國人居留的消息在坊間以各種方式流傳，小上海和唐人街上慢慢地聚集了許多中國學生，每個人都在詢問着彼此的消息，也都在傳播着這樣那樣不同版本的消息。那麼最初這個消息究竟是由誰第一個傳遞出來，沒有人能搞得清楚，但所有中國學生都已經把這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消息當作了事實，現在的問題是具體細節還有許多種的說法，究竟什麼人可以居留，什麼人不能，很是困擾這些無所適從的中國人。最終人們漸漸散去，趕着回家看電視新聞。

晚間電視新聞裏出現了基廷嚴肅的面孔。基廷給人們的印象總是扳着面孔，澳大利亞公衆普遍認爲這個總理不會笑，因此顯得不够親切。當然基廷可謂少年得志，二十五歲便成爲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其後又出任財政部長，一位世界上最優秀的財長。但祇當財長對年青的基廷而言太不過癮，霍克曾經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證：我們倆聯手戰無不勝，你助我再當兩年總理，我就把總理的位子讓給你。基廷果然很賣力地繼續當財長，并期待着老霍克兩年後讓位的消息，但霍克認爲自己還有把握再贏下一屆總理大選，于是基廷不幹了。年輕氣盛的基廷在黨內公開挑戰霍克，但最終却以五票之差敗走麥城。根據遊戲的規則，基廷辭去了副總理兼財長的職務，成爲國會坐在後排的議員，同時也宣布

自己決定從此不再東山再起，在議員任期屆滿之後將永遠退出政治舞臺。從此基廷坐在後排議席上一聲不吭，有時在電視上還能見到他昏昏欲睡的樣子。而在野反對黨挑起的消費稅法案的經濟改革大戰，却給了基廷再次挑戰政治高峰的機會。面對反對黨氣勢如虹的挑戰，執政的霍克政府顯然對不從心力，漸無招架之力。精通財政的基廷坐在國會後排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老邁霍克的手忙腳亂。當工黨一些要員邀請基廷出山協助霍克時，基廷仍然不為所動。那天媒體宣布的最新民意測驗顯示，工黨政府的支持率被反對黨遠遠拋在了後面，竟落後在野黨十九個百分點。這時基廷突然站出來，宣布為挽救工黨危在旦夕的執政形勢，將二度挑戰霍克。基廷果然如願以償地登上工黨的最高寶座，他是用工黨的政治危機作為賭注，這是天賜的良機。上臺的第二天，基廷便發表了洋洋大觀的反擊在野黨經改方案的宣言。基廷告訴國民，如果反對黨的新經改法案得以通過，以後國民上街買任何用品都要加上消費稅，工薪階層將不得不從腰包裏掏出更多的鈔票用于支付這一稅法，生活也為此會變得一塌糊塗。基廷把反對黨的消費稅提案形容得面目全非且一錢不值。這樣形勢出現戲劇性變化，工黨支持率迅速回升，基廷也坐穩了聯邦總理的位置。有評論家說基廷應當感謝反對黨的經改挑戰，如果沒有喧鬧一時的消費稅草案，就也沒有基廷的東山再起。中國留學生們也旁觀了這場政治較量。阿新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如是評論，西方政治其實也很黑暗，民主政治不過如此，祇不過做得更冠冕堂皇些罷了。同胞們不要再相信什麼政治家的善良，至少不要再相信那些街頭的政治家，還是全心全意搞居留賺錢要緊。他還不忘記順手揶揄了馬紅軍幾句，民主研究會的馬紅軍主席就很有覺悟，到澳洲伊始就明白搞錢重要的道理，現在早已身家百萬，成為中國學生中令人敬仰的成功人士。

基廷總理微笑的樣子也一樣的嚴肅，但今天他的神情對中國學生來說却格外的慈祥和藹。基廷宣布聯邦政府決定給予來自中國、斯裏蘭卡、阿富汗的難民和特殊群體申請移民的機會。凡在天安門事件之前抵達澳大利亞的中國人將無條件獲得居留；凡在此之後來到澳大利亞的中國人、斯裏蘭卡人、阿富汗人將有條件獲得居留，他們必須具有相當的文憑學歷或特殊技能、基本的英語水平、申請過難民、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之前得到過入境簽證。

電視臺晚間新聞證實了坊間的流言，中國學生終於可以解脫了。盡管從基廷宣布居留方案到落實方案再到中國學生得到居留證，這個過程可能需要相當的等待；盡管依據這一方案，還有一些中國留學生會不符合居留的條件，他們的命運仍然值得關注，但有一點已經不可改變，絕大部分的中國學生將在不久的未來變成澳大利亞的新居民。

阿新坐在百老匯酒吧裏與尤大力對酒當歌，“我現在真想放聲歌唱，什麼歌都可以，《翻身農奴得解放》或者《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對，再來個《上甘嶺》的主題歌或者《冰山上來客》的插曲，我在越南戰場上唱過幾回，每回都唱得熱淚盈眶。”尤大力也興致勃勃，說着自己先哼了起來，阿新也跟着唱和，引來酒吧裏其他人好奇的眼光。

“老哥，說實在話，我們倆都是愛國主義者，現在真的要永遠地留在這兒了，這心裏還有點不好受呢！”阿新說出心裏話。

“我沒弄明白這麼久了自己都幹了些什麼，就這麼做了澳大利亞人？將來澳大利亞跟中國開仗，我這個老兵拿起槍打誰去啊？”

“打誰都不行，祇能打打袋鼠。”

“咱們還得趕一期特刊出來，響應一下聯邦政府的英明決定。”雖說在慶祝，尤大力仍不忘了自己的報紙。

“行，聽你的，等我們慶祝完就出。來，咱哥倆再喝幾罐啤酒，換個口味，喝塔斯馬尼亞啤酒，真正清純沒有工業污染。喝到天亮我們看海去，看日出，看完日出就回報社寫報導。日出的時候，這世界特別壯麗特別純潔。來，幹，為了終於有這一天。”

尤大力開着那部破面包車與阿新到了邦迪海灘。

望着空曠的海灘，尤大力建議脫了衣服下海淌水。阿新則幹脆一下子脫光全部下了海。尤大力在灰濛濛的海灘上搜尋了一番，除一對男女在不遠處的霧水中躺在沙灘的浴巾上做愛，海灘上早已空無一人。

“好吧，咱也裸泳一回，中國人活着太累，咱們也釋放一下自己。”尤大力見阿新若無其事地下了海，也脫光了衣服跟了上去。

兩個男人就這樣光着身子向大海走去。尤大力的身子很臃腫，沒有腰也沒

有健壯的肌肉，凸起的啤酒肚在朝曦中閃耀着土黃色的光彩。阿新的身子正和尤大力相反，瘦削的軀幹輕飄飄地在沙灘上滑動，霧水朦朧中像是一個白色幽靈向大海飄去。

他們在海水中足足泡了一個多小時，真正感受到無與倫比的暢快，人身上無牽無挂是怎樣的輕鬆愜意，大海的胸懷又是怎樣的豪邁壯闊。他們將頭枕着淺水中的沙灘，靜靜地等候日出的時刻。

紅日並沒有慢慢地從海平面下面升起來，日頭仿佛一下子突然躍出海面，僅僅是瞬間就改變了大海的模樣，朝陽將蔚藍色的海洋抹上一層金色的釉彩，波浪之上跳躍着密密麻麻的光點。

“真是噴薄而出、萬丈光芒啊，日出就像人的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刻，波光粼粼的大海蘊育着生命的強大力量。”尤大力經不住感慨。

“我們看不到日出的過程。日出應該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就像十月懷胎才能孕育一個完整的新生命，日出的過程也是生命降生的過程。太陽是在和黑夜和大海升騰的氤氳之氣作殊死的搏鬥之後才噴薄而出的，可是我們看不到這背後的過程。人們往往祇需要結果，不看重過程，其實日出的背後一定有我們想象不到的壯美！”阿新也有同感

“所有的過程都是爲了最後的結果，沒有結果的過程是一種殘缺的美。日出掩蓋了它的傷痕而呈現出血紅的壯美，這就是日出的目的。太陽總是給人帶來希望，給予萬物以蓬勃的生機。我看過泰山日出，黃山日出和黃海、東海的日出，每一回看過日出之後我就對生活重新充滿了信心，我以爲日出的意義就在于此。”尤大力說得信心滿滿。

“因爲我們看不到日出的過程，所以我們對日出就祇有一種印象，那就是日出時的輝煌。如果看到了日出的全過程，我們就能夠體會日出背後的痛苦與日出分娩時的生死搏鬥，輝煌的日出之前彰顯着生命的原始張力與大自然的恢宏氣勢。”

兩人正聊得起勁，尤大力忽然驚呼：“快起來，我們光着身子呢!”

阿新回頭看見晨泳的人們已經陸陸續續來到海灘。有人踏着清涼的海水向海的遠處游去，有人腋下夾着衝浪板走向完全蘇醒過來的大海。波浪唱着勇者

之歌，海鷗像大海之歌五綫譜上的音符，衝浪者很快就躍上波濤之峰，五彩的衝浪板爲波浪帶去炫目的光芒。

“這裏真是衝浪者的天堂，衝浪真好啊！”尤大力不禁發起感嘆。

“我們都已過了衝浪的年紀，沒有如此壯闊的勇氣了。”

聽着阿新的話，尤大力鼓勵道：“人家澳大利亞人過了四十還能衝浪，我們算什麼老。我們在衝浪的年紀時還要去和人討居留，我們以爲生活就是鬥爭，政治就是生命，我們這一代人太不懂得生活啦。所以幾萬人都要留在這裏，但我們的後代會成爲勇敢的衝浪者。”

“其實我們都是懦夫，祇有懦夫才會逃避現實。假如你我是生活的強者，爲什麼還要爲了一張居留證苦苦追求？強者就應當重返故土，在屬於我們的土地上幹一番事業！我們四萬多人折騰了這麼多年爲了什麼？除了那張居留的證明和抹不去的苦難記憶，還有什麼？我覺得有這事很諷刺，人家西方人都看好中國的市場，成千上萬地涌向國內，他們認爲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實在太有誘惑力了。而我們呢，却想着往外跑，不願返回自己的祖國。我說老哥，你說我們幾年來到底是在做善事還是作孽？四萬多人都拿到永久居住證的時候，人也老了，身體也垮了，精神上就更麻木了。”

“我們都是爲了下一代，他們能在這塊土上愉快地生活！”

“我們別無選擇！”

兩人光着身子走出淺灘，在鬆軟潮濕的沙灘上坦然地走着，沒有人會注意這兩個裸體的中國男人。

阿新看着尤大力問道：“以後嫂子來了，你還會和我來看日出嗎？”

“當然，還光着身子看日出，人在日出的光影中本來就是赤裸的。”尤大力說。

大海托起了壯麗的景象，波濤唱着古老的歌謠，波濤之上是勇敢的衝浪者。

悲歡離合

不久，阿新在報紙上又推出一個全新的專欄——“家庭”。在居留問題解決之後，對於每一個出國的留學生來說，家庭問題已成了燃眉之急。那時許多出國的男人女人們誰都沒想到當初的憧憬和毅然決然如今居然變成了難挨的漂泊不定，誰都如同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孤舟，而異國他鄉長期的寂寞才是最熬人的，心靈上的安慰是每個游子最需要的藥劑。現在居留的問題已幾成定局，“抗戰”勝利在望，“抗戰夫妻”也到了該分手的時候。抗戰夫妻本就祇是人生的一種際遇，無論是露水夫妻還是假戲真做，現在都到了該謝幕的時候。

阿新說收到一封女同胞的來信，這位女同胞踏上澳洲大陸時年僅二十歲，她去語言學校上課時結識了一個三十三歲的男同胞，後來他們同居了。這個女人爲了那個國內已有家室的男人四年來做了五次的人工流產，每次手術都要經歷身心交瘁的痛苦，而現在却要面臨“瀟灑”的分手，女人再也瀟灑不起來了。四年裏，她沒有大專學歷和特殊技能，出國前祇是幼兒園裏的“孩子王”，這次沒

有希望獲得居留。她有權要求那個與她同居了四年的男人幫助她搞到一張薄薄的居留簽證，因爲他曾經表示將真心實意地愛她。

阿新對這位女同胞表示非常同情，他也關心那個男人在大陸的妻兒，但萬事不能兩全，無論那個男人怎樣選擇，都將是非常殘酷的。阿新爲此專門爲這位女同胞的故事寫了一篇報導。“抗戰夫妻”的結局在故事的開始就已經注定，無非是選擇悲劇和喜劇結局的問題。如果大家都在國內有家庭，爲了幾年來在澳大利亞的胼手胝足的同舟共濟，現在一起去吃一頓最後的晚餐，體會一下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的意味，然後欣然分手，安靜地等待國內家人的到來，這是喜劇。而這位女同胞的遭遇當然是個悲劇故事，但是她還很年輕，今後的路還很長，還可以去愛其他的男人，而且一定能找一個比那個結過婚的男人好得多的人。愛情就像流水，流到哪兒就愛到哪兒，沒有人會相信一生祇能愛一次！就是別再看花眼。“抗戰”時期過去了，這回要愛就要愛得實實在在。幼兒教師是個很高尚的職業，那位女同胞一定也具有高尚的情操，你的抗戰丈夫有個完整的家庭在國內，這樣的家庭你能忍心去拆散嗎？再說你的抗戰丈夫良心不大好，你的青春就此被這個男人耽擱了，這樣的男人有什麼值得你去留戀！這位親愛的女同胞，世界很大，灑脫地離開那個老男人，去尋找自己的新生活。

另一位女士打電話找阿新，坦露自己在國內有丈夫和女兒，不但丈夫事業有成，女兒也很乖巧，她不願意放棄這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但她在澳大利亞也有一個同居的男友，且爲他生了一個兒子。這個抗戰丈夫在上海同樣也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一樣不忍心把祖國大陸的家庭拋棄。這個女人和抗戰丈夫都符合政府的居留條件，她該怎麼辦？

阿新對此無可奈何，“抗戰夫妻”本來祇是“演戲”的需要，但這出戲演砸了，兩人世界變成三人世界，這就不是悲劇，而是荒誕劇。阿新說，既然是荒誕劇就應當採取荒誕手法來處理，當事人和局外人都不能依照常規的思維方式。抗戰夫妻生下來的兒女，無論是跟隨父親還是選擇了母親，他們都是這片大陸上的新主人，他們有着自己的生活道路。現在的問題是他們選擇父親還是母親，或者說他們別無選擇，而是由父母選擇他們。抗戰夫妻應當認真探討

一下哪一方的家庭有可能接受丈夫或妻子的非婚子女，也就是接受他們欠下的風流債。反正總有一方必須向國內的家人承認，這個兒子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請求家人接納這個新成員。阿新知道這種選擇確實很難，但這是必須作出的決定，誰也沒有權利將留在祖國的那個曾經很幸福的家庭一脚踹開。或許還有另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采用抓鬮的辦法來決定由誰撫養這些不該來到世界上的孩子，這種方法雖然荒唐，却簡便徹底，因為這本就是一出荒誕劇。阿新說，荒誕劇也可以表現得很崇高，男女主角無論誰接受了親生兒女，都將承擔巨大的責任，包括萬裏之外祖國親人的責難和永不寬恕的內心痛苦，但這是一種崇高的苦難，就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是永恒的、崇高的受難。

報社還接到這樣一封信，寫信的是一位上海留學生的家屬。這個女人在一九九一年帶着十三歲的女兒歡歡天喜地來到澳大利亞與分別多年的丈夫團聚，却發現丈夫身邊多了一位年輕善良的女友。丈夫租了一套二室一廳的公寓，安排妻子和女兒同居一室，自己仍然與女友睡在主人套間裏。十三歲的女兒什麼事都懂得，母女倆經常抱頭痛哭。妻子和丈夫吵架要搬出去住，丈夫說哪兒也不能去，這裏人地兩疏，出去會出問題的。妻子說你不愛我，就讓我和女兒走。丈夫說你是我老婆你走哪兒去。妻子說，現在這樣這又算什麼，大紅燈籠高高挂，你憑什麼有兩個老婆。丈夫說我有胃病，發作起來沒命疼這你知道，我們當年五個人合住一套公寓，她給我找偏方熬藥盡心伺候我，我這條命是她救下來的，你叫我現在怎麼辦？你應當謝謝人家才對。妻子說，我知道她心眼不壞，真心對你好，我又該怎麼辦呢？你考慮過我和女兒嗎？丈夫不吵了，一個人跑去俱樂部喝悶酒。妻子和女友就都沒睡，兩個女人在各自屋裏哭了半宿。

這是個悲劇。這種三角戀愛或稱之為第三者介入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留學生家庭就顯得特別沉重。一方是結發夫妻，從前也是很恩愛的，在上海虹橋機場上飛機之前，一向穩重矜持的妻子竟然敢當眾勾住丈夫的脖子親吻，真正的泪流滿面；另一方是患難中見真情，相依為命多年，與恩愛夫妻沒有區別。阿新和尤大力論證了這個故事，兩人得出相同的結論，沒有人可以處理得了這樣的家庭問題。

阿新在“家庭”話題裏說男主角祇有一個，女主角有兩個，還有一個現在已經十五六歲的女配角，這樣的戲不好演。中國自古清官就難斷家務事，這樣的家庭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許多歷史問題過了幾百年仍爭論不休，無法定論，這說明歷史問題一向非常棘手。兩個女主角都愛男主角，那個男主角也都割捨不了這兩個女人，沒有選擇的可能性，那就祇能維持現狀。一夫一妻制是人類進步文明的產物，但實際上這年頭裏許多男人都養情人，而且有時不止一個；許多女人也有情人，家庭關係仍然維持一夫一妻制，這是現代文明的虛偽面目。封建時代允許一夫多妻，妻妾是男人的附屬品；現代文明制度之下的男女關係非常開放，男女之間沒有依附關係，雙方都具有獨立的人格，這是現代文明與封建時代的不同之處。我們這個故事的兩個女主角都是現代文明的犧牲品，她們幹脆回到封建時代的家庭關係中，共同伺候一個男人好了。孟子曰：和為貴。

阿新的文章立即成為大家喝斥的對象，還有幾家當地的華文小報也像突然間領悟到了什麼，加入了叫罵的行列。即便如此，《新大陸時報》的印刷量却一天天與日俱增，對此尤大力滿肚子的不解，似擔心、似驚奇地望阿新那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

大千世界真是無奇不有。在眾多的讀者來信中，還有一封由約翰和安娜共同署名的求助信。其實約翰與安娜都是男人——同性戀者，已經同居逾四載。約翰先生從前就有一點同性戀傾向，看見漂亮的小伙子就喜歡追。去電影院看電影時喜歡摸鄰座小伙子的大腿，搞得人家莫名其妙。那會兒大陸的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同性戀，所以被約翰摸過的男人祇當他神經不正常，沒有人想到這是性侵犯。不過約翰不單愛男人，還屬於雙性戀者，在廣東順德娶妻生子。而安娜則是個地道的同性戀者，從小就認定自己是女孩，長大以後也一直扮演女人的角色。這封來信說現在情況緊急，如果約翰把妻兒接到澳大利亞，那安娜又將置于何地？約翰和安娜已經愛得没法分開，沒有約翰，安娜會去死；沒有安娜，約翰也會神魂顛倒。

阿新和尤大力拿着這封信都半晌說不出話來。第二天，阿新祇好在報上如是說：本專欄祇討論傳統男女的家庭問題，至于男人與男人的組合算不算一

個家庭，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澳大利亞法律承認同性戀家庭，但中國法律沒有提到，沒有提到就是不予考慮。阿新現在雖身處澳大利亞，但還是中國人，因此兩國的法律和文化傳統都可以制約阿新的行爲。他無法理解男人和男人的愛情是不是也像幹柴遇到火苗會劈劈啪啪就燒起來，是不是也像梁山伯與祝英臺那樣纏綿悱惻，並且可以爲對方去死，然後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假如約翰把老婆孩子接來了，安娜真的會去尋死嗎？安娜跑到悉尼大橋縱身一躍殉情而死，約翰會不會也跟着去跳海，來世再做紅塵知己。阿新說，安娜最好不要尋死，因爲是問題就總有解決的辦法，至于有什麼妥善的現成辦法，自己也搞不清楚這樣男人與男人的問題是不是家庭問題，所以現在實在無能爲力處理。阿新聲稱他沒有得罪同性戀者的意思，所以同性戀同志們千萬別在電影院裏摸他的大腿，再說自己骨瘦如柴，也沒有什麼可摸的。

阿新的專欄探討了許多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家庭倫理和心理問題。在等待居留的漫長時間裏，幾乎每個中國學生都在迷惘、茫然的氣氛中思量着自己的未來。從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政府宣布居留法案到第二年的三月一日政府允許入紙申請的那一天，中國學生們就在讀報中消磨打工之後的光陰，許多中文報刊不斷地披露、傳播和制造着消息，中國學生就在這一驚一詫中渾渾噩噩地渡過。人們知道現在真的需要重新拿起英文課本，但很少人可以真正安心學下去。阿新的“家庭”話題顯然比《跟我學》、《哈囉，澳大利亞》之類的教科書有趣得多，讀者們就是在讀報之中撕下一頁一頁的日歷，百無聊賴地點數着入紙申請日子的到來。其實許多讀者都知道所謂讀者來信都是阿新的杜撰與胡說，但這沒有關係，等待的日子太寂寞，而生活需要各式各樣的調味品，讀者一邊罵着阿新胡扯，一邊樂陶陶地談論着男人和女人永無休止的話題。

一天報社收到一封署名瑪麗的中國學生來信，信中講述了自己在悉尼三年多的遭遇。出國前瑪麗曾是上海醫院的一名護士，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自費留學來到悉尼，在九零年元旦的狂歡之夜瑪麗被自己的白人老板強姦，在半醒半醉之下成了這個六十多歲老頭的獵物，此後做了老頭的情人。白人老頭在悉尼北岸富人區開了一家按摩院，實際上是家妓院。爲了生計，瑪麗後來就在這家按摩院當領班，也陪客，因爲老頭另有了新歡，就把瑪麗轉行去作了妓女。這家

按摩院公開在中英文報紙上作廣告，表明此地是消魂蝕骨之處。老板買通了地方警署，雖然不可能拿到開妓院的執照，但他照樣養了一幫妓女，而且門面闊大，生意滔滔。瑪麗是在九三年的五月發現自己染上了艾滋病，病情發展得很快。瑪麗目前住進專門的醫院，醫生說她祇有三個月的生命了。瑪麗致信給報社，請求幫助尋找與她有過接觸的留學生顧客。瑪麗不知道自己怎麼得上了艾滋病，也不清楚是哪個人將HIV的病毒傳染給她，反正現在追究這個已經毫無意義了。她，快死了。瑪麗希望通過報社的幫助，提醒那些凡與和自己有過一夜之歡的同胞，他們可能都被染上了HIV病毒。瑪麗自己是犧牲品，但她覺得還是對不起那些曾經與她有過一面之緣的同胞。瑪麗說，有一個叫“飛”的浙江留學生很痴情，每個周末都要去找她，而且每次都送一束紅玫瑰。飛曾經非常認真勸自己離開那個鬼地方，并真誠地求婚。瑪麗說這個男人令她很感動，但她害怕自己已不能適應家庭的生活。一個野慣的壞女人是不適合再去作賢妻良母的。這個男人竟然動情地願意爲瑪麗贖身。瑪麗笑了，她沒有賣給任何人，也用不着贖身。瑪麗認爲自己是受害者，但她的職業害了更多的人，因此罪惡深重寧。瑪麗說她住進療養院之後就再沒有和飛聯系上，也無法找到“飛”，祇能默默地祈禱那個男人平安無事。

這則篇幅不長的消息一公布，就在中國學生群體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甚至是恐慌。那些曾經與瑪麗上過床的男人自然魂不附體，仿佛世界末日就在眼前。阿新和尤大力專門去採訪了一些醫生，醫生證實自從瑪麗的事報導之後，一些中國學生去了他們的診所做過HIV的檢查，有的報告已經出來，確實發現有人呈陽性。

阿新在報上痛心疾首，同胞們辛苦了多麼年還沒有把居權搞定，有些人却要在黎明到來之前倒下。那天一位讀者打來電話說今天的《悉尼晨鋒報》登出一則消息，在一些西人醫院和家庭診所已經發現了幾例HIV的陽性報告，病人就是中國學生。尤大力聽了，連忙下樓去買了一份《悉尼晨鋒報》，找到這個登在第一版下方角落裏的消息。消息的內容大致是這樣：新南威爾士州的衛生局官員非常重視這些報告，這些患者需要治療和心理輔導。誰都清楚，HIV檢查呈陽性者，等于準備與死亡握手，和生命道別。政府已準備接收幾萬中國學

生，但有HIV病毒者是不能通過身體檢查的。實際上倘若真的被發現是HIV的病人，即使給你居留權，那也毫無意義了。

一時間，《新大陸時報》儼然成爲中國學生們的諮詢中心，大家都在關心中一切與瑪麗有染男人們的消息，就連女人們也十分關心事件的進展，因爲她們也很害怕自己的男友是否有一天出軌，和像瑪麗這樣的人有染，這誰能保證呢？阿新在電話裏總是很有耐心地勸告大家最好趕緊去做個檢查，馬上就要居留了，無論如何不能在黎明前倒下。但是阿新知道并不是每個人都會去找醫生，有人害怕被查出，擔心心理上承受不了這種殘酷的現實，就像有些人原本好好的，照常可以和朋友打牌下棋，哪天醫生突然告訴他得了癌癥，不出三個月就一命嗚呼了。他并不是死于癌癥，而是死于自己恐懼的心理，有時候病人往往是最怕知道真相的人。

有人請求報社將那些與瑪麗有染男人的名單公布出來，祇要有了名單就可以順藤摸瓜，按圖索驥。但在那時的留學生圈子裏，很少有人可以在幾年浪迹天涯的日子裏仍始終保持着一顆安靜的心。上帝本來把男人與女人放在一起，就是讓他們相互吸引。漂泊的日子是那樣寂寞淒涼，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很多人在心靈上就像孤魂一樣在異國的土地上游蕩，男人和女人同樣渴求及時行樂，誰也不會想到當初的行爲會有潛藏的危險。

這一回却是人人自危了。就連阿新私下也偷偷去做了檢查，倒不是他也與瑪麗有染，而是回想到曾和夢露的日子。醫生說報告要一周後才能送來。阿新悻悻地回家後給夢露挂了電話，又山重水復地詢問起夢露的過去。夢露對男人的旁敲側擊早已了如指掌，故意不吐一字，在電話那頭近似放肆般開心大笑，讓阿新的心久久懸在半空無法着陸。

“聽說你們報社有和瑪麗上過床的男人名單，要不，咱們交換怎麼樣？”
“我對這個名單完全不了解，再說報社答應要對當事人負責。”阿新回避。

“那對不起了，我祇好挂綫了嘍。”夢露在電話那一頭繼續挑逗着阿新。
“他媽的，你從來不問男人名字就拉着人家的手去三流的旅館開房間。”
“你是否已經感覺到病毒在你的身體裏很活躍了？色是刮骨鋼刀，阿新先

生，我看你也該去做個HIV的檢查。我本就不想活得太長，祇要眼前能轟轟烈烈就行了，又何必在意這麼多。我要是那個瑪麗，無論如何都會在臨死前出一本自傳，把那些西裝革履祇會在面前專討女人歡心的狗男人一五一十地寫出來。哈，哈哈。”

阿新放下電話狠狠罵了一串臟話。這個女人的思維就是不正常，她可以視死如歸，但阿新却自認是個凡夫俗子。阿新有些後怕了，當初和夢露上床時想過用避孕套，可夢露說她長期服藥片，用不着那惱人的東西，一層薄膜把什麼感覺都稀釋了。那時祇想圖個刺激，現在心裏有點虛了。他在文章裏像個上帝似的對其他人諄諄教誨，在電話裏回答讀者的詢問時像個教父無所不知，但現在心裏像荒漠一般空曠寂寥。尤大力曾問過阿新是否也去做過HIV的檢查了，阿新說：“我順便去做了檢查，這世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老哥，你也去做了嗎？”阿新巴望着尤大力也去做下檢驗，這樣至少在心裏感到和其他人一樣平等了。

“我剛去驗了血，結果還不知道。”
“老哥你這人挺踏實的，沒看出你能有什麼風流事。”
但尤大力的一句話還真差點嚇着了阿新：“……瑪麗是我的情人，是我把她從上海弄過來的。”
“老哥你別嚇我，這可是火坑。”
“我和瑪麗在上海時就認識了，所以我倆想到私奔，那會沒想到今天會是這樣！”尤大力說得很悵惋。

“你也是那些人之一吧，那麻煩大了！”說完這句話，阿新感到自己太直接了，急忙收住了嘴。
“大概吧！”尤大力邊說着，邊將金絲邊的眼鏡摘下來，擦了擦。
阿新擔心自己先前的話對尤大力刺激太大，想打破下這凝重的氣氛，于是起身去給尤大力倒了杯咖啡，送到大力的面前，順便安慰道：“讀者以爲我們會有名單，其實瑪麗也應該給我們一份名單，這樣也好找到當事人。老哥你不必擔心，不會有什麼問題的，頂多就是一個帶菌者。我問過醫生，帶菌者與艾滋病人是兩回事。”

尤大力說：“瑪麗不可能記住所有人的名字。你真把我當作HIV病人啦！我不會死的，因為我要辦一份真正的報紙才會閉上眼。”

在等待驗血報告的日子裏，阿新再沒心思去寫什麼專欄了，給自己放了幾天假。

一周很快過去，阿新去拿最後的報告。醫生恰巧出去，漂亮的護士小姐把報告單遞給阿新。阿新看不懂其中的內容，他對護士講了許多有關HIV的內容，但他的英文實在不敢恭維，即使加上了手式，護士還是不明白阿新說的是什麼意思。阿新干脆用最簡單的英語問，翻譯成中文就是：我的一好一不好。護士淺淺一笑，她終於明白眼前這個焦急的人到底想要知道什麼，於是春天般地說了一句“Good”。阿新又加問一句，“沒問題？”說着還特意做了個OK的手式，護士跟着也點着頭說：“沒問題。”如釋重負了。阿新回到報社，正遇到馬紅軍、關東北來找尤大力談廣告的業務。阿新問二位都去做了HIV檢查嗎？兩人回答的都十分肯定，絕對沒問題。阿新說：“別那麼肯定，現在HIV病毒很活躍，就像黑社會一樣非常猖狂地活躍在我們的生活中，你們還是去做下檢查，有備無患嘛。”送走馬紅軍、關東北，阿新見尤大力還沒出現，才從杰西卡小姐口中得知尤大力也去取報告單了。阿新泡了一杯清茶，坐下來看起今天的報紙，隨後操起筆，繼續構思着專欄的下一個內容。

尤大力終於回來了，上樓來時非常輕鬆，看來他的檢查報告也可以Pass了。“我問了醫生，他說不是每個人和帶菌者交往都會受感染，我就是這種不受感染的人。說真的，我得抽空去看看瑪麗。”

“不，老哥，現在我們應該喝酒去，慶祝一下從死亡綫上安全歸來，生命誠可貴，走吧，去喝一杯，我出錢。”說着了阿新拉着尤大力下樓去了百老匯酒吧。

酒吧的暗格、昏暗的燈光讓人的閑談更加毫無顧忌。兩人邊喝邊聊，話題又自然轉到了瑪麗的身上。

“老哥你認識瑪麗，她很迷人吧。”

“我結婚那天，瑪麗跟着她哥哥來參加我的婚禮，後來我們就偷偷地往來。瑪麗是個好姑娘，善解人意，我們在一起真的非常美妙。”

“你這就不是真話，你才結婚，就不怕被發現？”

“我老婆從不懷疑，她是個實心眼。我也不能太對不起他，必盡結婚不久，但維持這種關係讓我和瑪麗都很苦惱。出國興起後，我就決定要走，你要說這是逃避也可以，反正我跑得遠遠的。我到了這邊一穩定就把瑪麗也辦了過來，在這裏我們還可以過得像夫妻一樣，沒人會指責我們。瑪麗與那個白人老板的事發生之後，我們就分手了，沒想到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說着尤大力操起剩下的半瓶百威，一口氣全喝了下去，才吐了口氣說，“是我害了她，我愛她却最終害了她。要是當初沒有認識，沒有把她辦出來，她現在在上海還可以做個好護士，可以嫁人，有自己完整的家。阿新，這就是命運，誰也改變不了命運。”說着尤大力竟有些哽咽。

“老哥你活得值了，有女人愛你，你也愛她，你們愛過了，這就夠了。天底下有多少男人女人從來就沒有嘗過愛的滋味。”

“你對女人好點，你也會得到真愛。”

“愛情這東西像泥鰍，你要去抓它就不容易。我是個怪物，女人生來就不愛我這種人，祇需要我的文章，讀我的文章又罵我是流氓。”

“有一種人生來就是當蠟燭，照亮了別人毀了自己。”

“我可沒那麼高尚。從前想當英雄的時候，最好在十八歲就能為國捐軀。可是現在呢，現實啦，也不得不現實，不會應變就沒法生存，不僅我，周圍的人概莫能外，何況是馬紅軍、老關這樣的人。在這裏祇有鈔票是最現實的，想想他們整天喊着要民主，反專制，為留學生討居留，結果呢，除了用這些口號唬唬人賺錢，還真正做了些什麼有意義的，什麼也沒有，這太明白了。我說老哥，有時回頭看看，真的很懷念原來那個年代。盡管盲從、狂熱，但我們至少還有理想、有抱負，想為國家盡點責任，人與人之間不需要戒備防範。現在有什麼？金錢就是一切，每個人的最高理想就是那張居留證和像塑料一樣的鈔票。我們都沒有信仰，你說這幾萬人留下來能幹什麼？除了追求一個身份，其他的全沒了。你看過斯通的越戰片《七月四日》嗎？我喜歡斯通的越戰系列片。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日，那些美國士兵沒有忘記這個日子。美國的強盛就在于這樣的精神力量！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麻木了。澳大利亞人至少還有基督

和上帝，而我們呢，真的很可憐！大家以為我活得很快活，或者把我當作一個小醜式的喜劇演員。其實我寫那些文章也是為了混飯吃，愛讀我文章的人也很無聊。大家都活得累極了，沒意思。你說我會得到真愛，那就錯了。我這個人已經愛不起來了，什麼都是假的，包括愛情。從前夫妻兩地分居很安全，絕不會出現什麼第三者。如今夫妻分別一段時間看看，用不了多久就守不住空房。世風日下吶，老哥。現在的愛情就是一種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討價還價，可以典當抵押。我已經不相信有什麼愛情，需要女人的時候就對她說我愛你，我想我說這句話就跟說Good Morning一樣，完全是口頭應酬的語言，沒有愛的成份。其實人家也不相信你說的，但是女人就愛聽這樣的話，反正如今生活充滿着虛假，女人就想象着這句話是真的，下一步的性愛動作就比較容易發展下去。男人和女人總是希望把做愛的過程裝飾美化。老哥你說我的思想是不是太灰色了。”

“世紀末的心態總是灰暗的，人們不知道新世紀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實際上很害怕進入二十一世紀，害怕被生活淘汰。我們這一代人承上啓下，老人認為我們叛逆，因為我們直接摧毀了自己。下一代人又會怎麼看我們？我們可能不大適應新世紀，盡管我們是跨世紀的一代。我才四十歲，却覺得身心蒼老。我夢想創辦一份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報紙，像《紐約時報》、《泰晤士報》那樣的國際性大報，但我知道實現不了這個願望。我兒子以後也許會笑我迂腐，生活中有那麼多可以選擇的職業，偏偏要守着這個破報社！”尤大力也說出自己的心聲。

“我們留在澳大利亞，偏居一隅，幾萬人死活也要留在這個大陸。老哥你說我們這幾萬人如果無法留下來會是什麼樣子？幾萬人回到中國會覺得那裏非常陌生，從前的朋友也變得陌生，從前的回憶既熟悉又生疏，中國對於我們已經成為異國他鄉。我們還自以為是時代的弄潮兒，有勇氣走出國門去開辟新天地，可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多少年來為了獲得這塊土地的承認忍辱負重，老哥你覺得我們值嗎？我們現在不屬於中國，我們誰也接受不了對方，因為我們雙方都不是原來的樣子……老哥你現在的存款有多少？”

“大概够吃半個月，如果光吃方便面，可以應付兩個月。”

“你我都是窮光蛋，所以我們看不起金錢。要是我們有許多錢，會不會改變看法？我看不會，我們會想用這些錢去幹一番事業。下一代人不會這樣想，他們會把錢花個精光，然後去自殺。他媽的，我們這樣詛咒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是有些瘋了？”

“文人都有些變態，這很正常。在金錢與精神兩方面，我們始終不能把握自己。我想成為有錢人，這樣就可以辦大報。為了事業，我要許多錢這也許這是個托詞，人的心理有時很齷齪，誰也抵禦不了金錢的誘惑，但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在很長的歲月裏沒有受到金錢的奴役。我相信如果我有許多金錢，不會拿去揮霍殆盡，我會想法兒回報社會。”

阿新說：“老哥，要是你今天的化驗報告是陽性，你會怎麼辦？”阿新喝得已經有點醉了，邊說邊拉住尤大力的肩膀。

“不知道，我想瑪麗是不會把那個病毒傳染給我的。”

“如果是我，我會很絕望，可能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然後轟轟烈烈地死去。”

“阿新你可別胡思亂想，剛才不還說沒有問題嗎？我現在真有些害怕了，你是不是真染上了，在這和我說訣別的話。可千萬別嚇我，還有多少事等着我們倆一起去做呢！”

“你怎麼啦老哥？我真沒事，你看看，這報告。”說着，阿新瞪着發紅的眼睛，將隨身的檢驗報告掏出來，拍在茶幾上。

當兩人走出酒吧時都已搖搖晃晃。第二天一早杰西卡小姐來開門的時候，發現社長和總編都躺在過道上。

塵埃落定

這是一九九四年的最後時刻，悉尼情人港對面的摩天大樓透射出無數各色的激光光束，那些光束凝聚成一個激光時鐘，幾十萬聚集在情人港等待一九九五年到來的男女都翹首仰望着時鐘計時的過程，因為在新年來臨的那一刻，狂歡的活動將被推向極致。在歌劇院門前的廣場和海濱道上，同樣聚集着幾十萬參加狂歡的人群。海濱道邊的所有酒吧火爆異常，熱烈喧鬧的搖滾樂夾雜着尖叫聲、酒瓶與玻璃杯的破碎聲，組成狂歡夜的前奏曲。所有的人們都在等待着教堂新年鐘聲敲響的那一刻和即將到來的烟火晚會。就像上帝沒有遺忘狂歡的人群是他的兒女，同樣此刻的悉尼街頭的警察們也沒有忘記這一年一度的狂歡不僅是所有人發泄熱情的時刻，也可能是使一切成為激情殉葬品的一刻，他們荷槍實彈、嚴陣以待。時針指向二十三點，情人港上空瞬間升騰起無數璀璨的火樹銀花，就像音樂組曲一樣，撩撥着狂歡的男女，此起彼伏，跌宕有致，給狂歡之夜彈奏出醉人的序曲。在時鐘指向零點的時候，在鐘聲敲響第一下的時候，男人和女人們相互擁抱接吻以

示新年祝福。

從前的新年夜裏，中國學生不敢去擁抱自己的异性同胞，更不敢擁抱白種人。在這歡騰的歌劇院門前，在這風景如畫的情人港，從前的中國學生祇是看客，祇是在人群之間流連，茫茫人海中愈顯出自己匆匆過客的身影，沒有人會在歌劇院、在情人港、在狂歡的人流中、在新年鐘聲裏留下一個快樂的擁抱和一個永恒的親吻。但今天不同了，如今進入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很快就要成為綠卡一族。在情人港和歌劇院的狂歡人流中，到處可見滿面笑容的中國學生，男的手裏拿着啤酒瓶邊走邊喝；女的在小販處買幾串水銀光環，學着當地人的樣子套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中國學生們正展現出新主人的風度，等待零點時刻的到來。

此時此刻，阿新和夢露正坐在植物園的山坡上，面前潔白的餐布上面擺着意大利餡餅、牛肉幹、香腸、色拉、香檳酒、威士忌等。這裏可以盡收悉尼灣的全景，腳下的歌劇院在燈火中通體透亮，就像燈火輝煌準備起錨的輪船；悉尼大橋橫貫南北，在焰火的映照下宛如巨龍即將飛騰；海灣中千帆競渡，來來往往的私家游艇飄蕩出搖滾樂撩人的旋律；高聳的悉尼塔在夜色中恰似琉璃宮散發出撲朔迷離的光芒，塔上的旋轉餐廳燈影幢幢，仿佛可以感覺到香檳酒與女人在燈影中的旋轉。悉尼城就仿若浮出海面的海市蜃樓。

夢露說：“我是第二次坐在植物園山坡上迎接新年。上回和湯姆，我們喝香檳，談鬱達夫。在這裏做愛別有情趣，你可以眺望深不可測的星空，尋找到懸挂在星空中的北極星和牛郎織女星。童年時我很容易找到它們，可後來却一直找不到，是不是人長大後視覺與感覺都變了。你也可以俯瞰不夜的悉尼，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辨認，一條大道一條大道地尋找，想象着燈影下的醉生夢死和罪惡勾當。有時會覺得自己就在城市上空，在喧囂世界之外赤裸裸地發泄着，那種感覺太美妙了。你知道嗎，湯姆也抽上大麻了，我教的，我倆在一起迷幻，那是瘋子的極樂世界。”

說着夢露一邊把隨身帶的大麻揉碎，卷成香烟狀抽起來，一邊問：“你要不要也來根試試，管保騰雲駕霧，但還有一點意識，處在迷幻與真實世界的邊緣，這種感覺有助于人的靈感活躍。”

“算了吧，我的感覺已經太活躍了，再多一點祇怕會精神分裂。我知道大麻這東西不同于可卡因、海洛因，但我擔心到時控制不了自己。如今這個世界越來越不像樣，就像瘋人院。我這人就有些不正常，說不定有一天會控制不住。你這個女人毛病更大，色是刮骨鋼刀，一個瘦弱女子却欲壑難填，才二十七八歲，就好像自己已經活够了，隨時可以去見上帝。我們之間有些不同，我相信苟活着總有希望，你是在毀滅生命，你可以在毀滅之中得到最高的享受。我這個人特壞，你呢，也壞透了。你和別的男人上床，品味着不同男人身上的氣味，就像品味不同牌子的法國香水，你純屬在發泄欲望，倒也給人快樂，從道德上來說你或許無可指責。你不放縱，靈氣就會消失，整個人就會死亡。我很奇怪你為什麼沒有去販毒，這是很刺激的職業。從前我向往西方的世界，對他媽的民主自由這一類的東西渴望得像男人對女人一樣。現在我有點醒悟，民主就是你罵總統是王八蛋，總統說我給你減稅，我給你加薪，你別罵我，還選我當總統；我不高興做愛的時候你偏要惹我發火，我就割去你的是非根叫你永遠也不會煩我。自由這玩意兒就更簡單，你要吸毒我就來販毒，我高興怎樣就可以怎樣。辛普森不是就把白人妻子與妻子的情人殺了。不管他是白人還是黑人，祇要有錢，不僅可以請最好的律師為自己辯護，還可以叫媒體向法院施壓，什麼族裔歧視、司法不公啦，甚至鼓動球迷，讓陪審團和法官也要提心吊膽，擔心什麼時候被球迷弄死扔進垃圾箱，所以你看吧，辛普森準沒事。這個世道你想怎樣就怎樣，就像馬紅軍搞民主，仗着手中有點從留學生那賺來的錢，趾高氣揚，今天當這個研究會的主任，明天當那個黨的主席，其實還不就那幾個人嗎？”

夢露吸足了大麻，顯得很亢奮，“你這個家伙不是早與姓馬的分道揚鑣了嗎，還提他幹什麼？再說了當時大家都窮，人家有本事，不論是搶是騙，總之能搞到錢，在這裏這就是本事。他走他的獨木橋，你走你的陽光道，什麼結果以後全是自己擔着。你既然那麼討厭這個世界，為什麼還要苟且偷生。我要是你就不會憤世嫉俗，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祇要今天你享受了就覺得活得够本。我這個人從不去想生與死的問題，我的小說全部是覺醒、獨立的女性。”

夢露以香檳酒和威士忌調出雞尾酒，與阿新對飲一杯。望着夢露迷離而誘惑的眼神，阿新伸手去剥夢露的衣服，兩個白花花的身體在夜色中像蛇一般纏繞在一起……

突然阿新猛地抬起頭喘着大氣，覺得熱血沸騰，心想夢露在酒裏究竟摻了什麼東西，“你這個女人很放蕩，給我下了什麼迷魂藥？”

夢露咯咯地笑得全身顫抖，“你的藥性發作了？你不是常說色是刮骨鋼刀嗎，哈……哈……今天真美，明天就算世界末日也好，反正我倆已經吃了最後的晚餐。新年鐘聲快響了，祇剩幾十秒鐘了，你得堅持到鐘聲響起，你就會一輩子記住這一年的鐘聲。”

阿新和夢露整理着各自的衣服，但迷幻藥的強勁力量依然沒有過去，推着阿新搖搖晃晃站起來。他摟着夢露輕飄飄地下了山坡。走出了植物園，他們站在悉尼歌劇院的石階上吻別，準備在狂歡的人群中分手。

阿新鬆開夢露，恍惚中夢露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在這紛亂的人群中個體的存在是非常微小的，阿新被狂歡的人群推搡着不由自主地往前移動，被一群白人女人圍在中間。還來不及問好，一陣暴風驟雨般地親吻，阿新身上所有沒有遮蓋的地方全部留下甜蜜的香吻。這時阿新才擺擺搖搖地打招呼：“姑娘們，新年好！”那群姑娘們就給阿新灌酒，不知道灌下去多少酒，反正阿新一直也沒有數清楚她們是七個人還是九個人，也記不清別人是怎麼放走他的。他的腦子裏實在不清楚自己置身于何處，現在又該往哪去，祇好順着人潮移動。

這時，阿新跌跌撞撞走到一個高大的女人面前，阿新沒有什麼考慮就一把抱住那女人，然後踮起脚尖去吻，可怎麼踮脚尖也祇够着那女人的下巴，阿新“喔喔喔”叫着急紅了臉。那女人說了一聲“新年好”，不等阿新問好，那女人就像老鷹抓小雞似地將阿新整個兒抱起，很沉重地在唇上啄着，還把阿新的舌頭啄了出來，吧扎吧扎地吮吸了一會。阿新覺得那女人胸前聳立着兩座對峙的山峰，自己則像被整個扔進了山谷，爬不上來。女人用兩祇碩大的乳房去擠壓阿新的腦袋，阿新祇覺得鼻子差點被壓壞了。脖子已經弄壞了，千萬不能再把鼻子也弄壞了。阿新落地之後才迷迷糊糊感覺到那女人是個黑人。

阿新吻過黑女人之後，真的像王子一樣很有信心地繼續尋找着下一個接吻擁抱的目標，他突然發現有一位絕代佳人正在面前幾步遠的地方笑吟吟地看着他，並且打了幾回眼瞞，絕對是對着自己發出了信號。阿新很有風度走上前去，問聲“新年好”便輕輕托起那女人的右手，在手背上蜻蜓點水地吻了一下，但是那女人却抽回手咕嚕了一句什麼，這時女人身邊多出了一個男人。阿新就覺得自己臉上被重重地挨了一拳，頭腦裏一片空白，然後就慢慢倒了下去。阿新倒沒感到一點痛，祇是覺得應該倒下去了。接着四周一片驚叫聲，有人把自己抱了起來。阿新半眯着眼睛，可眼前却是許多張癡笑的臉。阿新一直沒有弄明白那一刻到底發生了什麼，零點過後的時刻是可以和任何女人接吻的，這是悉尼的風俗。從前中國留學生入鄉不能隨俗，那是因為中國人那時還祇是過客。如今自己不也是這裏的主人嗎，他媽的一切都很亂……夢露給了什麼性迷幻藥，現在什麼都很混亂。

阿新被人拉起，又趑趄趑趄地被人羣推着走。他一路上祇有憨笑，不敢再向女人問好。一個貴婦打扮模樣的女人對着阿新微笑，主動地問：“親愛的朋友，新年好！”阿新覺得身上的荷爾蒙又立即活躍起來，他激動衝着貴婦人說：“新年好，好，好……”而身體已經靠在那婦人身上，美麗的婦人輕輕地將阿新攬在懷裏，低下頭來溫柔地吻着阿新，這是一個長長的久久的熱吻，一縷夢幻般的香味從阿新的舌頭慢慢地下墜，在心田裏溢開去了……阿新非常沉醉，覺得自己仿佛甜蜜地吻了一輩子。四周人潮涌動，在婦人的懷抱裏很安全……在阿新從溫柔鄉被搖醒時，他聽見那婦人說，“寶貝你沒事吧？”阿新這才看清婦人竟是一位七十歲模樣的老女人，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臉上厚厚的香粉仍然無法掩蓋額頭的皺紋和老人斑，猩紅的嘴唇還留着阿新潮潤的口水。阿新祇覺得一陣翻胃，仿佛剛才吃的鷄尾酒、意大利餡餅、牛肉幹、香腸一股腦全涌到了嗓子眼……

阿新不記得走到哪兒，人們手腕上脖子上的水銀光環晃得他頭暈目眩。游蕩中還是遇上了些同胞，但沒有一個女人主動來索吻，也沒有一個給他擁抱的機會。阿新的意識漸漸清醒，他心裏很清楚，人們祇喜歡他的文章，而不是他這個人。倒是夢露說得很現實，同胞們的居留問題解決之後，就會忘記曾經有

個叫阿新的人為大家奔走呼號。中國人忘性向來很大，在開雞店時就可以體會到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他經常看到自己的同胞從雞店門前經過時一副偷雞摸狗的樣子，生怕被自己看見，好像自己會跑出去強拉他們進店買東西似的。阿新那時就從這些同胞的眼神裏讀出些什麼。人都是虛偽的，你假裝沒有看見他，他也就順水推舟把目光移開，好像誰也沒有發現誰。彼此既可以非常熱情地握手說許多廢話，也可以形同路人擦肩而過，就看雙方當時的心情如何。一旦你和對方的目光東躲西閃却没有躲閃開去，雙方在瞬間的尷尬之後馬上就會像突然發現新大陸似的，無比驚訝無比熱情地打招呼，並且握着對方的手很久不願鬆開。中國人活得累極了。即使在西方世界住了很久很久，也始終得保持着中國人的特性。不論你吃了多少牛排、三明治；你英語講得多流利，以表明自己已經徹底洋化，可你在骨子裏還是個中國人！阿新眯縫着眼睛在人海中搜尋同胞的身影，他想看看同胞們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夜晚是如何釋放激情、如何努力地學着像一個澳大利亞人一樣歡度狂歡節。阿新朦朦朧朧覺得每一個在他眼前晃過的同胞都像幽靈的影子，沒有着地，沒有方向，祇是在那裏閑蕩、漂浮……

阿新努力睜大眼睛，想識別周圍的景物，但覺眼前盡是模糊的影子。迷幻藥也不能改變什麼，阿新絕對不是童話中的快樂王子。星空，燈海，大橋，游艇和悉尼歌劇院，就像是一幅幅布景，而自己不過是舞臺上的小醜。

各奔前程

悉尼機場坐落在風光迷人的植物灣，這是二百年前庫克船長登陸這塊大陸的第一個海灣。灰白色的跑道與蔚藍色的大海互為映襯，銀灰色的飛機衝出跑道，在海面上升起，有無數海鷗伴隨着，那是一幅壯美的海景，一首高亢的大海之歌。機場大樓是一座現代化的藝術建築，擁有着世界上最先進的通訊網絡和指揮系統，祇要沒有遇上機場職員的罷工，這裏完全可以給南來北往的乘客提供最完美的服務。

阿新坐在候機廳二樓的咖啡廳裏，倚着窗口的落地玻璃看着飛機起落，看着海鷗追逐，他從機身和機翼上的五顏六色圖案和文字，讀出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與風情。他現在心情相當閑淡。此時尤大力坐在他的對面，疲憊的臉上充滿熱情和遐想。

尤大力說：“我從前站在黃浦江邊看江水東流，總有心事兩茫茫的感覺。現在看慣了大海，不知道再見黃浦江水會有什麼感覺。”

阿新正想着幾年前，也是在這裏，他讓那個法國來的

庫爾班木表演出那不堪的一幕，聽到尤大力對着自己說話，才從回憶中扭轉過來，扭頭看着尤大力。“是啊！一別八載，我原來以為自己現在應該會很激動，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歸心似箭。我從前讀賀敬之的《回延安》，真的很感動，那些老一輩的人日裏夜裏都夢着寶塔山、延河水和那一孔孔烟火熏黑了窑洞。他們一回延安就撲在黃土地上不起來，眼淚嘩啦嘩啦流個不停。可我現在却出奇地平靜，廣州變成什麼樣子都無所謂。我都忘記了當初自己為什麼出國，為什麼會像大雁南飛一樣，一直飛到這個世界的南端，再飛遠一點可能就去了南極和企鵝對話了。絕對沒想到這一走就是八年，現在又要大雁北歸，我們這群人真成了候鳥。八年是個很長的時間，我說老哥，你我這八年都做了什麼？什麼也沒有。我們自稱是留學生，可我們又學到了什麼？什麼也沒學，祇是把寶貴的青春丟在了這塊大陸上。出國時我在自己的房門上貼了個“無”字作為陋室銘，當時還頗為自得，以為有道家風骨。我沒有想到來得時候兩手空空，回去依然兩手空空。無為啊無為！我這人將來死了也歸于無，歸于空，這是命運，由不得我。你說人這一生是不是很奇怪，你怎麼也跳不出一個圈子。你說我們這幫人是不是很差勁。外面的世界確實不一般，人模狗樣地出去走一回，就可以在唐人街幹出一番事業，包括拿了好幾個學位，然後想念祖國，一定要回去支援祖國蓋大廈，拳拳之心不盡言表。我知道你很討厭《北京人在紐約》這部片子，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要做點自我檢討，也許真的是我們自己有問題，不是那個故事裏的王起明有問題。一個拉大提琴的北京人跑去紐約能幹什麼？大街邊上的黑人鼓手什麼的隨便抓一個都比他更有藝術細胞。王起明好像連“歡迎你到紐約”的英語都聽不懂對吧，老哥你會相信這麼一個什麼本事也沒有的人會在一間破爛不堪的地下室裏織毛衣，然後就像變魔術一樣成了富翁嗎？買別墅，開跑車，順手就能買下一棟大廈，就連玩女人也比別人有氣派，隨便就將一大把百元大鈔扔在女人的胴體上。老哥你說北京人怎麼就這麼有出息，好像美國佬個個都是笨蛋，紐約到處是黃金美鈔也不懂得俯身去撿。我們在澳大利亞的北京人也不少啊，怎麼就沒見有誰有驚人之舉？馬紅軍也是個北京人，他可以弄到百萬很了不起，算是個人物吧。但他那德行，實在瞧不上眼。老哥我沒聽說悉尼有誰跑回北京去蓋什麼大廈，自己都買不起房子

還會去蓋大廈？這可能不是北京人的問題，而是澳大利亞的問題。北京人走錯了門，走到了悉尼所以不能大展宏圖，當初要是去了紐約，可能就跟王起明一樣神氣活現，別說一座寫字樓，再建個圓明園都不成問題。老哥，我想寫一部小說——《廣州人在悉尼》，正好和《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這些寫留學生經歷的書成為姐妹篇。我準備這樣安排筆下的人物，廣州人都是神氣人物，智力都與愛因斯坦一樣，去了澳大利亞沒幾年，他們個個騰雲駕霧，不知道有多麼發達。”

“你要真能寫出廣州人在悉尼的故事那就太好了，中國人在澳大利亞都不太行，有損于我們留學生的形象，你可以誇張一些，塑造出幾個英雄人物，中國留學生進入你的小說都成了人物，至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勝利。藝術本來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尤大力也對澳大利亞中國人的現狀很無奈。

“老哥你就等着吧，我真能寫出這麼一部小說，我會告訴讀者，小說的情節都是虛構的，中國人在悉尼其實都被玩殘了，沒有什麼能人，一個也沒有！但是我會寫得很刺激，這難道不比你想搞的那個紀念碑有趣嗎。你那個建紀念碑的倡議也真可憐，這裏沒有人想去懷念過去。”

“是啊，現在的人都怎麼啦！”尤大力聽到阿新講到自己想在貝爾蒙公園裏樹一座中國留澳學生群體像紀念碑的倡議，就不由感嘆，“大家給馬紅軍交錢總是很積極，幾千元也可以毫不猶豫地交出去，想想也是，這是關係自己命運的事，有誰不為自己着想。建碑立傳雖然是千秋大事，可和自己的利益沒有什麼直接聯系，所以都比較冷漠。這些人怎麼就不明白，我們這些年風風雨雨地走過來容易嗎？你阿新沒少吶喊沒少吃苦，國會大廈廣場絕食那回還差點沒了命，可現在還有誰願意提起這些往事。我祇是想大家出點錢建個永久性的紀念碑，鐫刻上中國留學生的群體像，以紀念這八年苦等的歷程。我相信子孫會永遠記得他們先輩的歷史。在二十世紀末，有四萬多中國留學生踏上澳洲大陸，他們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的探險者，為成為這個偏遠大陸的新移民，他們付出了青春、理想、事業甚至生命。許多年以後這些人都不復存在，祇能由這座紀念碑對着所有游客訴說。我在報上登出這個倡議時還以為能很快得到大家的響應，真是見鬼，人怎能這麼快就忘記了過去。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怎麼說

都應該有點東西留下來，紀念碑是我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歸宿，我們應該記住走過的歲月，我們的後代會記住這樣一段歷史。”

“老哥，你活得實在太累了，還是好好休息休息，放鬆放鬆吧。我覺得那封讀者來信寫得太絕了，‘八年啦，別提它了！’你想想這幾個字包含了多少的酸甜苦辣，可這幾個字也把你的倡議給徹底粉碎了！他們怎麼會想到這樣的臺詞，簡直太貼切，太深刻了！忘記過去又怎麼樣，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們背叛了什麼，又忘記了什麼，其實誰心裏都清楚，那樣的日子能忘記嗎？我們的同胞需要的不是什麼紀念碑，他們要的是趕回國全家團聚，然後再急急忙忙地返回這裏，繼續打工掙錢，買房買車，還清銀行貸款，然後就老了，退休了，再就是在這裏買塊墓地或者落葉歸根，人的一生很快就沒了。人都沒了還留個紀念碑做什麼？人死燈枯，灰飛烟滅。我們的後代不會去憑吊什麼紀念碑，前輩的奮鬥與他們的生活沒有關系。真的老哥，紀念碑又算得了什麼東西，能用它來作抵押向銀行貸款買房子嗎？”

“可人活在世總要有點追求吧，我指的是崇高一點的。人不能沒有精神支柱。沒有信仰實在太可怕了！”尤大力並不贊成阿新的說法。

“老哥還是你比我有理想，我做人沒什麼目標，很多時候是想做就去做，我祇是還有點骨氣，我在為留學生奔走呼號的時候真的感覺到我這輩子還算是做了點有用的事。”阿新談起了自己的感受。

“也許是我沒有像你一樣看透，我不能這麼殘忍地把生活看透，人還是需要一種信念支撐的，辦報也是一樣。我并非要讀者聽我的教誨，祇是希望報紙能給讀者打開一個廣闊的世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從中能看到點希望。我覺得有時這有點像傳教士，以一種對上帝的虔誠對待自己的人生事業。你知道嗎，瑪麗死了，她要我帶她回上海。她是我帶出來的，現在也該由我帶回去。她說她一直深愛着我。她在閉上眼睛之前說‘終於要回家了’。我的提包裏就放着她的骨灰盒。這些年有多少同胞為了那一張綠卡永遠留在了這塊土地上，出師未捷身先死啊！每回看着他們的父母從國內風塵僕僕趕來辦後事，我就想哭。怎麼總是白髮人送黑髮人？這八年太不容易了，你說怎麼可能瀟灑地走過從此就不回頭！我總覺得該為這做點什麼。就算建不了紀念碑也不要緊，可以

收集資料編寫我們八年的奮鬥史，起碼要留下點文字。你看我又自作多情了，沒有辦法，這可能和我在部隊呆了許多年有關係。我相信這八年肯定有許多東西值得回味。幾萬人轟轟烈烈了幾年，總得有什麼東西留下來，我要找出來，它一定是我們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我相信你也一樣。無為處世，但你又從來沒有真正地泰然處之、超凡脫俗過，所以她才憤世嫉俗，以荒唐之筆，借胡說為名，渲泄心中的苦悶孤獨。在渲泄情緒的時候也透露出你的真誠。你祇看到世態炎涼，因為那些得到過你幫助的人很快就把一切都忘記了。可我相信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勢利，一定還有許多人從心裏感激你。澳大利亞這八年留學史上，留下最重筆墨的就是你阿新啊，我相信連那些健忘的人也不會否認。人總要做點什麼，你說這八年什麼也沒做，我不信。其實你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無論是霍克還是基廷，沒有人會忽視你的作為。你這個人表面上很刻薄、傷人面子，但你的心裏却有一團烈火。在大家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會充滿熱情、無怨無悔地殫精竭慮。人活一口氣，你至少比馬紅軍他們活得真實！”尤大力說。

“你對我太過獎了。記住了過完年你就早點回來，你有報紙，無論怎樣，我相信你還是會堅持把報紙辦下去的。而我能做什麼呢？還繼續在報紙上胡說八道遊戲人生嗎？我真不知道往後還能做什麼。你的飛機要起飛了，可以過海關了。你我不同，你國內有老婆孩子，我回去不知道該幹什麼，所以先去泰國逛逛。我也一直想看看這個神秘的佛教國家，在這個山青秀水、到處是寺院的國家裏，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妓女、人妖和童妓，全世界都知道去那裏觀光就是為了消魂一回，這些色情世界是怎樣和古老的宗教共熔于一爐的？我想親眼去看看這種奇怪的組合，會不會是禁欲的結果反而導致縱欲和淫亂……有時我實在搞不清楚要回去的目的，從前的一切依舊嗎？家裏人當然年年盼我回去，可我祇是海角浪子，真的可以不回去。我就繞着走，從泰國轉機，既可以省許多鈔票，又正好利用在泰國的幾天，好好想想要不要回去。”阿新說出自己的行程，也說出了心中的想法。

看着阿新猶豫不決，尤大力繼續勸說：“還是回去看看吧，你母親也老了，我們回去又不是為了榮宗耀祖，祇是盡一盡孝道。這麼多年了，其實我知道你也很想回去。雖然當初漂洋過海的決心那麼大，但這幾年過來，我知道自

己還是離不開那塊黃色的土地，我們這些游子就像風箏，無論飛得多遠，也總解不開身上那根纖細的繩索，無論走到天南海北也忘不了那片土地。”尤大力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離登機還有半個多小時，接着說：“老弟我給你說件親身經歷的事。我有個老戰友叫周大勇，我倆同年入伍，他是山東沂蒙老區的兵。打涼山時他是連長，我是指導員。我倆原來不在一個連隊，大勇的連隊百來號人就活下五個，我的連隊也傷亡過半，連長陣亡，周大勇帶着五個兵補充到我的連隊。從打涼山開始，我倆一直搭檔。打下涼山，我們連榮獲一等功。從涼山往回撤時，我們師斷後掩護，一路上不斷遇到越南人的襲擾，每天都有傷亡。就在回國前的一天，正好是大勇的生日，我叫人特意弄了幾瓶酒，正準備為他過生日。這時接到師部的緊急電話，我們師的野戰醫院被越南人的武裝偷襲，情況火急，師部要我們迅速集合前往救援。我們連離醫院僅隔一座山，走山路大約兩個鐘頭就能抵達。野戰醫院的那個山谷在地圖上叫做野狼谷，名字很不吉利。我們連隊趕到時，醫院的警衛班和傷員已經堅守陣地一個多鐘頭。越軍部隊有一百多人，火力很猛。我和周大勇兵分兩路包抄，激戰了半個小時越南人扔下幾十具屍體撤了。戰鬥結束，大勇還跟我說，明天就可以回到國境綫了，酒留着明日再喝，到時在祖國大門裏過生日。我倆當時在打掃戰場，誰也沒有想到還會出什麼事。一個越南的傷員就躺在我們五米遠的地方，這時天已經暗下來了，我還以為那是具屍體。那個混賬東西受了重傷居然還能開槍，周大勇哼了一聲倒在我懷裏，我的通信員把二十發子彈全打在那個家伙的身上。周大勇胸部中了兩槍，鮮血染紅了他的軍服和我的軍服。他臨死前對我說他想回家，請組織上把他的骨灰運回山東沂蒙老家。那時我們離國境綫祇有三十里路，眼看馬上就要回國了。我把大勇的骨灰帶回山東。那時烈士的骨灰通常埋在當地的烈士陵園裏，但首長特批大勇可以回家。我到了沂蒙山區才知道，大勇一家都是英雄。爺爺原來是沂蒙山的游擊隊員，在打日本人的時候死了。大勇爺爺的兩個兄弟也都死在戰場上。大勇的父親當時是軍區的政委。大勇是家裏的獨苗。我到了他們家的墓地，那是當地政府為他們家修建的烈士陵園，已經葬着大勇的祖父、兩個叔祖、兩個姑姑和一個叔叔。周大勇的叔叔在淮海戰役陣亡；一個姑姑在進軍上海時犧牲；另一個姑姑犧牲在朝鮮戰

場上。現在 he 可以和先輩們團聚了。我在大勇的陵前伫立了很久。大勇有個兒子，七九年時才一歲，現在也該是大小伙子了。後來每年大勇的生日裏，我都去沂蒙山，帶着高粱酒，在墳前給他過生日。我這次回去還要去沂蒙山，許多年沒有和大勇喝酒了……我說人對家鄉的眷戀有多深，有時連自己也不清楚，但人在將死時神智很清醒，從前的歲月一下子就濃縮成簡明的畫面，故鄉和童年往事都是美好的回憶。‘我要回家’，瑪麗這麼說；大勇也這麼說。無論是客死異鄉，抑或戰死疆場，都無一例外想念故土和親人。我說老弟啊，回去吧，一定要回家看看！”尤大力噙着泪滔滔不絕地訴說着馬革裹尸也要回家的故事，說到後來眼泪竟忍不住源源不斷地涌出眼眶。

哽咽了一陣，尤大力終於平靜下來，與阿新道別後，小心翼翼地拎着手提包徑直走向機場的安檢大門，從那裏跨進去就是海關，走過海關就算踏上回鄉的路。八年前從這裏進來時，沒有人會想到等待着自己的將是什麼，也沒有人想到將在這個陌生的國度一呆就是八年，而且今後還將一直生活下去，直至永恒。尤大力走過海關時心情復雜，他想起當年帶着連隊和周大勇的遺體走向國境綫時的情景，當初爲了保家衛國，自己可以毫不在惜犧牲流血，如今自己竟然是作爲一個外國人走回國門。兩種情景，兩種人生。爲了私情爲了愛自己遠走天涯，如今他把愛和心靈的創傷一起裝在骨灰盒裏帶回故土，從故土帶走的還給故土。通過海關，在長長的候機長廊兩邊有許多讓人悅目的商店，尤大力突然停下脚步，盯着一家珠寶店的炫目招牌，毅然走進去，在其中挑中了一條嵌藍寶石的項鏈。那顆寶石實在太美了，藍瑩瑩的寶石鑲嵌在一顆紅色桃心內，一條細細的項鏈挑着桃心，如果它能挂在瑪麗雪白光潔的脖子上簡直是天造地設般的相稱。這顆寶石後來攔在骨灰盒裏葬在上海公墓內。尤大力相信瑪麗躺在故土下仍然會看到澳大利亞藍瑩瑩的天空，藍幽幽的大海。

阿新獨自喝着咖啡。他故意提前幾個小時和尤大力來到機場，沒有告訴任何朋友。他知道自己和尤大力都是不喜歡朋友相送的人，他更願意此時靜靜地坐在這裏等候起飛。機場真是個十分奇怪的地方，讓人浮想聯翩，從這裏起飛，你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你選擇了一個方向，可能等待自己的就是一種人生際遇。當年從廣州起飛，落在悉尼就成就了現在的這個阿新，但無

論遇上哪一種際遇，人的本質並不會改變。這次繞道泰國，阿新心裏很清楚，這其實祇是自欺欺人，在精神上 he 永遠也無法擺脫珠江邊上的那塊土地。現在 he 仿佛已經嗅到那塊土地的氣息，是那麼的吸引和誘惑着他，但他又是矛盾和掙扎的。那片土地對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甚至害怕回到那片土地上，一切都在變化，他感到自己無力把握。從前的朋友是否依然熟識，而故土是否還記得 he 這麼一位飄泊海角的浪子，因爲八年的風雨總在人身上留下了某些印迹，不可抹去。今日的故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裏討生活，爲生活追逐。可他依然是八年前的那個窮小子，故土、故人會怎樣對待這個在外飄泊了八年、兩手依舊空空的浪子呢？阿新擔心這次回國會毀掉自己原先對故土的那片憧憬和向往之情，渴望變爲絕望。有時候保持一種距離一種神秘，未嘗不是更好。阿新很懷念從前的朋友，經常發着呆想象着一朝重逢時的激動與歡樂。去酒樓喝酒飲茶，胡吹神侃，他知道這種輕鬆的日子已經遠去，他害怕一旦見到從前的朋友却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是否還能像從前一樣無拘無束，一包方便面大家也可以分享。沒有錢的日子很平靜，沒有錢的朋友在一起活得很開心。他知道從前的哥們現在有的已經發達，可能個個都比 he 有錢，有錢的日子就很沉重，金錢改變了人們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人生與社會的坐標。

一個女人在尤大力空出的位子上坐下，將紅色的袖珍皮包輕輕攔在旁邊的椅子上。阿新聞到一股Dior香水的味道，那是一種很舒服的清香。女人用中文柔聲問道：“我可以在這裏坐下嗎？”阿新這才注意，這位打扮入時但不失高雅的女人竟是肖伊文。

“你不是已經坐下了嗎？”

“回國？第一次吧？”肖伊文嫣然一笑。

“不，去泰國，你呢？回國？聽說你現在在國內做大買賣，回國就如同去鄰家串門。”

“喔，我這是第六趟回去，這次去北京。你以爲進進出出有那麼輕鬆，我都覺得累死人了。”

“你這話我很耳熟，大凡女強人都這樣講話。肖小姐你可是中國留澳學生中不多的成功者！”

“謝謝，阿新先生！你嘴巴還是那麼不繞人，不過我很欣賞你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

“這麼說你不記恨我？當初我對你的可是很尖刻的，你真有這麼的寬容？”

肖伊文要了一杯摩卡咖啡和一包七星烟，點着烟，悠然地吸了幾口。阿新覺得她把烟霧全部都吞進了肚子才開了口：“阿新先生，我確實很欣賞你的才幹，你為中國學生所做的一切我都了解，不過你并不真的了解我，我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種人。”

“那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有興趣了解嗎？”

“反正我的飛機還早，有的是時間，願聽其詳。”

肖伊文用迂緩的語調開始了她的訴說：“我從小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很幸福，從小夢想當一名記者，走遍千山萬水，領略美好的河山、純樸的民風和萬象人間。但在十八歲那年我的夢想破滅了。那年我正準備高考，我的班主任很關心我，提出要為我單獨補課，還說我一定能考上北大中文系或人大的新聞系。我那時完全信任他，可你知道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以你阿新先生對這方面的特殊感悟，你肯定已經猜到。那個禽獸在第一次輔導的時候就強奸了我，還威脅我不許告訴任何人，如果我順從，他保證精心輔導讓我考進名牌大學。我當時害怕極了，也不敢告訴家人。這個人面獸心的家伙曾經是我奶奶的學生，我奶奶退休之前是這所中學的校長。我那時除了心慌意亂，根本無法專心復習。我去了外灘，在黃浦江邊徘徊了很久，但我沒有選擇去死，我不甘心就這樣結束生命。我本可以憑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學，但我最終沒有考上，而且是徹底的絕望了。家人都對我很吃驚，誰都以為我前程似錦，沒有人知道真相。你知道女人出了這種事情是一定要遮掩起來，所有不懂得遮掩的女人注定毀滅一生。我對男人的認識就從十八歲開始，男人沒有幾個是好東西，十有八九都是好色之徒，尤其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們即使身居高位，人模人樣，但在女人面前就原形畢露，這也是許多男人敗在女人身上的原因。我在十八歲認識了男人之後就了解了男人的全

部，所以以後的生活一直和各種不同的男人糾纏在一起。男人看重我的容貌，我也有我的目的。你以為我的丈夫李明是個什麼人？高幹子弟，可以為我謀到一份好工作。但他結婚前就是個花花公子，婚後還不老實，沾花惹草的事沒少幹。有了十八歲的經歷我已經對這看得很透了。男人祇是將女人視為花瓶和泄欲的工具，因此毀在女人身上的男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好色總要付出代價的。那個班主任後來又玩弄一名畢業班女生，結果把人家肚子弄大了，被判了十年，這也算一報還一報。在外頭我與許多男人周旋，丈夫對我也睜一眼閉一眼，反正他自個也不是省油的燈。我們一直没離婚，我公公愛面子，他生怕離婚會影響他們家的聲譽，也影響兒子的前途。我是自個掏錢出來留學的，當然這些錢都是男人們自願孝敬的。我和丈夫彼此就保留那一紙婚約，却各顧各的，你說那張紙能說明什麼？阿新先生你在報紙上把我寫成一個騷貨、一個妓女，這也沒什麼，反正我是一個已經死過一回的人了，什麼傷害比起十八歲那年都算不了什麼。你知道嗎，我去面試時，那個老威爾遜就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心裏很清楚那意味着什麼。上班第一天的下午威爾遜就跪在我面前說對我一見鐘情，遭到拒絕他就會去死之類令人作嘔的狗屁話。這老家伙太粗魯了，比豬還醜陋。曾經跪在我面前什麼樣的男人都有，什麼場面我都見過，但那回我是徹底失敗了。我當時反抗，我對那個老色狼說我們得談談條件，真的，我不能就這麼便宜了這個老家伙。我是要利用男人的弱點。你相信嗎？威爾遜在外頭堂堂儀表，一副正人君子風度，受人尊敬。就是這個威爾遜那天硬是將我按在沙發上，不容分說剥去我的衣服，我的一切反抗都無濟于事，我實際是被強奸的。完事之後他跟我說謝謝，就像對待妓女一樣。我後來才知道，其實被他玩弄過的女人不計其數，他有權有勢，背後還有幫會，誰敢不順從！你不是挺同情那個叫蘇珊的越南女人嗎？我和威爾遜同居以後，老家伙還經常找她來鬼混。我要的祇是利用威爾遜的頭銜在白人社會裏出人頭地。你知道我和總理夫人、州長夫人，還有一些著名政治家的夫人都是好朋友，這也許就是我所得到的好處。坦白地說，這個世界是屬於有錢有權有地位的男人和聰明漂亮的女人的。威爾遜有權有地位，他和黑社會往來十幾年，却堂而皇之地一直扮演着反幫會勢力的英雄，够虛偽的吧。威爾遜這個謀殺案是破不了的，我

猜警方從一開始就知道事件的真相，但他們不能不掩蓋，這是政治的需要。悉尼警察局的那位老局長不是一直聲稱無論如何都要把華福會的老大弄上法庭，可事情還沒有做成，自個就先被弄出了警察局，如今退休在家。這就是真實的社會。我相信我活得很真實，可能有人接受不了，但我無所謂。我得到威爾遜的部分遺產，但那也是我應得的，是我付出代價換來的。你們罵我無耻也無所謂，我覺得付出就得有回報。”肖依文說得很平靜，生活經歷已將她磨礪得不動聲色，就連抽烟的姿勢也是從容不迫、胸有成竹的樣子。

“是啊，色是刮骨鋼刀，女人要是存心報復男人，比什麼都厲害。肖小姐你很漂亮，也很優雅，這是打動男人的主要原因。順便問一句純屬個人隱私的問題，你現在有新的男友嗎？”

肖伊文淡然一笑，“你對我有興趣？你也想試試運氣？就不怕惹上晦氣？”

“我可沒那個膽量，這需要色膽包天的狠角兒，我扮演不了。我從前就很怕吃女人的虧，所以不敢捨身忘己。我的意思是你這樣的女人身邊總不缺乏男人，我的好奇心或者說職業本能讓我問問你現在的男友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我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我現在的男友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老總，我這趟回去就是和他拍板一樁生意。十八歲之前我很崇拜那些大男人，我覺得那些男人實在太了不起，頂天立地。現在則完全不同，我的經歷告訴我，很少有人能真正抵禦誘惑，就連議員也跪在我的跟前。當年那個肯尼迪總統和他的議員弟弟够體面了吧，還不一樣拜倒在瑪麗蓮•夢露的石榴裙下，爲了一個女人幾乎毀了前程。男人們的那些甜言蜜語，沒有一句是真話，我從心裏鄙視這些男人。我現在這個男友在北京有老婆有孩子，經濟學碩士，混到大公司的老總也算事業有成，但頭一回見我就完全失態變形，像饞貓一樣在我眼前轉悠，我和這家公司做生意有怎樣的好處我不說，你也可想而知。大家都說做個女強人難，這話祇說對了一半。有漂亮的臉蛋做女強人其實也不難。”

“你這話太可怕了，喜歡女人的男人都不要活了。我以後找女人要十分留意，我這人本來就不討女人歡心，可能因爲我的思維方式有點問題。我這人自

認爲是好色之徒，但不是餓狼，也不會像哈巴狗一樣跟着女人後面一顛一顛地跑，所以女人通常不喜歡我。漂亮女人對我當然有吸引力，玫瑰好看但帶刺，男人常常爲了獻殷勤而不惜流血。我不會這樣，所以我都找不太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自然也擺弄不了我。”

“你這樣倒是很怪，從心理學上來說是一種自卑心理而導致的思維與表達、感覺和行爲相悖的病態，不過你這樣的男人很有意思。我要找個可以無拘無束交談的异性對手很困難，男人在我面前多半都很做作，他們要表現自己的才華，大獻殷勤，語言誇張，動作也特別别扭，口若懸河，手舞足蹈，其實做作虛偽，越是有錢有勢的男人背後就越虛偽，都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肖伊文狡黠地笑着，又點燃一支烟，然後微微仰起尖尖的下巴，嘖着嘴唇輕輕吐出白色的烟圈，一個一個小烟圈穿過大烟圈，然後慢慢飄散。

阿新心裏暗想：這女人能看穿男人的五臟六腑，還能從別人的眼裏讀出心思，就連烟圈也吐得如此美妙，太危險了。

肖伊文接着說：“阿新先生，你要去泰國找刺激得多加小心哪，那裏的女人身上不僅帶刺還帶着艾滋病毒，千萬珍重。”

“我沒有錢去找刺激，就是走走看看，這個神秘國家不僅盛產妓女，還盛產佛寺廟宇，很有意思。你知道買直達機票去香港很花錢，去泰國轉機就省錢多了，我這樣兜個圈，既能省錢又能旅游。肖小組現在是有錢人，可能覺得如此兜圈子太浪費時間，我這人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

“你的意思是兜了一圈還是要回國，打算做什麼呢？廣州現在什麼都不需要，祇要有錢人。你回去兩袖清風，你不會喜歡廣州的，廣州也不喜歡你。我說你進去看幾眼，住上十天半月還得走人，你口袋裏沒幾個錢會很狼狽的。你千萬別把名片到處派，如今這世道有錢才是硬道理，誰會理睬一個什麼辦破報紙的記者。廣州的記者和外來民工的人數可能差不多，但沒有哪個記者的收入會高于民工。你千萬別說你在澳大利亞做記者，就說你在這裏打工，譬如在唐人街餐館洗碗什麼的。廣州人很會算，他們可以算出你在餐館裏洗了八年碗，吃住不要錢，一定是攢了十幾萬的澳元，可以和你談談話，或者給你一點比較好看的眼色。這年頭人都變得很勢利。今後想幹什麼呢？還繼續辦報紙寫那些

文章嗎？文人在哪兒都不好混。我在大陸見了一些有名氣的作家，非常可憐這些人，他們現在連寫什麼東西自己都搞不清。搞純文學的賣不出去，搞通俗文學又覺得俗氣，出賣自己的靈魂。從前文學很熱門的時候，人人都想當作家。現在人人都想着下海，作家被冷落。商人生產金錢，作家生產精神，精神不能變作物質、變作金錢，作家現在就没人要。原來當了作家的也找門路下海改行做商人，下不了海的就去寫通俗小說換柴米油鹽，就成了比商人還俗氣的小人物。當然也有一些作家不願隨波逐流，閉門寫作，但這樣的作家每天也要像家庭主婦一樣上街買菜，爲了一分一角與人討價還價，有時俗氣的甚至像個小市民。你說作家活得有多累。”

“我這人沒什麼本事，你說我還能做什麼？在國內我祇是個混混，無所事事，除了和人打架鬥毆。以前那個年代真是火紅的時代，我特別懷念那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的時代。我這人五音不全，但是唱語錄歌我特別帶勁，現在還能記得住歌詞。時光要是能够倒流我還願意回到那個年代。我在國內原來是做法警的，除了會使槍、打幾套拳、押犯人上刑場，也沒學別的本事，再後來就祇會耍嘴皮子。我母親給我找過個算命先生，那老頭說我是文曲星下凡，一生注定要喝墨水。我母親問能不能燒香拜佛捐點功德，把命改一改，不喝墨水。算命先生說了，人生有命，富貴在天，我命硬改不得。我相信這老先生的話，因此祇能賣字爲生。我這人要生在亂世，興許會有大出息，一旦太平盛世就成爲多餘的人。這八年我在這裏也算風光過，不怕你笑話，我連割草都不會，去朋友家幫人家割草，草沒割掉，還把割草機弄壞了。你看你現在有多風光，你這人活在什麼時代都會走紅，女人一旦紅火起來世界都會顫抖。讀過芭芭拉的《風流女富豪》嗎？我想你真該讀一讀。芭芭拉筆下那個叫埃瑪的女人，和你一樣年輕貌美，少女時就讓貴族少爺睡了并且懷了孩子。埃瑪比你還小的時候就被男人拋棄，她有過六個男人，依靠男人當然也依靠自己成爲了世界大富豪。她也帶着復仇的心走向社會。你比埃瑪更聰明，會成爲超級女富豪的。我以後就學芭芭拉·泰勒寫你的傳奇，既給同胞們逗樂，也爲自己解悶，還可以換點錢過日子。你把文人都看成可憐蟲。你忘了自己在西悉尼大學學文學時不也寫點散文隨筆，那味道很純的，說明你很有文學天賦。真

的，你要是繼續寫下去，一定在文學上很有造詣。不過你不屑去做一名作家，你瞧不起作家。因爲作家的那些可憐的稿費還不够你買化妝品的，你當然不會嘔心瀝血地去爬格子，而且那樣容易使人蒼老。你需要迷人的容顏，那是徵服男人的本錢。擺弄文學這個行當是最清苦的，沒文化的人弄不了，有本事的人又瞧不上，因此這個没出息的行業就留給不得志的人做吧，譬如像我這樣身無分文、又無一技之長的人。文學是農業社會或者不發達的工業社會的精神產品，李白、杜甫要是活在現在，可能比我還落魄，連方便面也吃不上。如今是信息社會，沒有多少人會有那份閑情坐在沙發上把一部厚厚的小說或者詩歌散文細細讀完，人們得養精蓄銳去應付生活的挑戰。文人們就十分潦倒落魄，就有滿腹牢騷。文人不喜歡社會進步太快，他們有時害怕高科技，信息高速公路會衝淡人們對文學僅有的一點殘存依戀，因此作家喜歡懷舊。你問我將來做什麼，你說我還能做什麼？如今大陸是一片商海汪洋，像你這樣有本事的人可以乘風破浪，在汪洋中沉浮。我這樣的酸文人祇能看看日落日出，潮漲潮落。我在澳大利亞沒什麼事做了，其實回到國內也一樣没事可做。從前的環境變化很大了，不再是我原來熟悉的世界，所以國內不會是我的歸宿。我屬於什麼地方呢？什麼地方都不是我的歸宿。我也祇好說自己是地球村公民，在哪兒都可以。文人面對失落的日子總是百感交集，很難拋棄過去。其實我的過去也很普通，在廣州不過是個小人物，要是從前的生活從前的故土就那麼好，那麼值得留戀，我還漂洋過海嗎？出國這麼多年也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會懷念從前，總以爲從前自己是有位置的。也許這是東西方文化差异太大造成的錯位和落差。像你這樣的女人絕對不會有什麼懷舊情結，祇往前看。男人與女人不同之處在于男人没可能用肉體去抵押下注，所以男人注定不能成爲贏家。”

阿新不知哪來的興致，竟滔滔不絕地發了一大通感慨，肖伊文竟也靜靜地聽完阿新喋喋不休的饒舌

“我看你這個人就是自怨自艾，牢騷太盛，所以才會弄出那些亂七八糟的話題文章。沒有人天生是商人的料，做生意就是要有一張厚臉皮，對着所有的過路人笑臉相迎，嘴巴甜一些。生意人就講究和氣生財，你還整天抱着什麼破小說消遣，說白了你這人文人習氣太重，骨子裏瞧不起生意人。我現在

專心做生意，沒時間懷舊，也不會考慮什麼歸宿之類沒有意義的東西，生意場上的女人總比男人聰明。這個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可那些男人酒足飯飽加上美色誘惑往往就不能自持，女人要善于利用這些，才能取勝，這也是人的生存之道。其實阿新先生你也可以下海試試，你對女人有戒備心理，有這種心理素質的男人適合闖蕩，女人打不垮的男人可以成就大事。真的，祇要你丟掉文人的臭毛病，把那些歸宿之類的話全扔進太平洋，你準能做成生意。好了，我該進關了，很願意結交你這樣的朋友，因為在我面前你能無動于衷，我們就可以開誠布公地聊聊。”肖伊文倒是很真誠，伸出柔嫩的手與阿新握了握，收拾好行裝，款款走向海關的檢查門。

阿新一直站在原地，直到肖伊文婀娜的背影消失在海關的安檢門裏。阿新有點呆若木鷄，心想這女人一定是個魔頭，沒有男人會在她的面前無動于衷。阿新也有過擁抱肖伊文的衝動，甚至想入非非與她在床上消魂的情景。但是阿新知道必須克制，必須在這個女魔頭面前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如此才能保持一貫獨立的形象。旦凡與肖伊文上過床的男人，無不被這個女人利用和在心底蔑視。阿新努力抑制着自己在肖伊文面前的情緒與衝動。不過肖伊文那句“女人打不垮的男人可成就大事”的話倒使他有些飄飄然了。

阿新回味的思緒被關東北的大嗓門打斷了。他循聲看去，好家伙，悉尼的幾大“名人”都聚在這裏。

“我一早給你打電話，沒有人接。原來你一個人在這躲清淨啊。這回好啦，我們可以結伴回國了。”關東北依舊大嗓門，高亢的音調引來候機廳裏其他人的側目。

中國人素來喜歡在公眾場合大大咧咧地叫喊，這和西方一貫的公眾道德禮數大相徑庭，但是中國人改不了這種傳統的脾氣。關東北在國會大廈廣場都敢引亢高歌，在候機廳這樣一個公眾場所就更加肆無忌憚。

“關老哥，你我從來就不是同路人，我去泰國，不能參加你們的觀光團了。”阿新回應道。

馬紅軍這時也趕上來：“你這人哪又犯毛病了，想去玩泰國人妖還是妓女，小心別碰童妓，澳大利亞剛剛通過法律，狎玩童妓屬犯罪行爲。”

“阿新膽小，絕不敢去碰泰國女人。如果是馬大哥、關大哥，我倒十分擔心，你們倆都是烈性漢子，肯定受不了泰國女人的挑逗，一定會情陷溫柔鄉嘍！”夢露也跟上來。

“還是夢露了解，一夜夫妻百日恩嘛。可阿新哪是老實人，去了泰國一定另有企圖。”馬紅軍陰陽怪氣地說。

“没人說我是老實人。我這人壞透了，這點連我自己都很清楚。請問馬主席，您此番回國又有什麼企圖呢？是不是回國推銷你的民主建國計劃，你可是澳大利亞大名鼎鼎的‘中國民主研究會’的主席啊，小心到時有人找你的麻煩！”阿新半開着玩笑。

“我會有什麼麻煩，能有什麼麻煩。什麼民主研究會，那還是逞一時之快嗎？誰能保證年青時不衝動。過去的就過去了，那塊研究會的牌子我早就讓清潔工扔進垃圾筒了。再說我那時不也是爲了帮助大家辦居留時有個名份嗎？這些我早就一五一十地向大使館的陳大使報告了。反正那個研究會也沒幹過什麼，你阿新不也曾在我那挂了個秘書長的名頭，你又參加過幾回，我現在可是注册的悉尼‘亞洲藝術中心’的主席了。這次回國，我帶了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歡樂的土著人》，還將親自演奏，把自己的才藝展示給國內同胞！”馬紅軍說話從來都是這樣理直氣壯。

阿新打斷馬紅軍的話，戲謔道：“想不到啊，我們的馬主席，一代學生領袖，戎馬倥傯的老馬，現在搖身一變，皈依藝術，重新擁抱謬斯。但是，我有一個疑問，你這麼多年沒拉琴了，看你手指都肥嘟嘟的還能拉嗎？”

夢露一旁哈哈大笑，打斷了阿新的話：“阿新你這個人啊，說話就是尖酸刻薄，人家馬大哥這次是千真萬確是受了邀請回國的。馬大哥，快把請柬拿出來亮亮，免得他這麼損人。人家馬主席就不會在家偷偷練？我看沒有問題，姜還是老的辣。至于指法，馬主席無論是打老虎機還是點鈔票那都不是在練指法嗎？哪裏會生疏。我相信馬大哥演出一定成功！”

“夢露你真行啊，馬屁拍得響！”阿新笑道。

馬紅軍一本正經地說：“這次演奏由中央樂團伴奏，他們已經排練半個多月了。我對這次演奏很有信心，《歡樂的土著人》每個音符都浸透着我多年的

心血和夢想。這次我可是代表全澳的中國留學生，我一定要為大家爭光！”說着馬紅軍還真有點熱淚盈眶。

阿新說：“老馬你是民運搞手馬主席，又是掙錢能手馬百萬，現在丟下主席和百萬富翁不當去玩小提琴，豈不可惜？”

馬紅軍皺了皺眉頭，但還是沒有發作，故裝大度地說：“你這人真沒治了，我看你這樣玩世不恭會毀了自己的。過去是過去，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形勢變了，識時務者為俊杰，我不僅重拾我的專業，重新找回我的理想和追求搞音樂，而且北京的朋友還邀我一起在北京辦個藝術俱樂部，我以外商身份投資，這樣音樂經商兩不誤，魚與熊掌可兼得了。哈哈……”

阿新說：“馬主席不愧是馬主席，永遠站在風口浪尖，好處全都讓你占去了。老關，你怎麼樣？這次也是回去當俊杰？聽說你老關是去當什麼大學的講師，够有面子的，你原來的民主會難道也和老馬的一樣不幹了嗎？”

“什麼民主會不民主會的，居留一到手我手下那幾個人就散伙了，有了居留誰還幹那事啊，再說現在幹那事能當飯吃嗎？有誰聽？早就算了。我這次回去是受母校聘請，當客座教授，不是講師。”關東北一字一頓地說得很認真。

“關大哥真的當教授了？”夢露驚訝地叫起來，“原來有人說你的教授好像不地道，這回當教授，總該是真的了吧！”

衆人一聽不由地相視一笑。

“教授哪還有假的？我們老關是這種人嗎？”阿新說道。

關東北有些尷尬：“當然是教授，學校的聘書都發來了，我攔在旅行包裏掏出來不方便。”說着彎下腰，做出要掏旅行包的樣子。

“不必，不必，大家祇是開個玩笑，何必當真呢。不過老關，現如今國內教授是窮得叮當響，可没人願意幹，很多人都改行下海了。”阿新拉住了關東北。

“對，要說某個大公司聘你去做個總經理什麼的，薪水五萬、十萬的，那我們會特崇拜你。你拿個破教授當作時髦來炫耀，可見你這個人不識如今的潮流。真的，大款們幾頓飯、幾支歌就够國內的教授們掙一輩子的。”馬紅軍仿佛像得着一個機會似的在一旁攻擊着。

關東北并不理會馬紅軍，却衝着阿新反駁：“阿新，你在悉尼也算個文化人，什麼時候同流合污，也和有些人一樣變得這麼俗氣，錢能買到的品格學識嗎？再說我當教授又不是爲了錢。”

“好，好，人各有志，教授不是不可以去做，我們大家已經認可你是關教授了。請問教授，你這次回去上的什麼課，是中國人權、民主革命，還是政治避難、居留權呢？”阿新見關東北衝着自己來了，輕輕來了個四兩撥千斤。

“夢露說得真對，你這人說話就是不積德，哪壺不開提哪壺，還翻什麼老皇歷。這回我可真是身負重任，學校要我開“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課，我連講義都寫好了。這幾年在澳洲，面包咖啡沒少吃，西方人的政治也接觸過，有名的議員、部長我也打過交道，連國會大廈我也進去過，耳濡目染，民主這東西不過如此。說到底，有沒有實力才是說話辦事的硬道理，其他全是廢話，你沒實力還有誰聽你的。”

“那你可千萬別把國會門前絕食、包圍維拉中心、在貝爾蒙公園高呼口號、用同胞的血汗錢去買奔馳、下館子吃大龍蝦之類也當作西方文化介紹回去。嘻嘻……”阿新挖苦道。

夢露也跟風：“關教授，你別亂比較。我建議你回母校開個講座就算啦，隨便說說澳洲的風情啊、土著人啊、袋鼠啊，還有政客的醜聞、英王十字街區的紅燈區之類的就行了，反正這些都是你在澳洲的見聞，想怎麼說都可以，既不會鬧出笑話，教授還可以照做。人家馬大哥回去上電視給咱們露臉，那才是大氣派。”

“真叫你說對了，這次回國我還爲了一件事，我將在C市府禮堂開講座，講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比較》，他們定的，很有挑戰性。”關東北說。

夢露故作驚詫地又一次尖叫起來：“關大哥，這個題目你可不能講，兩個主義的比較，我看你還是講講中澳兩個文化的比較好一些，起碼沒有太大的政治風險。如果講溜了嘴，擔心座上客變成階下囚嘍。”

“你怎麼也學着和阿新一樣刁難人了。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阿新多了，嘴皮子都變成刀片了。我說夢露，你說說你自個吧，這回去中國做什

麼，還是找男人？”

夢露說：“太對了，我不找男人回去幹什麼？上海的男人滿街都是，隨便去揀一個就是。我没有你們兩位那麼高尚，又是電視臺邀請，又是作報告，神氣活現的。我的興趣祇有男人和寫作，既不高尚也不俗氣。”

“你是個很有才氣的女作家，這樣不可惜嗎？”馬紅軍在一旁苦口婆心，“應該寫些嚴肅的作品。你和阿新從前寫得那些哪裏能讓人看下去？文字污染啊，不能再這麼寫了。你完全可以將我們這幾萬的新移民艱辛奮鬥寫一寫嘛。我的意思咱們應該幹出點名堂。留美的那幫學生就很神氣，國內的電視、報紙就經常報導他們的情況，好像就祇有他們有報國之心。我們這些人也算是留澳中國人的名人，我們完全可以代表幾萬同胞和國內有關部門洽談，進行文化交流、商務考察和教育投資，總之什麼都可以。我還想請國內電視臺到澳洲來，將這裏中國學生的奮鬥歷程拍成故事片。阿新和夢露你們可以來組織劇本，我負責公關，祇要我們擰成一股繩，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來。”

“對，我在中央電視臺也有個鐵哥們，原來也在這裏留過學，現在是節目的主編，我叫他派個攝制組來準沒有問題。我也可以寫本子，題目就叫《中國留學生在澳洲》，通過實景拍攝展現四萬多中國留學生八年的艱苦歲月，激勵青年人發奮圖強，為國爭光。”關東北說。

夢露說：“唉，關大哥馬大哥，我真的不認識你們了，你們真比川劇變臉還快，說話的調門高得叫人吃不消，比國內作報告的還高調。”

馬紅軍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此一時彼一時了，你這麼聰明的人連這點起碼的都不懂。如今國內發展這麼快，什麼人都去大陸找機會，我們這些真正來自國內的怎麼能袖手旁觀？我們現在就要重新規劃自己的未來，再等都要讓潮流給淘汰了，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我有個設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做不成大事的，我們應該組建一個能够代表全體新移民的社團。我歷來就反對同鄉會的那種把戲，我們不同于老一代華人，他們那時候缺少資訊聯系，文化水平又低，所以祇能在同鄉之間建立小團體；我們這幾萬人都受過良好教育，也是作為一個整體留在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起新的民族社區。這些設想一旦成為現實，將是偉大的成就，我們的後代生活在澳大利亞就如同生活在中國一樣。”

阿新先鼓起掌來，很熱烈地鼓掌，歪着脖子，眼睛細眯着看着異常激動而漲紅臉的馬紅軍；夢露稍頃也鼓起掌來，輕輕地很緩慢地有板有眼地鼓起掌來，臉上似笑非笑的模樣；然後是送行的一幹人鼓起掌，他們相互看着，莫名其妙地跟着鼓掌。

關東北在掌聲稀落時慷慨陳詞：“這些設想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實現，我以為我們的眼光應當更加遠大，我們本來就是最棒的。不是澳大利亞政府拖了這麼多年，我們做得一定比留美的學生出色得多。原來搞民主運動時，我們起步雖然晚一些，但幾個月下來就把留美、留歐的全比下去了，現在一樣可以。我這次回國就要到處吹風，我會告訴國內，不出幾年我們這些人中可能就會有國會議員。中國人不僅能開餐館，也能成為西方主流社會的佼佼者。”

阿新又一次熱烈地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這時人群中擠出一位一頭栗色頭髮的白人，徑直走到阿新的面前用有些僵硬的中國話問：“你好，阿新先生，還記得我嗎？大衛，《悉尼晨鋒報》的記者。”

“當然，你還好吧？大衛，那年在國會大廈廣場你採訪我，還想偷偷給我塞面包。”

大衛說：“可你拒絕了我的好意。你們剛才談得很有趣。我也正要去北京，我們可能同一個航班，我準備去報社駐北京的辦事處工作。”

阿新一一將在場的列位介紹給大衛。大衛與眾人握手示意，“馬先生、關先生，我們可是早就認識的，你們都是中國留學生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没有見過夢露小姐，不過讀過你的作品。”

馬紅軍說：“大衛先生，你要在北京工作，這太好了，我就是北京人，在北京政界和文化界都很熟，我可以給你引薦，有什麼困難找我就行。我這次回國將演奏我的創作作品《歡樂的土著人》，這是我多年的心血結晶，希望大衛先生能大力報導。”馬紅軍立即抓住時機推銷自己。

關東北插話說：“大衛先生是悉尼的名記者，我讀過你寫的文章，太生動太精彩了。大衛先生可能沒去過C市，那是座非常美麗的北方海濱城市，大衛先生有空應該去走一走。我今年三月在那裏會有一個重要演講，是當地的市政府專門為我舉辦的，屆時還希望大衛先生能够撥冗光臨採訪。這不是我的私

事，我是代表幾萬名中國的新移民所作的一次報告。”關東北也不示弱。

大衛說：“我對你們這個新移民群體很有興趣，我相信你們留在澳大利亞有許多事要做。我很喜歡中國，你們的文化很迷人，現在又是世界關注的中心，所以我主動要求去中國工作。我也會去各地走走看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已經發生了令人驚奇的變化，我的工作就是將那裏變化的一切告訴澳大利亞人。”

“大衛先生，你一定要答應報導馬先生和關先生的事迹，他們真的非常了不起，正在為我們這些留學生的新移民描繪未來的藍圖呢！”夢露也插上一句。

“大衛是我們的老朋友，這點忙肯定會幫的。”阿新也說，“馬先生和關先生他們這回作為中澳民間的使者回國搭橋架梁，要在中國和澳洲之間架起各方面廣泛交流的橋梁，大衛一定會關注他們的活動的。《悉尼晨鋒報》在澳大利亞是一家具有權威和廣泛影響力的報紙，我們大家都需要你的支持。”

“阿新先生，此番回國你有什麼打算呢？”大衛問到。

“我現在還沒具體的計劃，準備這次先去泰國，然後再到香港。”阿新說，“我還在猶豫，近鄉情怯啊！”

大衛又問：“阿新先生今後還做報社的總編嗎？我知道這裏的許多中國人現在都想回去做生意，你們管這叫下海。”

“我這個人不大會游泳，所以不敢下海。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阿新反問：“你的那個辦事處需要文員或者清潔工嗎？或者司機、向導之類的也行，我為你打工，你付我薪水就行。”

“哈……”大衛笑起來，“阿新先生真會開玩笑，你是一家在悉尼華人社區中鼎鼎大名報社的總編，我的那個辦事處廟小，怕容不下你這個大和尚？”

阿新也哈哈大笑：“大衛，沒想到你還沒到中國，就已經是中國通了，連中國的諺語都會說。你知道我的報社有多大嗎？告訴你，那間office可能祇比《悉尼晨鋒報》的衛生間大不了多少；你們的報社有幾千號人吧，我的報社的員工到現在也祇有三個；就算我把你們堆在倉庫裏的舊報紙當廢紙賣了，也够《新大陸時報》吃上好幾年的。”

大衛以為阿新在開玩笑，睜大了眼睛：“真的嗎？你一向是很幽默的。你的報紙不僅在中國留學生中很有影響力，連政府、國會圖書館都關注你的報紙，我們報社的資料室也可以看到你的消息。你說祇有三個人辦一家時報，這不是真的吧？太不可思議了！”

夢露進一步證實，“大衛先生，你有所不知，他辦報却常常得吃方便面度日，有時連社長尤大力先生自己都領不到薪水。”

“他們的報社太保守了，讓我來辦準賺錢。”關東北又扯開他特有的大嗓門。

“你老關向來是吹牛不打草稿的，你對辦報懂得多少，辦報紙太不容易了，沒錢能辦得了什麼報紙！”馬紅軍說。

大衛很是吃驚：“你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嗎？三個人也成立一家報社，那太不簡單了！《新大陸時報》在悉尼華人中確實很有影響，這是你們的成就。媒體這一行是要有一種特別的專心，我當初選擇新聞專業，就是因為我熱愛這個專業，輿論對公眾有很大的引導作用。這幾年澳洲有不少政治家醜聞敗露下臺，就是因為《悉尼晨鋒報》的報導披露。公眾生活需要記者，這是記者職業的榮譽感。我看阿新先生很適合幹這一行，思維敏捷，還有讓我佩服的敬業精神。”

阿新坦言：“其實我祇想要一份工作。如果有哪一家大報社願意僱我，我就不必再吃方便面了，一定會更加兢兢業業無所畏懼。大衛，不瞞你說，我和社長尤大力先生經常為付不起印刷費煩惱，吃飯當然也成問題。要知道在英語社會裏辦一份華文報紙是相當困難的，而且就憑幾個人白手起家，我真的沒有信心。馬先生他有幾百萬的存款，但是他是不會拿出來資助我們；關先生也有能力辦報，還可以賺錢，我曾經誠懇地希望他能買下我們的報社，祇要能按時開工資，我願意為他服務，當然這報紙首先一定要有真實公正的品格，假教授沒有關係，但如果是假消息就會引起社會的譴責。不過關先生現在可沒有心思買下我的報社，他要回國去當真教授了，無暇顧及小小的《新大陸時報》。我現在沒有選擇的餘地，既然你也不要我做清潔工，我祇好和尤先生繼續慘淡經營了。”阿新故意說得很可憐。

夢露在一旁搭腔：“你這個人就是腦筋不開竅。我現在一邊領失業救濟金，一邊做專職作家，給報紙寫專欄，活得很自在。我看你也別做什麼總編，跟我一塊領失業金吧，你還可以照樣在報紙上寫你的文章，多自在。可你就是餓死了也不願去領，你們說這是不是有病？領失業金怎麼啦，這是澳大利亞社會的福利嘛，不領白不領。人家關大哥不也領過救濟金，現在不照樣人五人六地回國做教授嗎？”

關東北急着辯白：“我那是真困難，我又沒有百萬存款，走投無路才去領的。這種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我發誓不會白領這些錢，會對社會作出回報，特別是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政治、文化、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溝通與合作。”

“算啦，老關，別說大話啦！”馬紅軍搶過話頭，“我說你們東北人是不是都這麼愛吹牛。你一直對我眼紅。話說回來，就算我自個印鈔票，也要花許多時間才能弄出來，你真以為這錢那麼容易就賺到手？我說過我沒有錢，你們可以查賬嘛，整天盯着我不放，有沒有意思？我看你們是太無聊了！”

“喔，對了，馬先生，中國學生都管你叫馬百萬，這一點連我都知道，你可是澳大利亞中國學生裏的第一個百萬富翁。”大衛在一旁插話。

“這是造謠，大衛先生，這純粹是造謠，我要真有一百萬早買海邊別墅了。”馬紅軍再次漲紅了臉，“我這幾年辛辛苦苦為中國學生的定居操勞，反倒挨了許多人的罵。這是為什麼？大衛先生，中國人不僅有優秀的文化傳統，也承繼了一些民族劣根，這一點中國的魯迅先生看得最深刻。我是搞音樂的，不是政治家，但那時中國學生實在太困難，需要我出來為大家工作，我真心樂意。當初中國學生請求我幫助他們的時候，那也是很感人的場面，一百萬就是他們自願捐款集資打官司的，政府後來公布的居留方案就是這種壓力的結果。我馬紅軍絕不會貪污其中的一分錢，全用在刀刃上了，事情也辦成了，大家的綠卡不都拿到手了嗎？現在有人要我還那一百萬，這不是過河拆橋、無理取鬧嗎？”

阿新說：“老馬你也別着急，有時候為了大家受點委屈也是應該的。再說你那個官司本來就雷聲大雨點小，根本就没有打起來，也沒花多少錢。反正没人叫你吧錢交出來，再說有些錢早就變成鮑魚、龍蝦了，怎麼可能要得回來？

我的意思是說大家應當向前看，老馬如今決定回國，從前的事大家就既往不咎了。我衷心祝願兩位走運！”

這時，不知誰在人群中提醒：“到點了，該進海關了。”于是眾人前呼後擁地準備走向安檢大門。

阿新在和這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們一一道別時，關東北仍不忘拉着他的手：“老弟，怎麼說大家都是朋友，回國一定要聯系我，大伙一起去北京，到時叫老馬陪我們，夢露小姐是一定去的，大衛先生也在北京，到時我們在天安門樓前留個影，這可是有歷史意義的。”

“嗯，這個想法很有意思。祇要你們在北京聚會，我一定會參加你們的活動。”大衛說。

夢露也說：“就是，就是，我可有好多年沒去長城了，在那裏拍照一定很有意思，我會去的。大衛先生，到時可要替我拍張在長城上的photo登在報上喔。”

大伙兒熱烈地握手擁抱，關東北與馬紅軍的眼眶裏似乎還亮晶晶的，阿新此時也有些被感動了。無論過去他和這些悉尼的風雲人物有過怎樣的瓜葛，但現在畢竟都過去了。

飛往曼谷的航班終於可以登機了。阿新在一步步走向的安檢大門的時候，心中不由地感慨，機場真是個奇妙的地方，飛機的升降起落就是人生的聚合分離，也許這次旅行會再次改變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誰知道呢？

1997年4月草于悉尼

海角浪子

作者：平德

編輯：榮山

排版制作：冷澤江

出版發行：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電話：(852) 23305870

傳真：(852) 23642320

郵箱：szekam2001@yahoo.com.hk

承印：香港秀麗印刷有限公司

郵箱：zetv88@163.com

開本：787mm × 1092mm 1/16

字數：160千字

印張：15張

版次：二〇一一年十月第一版

ISBN：978-962-962-314-2

定價：HK\$80元

版權所有，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複印或轉載